中国经济发展

理论与实践研究

Studi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解读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 探讨新的国际背景下中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论证中国经济稳健发展的政策环境与现实依据

彭刚 黄卫平 郭郁彬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Studi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ISBN 7-300-05310-6

9 787300 053103 >

ISBN 7-300-05310-6/F · 1639

定价：24.00元


国家教育部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
彭刚 黄卫平 郭郁彬 著
Studies on Theory and Practic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
中国经济发展
理论与实践研究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彭刚等著.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

ISBN 7-300-05310-6/F·1639

Ⅰ. 中…
Ⅱ. 彭…
Ⅲ. 经济发展-研究-中国
Ⅳ. F12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04910 号

中国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研究
彭　刚　黄卫平　郭郁彬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 31 号	邮政编码	100080
电　话	010－62511242（总编室）		010－62511239（出版部）
	010－62515351（邮购部）		010－62514148（门市部）
网　址	http://www.crup.com.cn http://www.ttrnet.com(人大教研网)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东方圣雅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版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　张	12.125 插页 1	印　次	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336 000	定　价	24.00 元

百年沧桑话发展*

（代前言）

无论是对于当代中国还是对于整个世界，20世纪都是一个风起云涌、天翻地覆的伟大时代。在这已经成为历史的、既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百年中，曾经发生过一系列决定人类历史命运、改变社会发展进程的伟大事件。然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考察，在这一百年中留给人类历史最为深刻的烙印，则是第三世界的蓬勃兴起、经济发展理论的广泛传播和占人类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在谋求经济发展过程中所取得的辉煌成绩和所遭遇的严重挫折。20世纪留给人类社会最重要的历史遗产，就是几乎所有经济落后的国家和民族都在这一百

年中先后走上了摆脱贫困、振兴经济、谋求发展的道路，它们在自立、自信、自强的基础上，怀着与经济先行发展国同样的心态，去迎接新的世纪赋予人类的机遇和挑战；以世界大家庭平等一员的身份，去共同开创人类历史的崭新纪元。

二

众所周知，一部世界近代史，从根本上来说，就是一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对落后民族和国家侵略、剥削、凌辱、掠夺的历史。经济先行发展国家从不发达向发达的转化与经济落后国家一步步沦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是同一历史进程的两个不同的方面。按照列宁的说法，到20世纪初，帝国主义列强已经将世界瓜分完毕（列宁，1916），处于殖民统治下的落后国家和民族，所面临的只能是任人宰割的悲惨命运。它们根本就无法产生谋求发展的动机和愿望，或者即使有这样的想法，也难以如愿以偿。在西方经济增长与发展思想史中，著名的“沉寂的一百年”，实际上所反映的就是从1850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这一时期，在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剥削和掠夺下，落后国家和民族在经济发展实践上的空白。20世纪初叶，虽然拉丁美洲的一些国家已经争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但它们只是获得了政治上的解放，在经济上仍然是西欧和美国的附庸。而亚非拉的广大国家和地区，依然处在前资本主义发展阶段，振兴和发展经济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有着悠久的历史、灿烂的文明，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然而，1840年以后，帝国主义用利炮坚船打开了古老中国的大门，这个曾经繁荣强盛，在经济、科技、文化等各个方面都遥遥走在世界前列的封建帝国，在西方列强的侵略、掠夺、宰割和剥削下，一步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到20世纪初，封建王朝摇摇欲坠，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内忧外患、危机四伏。仅就经济发展而言，据

统计，到辛亥革命爆发时的1911年，全国共有近代工厂615家，资本总额23 258万元，其中中国人办的工厂为521家，资本为13 232万元，占资本总额的56.89%；其中民营工厂419家，资本8 855余万元，占资本总额的38.07%；官办或官商合办的工厂66家，资本4 377万元，占资本总额的18.82%；外资工矿94家，资本7 247万元，占资本总额31.2%；中外合资工厂36家，资本2 753万元，占资本总额11.84%。或许这就是当时中国工矿企业的全部家底了。民办企业规模狭小，百人以上的企业非常罕见，仅有7～9个工人的小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8%以上[①]，并且技术设备落后，操作方法简单，生产的产品成本高、质量低，缺乏竞争力。

从交通运输业的发展来看，以铁路运输为例，中国是世界上地域最为辽阔的国家之一，可是直到1865年，才有英商杜兰德在北京宣武门外修造的一条一里多长的小铁路，这算是开了中国修建铁路的先河。可就是这样一条"铁路"，不久就被清政府下令拆毁了。在民国以前的40余年中，中国共修筑铁路21条，总长度为9 719公里。其中13条是由清政府借用外资、技术和设备，由中国人经营的，长度为5 193公里，占总长度的53%；由中国民间集资或由私人投资兴建的铁路有4条，长度为666公里，占总长度的7%；完全由外国人修筑并经营管理的有4条，长度为3 760公里，占总长度的39%。这些铁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当时中国经济的发展，但是外国资本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强化对中国的政治控制和经济掠夺，这导致了中国主权的进一步丧失。例如东北和山东的铁路基本上为日本、俄国和德国所占有，他们在这些地方任意开矿、伐木、征税，甚至驻军、设警等，铁路沿线地区几乎全部沦为这些国家的殖民地。

再以对外贸易为例。鸦片战争以前，中国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国家，拥有独立的对外贸易权。外国资本来中国做生意，要受到中国政府的政策制约。两次鸦片战争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使中

① 林载爵：《中国近百年经济史》，46页，台湾，台湾世文出版社，1987。

国的主权日益沦丧，外贸与海关被外国列强所控制，鸦片贸易合法化，外国商人可以自由地进入内地做生意，中国的对外贸易迅速由出超变为入超。到辛亥革命前夜，外国资本对中国的进口已经没有什么障碍了。如果摈除鸦片贸易，1887 年以前，中国的对外贸易一直是“出超”的，可从 1888 年开始出现入超，以后逐年上升。到 1911 年，出口总值为 37 733.8 万海关两，进口总值为 47 150.4 万海关两，即自 1901 年起，每年的入超数均在 1 亿海关两左右。[①]根据法国著名中国历史学家白吉尔教授提供的数据，到 1913 年，中国的外贸总额与全国人口总数的比值，仅为 1.61 美元。尽管中国当时在世界上已是一个人口大国，但这区区一个多美元的人均贸易额，也实在是有点少得可怜了。[②] 至于当时国民，尤其是广大农民收入的低下、生活的困苦，更是世界上所罕见的。

面对西方列强的侵略、剥削、凌辱，中国也不乏志士仁人，试图向西方寻求富民强国的真理，探寻中国自立自强的途径。他们或尝试建立民主共和政体，或推崇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提出“立宪救国”、“共和救国”、“实业救国”、“教育救国”、“科技救国”，掀起一次次投资热、设厂热、筑路热、开矿热、国货热，展现了新生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创业自立、报国惠民的勇气与激情。其中最为杰出的代表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1919 年，孙中山在《远东时报》6 月号上发表了他用英文写成的《实业计划》（原名为“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在这个使“中国现代化并将中国改变成工业化社会的伟大计划”（白吉尔，1986）中，孙中山写道：“当革命破坏告成之际，建设发端之始，予乃不禁兴高采烈，欲以予生平之抱负与积年研究之所得，定为建国计划，举而行之，以冀一跃而登中国于富强

---

① 陆仰渊、方庆秋：《民国社会经济史》，38～39 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1。

② ［法］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29 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

隆盛之地焉。"① 他满怀着兴邦富民的一腔激情，经过深入的研究和考察，规划出使自己的祖国与同胞摆脱贫困落后、走向富裕繁荣的宏伟蓝图，为谋求经济的迅速发展提出了一系列政策建议和战略构想。

孙中山认为中国要振兴实业、实现现代化，首先要发展交通，交通中又以铁路建设为重点（正如今天的所谓"要致富，先修路"）。他认为"交通为实业之母，铁道又为交通之母"，并把一个国家拥有铁路的多少视为衡量这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标志，指出"国家之贫富，可以铁道之多寡定之，地方之苦乐，可以铁道之远近计之"。他对建设铁路几乎抱着一种至高至上的虔诚，甚至提出"民国生死存亡皆系于此举"，计划利用外资，在 10 年内建成 10 万公里铁路。他在《实业计划》中规划要建海港、修铁路、公路，组建沿海和远洋商船队，治理、改良内河水系。提出要在长江上修筑大坝，截流发电，在陆地上修建横贯欧亚的铁路大动脉，从中国的北方大港直达好望角。而要搞如此宏大的基础建设，以当时中国的国力、财力来说，显然是远远不够的。因此孙中山始终强调欲求中国的经济发展，必须要利用外资，实行门户开放的政策，主张"利用外国资本主义在中国建立社会主义"。为了能从西方国家获得资金，他提出可以请外国人承包筑路，然后出租路权，期满之后再行赎回。孙中山特别强调要争取主动地发展，即要把经济发展之权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这就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政府。对内统筹经济，对外抵御外强，为此孙中山主张建立一个"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并为此奋斗了一生。他还提出要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公平分配收入、吸引外国人才、保持适度人口等一系列促进经济发展、加快社会进步的思想。此外，他认为中国实业的发展应从两个方面同时进行，即凡是可以由个人经营，或由个人经营比国家经营更为适宜的，统统应交予个人经营，从而要充分发展个人企业，而个人不能经营的则应由政府经营的经营策略和加强沿海与内地的经济文化

① 孙中山：《建国方略》，5 页，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

交流，鼓励沿海对内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支持，保持沿海与内地、东部与西部的协调发展。这些思想也都是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极富创见并对当代中国的经济发展颇具指导意义。然而，由于当时中国所处的内忧外患的历史环境，加上后来三座大山的沉重压榨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黑暗统治，孙中山这些富民强国的宏图大略无从实现。到 1949 年，中国的工农业总产值只有 466.1 亿元（人民币），人均 86 元；钢 15.8 万吨，相当于英国 1870 年的产量；煤 3 243万吨，相当于美国 1870 年的产量，比英国 1850 年的产量还少 1 000 多万吨；石油 12 万吨，不及美国 1861 年至 1865 年平均产量的一半；发电量 43.1 亿度，接近美国 1902 年的水平；粮食 11 320万吨，比美国 1876 年的产量还少 4 000 多万吨；棉布 18.9 亿米，不到美国 1737 年产量的 1/4。根据联合国的地区组织亚洲及太平洋和社会委员会所提供的数据，1949 年的各国人均国民收入，美国是 1 453 美元，西欧是 437 美元，亚洲平均是 44 美元，其中日本为 100 美元，印度为 57 美元，而中国仅为 27 美元，在亚洲居倒数第一。① 事实表明，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国度里，没有国家真正的独立和自主，没有一个强盛的、有独立决策能力和高效率的政府，经济是无法得到发展的。

二

194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亿万中国人民在政治上翻身获得了解放，也为贫穷落后的中国摆脱贫困、谋求经济发展提供了政治前提。经过 3 年的经济恢复时期，中共中央于 1952 年提出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的总路线。这条总路线要求：第一，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

① 齐大方、任安泰：《百年沉浮——近代中国民族工商业的发展道路》，335～336 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

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断壮大社会主义公有经济的力量，将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国；第二，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条总路线的实质是将生产资料私有制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公有制，迅速发展生产力。根据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国家制定了1953—1957年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前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的、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初步的基础。根据李富春同志在《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中所提出的指标，在第一个五年计划期内，全国经济建设和文化教育建设的支出总额为766.4亿元，其中基本建设投资427.4亿元，占支出总额的55.8%；5年内，工业基本建设和改建的单位，包括苏联帮助中国建设的单位在内，限额以上的有1 600多个，限额以下的6 000多个；农业和水利方面新建国营机械化农场91个，建设13个大型水库，并将开始进行黄河的治本工程。此外还规定5年内房屋建筑面积1.5亿平方米，工业每年增长速度为14.2%。

“一五”计划进行得很顺利，5年中工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0.9%，其中工业总产值增长18%，农业总产值增长4.5%。1952年7月，成渝铁路全线通车。这条铁路于1950年6月15日开工，东起重庆，西到成都，全长505公里，对发展西南各区交通，沟通城乡物资交流，繁荣经济，改善西南人民的生活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1952年9月29日，天（水）兰（州）铁路通车，该路全长346公里，比计划提前两个月通车。1952年10月1日，兰新铁路开工，全线长1 892公里。1956年1月1日从中国集宁到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第一条铁路正式接轨通车，为北部边陲增添了一条国际交通大动脉。这一年的7月13日，全长668公里的保成铁路接轨通车。1957年10月5日，全长1 179公里的藏新公路建成，这条有915公里蜿蜒于海拔4 000米以上雪域高原的公路，化天堑为通途，创造了举世震惊的奇迹。据统计，“一五”期间内，全国

新建铁路干线和支线共4 000公里以上，加上修复改造等，共增加铁路总长度约10 000公里。孙中山先生未能实现的梦想，仅仅在5年时间里，就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变为现实。事实上，除了修筑铁路，新中国还创造了许多更为辉煌的成果：1952年8月1日，四方铁路工厂在八一建军节前夕赶造出新中国第一台火车头。1953年7月15日，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工兴建。1956年7月13日，试制成功中国第一批解放牌汽车。1953年12月26日，鞍山钢铁公司的三大重点工程——无缝钢管厂、大型轧钢厂和7号高炉系统先后竣工投产。1954年9月26日，新中国自制的第一架飞机问世，经过试飞显示性能良好，完全达到设计标准。1955年7月20日，武汉长江大桥正式开工兴建，1957年9月25日，大桥胜利建成通车，一桥飞架南北，武汉三镇从此连为一体。1956年7月11日，克拉玛依油区已有10口探井喷出原油。1956年12月12日，全国钢铁工业提前13个月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指标，到当年11月底，钢产量达到415万吨，铁467万吨，钢材323万吨。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解放、当家做主的中国人民，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消除贫困、振兴经济、强盛国家的伟大运动中。经过5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初步摆脱了过去那种极端贫穷落后的状况，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奠定了最初的基础。

1956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是一次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会议。9月27日全会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指出：当前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当前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来解决这个矛盾，把中国尽快地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先进的工业国。显然，这一判断是建立在对当时中国政治经济形势和所面临任务冷静客观分析基础之上的，并反映了广大群众迫切要求改变中国当时经济、文化、社会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令人遗憾的是，党的八大所制定的这一正确路线未能得以全面贯彻，由“一五”计划开辟的经济发展之路未能继续延续。此后一段时期，中国经济发展偏离了正确的轨道。

当我们今天回顾这段历史的时候，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在20世纪50年代中后期，正当世界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借助新技术革命纷纷步入谋求经济发展轨道的时候，已经建立起新的国家政权、掌握了自身命运的中国，却中断了业已开始的经济发展进程，并使这一进程整整推迟了20年？显然，仅仅用所谓“极左路线”的干扰破坏来解释，未免过于简单了。事实上，经济发展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它取决于众多的先决条件和要素构成：历史传统、文化习俗、政治体制、经济模式、社会背景、国民素质、要素禀赋、科技水平、政策制定、国际环境等等。从而，20世纪50年代中国正常经济发展进程的中断，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

1. 政治上对于当时中国所面临的社会基本矛盾判断失误。任何一个发展中国家，在赢得了民族独立和获得国家主权以后，所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迅速发展生产力，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增加国民的收入水平和提高整个国家的综合国力。道理非常简单，任何一个国家，如果其经济长期处于落后状态，就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真正保持其政治上的独立。对于这一点，我们党在建国初期是清醒的，判断也是正确的。如上所述，1956年党的八大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然而，八大所制定的正确路线未能得到贯彻。当“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使我国的经济有了初步进展之后，便开始了向“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转变。背离了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正确判断，将所谓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将所谓复辟与反复辟的斗争视为贯穿于整个社会主义历史时期的基本矛盾，并通过“十年动乱”将这条极“左”的路线推向了极端。在这一错误的判断下，经济建设被抛到了一边，甚至对所谓的“惟生产力论”提出批判，延误了发展经济的大好时机。

2. 经济上选择了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从当时的历史条件看，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一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都是中

国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并且无论是对于迅速地医治战争创伤、恢复经济，还是对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奠定共和国最初的工业化基础，这一体制都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问题在于，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各方面条件的逐步改善，应该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逐步培育市场，发展商品经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然而在实践中，却是在不断强化这一体制，将其视为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惟一选择。并且不顾生产力发展的现实水平，片面地追求“一大二公”，将所有的社会经济活动都纳入到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内，最终导致了体制的僵化，使之成为阻碍经济发展的桎梏。

3. 中国当时所处的特定的国际环境和社会发展阶段。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特定的“冷战”格局中，其经济发展必然会受到来自西方世界的封锁、干扰和破坏。事实也正是如此。年轻的共和国刚刚诞生，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便对中国实行武装禁运，在巴统会下专门成立了中国委员会，美国甚至悍然发动侵朝战争，把武装侵略的战火烧到了中国的大门口。在这种特定的国际背景下，中国根本不可能从西方国家获得发展经济所急需的资金、技术和机械设备等，与外部世界的交往被人为地阻断了。

从当时中国的情况来看，在经历了连年战乱和三座大山的黑暗统治后，人们普遍把政治上的翻身解放看得比经济上的宽裕富足更为重要，而且更容易把生活温饱的满足误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终极目标。由于还未建立起现代经济发展的概念，更缺乏对现代化社会的亲身体验，因此，人们并未感觉当时的经济发展道路有何不妥，这是整个民族一个时代的悲哀。

4. 农民传统的思维方式与小生产者的盲目狂热是导致经济发展受挫的直接原因。“一五”计划的顺利实现，使很多人被经济发展成果冲昏了头脑。在发展目标的确立、发展战略的制定、发展政策的实施、发展道路的选择等方面，都缺乏实事求是、冷静客观的态度。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几千年的封建统治与殖民压迫，几个世纪的贫困生活，使广大的贫苦农民穷怕了，他们做梦都想过上富裕的生活。一旦在政治上当家做主、掌握了自己的命运以后，他们

恨不得在一夜之间把贫困的帽子甩到太平洋里去。而小生产思维方式的局限性使他们在决策时缺乏科学的思考、冷静的判断，盲目乐观、急于求成。例如，“一五”计划完成后，经济建设刚刚开始步入正轨，便提出了“超英赶美”的战略目标。开始提出用8个至12个五年计划，即用40年到60年的时间赶上美国，此后又提出“要在15年左右的时间内，在钢铁和其他重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和超过英国；在此以后，再用20年到30年的时间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①]。最后干脆宣布：3年超过英国，10年超过美国，我们有充分把握。热衷于“卫星”齐上天，跃进再跃进。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报道：河南省遂平县卫星农业合作社小麦亩产首放卫星，5亩小麦平均亩产2 105斤。6月12日这个社再放卫星，2.9亩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到3 530斤。6月16日新华社报道：湖北省古城县星光农业合作社王明进试验田小麦亩产达到4 353斤。6月23日《人民日报》报道：湖北省古城县先锋农业合作社小麦试验田亩产达到4 689斤。7月12日，河南省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合作社2亩小麦亩产7 320斤。7月26日，江西省波阳县和平农业合作社干部试验田早稻亩产9 195斤。7月31日，湖北省应城县春光农业合作社生产队长甘银发，终于首放早稻亩产万斤高产“卫星”——平均亩产10 597斤。紧接着，8月10日，安徽省枞阳县石牙乡高丰农业合作社早稻试验田亩产16 000斤，8月13日，湖北省麻城县麻溪建园一社的早稻亩产36 900斤。9月5日广东穷山出现奇迹，北部山区连县田北农业合作社的1.73亩中稻平均亩产60 437斤，终于拔了世界小麦亩产头筹。这一天的《人民日报》刊登的“田北社卫星田”照片说明为：在金黄色地毯一样的中稻田上，13个人站在稻子上面也压不倒。没有谁知道在一亩地里怎么能种出6万多斤稻谷，还是8月27日《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封调查信在无意中泄漏了“天机”，题目叫做《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就这样，当中国的经济建设刚刚有点起色，在没有经过认真

① 《人民日报》社论：《乘风破浪》，载《人民日报》，1958-01-01。

的调查研究和试点的情况下，便极为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大炼钢铁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倾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最终导致了国民经济各部门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工农业生产急剧下降，人民群众的生活遭遇到极大的困难。

正是由于上述原因，使得本来已经步入发展轨道的中国经济，在取得了初步成就以后，偏离了正确的方向，错过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机遇，使中国的经济起飞和与世界接轨整整滞后了20年。

三

在走过了20年的曲折道路之后，在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领导下，中国人民终于迈开了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新步伐。作为中国革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人物，邓小平高瞻远瞩、审时度势，适应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急剧变化，直面新的科学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反思传统经济体制和“左”的路线给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造成的重大灾难。他深刻理解全国亿万人民强国富民的深切希望，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出发，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经济发展的具体实际相结合，逐步形成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邓小平理论。这一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①。邓小平理论的中心便是发展经济，实现现代化。邓小平多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7-09-22。

次强调指出："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①] 正是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们党及时地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把经济建设作为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开始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长征。

改革开放的26年，是中国经济迅猛发展的26年。中国经济以年均增长率接近10%的速度持续、快速、健康地发展，比同期世界经济年均增长率高6.5个百分点，比发达国家高7.3个百分点，比发展中国家高4.8个百分点，超出同期经济增长速度较高的亚洲"四小龙"1.9到3.5个百分点。经过26年的经济发展，中国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能力有了极大的提高，谷物、棉花、肉类、煤炭、化纤、纱、布、服装、水泥、电视机、钢等近百种产品产量均居世界第一。自1996年粮食产量突破5 000亿千克大关后，连续多年稳定在这一水平。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已达40%以上。

改革开放的26年，也是中国的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的26年。到2003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了11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与1997年的7.4万亿元相比，平均每年增长7.7%。占世界经济总量的位次已经由1997年的第七位，提升到2001年的第六位，居发展中国家之首。仅从1997年至2002年的五年中，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17.2万亿元。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基础设施建设成就显著，建设了一大批举世瞩目的项目，如三峡工程、京九铁路、南昆铁路、秦山和大亚湾核电站、青藏铁路、西气东输、西电东送等。

改革开放26年来，中国的对外开放也取得了辉煌的成就。1980年，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001号合资企业，到2002年12月底，全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424 196家，合同外资金额8 280.60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7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4 479.66亿美元。从 1993 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 年，中国全年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527.43 亿美元，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吸收外资最多的国家。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中国的进出口商品结构不断优化，工业制成品出口额已占出口总额的 86.9%。进出口总额从 1978 年的 206 亿美元提高到 2003 年的突破 8 000 亿美元，贸易额在世界上的排名从第 32 位上升到第 4 位。1978 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仅有区区的 1.7 亿美元，而到 2003 年 10 月底，已增加到 4 009 亿美元。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对外开放度已达到 50%以上。

随着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显著增强，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也有了极大的提高。根据世界银行《2003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统计数据，2001 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gross national income）为 890 美元（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为 4 260 美元），是 1979 年人均 260 美元的 3.42 倍。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组方法，中国实现了从低收入组向中等收入组的历史性跨越。虽然只是处于中等收入组的低位，但考虑到中国作为一个拥有 13 亿以上人口的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人均美元 GNI 能有如此迅速的增长，实在是一个惊人的奇迹。随着农业实现历史性的跨越，中国人民的温饱问题已得到基本解决，人民生活明显改善。2002 年中国农民家庭人均纯收入已增加到 2 476 元，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生活费收入达到7 703元。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余额达 8.7 万亿元，比 26 年前增长了 400 多倍。

我们之所以要这样不厌其烦地引证如此之多的数据，无非是要表明，一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为了从根本上摆脱贫穷落后的境遇，开创幸福美好的生活，做出了艰辛的努力和探索，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和丰硕的成果。百年奋斗，百年求索；百年荣辱，百年沧桑。20 世纪的后半叶，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文明历史的东方古国，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指引下，真正迈开了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步伐，张开了经济腾飞的翅膀。鲲鹏展翅九万里，扶摇直上彩云端。改革开放的 26 年，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

领导下，解放思想，开拓进取，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26年。经过26年的艰难探索和不懈努力，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迈出决定性步伐，对外开放提高到新的水平。社会生产力、综合国力、人民生活水平上了一个新的台阶，政通人和，百业俱兴，国力增强，前程似锦。当我们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我们终于可以向世人宣布："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①] 在中国这样一个十多亿人口的国度里，进入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是一件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情。这将为国家的长治久安打下新的基础，为更加有力地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开创新的起点。

20世纪已经成为历史，新世纪的朝阳普照大地。回顾这波澜壮阔、风雷激荡的一百年，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前半个世纪在民族解放和民主革命的斗争中取得了划时代的胜利，后半个世纪在社会改革和实现繁荣富强的道路上迈出了决定性的步伐。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空前的壮举，是中国对整个人类文明和社会进步做出的重要贡献。已经到来的新世纪，对于正处于现代化路途上的当代中国，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在这充满挑战、机遇和希望的21世纪里，中国将逐步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体制，将从根本上消除贫困落后的状况，将把一个古老的、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一个先进的现代化的工业国，将最终实现中华民族富民强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梦想。

本书将以当代中国在新世纪的经济发展作为自己的考察对象，对经济发展的基本概念和基本理论进行重新界定和深入研究；探讨在新的国际条件下，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和新的科技革命的冲击下，中国经济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阐述在经济发展的新时期中国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经济发展的目标、任务、承受的压力和所需要克服的障碍；揭示在知识经济和亚洲金融危机的严峻国际背景与国内经济体制改革深层矛盾不断涌现的环境下，中国经济发展的热点和难点所在以及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建议；论证中国经济健康发展与发展目标顺利实现的政策环境和现实依据；最终阐明惟有"发展才是硬道理"，只有坚持发展，才能去开创中华民族光辉灿烂的明天。



目　录

第1章　经济发展概念的发展与深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整个世界格局发生了重大变革，其中最深刻的变革之一就是民族解放运动的兴起和旧的殖民体系的瓦解。在这一过程中，先后有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摆脱了殖民统治，获得了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这些国家的人民，在遭受了几十年、上百年的殖民统治之后，第一次掌握了自己国家的命运。以往的经历使他们感悟到：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没有政治上的最终独立。因此，在取得独立之后，如何迅速发展本国的民族经济，使自己的国家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成为这些年轻国家所面临的最为紧迫的任务。与此

同时，随着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广播、电视、互联网的广泛普及和广大第三世界国家普遍实行的对外开放政策，这些国家的人们看到、了解到甚至亲身体验到在那些经济先行发展的国家，经济结构有了根本的变化，生活水准有了普遍的提高，认识到人类通过自己的努力可以过上富庶的生活。广大第三世界人民热切希望迅速发展经济，创造物质财富，改善自己穷困的生活，他们对经济发展问题给予了深切的关注。广大第三世界国家尽管在历史发展、社会形态、经济结构、发达程度等方面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都面临着一些共同的问题，需要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于是，如何从共同的问题中寻找出具有普遍性、规律性的东西，对落后国家的贫困状况做出合乎实际的说明，为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战略、道路、政策和措施，就成为历史赋予经济学家的任务。

半个世纪过去了，随着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实践的不断丰富和深化，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理论的认识和理解也在发生着深刻的变革。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两极”格局不复存在，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区域集团化的浪潮席卷全球，金融危机肆虐横行，新兴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严重受挫，知识经济方兴未艾，美国单边主义与霸权行径甚嚣尘上……所有这一切都使人们对传统的发展理论和发展概念产生了深深的疑虑和动摇。什么是发展，应该如何发展，怎样才算发展；如何重新诠释世界新格局下的南北关系；如何重新认识经济发展对于广大经济落后国家现实发展和历史命运的作用与意义；如何以积极进取的精神和心态去迎接新的世纪给予第三世界国家的机遇与挑战等，都是经济发展理论在今天不能回避的新课题，都要求对发展的基本定义做出新的阐释。

与此同时，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的认识和理解也在不断地发展。从 20 世纪 50 年代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居于统治地位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到 60 年代实现工业化的梦想，从 70 年代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发展战略，到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的可持续发展战略，一直到 21 世纪初知识经济方兴未艾，制度学派大行其道，几乎每过



十年，经济发展的理论和概念就会发生一次重大的理论飞跃，人们的发展实践也会随之发生重大的调整。本章便是要通过对于经济发展概念发展沿革的历史回顾与分析，确立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1.1 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

20世纪50年代是发展经济学的萌芽时期。严格说来，在这一时期还未产生专门服务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的科学的和系统的经济发展理论。经济学家们只是将传统经济学的一些经典理论模型和分析方法（例如下面将要提到的经济成长阶段论和哈罗德-多马模型等）拿来分析和解决落后国家所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当时在发展经济学理论中，占据统治地位的是由发展经济学的先驱人物、美国著名发展学者沃尔特·惠特曼·罗斯托（Walt Whitman Rostow)所提出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

1.1.1 线性发展模式与“经济起飞”

罗斯托在他的经济成长阶段论中提出了著名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将人类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进程解释为是一个由低向高循序跃进的自然历史过程。他将人类社会的经济成长划分为五个阶段：传统社会、为“起飞”准备阶段、经济“起飞”阶段、经济成熟阶段和群众高额消费阶段。在以后的一部论著中，他又补充了一个追求生活质量的阶段。他认为世界上的任何国家和民族，其经济成长的历程都将依次通过这些发展阶段。

在上述经济发展阶段中，罗斯托格外强调“起飞”阶段对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决定性作用。罗斯托的“起飞”概念，是指在工业化初期的一个较短时期内（20年～30年），一个不发达经济突破长期停滞的落后状态，摆脱“贫困的恶性循环”与“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束缚，迅速实现基本经济体制和生产方法剧烈变革的过程。正像只有达到了既定的滑行速度，飞机才能最终摆脱地球引力和空

气阻力升空一样，惟有实现了经济“起飞”，一个国家才能超越传统社会，进入经济的良性循环。正因为此，人们将“起飞”视为划分传统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分水岭”。

在经济成长的过程中，“起飞”既是最重要的阶段，也是最艰难的阶段。罗斯托指出，除非具备了若干先决条件，否则经济“起飞”难以发生。这些条件包括：第一，保持既定水平的资本积累率；第二，建立能够带动普遍经济增长的主导部门；第三，实现必要的制度变革。罗斯托运用哈罗德-多马模型，计算出只有将资本积累率保持在10%以上，所能实现的经济增长率才能达到“最小临界努力”的要求，进入经济“起飞”的状态。而由“起飞”所带动的经济增长总是首先在那些不仅本身具有很高的增长率，而且能够带动其他部门增长的主导部门发生，并通过主导部门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成长。罗斯托还特别强调必须完成从封建经济制度到现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指出没有这种制度变革，经济“起飞”是无法发生的。

1.1.2 “经济起飞”与经济发展

作为新古典学派的理论大师，罗斯托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代表了传统经济学对于落后国家经济发展问题的基本看法。对于诸如发展中国家贫困落后的原因解释、不发达经济发展的目标确定以及落后民族图强致富的道路选择等一系列有关经济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做出了自己的回答。根据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世界上的不同国家和民族，分别处于经济成长的不同阶段上，而且必然会依次经历这些阶段。因此当探究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为什么至今依然深陷于贫穷落后的深渊之中时，答案便非常简单：只是因为这些国家至今仍然处在传统社会之中，停滞在经济成长的低级阶段。如何才能摆脱这种贫穷落后的境遇呢？那就是积极创造条件，实现经济“起飞”，一旦突破了“低水平均衡陷阱”的束缚，便会自然而然地进入经济成长的高级阶段。怎样才能完成这一过程呢，新古典学派提出了“踩着发达国家的脚印走”，“发达国家的今天就是发展中国

家的明天"的基本命题。认为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发展任务，不过是经济先行发展国历史过程的简单重复。显然，这一为众多经济先行发展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实的线性发展模式，对于广大梦想经济发展的经济落后国家，具有莫大的诱惑力。一时间，"起飞"几乎成了所有发展中国家政府和人民所刻意追求的目标，以为只要实现了经济起飞，发展任务便可以自然而然地完成了。有人曾经这样评价罗斯托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罗斯托无疑是我们时代最著名的经济史学家……'起飞'这个术语已成为了本世纪中叶词汇中的一个标准名词。没有一位经济学家能有他那样的地位。说实话，向上追溯在我们的同行中也许能找到同样杰出的人物，那就是罗斯托本人曾乐于相比拟的马克思，而马克思是在死后才享有盛名的。"① 罗斯托在西方经济学界以及在发展中世界的地位和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罗斯托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意在揭示人类经济成长的普遍规律，并非专门探讨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道路。通过对当今发达国家当年的经济发展历程和今天的落后国家的经济发展进行比较研究，发展学者认识到"欠发达国家今天的增长地位，在许多方面，与现今发达国家在进入现代经济增长前夕的增长地位有重大差异(日本可能是例外，但即使这一点人们也不能肯定)。今天的欠发达国家比发达国家过去开始工业化时的人均产值低得多；后者当时比世界上其余地区在经济上先进。在人口和某些基本条件方面也完全不同。"② 事实上，这里所列举的差异还并没有触及事物的本质，如果比较这两个发展过程有什么根本不同的话，那就是在今天的发展中世界之外还存在着一个发达世界，并且发达国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有时甚至决定着发展中国家发展的方向和水平。③ 对此，激

---

① [美] 亨利·罗索夫斯基：《起飞进入持续的争论》，载《经济史杂志》，271页，1965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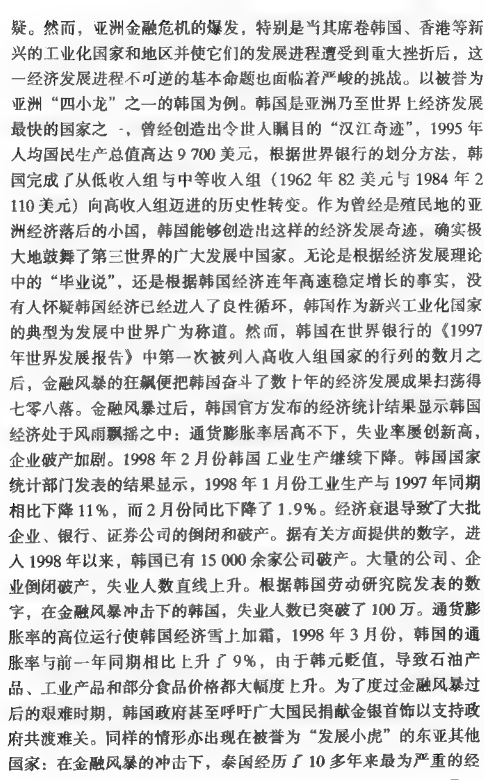
② [美]西蒙·库兹涅茨：《现代经济增长》，载《美国经济评论》63卷，1977(3)。

③ 彭刚：《发展的危机——东亚金融风暴的发展经济学思考》，载《河南社会科学》，1998 (4)。

进学派的理论家们揭示得更为深刻。他们指出，目前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与落后，并不是因为他们处于经济成长的低级阶段，他们的贫穷落后是当代资本主义存在的一种形式，穷国的贫困和富国的繁荣是彼此相连、互为因果的同一个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穷国的贫困，就没有富国的繁荣，而离开了对穷国的剥削和掠夺，富国的富裕也就无从谈起。简言之，对于广大由过去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转化而来的第三世界国家，历史的发展从来就不是什么线性的，发达国家的盘剥掠夺，人为地阻断了这些国家经济成长的自然过程。“起飞”对它们而言，终究是一个遥远的梦想。

1.1.3 线性发展模式与“可逆发展”

作为个案，也有少数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由于种种特殊的原因和机遇，通过经济“起飞”，迅速实现了从不发达向发达的转变，创造了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发展的奇迹（如亚洲“四小龙”），这似乎验证了罗斯托的理论。但是这些国家和地区在经济发展实践中所遭遇到的新问题，也对曾经被奉为神明的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20 世纪 90 年代末源于泰国、席卷东亚、波及整个世界的亚洲金融危机，向世人警示：一个经历了数十年艰苦创业、奋斗发展并创造了高速持续增长奇迹的经济，竟会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发生结构性崩溃，几代人辛勤积累的财富在顷刻间化为乌有。这场席卷东亚的金融危机，对罗斯托的线性阶段模式提出了新的挑战。因为这个模式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特征，便是经济发展的不可逆性。如前所述，罗斯托将人类的经济成长描述为一个由低向高飞跃发展的单向递进过程。当经历了关键性的经济“起飞”阶段以后，一国经济便会自然而然地依次进入更高级的成长阶段。因此，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便是为经济“起飞”创造条件，全力以赴地摆脱低水平均衡陷阱，而一旦步入了经济成长的正常轨道，便不会发生重大的反复和倒退。由于这一模型基本上是对发达国家当年经济发展实践的理论概括，又大体上符合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因此在发展理论中极富权威，很少有人对此提出质



疑。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特别是当其席卷韩国、香港等新兴的工业化国家和地区并使它们的发展进程遭受到重大挫折后，这一经济发展进程不可逆的基本命题也面临着严峻的挑战。以被誉为亚洲“四小龙”之一的韩国为例。韩国是亚洲乃至世界上经济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曾经创造出令世人瞩目的“汉江奇迹”，1995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高达9 700美元，根据世界银行的划分方法，韩国完成了从低收入组与中等收入组（1962年82美元与1984年2 110美元）向高收入组迈进的历史性转变。作为曾经是殖民地的亚洲经济落后的小国，韩国能够创造出这样的经济发展奇迹，确实极大地鼓舞了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无论是根据经济发展理论中的“毕业说”，还是根据韩国经济连年高速稳定增长的事实，没有人怀疑韩国经济已经进入了良性循环，韩国作为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典型为发展中世界广为称道。然而，韩国在世界银行的《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第一次被列入高收入组国家的行列的数月之后，金融风暴的狂飙便把韩国奋斗了数十年的经济发展成果扫荡得七零八落。金融风暴过后，韩国官方发布的经济统计结果显示韩国经济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失业率屡创新高，企业破产加剧。1998年2月份韩国工业生产继续下降。韩国国家统计部门发表的结果显示，1998年1月份工业生产与1997年同期相比下降11%，而2月份同比下降了1.9%。经济衰退导致了大批企业、银行、证券公司的倒闭和破产。据有关方面提供的数字，进入1998年以来，韩国已有15 000余家公司破产。大量的公司、企业倒闭破产，失业人数直线上升。根据韩国劳动研究院发表的数字，在金融风暴冲击下的韩国，失业人数已突破了100万。通货膨胀率的高位运行使韩国经济雪上加霜，1998年3月份，韩国的通胀率与前一年同期相比上升了9%，由于韩元贬值，导致石油产品、工业产品和部分食品价格都大幅度上升。为了度过金融风暴过后的艰难时期，韩国政府甚至呼吁广大国民捐献金银首饰以支持政府共渡难关。同样的情形亦出现在被誉为“发展小虎”的东亚其他国家：在金融风暴的冲击下，泰国经历了10多年来最为严重的经

济危机，该国半数金融机构停业。印度尼西亚货币波动引发的经济危机导致很多建设项目停滞及众多行业不景气，造成大批员工被裁减，失业人口从原来的700万人增至800万人。

上述事实清楚地表明，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重大变化和这些发展中国家在其发展过程中深层次矛盾的不断积累以及发展战略、发展政策的失误，即使对于那些处在较高发展阶段的发展中国家，甚至像韩国这样被称为次发达的国家，金融危机的孕育和爆发也会阻断发展进程，引致严重的挫折和倒退。正是这种已为现实证明的逆向发展可能性的存在，对广大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产生了极为强烈的震撼，如果几十年辛勤奋斗的发展成果最终将被毁于一旦，那么，为谋求发展所付出的努力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可见，罗斯托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在当年既没有能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指明发展的途径，在今天也未能经受住亚洲金融危机的检验，最终不过成为发展经济理论中的明日黄花。

1.2 结构主义学派的工业化情结

如上所述，根据罗斯托历史发展的线性模式，经济落后国家只要顺利地通过“起飞”阶段，便可自然而然地跨入经济成长的高级阶段，实现经济运行的良性循环。然而，第三世界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现实却与线性发展模式大相径庭。由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成长阶段上的严重错位，在经济发展水平上的悬殊差距，尤其是旧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存在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际剥削和财富的不平等分配，阻断了这一正常的发展过程，使广大经济落后国家深陷在贫困之中难以自拔。

1.2.1 结构主义学派的基本立场与理论特征

经济发展理论中的结构主义学派认识到了线性发展模式的缺陷，指出陈旧的经济结构是落后国家经济成长的根本障碍。从20



世纪60年代末开始，“结构变动模式”便逐渐取代线性发展模式在经济发展理论中占据了主导地位。正如曾经担任过世界银行副行长的美国著名发展学者霍利斯·钱纳里（Hollis Chenery）所概括的：“发展经济学的领域在过去的10年或15年里，由于经验知识的迅速增长而发生了改变。50年代提出的理论，已经通过对其基本假设做出统计分析的方法进行了检验、修正和抛弃。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把发展看作为经济结构的一系列相互关联变化的更为综合的观点。”① 在结构主义学派看来，“经济发展可被视为持续增长所必需的经济结构的一系列互相关联的变化。它们涉及需求、生产和就业的构成以及贸易和资本流动的外部结构等因素。总之，这些结构变化表明了传统经济体系向现代经济体系的转变。尽管发展经济学最初关心的是原始经济启动增长的条件，但这一问题现在已被大多数国家以这样的或那样的方式解决了。在过去的20年里所发生的通常每年5%或6%的增长率，已经导致经济发展的重点转移到避免各种形式的结构性失衡和促进增长利益的广泛分配。‘重新构造’经济关系，现在已被看作是国际和国内发展问题的中心。”② 与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相比较，结构主义学派认为线性发展模式所极力推崇的投资和储蓄，都只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就发展而言，重要的是进行全面的结构转变。这种结构的变革不仅包括生产、需求、贸易、资源运用和人口等方面的结构变革，而且包括城市化和收入分配等过程的变革。与此同时，结构主义学派还强调应对结构变革过程中的各种制约因素进行分析。这些因素包括：收入水平、资源禀赋、人口规模、政府的政策和发展目标，以及国际资本、国际先进技术和国际贸易环境等。

结构主义学派论述了结构转变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密切关系。认为这种密切的关系不仅表现为在不同的收入水平上经济结构的状况是不同的，而且表现为经济结构的转变特别是非均衡条件下的结构

① ［美］钱纳里：《结构变化与发展政策》，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91。
② 同上书，1页。

转变能够加速经济的增长。他们强调指出：经济结构的转变对经济增长的重要性会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动而变动；在经济结构发生转变的不同阶段，不同部门、不同要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不同的；由于经济结构的差异，经济增长的过程在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存在着本质的差别，比较而言，结构转变对于经济增长的潜力和意义，对发展中国家比对发达国家更大，这是因为由于发展中国家要素市场的非均衡特征明显，从而具有较大的调整空间，所以发展中国家的资源转移和重新配置较之发达国家是更为重要的增长因素。

结构主义强调工业化是经济结构变革的重要阶段，认为同资本积累和比较优势这样的供给因素变化相比较，需求因素变化对于工业化的作用同样重要。指出所谓工业化即是以各种不同的要素供给组合去满足类似的各种需求增长格局的一种途径，然而在传统的发展理论中，却忽视了需求方面的作用，因此，必须重视需求方面的研究。结构主义学派指出总需求的水平和要素供给的结构是决定工业化——经济结构转变的两类基本要素，并由此提出了结构转变的标准形式，而与这一经济发展初始条件密切相连的发展战略和发展政策的选择确定，对于工业化的进程具有重要的影响。根据不同的发展战略特别是贸易战略，可以将工业化的过程大致地划分为内向型与外向型等，而实行不同的发展战略从而不同的工业化过程，其结构转变的时间、次序、速度以及各个部门、各种要素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也是不同的。

劳尔·普拉维什的“中心—外围论”和威廉·阿瑟·刘易斯的结构变动发展模式从不同的侧面对通过工业化实现经济结构变动进而摆脱贫困的必要性和历史过程进行了深入的论述。

1.2.2 劳尔·普拉维什的中心—外围理论

劳尔·普拉维什（Raul Prewish）是在拉丁美洲具有重大影响的阿根廷经济学家、第三世界民族主义经济发展理论的创始人，曾任联合国拉丁美洲经济委员会常务秘书。普拉维什采用中心—外围的

结构分析方法，深入地考察了当代资本主义国际经济体系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关系。他认为，当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由非对称的两个部分——中心和外围——构成的。资本主义工业发达国家构成了这个体系的中心，贫穷落后的经济不发达国家构成了外围。中心利用国际分工，主要从事制成品的生产，而处于外围的发展中国家则主要从事初级产品的生产。连接中心与外围的桥梁和纽带便是国际贸易即制成品和初级产品的交换。

通过理论和实证的分析研究，普拉维什指出，在发展中国家的初级产品与发达国家的工业制成品进行贸易时，初级产品的价格比制成品的价格下降幅度大得多，从而发展中国家必须出口更多的初级产品才能换回既定数量的进口品，即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在不断地恶化。正是在“中心—外围论”的基础之上，普拉维什提出了著名的“贸易条件恶化论”。

发展中国家的贸易条件不断恶化，其主要原因首先在于初级产品与制成品的需求弹性不同，因而需求增长率不同。作为投入物，农矿等初级产品需求的价格弹性较低，在价格下降的情况下，扩大出口量并不能带来出口收入的同比例增加。不仅如此，在恩格尔定律的作用下，农产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也较低，这意味着实际收入的增加中购买农产品的支出部分所占比例趋于缩小，农产品需求扩大的余地小于制成品需求，初级产品需求的这种低弹性与供给的低弹性结合在一起，更加剧了初级产品价格的不稳定和贸易条件的极大波动。其次，初级产品的节约和替代技术的发展，进一步减少了原料性初级产品的世界性需求。技术进步降低了工业生产中原料的消耗系数，使原料的出口需求并不随工业国生产规模同步扩大，人工合成代用品的开发则直接替代了相当部分的原料需求。再次，工业国的企业，尤其是大型跨国公司掌握着技术优势，工业制成品中的技术含量较多且复杂，因而制成品的出口价格中包含有技术创新租金；由于跨国公司的规模与实力，还包含有垄断利润。最后，“中心”国家和“外围”国家的商品市场及劳工市场结构不同，技术进步所产生的利益分配方式也就不同。位于世界经济“中心”的发达

国家，由于工会的强大压力和产品市场上垄断势力的存在，技术进步及生产率的提高只会带来工资和利润的增加，即转化为生产要素拥有者的收人增加，而不是通过降低价格的形式馈赠给消费者。而在发展中的“外围”国家，由于劳工的组织程度低，工会的压力相对较小，加之农村剩余人口所造成的劳动力的无限供给，工资遂被压到最低生存水平上。另一方面，生产初级产品的厂商亦无良好的组织，彼此竞相供给，因而将产品价格压低到平均成本水平。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存在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由此取得的利益也会以价格下降的形式全部或部分转移到“中心”国家的买主手里。这一价值跨国转移的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贸易条件日益恶化的过程。正是遵循上述思路，普拉维什将“进口替代工业化”作为“贸易条件恶化论”的逻辑推论和主要政策建议。普拉维什认为，传统的自由贸易理论和政策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即采取有节制有选择的保护政策，削减和限制对发达国家工业制成品的进口，在提高初级产品部门劳动生产率的同时，将其余的资源投入工业部门，发展国内工业制成品的生产。普拉维什的逻辑其实很简单，既然不平等的贸易交换是导致发展中国家财富流失的根源，那么就切断这种联系，不再从“中心”国家进口制成品。而要自己生产制成品，“外围”地区的工业化进程就成为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当务之急。20世纪50年代初期，普拉维什成为工业化战略的热忱鼓吹者，他一再重申：“我提出的发展政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能克服先前模式局限性的新发展模式，其主要目标是工业化。实际上，我的政策建议是谋求为工业化政策提供理论依据，鼓励其他国家也执行这种政策，并为所有这些国家提供为执行这种政策而要采取的井然有序的战略。”①

① ［阿根廷］劳尔·普拉维什：《我的发展思想的五个阶段》，载《发展经济学的先驱》，179页，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

1.2.3 刘易斯的双元经济结构理论

另一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大师刘易斯则通过他的结构变动发展模式从另一个角度阐述了发展中国家实现工业化的必要性和途径。刘易斯以他的二元结构论为基础，从发展中国家的实际出发，强调广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流动，是这些国家摆脱贫困、实现结构转变、推进工业化、现代化进程的现实机制。

刘易斯从古典学派的经济发展观点出发，将不发达经济划分为两个部门，一个是以城市中制造业为中心的现代化部门，另一个则是农村中以农业和手工业为主的传统部门。城市中的现代化部门按照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进行经营，以现代科学技术和生产方法为手段，以向市场提供商品获取利润为目的。而传统部门生产规模狭小、生产技术落后，生产的产品多为满足自己的消费，很少在市场上出售，并且存在着大量隐蔽的失业人口。

刘易斯认为，在不发达经济的两个部门中，只有现代化的城市工业部门才是增长的主导部门，农村中的传统农业只是为城市工业部门的扩展被动地提供剩余劳动力。根据刘易斯的意见，现代工业部门增长的动力来自于资本的积累，资本积累来自于利润的再投资，而利润则来自于对剩余劳动的有效利用。由于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给是无限的，因此这一过程一直要持续到城市现代化的工业部门将农村的剩余劳动吸收完毕为止，也即是说，工业化的进程使不发达经济中的二元结构演变为单一的现代经济结构。

上述情形表明，这两位发展经济学的理论大师，一个从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外部环境出发，认为只有实现工业化，才能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经济结构和对外贸易结构，割断遭受国际剥削和财富流失的源泉。另一个则是从发展中国家陈旧的经济结构现状着眼，指出只有彻底转变二元经济结构，完成工业化的进程，才能最终实现富民强国的梦想。实际上在当时，不但结构主义的发展学者，而且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都对工业化的进程抱以极大的热忱和无限的希望，无论是在学术界还是在发展实践当中，工业化都是压倒一切的论题和任务。工业化的目标、工业化的战略、工业化的道路、工业

化的政策，成为人们谈论最多的事情，甚至有很多人将工业化简单地等同于发展，以为只要实现了工业化，发展的任务便可以完成了。

工业化的进程的确使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衡量经济增长的一系列指标也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工业化的成就、经济增长的果实，并没有给广大国民带来真正的实惠和利益，尤其是那些社会最底层的贫苦百姓，依然没有从根本上摆脱穷困的境地，发展所追求的最基本的目标，不但没有得到实现，有些反倒更加恶化了：收入分配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反而更加悬殊了；失业状况不但没有好转，反而更加严重了；绝对贫困人口的数量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扩大了。即出现了经济发展理论中时常提到的“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尽管一些拉美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已和50年代某些西欧国家的水平不相上下，但从广大国民所实际享受的福利水平来看，二者却相差甚远。

正是因为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政府脱离经济发展的多元目标而一味地追求工业化进程，不切实际地把在经济增长速度上赶上和超过经济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惟一目标，提出所谓“先增长，再分配”的发展模式，致使广大国民不能分享经济增长带来的利益，失业与通货膨胀所造成的贫富差距的迅速扩大进一步激化了原本就已存在的社会矛盾，加上进口替代工业化战略在实施中的普遍失误和国际经济环境的日趋恶化，80年代对于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成为“失落的十年”、“被遗弃的十年”。所有这些使得许多发展学者和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开始以怀疑的态度来重新审视单纯追求工业化的发展战略，并试图以新的发展战略取而代之。其中最富代表性的便是由当时在世界银行供职的著名发展学者钱纳里和斯特劳特提出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

1.3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现实矛盾

正如前面所指出的，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增长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接近或赶超世界主要发达国家作为发展的主要甚至惟一的目标，在增长与分配的关系上，后凯恩斯发展学者一般都主张实行“先增长，后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但这一战略在1960—1970年却遭遇到严峻的挑战。经济增长不仅没能使大多数普通的国民从中受益，严重的失业和通货膨胀反倒使贫富差距明显扩大，经济增长的果实往往被少数富裕阶层所独占，广大贫苦劳动者从中得到的好处却微乎其微，甚至为零，社会矛盾日趋恶化，出现了“有增长而无发展”的状况。这一情形大大动摇了传统的发展经济学观点，从而一种以争取就业、改进发展中国家人均收入分配为目标的新的“随增长，再分配”的经济发展战略，在20世纪70年代首先由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等经济学家提出，以后又逐渐演化为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理论和相应的发展战略。

1.3.1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提出

1965年联合国提出的第一个十年发展战略后五年的社会发展方案中，曾经提到要求各国执行公平的收入分配政策。20世纪60年代末，在联合国第二个十年发展战略中，更为明确地指出“发展的最终目的，必须是使个人的福利得到不断进步，并给所有的人带来好处”并强调发展中国家要实行“随着增长而重新进行分配”的发展战略。除了经济增长、工业发展指标外，还把教育、保健、营养、住房、收入分配、就业、人力资源开发和农村发展等社会指标也作为发展的重要内容。应该说，在此已经提出了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设想，或者说是社会经济综合发展的战略设想。

随增长再分配和满足基本需要的理论首先在发展的定义方面向传统的发展理论提出了挑战，新的理论认为：单纯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并不等于发展。发展是一种充分发挥人的潜力的社会经

济和政治变革的过程，它着眼于广大贫困人口的生活现状，是一个人们生活水准不断得到改善的渐进过程。因此，发展应该包括正义、公平和收入分配和服务等内容。应该重视农村的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会，满足人们的基本需要。发展还应该重视生活质量，关心物质和精神的价值，使生活过得有意义。这一理论强调，无论是经济增长，还是经济结构的变革，都不足以构成发展的目的，而不过是为达到发展目标所采取的一种手段。发展的真正目标应该是首先保证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

1.3.2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主要内容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1. 满足基本需求，消除贫困。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是这一战略的核心内容，其出发点和基础是满足绝大多数贫困人口的最低物质和非物质的生活水平所需。所谓基本需要，按照世界劳工组织的《世界就业纲领》的定义是：“适当的吃、穿、住条件，教育与卫生，基本人权和作为手段也作为目的的就业与就业质量的提高。”满足基本需要论者主张：在发展过程中，应该将人的素质的提高放在首位，因而卫生、营养、教育、文化等方面的发展应比追求GNP的单纯增长更为重要，必须以增加就业和大多数穷人的基本需要为优先发展目标。基本需要包括两方面的内容，首先包括一个家庭为满足个人消费所需最低限度的需要，诸如维持生计所必需的食物、住房、衣着以及必要的家庭摆设和家具。其次是必要的社会基础设施和服务，诸如初等义务教育、公共保健卫生、电力照明、洁净的饮用水和公共交通等。当然，在基本需要中还包括民众自由、安全、自决、参政、享有民主权利等各项非物质需要方面的问题。当然，在这些基本需要的实现方面，经济增长是先决条件。国际劳工组织曾经指出：穷国的经济年增长率必须达到7%，才能保证到2000年前后满足发展中国家广大人民的基本需要。

为了保证这一战略的成功，需要变革发展中国家的生产、分配、对外贸易结构，扩大和开拓国内市场，提高国内居民的购买



力；调整工业发展的方向，生产最大多数人需要的消费品；改善资金的使用和分配，采用符合实际情况的技术或中间技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发展，缓和城市膨胀、失业剧增的矛盾。

2. 强调增加就业机会。针对发展中国家人口急剧上升、城市和农村劳动力失业严重的情况，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格外强调优先考虑就业。主张发展中国家在制定经济目标时要提供生产性就业和基本社会服务就业，以提高大众的收入水平，改善收入分配结构，使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与劳动力就业相适应，缓和因失业带来的贫困和收入分配不均现象，减少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创造新就业机会的途径，要重点发展农业、商业和服务业等劳动密集部门。这些部门所需要的投资相对较少，但可创造出比工业部门更多的就业机会，符合许多投资短缺、劳动力丰富、失业率较高的发展中国家的实际需要。为此，发展中国家应该根据本国需要和经济发展水平，采用和引进恰当的中间技术，以发挥现有基础设施、劳动力、传统技术和管理人才的作用，在短期内取得较好的社会和经济效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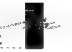
3. 改变投资方向。不少发展中国家开始重视增加那些与低收入者直接利益有关，能够促进他们劳动生产率提高和改善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的投资，重视教育、卫生保健和信贷等方面的发展。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建议将那些投资规模大的资本密集项目改变为实用性更强的中小型项目，使投资从比较集中的工业地区和大城市转移到需要发展的边远山区和农村，从而使低收入阶层更多地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和好处，在渐进和长期的发展过程中改善他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不利地位。

在新的投资中，特别强调人力资源的投资和开发。该战略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加强医疗保健、在职人员培训、初中等教育、成人教育和科技推广活动，进行必要的人口迁移和就业变动等工作。通过这种广泛的人力投资行动，使全体人民的身体、文化、技术和劳动素质迅速提高，为经济的高速增长积聚大量人力资源。

4. 优先发展农业和农村地区。在传统的工业化战略中，农业与工业的发展不相协调，造成了结构失衡。因此，满足人民基本需

要的战略主张加快农业和农村地区的发展，以便提供价格稳定的农产品和工业原料，以及在农业部门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该战略提出：首先要实行土地改革，解放农村生产力；其次要以劳动密集和资本节约型技术为主，通过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提高农业生产的效率和单位面积的产量，扩大国内外市场的销售，为农业的发展开辟更为广阔的前景，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经济部门转移创造良好的物质条件。此外，为了加快农业的发展，该战略还建议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增加农业投资，加强农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大力发展农业生产资料生产，制定有利于农业发展的经济政策和优惠措施，以调动广大农民的积极性。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们对于发展的理解更为丰富也更为人道。经济发展不再是一个由水泥和钢铁堆砌而成的冷冰冰的概念，而是充满了对最广大贫困人口的深切同情和真诚救助。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许多发展中国家实施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取得了积极的成就。(1) 在改善人民的收入分配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许多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抑制。(2) 部分发展中国家的农村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部分贫困劳动人口的劳动生产率得到了提高。(3) 部分发展中国家在贫困人口的教育、卫生、营养和计划生育等方面取得了明显的进步。许多国家的政府增加了教育开支，积极发展初级和中等教育，识字率有所上升。一些国家的卫生保健事业也有了明显发展。值得一提的是，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不仅仅提出了一种经济发展的新的理念与原则，而且由于有一系列在这一战略思想指导下衡量社会经济发展的指标体系的出现，使之具有较强的操作性。例如由美国发展学者莫里斯（C.Morris）设计的“物质生活质量指数”(PQLI)，是以婴儿死亡率、一岁时预期寿命和识字率三个指数来衡量一个社会满足基本需要的程度。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提出了与之相似的“人类发展指数”（HDI)。美国健康协会的 ASHA 指标，则是用就业率、识字率、预期平均寿命、人均国民产值增长率、出生率和婴儿死亡率等六个指标加总的综合指标来测度



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还有更多的各种各样人均福利指标和物质享受指标的设立，都体现了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所深深沁浸的平民倾向。

1.3.3　“满足人民基本需要战略”的局限

然而，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与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现实之间存在着一个明显的矛盾，即这一战略所强调的是发展中国家中最广大贫困人口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使他们能吃饱肚子，能喝上洁净的水，有衣穿、有房住，能做工赚钱，能读书识字。但是对于推进发展中国家的工业化进程，使它们从根本上摆脱贫穷困苦的境地，缩短与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差距提及不多，尤其是对于那些历史悠久、人口众多、具有较雄厚工业基础的发展中大国来说，仅仅停留于基本生活需求的满足还是远远不够的。

1.4　发展“知识经济”，弥补“制度缺陷”，提出经济发展的新理念

1.4.1　“知识经济”与“知识差距”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信息时代的来临，“穷国与富国以及穷人与富人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穷国和穷人获得的资本较少，而且也在于他们获得的知识较少”。这是因为“知识对于发展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依赖于知识。仅仅是为了生活，我们必须将我们所拥有的资源转化为我们所需要的东西，这便需要知识。如果我们想使明天的生活比今天更好，如果我们想使一个家庭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水平提高以及改善我们的健康状况，使我们的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并保护我们共有的环境，那么我们就不仅仅是要简单地将更多的资源转化成我们所需要的东西，因为资源是有限的，我们还必须用一种使我们的努力和投资产生更高回报的方式来利用这些资源。这也需要知识，而且相对于资源而言，

我们需要更多地倚重于知识"[①]。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来临，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尤其是那些最贫困的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面对经济发达国家日新月异的科技进步和以美国"新经济"为代表的经济迅猛增长，广大发展中国家再一次深刻地认识到自己所面临的艰难处境：过去总是认为贫困的原因在于资本的高度匮乏，资本形成的困难导致了经济发展的落后；尔后认识到落后的本质在于人的落后，人力资源的严重稀缺与国民素质的普遍低下，使得那些即使通过种种渠道解决了资金注入问题的国家也没有开创出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而今天人们进一步认识到，人之所以落后，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知识的薄弱，"经济不仅建筑在实物资本和人类技能积累的基础上，还建筑在信息、学习和对知识加以吸收改造的基础上"（詹姆斯·D·沃尔芬森，1998）。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世界银行提出了"知识差距"的概念。什么叫知识经济呢？世界银行将人类已有的知识划分为两种类型：关于技术的知识和关于属性的知识。关于技术的知识也叫做技术知识或简称为技术诀窍，例如有关营养方面的知识，控制人口方面的知识以及软件工程和会计方面的知识等。一般而言，发展中国家拥有的技术诀窍比工业国少，穷人拥有的技术诀窍比非穷人少。世界银行将不同国家间及国家之内知识的这种不平等分配，称为知识差距。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上的悬殊差距，从根本上来说，正是由这一知识差距所决定的。因此，当世界已经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今天，知识差距就成为经济落后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首要障碍。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自己的经济，如何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就演化为如何提高自己利用知识的能力，尽快缩小知识差距的问题了。正如世界银行发展报告所指出的：对发展中国家提高其利用知识的能力的必要性来说，怎么强调也不过分。为了说明当今知识对于经济发展的重要意义，世界银行甚至引用了培根的那句不朽箴言（只是略作修改）——知识就是

① 世界银行：《1998/1999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知识与发展》，1页、16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发展。

1.4.2　缩小知识差距的战略措施

发展中国家如何才能尽快地缩小知识差距，并不断增强自己利用知识的能力呢？这便是要制定切实可行的获取知识并利用知识的有效战略。这一战略的内容包括：获取并应用全球知识，创造本国的知识；投资于人力资本，以增加吸收和利用知识的能力；投资于技术以促进获取知识和吸收知识。这一战略所涉及的三个方面又是相辅相成，紧密相连的：一个国家的政府惟有不断地加强对教育的投资，才能持久地获得新的技术；而新技术的不断涌现，则会进一步提出对于教育的需求，并使获得知识更为容易。因此，对于一项缩小知识差距的总体战略来说，获得知识、吸收知识以及交流知识的有效政策之间是互为补充的。

1．知识的获取。发展中国家获取知识的渠道有两个：一个是从全世界的其他国家获取知识，另一个是利用自己的力量进行技术创新。通过对当今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与今天的发达国家当年从不发达向发达转变过程的比较研究表明，二者间的一个重大差别就是今天的发展中国家可以通过对外经济开放，从外部经济发达国家获得先进的技术。统计数字表明，世界上80%的研究与开发以及类似比例的科学出版物都来自于工业化程度较高的国家。对于广大经济落后、科技水平低下的发展中国家，获取国外的知识是扩大自身知识基础的最佳途径。世界银行明确指出：发展中国家不管面对多么不利的制度缺陷，它们至少还可以获得一项巨大的资产——工业国积累的技术知识。发展中国家应当发掘全球知识宝库。国际贸易、外国直接投资、技术许可制、人口的国际性流动以及战略联盟、技术援助和电子信息交流等，都是获取进口知识的主要渠道。

除了从国外获取知识以外，发展中国家还应该努力创造本国的知识。这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都能够直接拿来用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譬如农业知识必须适应本地的条件才会

发生绿色革命。即使在制造业中，其他国家所创造的知识也必须与不同的条件相适应，比如气候、消费者的爱好及补充性投入物的供应情况等。这种适应过程往往需要本地的研究，这对于全球知识的最新进展以及选择最适宜的技术也是非常重要的。实际上，对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一个发展中大国，技术引进并不是目的，引进技术是为了消化、吸收、创新，最终提高自主技术开发能力。大量案例表明，越是享有更多的内部技术资源的国家，所能利用的外部技术资源也就越多。

2. 知识的吸收。知识的吸收是发展中国家提高自己获得知识、利用知识的关键，而教育则是知识吸收的关键。无论是对于知识的创造与获得，还是对于知识的吸收与传播，教育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对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来说，经济落后是因为人的落后，人的落后是因为知识落后，而知识落后是因为教育落后。所谓知识的吸收，就是人在人生的不同阶段，通过各种不同的形式，接受教育和培训，积累知识、掌握技能、提高素质、增长才干的过程。因此，发展中国家缩小知识差距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全力振兴和发展自己的教育事业。教育可以促进农业的创新。农民接受了更多的基础教育后，其生产率就会提高，更有可能从新技术中获利。在快速发展的创新领域，这种收益最大，因为教育提供了基本的认知技能，这些是农民为了适应不断变化的条件，并从新的经验中学习所必需的。教育可以提高人们为适应经济变化而重新配置资源的能力，以便更好地应付价格的波动或经济周期中的高潮与低潮。受过更多教育的人往往更有风险意识，更愿意承担为快速适应不断变化的经济环境所必须承担的风险。教育还可以促进家庭在医疗保健、营养、学习和计划生育等方面采用新技术。

3. 知识的交流。知识交流的深度和广度，取决于传播手段的方式与水平。传播手段的革命常常是现代社会变革的核心。在发展中国家，尽管交流的传统渠道仍然具有重要性，但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在用低成本传播知识，并缩小国家内部和工业国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知识差距方面，拥有很大的潜力。现代化的先进传播手

段，是加快信息传递、促进知识分享的技术前提，也是发展中国家应对知识经济的挑战、溶入信息社会的物质基础。电报、电话、收音机、电视机、传真机，一直到国际互联网和数据传输系统在发展中国家的出现与普及，无不有效地提高了发展中国家与外部世界知识交流的能力和水平。通过知识的交流，发展中国家不仅缩小了与发达国家的知识差距，而且日益深化地融入到经济全球化的进程当中。

1.4.3 制度建设与经济发展

如果说“知识差距”是世界范围内新技术革命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严峻挑战的话，那么“制度残缺”则是发展中国家长期以来市场经济不发达所形成的“历史沉疴”。“缺少的因素”历来是西方发展学者诠释发展中国家贫困原因的传统思路。从“因为穷所以穷”(It's poor because poor)，到“之所以穷是因为不适宜的政策”(It's poor because poor policies)，都试图从更为深入的层面来探讨发展中国家贫困的根源，寻到摆脱贫困、实现富裕的途径。然而，即使在政策层面，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矛盾和问题，也难以得到令人信服的解释与说明，就更不要说政策本身的制定失误以及良好的政策得不到有效地贯彻执行了。随着经济发展实践的日益丰富，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化。进入20世纪90年代，“制度残缺”对于经济发展的障碍作用，愈发引起人们的重视和思考。尤其是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韩国等东亚新兴的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遭受重大挫折，经济高速增长的泡沫破灭之后，制度建设的问题暴露出来。对于那些虽经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但依旧贫困的国家和地区，这一问题就更为尖锐了。“我们如何解释富庶之中贫困的存在？如果我们知道了富裕的源泉，那么为什么贫困国家不采取那些能够致富的政策呢？……我们必须创造出新的体制，从而激励人们投资于更有效的技术，增加其技能，并组织更为有效的市场。这些激励机制体现于制度之中。”（道格拉斯·诺斯，2000）实际上，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并非没有考虑到制

度因素对于经济发展的影响，例如鼓吹经济成长阶段论的罗斯托，就将必要的制度变革视为经济"起飞"的先决条件，只不过他所考虑的制度概念仅仅局限于封建土地所有制的变革，比较狭隘罢了。当世界已经跨进新的世纪的时候，广大的发展中国家才发现，在市场经济的制度建设方面，它们所面临的问题与以前相比较似乎并没有什么明显的进展："非洲的企业家缺乏关于潜在商业伙伴的信息。拉丁美洲的贫农由于没有对土地的正式所有权，因而不能用土地抵押来获得贷款。中亚处于成长期的企业家在开始新的商业活动时，却面临着现有企业和政府设置的政治障碍。"[①] 体制与制度的缺陷，愈发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成长的严重阻碍。制度因素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具有两方面的意义：其一是发展中国家要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制度；其二是这一制度如何帮助穷人摆脱贫困。

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苦探索和对发展实践经验教训的悉心总结后，《2002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明确地指出："市场是关乎穷人生活的核心问题，在市场对人民生活水平产生影响以及帮助保护人民权益方面，机构制度发挥着重要作用。"并进一步阐释道：对市场能够起到支持作用的机构制度可以有效地促进形成具有包容性的一体化市场，能够确保实现稳定的增长，从而极大地提高人民的收入并减少贫困。[②] 从市场和制度的角度来阐释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原因并进行摆脱贫困的路径选择，标志着对于经济发展理念认识的新攀升和进一步深化。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落后，说到底是这些国家市场经济发展的落后，否则就难以说明为什么那些中东的石油输出国虽然富甲天下却依然是发展中国家；同时也难以说明为什么前苏联以及东欧国家科技发达，国民素质高，也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在当今时代，经济发展实质上就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个国家的落后，在于市场体制的不完善、不健全，

---

① 世界银行：《2002 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3 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② 同上书，前言。

广大国民的贫困，在于被排斥在市场之外。而市场的建立与健全，说到底就是要完善支持市场的一整套机构制度。正因为如此，世界银行将建立市场体制作为新世纪发展中国家摆脱贫困、谋求经济发展的当务之急。

1.4.4 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建设

那么，什么是支持市场发展的制度呢？它包括法律、执行机制以及支持市场交易的组织。这些制度将有助于传播信息，执行财产权与合同和促进市场竞争。市场是致富之本，是提高穷人生活水平的关键。市场可以带来机会，可以使人们从事于生产型的活动，它可以赋权于人民，因此市场能够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穷人之所以贫困，是因为他们被排斥在市场之外。对穷人最为有效的救助，不是资金提供，也不是物品救济，而是制度支持。正是这些机构制度，为穷人进人市场、寻求机遇、发展自身提供了渠道和空间。

支持市场的制度通过以下三个途径来发挥自己的职能：第一，提供信息。支持市场的制度提供关于市场条件、商品和参与者的信息。穷人之所以被排斥于市场之外，首先就在于他们不了解、也难以获得有关市场的信息。要帮助穷人摆脱贫困，最根本的途径就是帮助他们进人市场，而要帮助穷人进入市场，第一步就是给他们提供有关市场的信息。畅通的信息流动有利于企业寻找合作者和高收益的活动，并评估其信誉。企业的信息可使政府有效地进行管理。制度可以影响信息和知识的生成、收集、分析、核实和传播或废弃。它们为社团和市场参与者完成这些工作。会计事务所和信用评级机构等机构会增加信息处理量。第二，明晰产权，维护权益。仅仅帮助穷人获得信息，还不能使他们摆脱贫困。支持市场的制度通过制定并执行产权与合同，来决定谁得到什么东西以及什么时候得到这些东西。这是因为，作为一个生产当事人，能够明确地了解自己对资产和收入所应有的权利，并能够保护这些权利，这是市场发展的关键。这些权利包括相对于政府而言私人部门所享有的权利。

制度可以减少发生争端的可能性，并有助于执行合同。第三，增强竞争力。竞争是市场的灵魂。进入市场只是提供了摆脱贫困的可能性，是否真正能够摆脱贫困、实现富裕，最终还要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的竞争能力。支持市场的制度可以提供平等竞争的机会，可以制定规范竞争的法律法规，可以培育生产当事人的竞争意识并提高他们的竞争技巧。综上所述，“通过这三种职能，所有的制度结构都会影响着资产、收入和成本的分配，也会影响着市场参与者的激励机制和市场交易的效率。制度可以使得权力配置于效率最高的人，因而可以提高生产率，促进经济增长。通过强化财产权等手段，制度可以影响投资的水平和新技术的采用。通过执行竞争法，制度可以明确市场权利，从而限制生产者获得暴利，保护消费者不受高价格的影响。通过明确市场中弱势群体的权利，制度可以直接影响穷人的生活”①。

应该说，缩小知识差距与弥补制度残缺战略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概念认识的进一步深化。实际上是揭示了在新的国际背景下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过程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的新特征。既显现出知识经济、市场经济发展给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严峻挑战，也指明了建立健全一整套支持市场的制度是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选择。强调制度建设，并不意味着贬低政策的重要性，但仅有良好的政策是不够的，制度建设的进程对于促进经济增长和减少贫困具有基础性的作用。由此我们看到，从物质资本到人力资源，从制定政策到完善制度，人们对于经济发展的认识在一步步地深化。然而，为此所作的全部工作，无一不是在考察如何才能实现经济发展的目标。与此同时，那些思想深刻的发展学者，则开始探索在更为广泛的领域里去揭示经济发展的深刻内涵。

① 世界银行：《200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建立市场体制》，9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1.5 "以人为本"，确立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

"发展是人类所面临的最重大的挑战"（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尤其是对于占世界人口比率四分之三以上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发展是一个永恒的主题。在经历了理论与实践长时间的艰难探索之后，无论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还是众多的发展学者，都在深刻地反思到底应该确立什么样的经济发展目标，什么才是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这些问题。

1.5.1 发展的核心命题

对此，达德利·西尔斯（Dudley Seers）在他的主张中曾简洁地提出了有关发展含义的基本命题："因此，对一个国家所提出的问题是：贫困问题已经并正在发生哪些变化？失业发生了哪些变化？不平等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如果所有这三个方面都从过去的高水平降下来了，对于这个国家而言，这无疑是个发展的时期。如果这些中心问题的一个或两个方面的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在三个方面都越来越糟的话，即使人均收入倍增，把它叫做'发展'也是不可思议的。"① 事实也正是这样：许多发展中国家在1960—1970年期间取得了相对来说较高的人均收入增长率。然而，对处于这些国家底层的40%的人口来说，在就业、平等和实际收入方面却很少或根本没有什么改进，甚至在实际上还有所下降。根据早期的增长定义，这些国家是处于发展之中；但是按照新的有关贫困、平等和就业的标准来衡量，他们却没有得到发展。到了80年代，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转向负增长，又面临着日益严峻的债务问题，不少国家的政府被迫取消原本就很有限的社会和经济项目，形

① ［美］达德利·西尔斯：《发展的含义》，载《国际发展协会第11届世界大会论文选》，3页，1969。

势更进一步恶化了。

但是，发展现象或长期不发达状况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一个经济学问题，或者是对收入、就业和不平等的数量衡量问题。不发达是世界上 30 亿以上人口实际生活中的严酷事实——既是一种精神状态，也是一种国民贫困状况。正如丹尼斯·古雷特（Denis Goulet）所生动描绘的那样：

“不发达是骇人听闻的，它是肮脏、疾病、不必要的死亡和绝望所有这些东西！如果不发达对一个人来说只是反映低收入、住房破旧、夭折或不充分就业的统计数字的话，他是不会懂得它的。即使是最富于感情的观察者，也只有在亲自经受或设身处地地经受了‘不发达的震动’之后，才能客观地谈论不发达问题。当一个人被带入‘贫困的文化’普遍流行的情绪中时，他便会受到这种独特文化的震动。而那些在匮乏中生存的人们，当他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生活既是非人的，又是不可避免的时候，他们所感受到的就是截然相反的震动……在不发达情况下的普遍情绪是在疾病与死亡面前一种个人的和社会的软弱无能感，是当一个人摸索着认识变革时的慌乱感和无知感，是对控制事态进程起决定作用的人的屈辱感，是在饥饿和严重自然灾害面前的绝望感。长期贫困是一种地狱一样残酷的东西；当人们只是把它作为一件客观事物来看待时，很难理解这个地狱究竟有多么的残酷。”[1]

在一本 1987 年出版的著作中，埃德加·欧文斯（Edgar Owens）发表了同样的见解：

“在经济学家们看来，似乎除了作为一种运用经济学的练习，发展就不再具有任何其他的意义，它与政府的政治观念、体制以及人民在社会中的作用完全无关。现在该是我们将政治与经济理论结合起来的时候了，不仅要考虑怎样才能使这个社会更富生产力，而且更要考虑社会质量的提高，这个社会应该是更富生产力，即是说

---

① ［美］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概念》，23 页，纽约，埃希尼姆出版社，1971。



人的发展重于物的发展。”[①]

就连在20世纪80年代积极鼓吹将经济增长作为发展目标的世界银行也加入了这场以更为广阔的视野来重新审视发展的大合唱，它在《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中宣称：

“发展的挑战……提高了生活的质量。特别是在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国家，生活质量的改善总是要求一个更高的收入，但是它所包括的内容更为广泛。这意味着最终他们将接受更好的教育，拥有更高水准的健康与营养，减少贫困，一个更为清洁的环境，更加平等的机会，更广泛的个人自由和一个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②]

正是从这些论述中我们看到，随着对既往的经济发展理论与实践的深入反思，人们愈发认识到传统发展理论的主要弊端，开始摈弃过去那种见物不见人的惟经济发展观，开始关注人在经济发展中的位置，格外强调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生活质量、人的选择机遇，以人为本开始被视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

因此，发展必须被视为是一个既包括经济增长、缩小不平等和根除贫困，又包括社会结构、国民观念和国家制度等这些主要变化的多元过程。就其本质而言，发展必须体现变化的全部内容，通过这种变化，整个社会系统应面向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集团的多种多样的基本需求和愿望，使大家普遍觉得原来不满意的生活条件，已在物质和精神两方面都向更好一些的生活环境和生活条件转变，使所有的人尤其是那些贫困人口能够通过发展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人。

1.5.2　“以人为本”的发展观

实际上，在经济学说史上，有关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可以

① ［美］埃德加·欧文斯：《发展中世界的自由前景：伴随政治改革的经济发展》，15页，纽约，坡哥芒出版社，1987。

② 世界银行：《1991年世界发展报告》，4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91。

追溯到非常久远的年代。作为18世纪末19世纪上半叶小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和法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完成者，让·西斯蒙第（Jean Sismondi，1773—1842）在他于1819年出版的《政治经济学新原理或论财富和人口的关系》一书中，便对此做出了论述。西斯蒙第认为衡量一个国家繁荣的标志不是总的财富量，而是人均的财富占有量。财富的增长不过只是手段，而广大国民物质福利的提高才是目的。他力图确立人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地位。他强调说："一个国家的财富不仅表现在收入的总额上，而且表现在这种收入的总额和它所应养活的人数的比例上。"① 他还说："财富和人口并不是国家繁荣的绝对标准；国家繁荣的标准在于财富和人口的比例。"② 西斯蒙第之所以将自己的代表作命名为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要表明他在这一著作中所创立的原理是与当时占统治地位、广为流行的见解有着根本不同。它首先是对斯密学说的"修正"，特别是反对李嘉图所阐述的经济学原理。

西斯蒙第认为，斯密只是考察财富，并认为拥有财富的人总是关心财富的增加，只有让个人在社会上自由地进行利己主义的活动，才能最大限度地增加财富。正是在这两个问题上，西斯蒙第"修正"了斯密的学说。他认为财富应该保证人们过幸福的生活，因此政治经济学不应该只考察财富，而应该考察财富与人的关系，尤其是人及其需要。他指出：富人能够增加自己的财富，甚至掠夺应该属于穷人的财富；为了使财富的分配合理与均衡，保证穷人过上幸福的生活，他说："我们几乎始终呼吁亚当·斯密所摈弃的政府干预。"③

在西斯蒙第看来，政治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人民物质福利的科学，它应该给政府提供管理全国财富的真正方法。他指责过去的经济学家仅仅把政治经济学视为研究财富的科学，见物不见人，尤其

---

①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102～103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

② 同上书，23页。

③ 同上书，46页。

指责李嘉图的学说，因为按照西斯蒙第的说法，在李嘉图那里，“财富就是一切，而人是微不足道的”[①]。

西斯蒙第断言，财富只是人类物质享受的象征，它只是一种手段；人类进行财富的生产是为了满足自身物质生活的需要，不断地提高物质享受。因此，财富应该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而且也只有全体国民的物质享受增加了，国民财富才算是有了增加。所以，政治经济学真正的研究对象应该是人而不是财富，政府应该通过政治经济学使全体国民都能获得物质上的享受。西斯蒙第强调政治经济学应该研究人、研究人的需要及其这种需要的满足。正是从上述见解出发，西斯蒙第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给出了自己的定义：“从政府的事业来看，人们的物质福利是政治经济学的对象”[②]。

西斯蒙第这种以人为本的经济观，使他自觉不自觉地站到了广大劳动群众的一边。也正是为了维护大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西斯蒙第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矛盾和缺陷进行了无情的揭露与批判，对工人阶级所遭受的剥削和不幸表示了深切的同情。遗憾的是，小资产阶级立场和方法论的局限，使他终于未能为这个充满矛盾与弊端的社会找到科学的出路。

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中，处处洋溢着无产阶级人道主义的激情，经典作家们科学地论证了作为物质资料生产主体的无产阶级的历史命运与社会发展进程的高度一致性，“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③] 马克思和恩格斯用这句曾经给予了全世界无产阶级无限希望的名言作为不朽的《共产党宣言》的结束语，不仅向整个世界表明了他们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立场，同时也奠定了劳动者阶级在他们的光辉学说中的主体地位。

在我国，以人为本的经济发展观也正在日益成为人们的共识。

---

① ［瑞士］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457页。

② 同上书，22页。

③ ［德］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版，62～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我国著名发展经济学家、南开大学的杨敬年教授在他的《论经济发展的十大关系》一文中深入阐述了经济发展是人的本性所需的观点。1998年，杨老以其90高龄，集毕生所识，笔耕三载，隆重推出了他的综合研究著作《人性谈》，对人性与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改革做出了精辟、系统的阐述。

1.5.3 发展的新内涵

综上所述，正如托达罗教授所说，当我们把发展视为整个社会和社会系统持续向着“更美好”或“更人道”的生活前进时，我们能否将我们认为的发展含义解释清楚？或使这一概念的内涵扩展？美好的生活是由什么组成的？这是一个与哲学和人类一样古老的问题。这是需要随着人类社会不断变化的环境重新加以评价和回答的永恒的问题。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20世纪最后十年的适宜答案并不一定要像几十年以前的那样，但我们和古雷特教授及其他一些人都相信，要理解发展的内在含义，起码要有三个基本组成部分或核心价值作为思想基础和实际指导方针。这些核心价值是：最低生活需求，自尊和自由，它们代表了所有个人和社会追求的共同目标。它们与所有时代的社会和文化中的基本人类需要相联系。①

1. 基本生活需求：满足基本需要的能力。任何人都有某些基本的需求，这些需求得不到满足就无法维持生存。这些赖以维持生存的人类基本需求包括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当这些基本需求中的任何一项得不到满足或严重匮乏的时候，就意味着存在着“绝对不发达”的状况。从而，全部经济活动的基本功能就是向尽可能多的人提供克服由于缺乏食物、住房、健康和保护所导致的绝望与痛苦的手段。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可以断言，只有这种作为改进生活质量的必要条件的发展才是发展。没有在社会水平和单个个人水平上持续不断的经济进步，人力资源的潜能就很难得以发挥。不言而喻，一个人只有基本的生存需求得到了满足，才谈得到去追求更

① ［美］托达罗：《经济发展》，15页，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9。

多的东西。因此，提高人均收入，根除绝对贫困，增加就业机会，减少收入上的不平等就构成了发展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

联合国的1994年《人类发展报告》中对另一种可供选择的道路作了进一步的阐述。在这一报告的开篇宣称：

> 人类带着既定的潜在能力来到这个世界上。发展的目的就在于创造出一种环境，在这一环境中，所有的人都能够施展他们的能力，不仅为这一代，而且也能为下一代提供发展的机会。人类发展的真正基础是对每一个人生存权利的普遍承认。……对于人类生活，财富固然重要。但是，若不顾其他只是专注于财富也是错误的。其原因有二：首先，积累财富并不是实现一些重要的人类选择所必需的。……其次，人类选择会远远超越经济福利。

2. 自尊：要作为一个人。美好生活的第二个共同构成部分是自尊——一种能够感受到自身价值的自尊感，而不是为了他人的目的而被作为工具来使用。所有的人们和社会都在寻求某种自尊的基本形式，尽管这些形式可能被称为权威、个性、尊严、尊重、荣誉或社会承认。这种自尊的性质与形式可能会因不同的社会和文化背景而发生变化。然而，随着发达国家"现代价值观"的扩散，由于国家的繁荣几乎已经成为价值的一般尺度，当许多第三世界国家从经济上和技术上与先进的社会发生接触时，这些原来有着自己的深刻价值观念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的社会在文化上产生了严重的混乱。由于在发达国家中与物质相联系的自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因此，具有价值和值得尊重在目前就越来越只赋予那些拥有经济财富和技术力量的国家，即那些已经发展了的国家。这里，我们再一次引证古雷特教授的话：

> 中肯的观点是，欠发达是全世界大多数人口的命运。只要一个人的价值能否得到别人的尊敬根据的是物质财富以外的标

准，那么就有可能使人们安于贫困而不觉得受蔑视。相反，一旦社会流行的风气把优裕生活，包括物质福利当作尊严和尊敬的基本因素时，在物质上“欠发达”的人们要感到受到尊敬和有尊严就变得困难了。……为了获得生活在“欠发达”状况中的社会所不能获得的尊严，而今第三世界正在寻求发展。……正因为发展是一个重要的、或许甚至是必不可少的获得尊严的途径，所以发展理所当然地成为一个目标。①

3. 从奴役中解放出来：能够进行选择。发展学者提出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应包含在发展含义中的基本标准是人类自由的概念。这里所讲的自由要从把人们从异化的物质生活条件和从自然、无知、其他社会成员、悲惨的境况、种种惯例及教条主义的信仰的社会奴役下解放出来的角度来理解。自由含有社会及其成员具有扩大的选择范围，以及在追求我们称之为发展的社会目标时外部限制最小化的意义。W·阿瑟·刘易斯在强调经济增长与从奴役下取得自由之间的关系时断定：“经济增长的好处并不在于财富造成的幸福的增长，而在于它扩大了人类选择的范围。”② 财富可以使人们获得他在贫困时不能得到的对自然界和周围物质环境的更大的控制能力（如通过与衣、食、住产品有关的生产）。财富还可以使人们有选择更多闲暇的自由，获得更多的产品和劳务的自由，以及摆脱物质需要的负担，生活在平静的精神世界的自由。人类自由的概念也应该囊括政治自由所包含的种种内容，如个人安全、法律规则、言论自由、政治参与程度和机会均等程度等，虽然并不止限于这些。20 世纪 70 年代和 80 年代一些经济发展的著名的成功案例（沙特阿拉伯、智利、韩国、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和中国）在由联合国开发计划署（UNDP）编制的“1991 年

① ［美］丹尼斯·古雷特：《痛苦的抉择：发展理论的新概念》，80～90 页，纽约，埃希尼姆出版社，1971。

② ［美］刘易斯：《增长是可取的吗?》，载刘易斯：《经济增长理论》，420 页，纽约，艾伦与欧文出版公司，1963。

人类自由指数”中并没有获得高分。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发展既是物质的现实，又是精神上的一种状态，在发展中通过社会的、经济的和制度方面的综合过程，社会获得了享受美好生活的手段。不管这种美好生活包含什么内容，所有社会的发展至少必须具备下述三个目标：

1. 增加能够得到的诸如食物、住房、保健和安全感等基本生活必需品的数量，并扩大这些生活必需品的分配。

2. 提高生活水平。除了更高的收入以外，还要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更好的教育机会，并对文化和人道主义给予更大的重视。所有这些不但要增加物质上的福利，而且还要能给个人与国家带来更大程度的自尊。

3. 通过把人们从奴役和依附中解放出来，来扩大个人与国家在经济和社会方面选择的范围。这种奴役和依附不仅是对其他人和国家的依附，而且是与无知和人类的悲惨处境有关的奴役和依附。

通过对经济发展三个核心价值以及发展所包含的三个目标的阐述可以清楚地表明，经过多年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的探索和验证，人们对于经济发展概念所包容的丰富而深刻的理论内涵与实践特征有了愈发全面的认识，完成了从单纯追求物质增长目标到以人为本来把握发展概念的飞跃。人类自身取代了国民生产总值而成为发展的核心命题，人的生存、发展和自由成为在发展过程中始终得到密切关注的对象，从而确立了经济发展的新概念。

以人为本，首先就是强调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需求为本。因为这种需求是源于人的本性，源于人们求生存、谋发展的本能，源于人们对物质资料的欲望和要求。人们要生存就要消费，为了满足消费就必须生产，而在资源约束条件下，为了在有限的资源投入下获得尽量多的产出，就必须努力发展经济。人既是物质资料与社会财富的生产者，更是构成物质资料与社会财富生产的根本目的。虽然究竟是生产引起了消费还是消费刺激了生产这个问题似乎是一道到底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一样的难题，但离开了对人们基本需求的满足，离开了人在经济过程中的核心位置，生产活动既丧失了目标和

动力，也失去了行为主体和根本目的。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那种只见物不见人，为生产而生产的发展观必须摈弃。

以人为本，还要强调以满足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广大贫苦大众的基本需求为本。发展经济学从根本上来说是平民的经济学。它所关注的是世界上那些贫困国家中最广大的贫苦大众，他们的悲惨遭遇和痛苦现状，他们的不懈追求和美好希望，他们的坎坷经历和发展方向。因此，经济发展理论应该重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的收入分配均等问题，贫苦大众的就业问题以及绝对贫困状况的改善问题等。以人为本的关键在于以大多数人为本，以广大的贫苦大众为本，发展实践一再证明，靠人为地扩大收入分配差距来换取经济增长有百害而无一利。尤其是对那些正处于经济发展初始阶段的经济落后国家，注重缩小贫富差距，努力创造就业岗位和减少绝对贫困，是坚持以人为本发展的当务之急。

以人为本更强调不仅要在物质上满足绝大多数人们的需要，而且要使每个人都能受到社会的承认与尊重，都能实现自身的价值，都有进行选择的广阔空间。也正是在这一点上，经济发展的新概念与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存在着本质的区别，以人为本的理念具有丰厚的哲学基础，闪烁着人道主义的光芒。它不仅致力于人们都过上富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追求人类从精神枷锁与社会奴役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它的最终目标是整个人类自身的发展。我们只有将以人为本作为经济发展的核心命题的时候，才能确立经济发展的新目标，制定经济发展的新战略。

第2章　经济发展战略的重点与特征

进入20世纪以来，伴随着科学技术进步和社会生产力的迅猛发展，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物质财富，加速推进了文明发展的进程。与此同时，人口剧增、资源过度消耗、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南北差距扩大等成为全球性的重大问题，严重地阻碍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继而威胁着全人类的未来生存和发展。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在实现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其庞大的人口负担和极度贫困的现实，以及某些不切实际盲目赶超的发展思想，导致了在发展过程中严重的资源、环境和生态问题。环境与发展之间的矛盾日趋激

化，成为困扰第三世界广大国家经济发展的第一大难题。在这种严峻的局势下，人类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社会经济行为和所走过的发展历程，认识到通过高消耗追求经济数量增长和“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已不再适应当今和未来发展的要求，必须努力寻求一条人口、经济、社会、环境和资源相互协调,既能满足当代人需求而又不对满足后代人需求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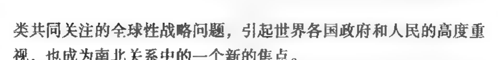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对于发展概念认识的又一次重大突破和深化，在人类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历史进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对于广大正处于经济“起飞”和正准备进入“起飞”过程的发展中国家来说，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意味着它们所面临的发展任务更加艰巨，发展历程更加曲折，环境优先还是发展优先，成为了两难的选择。

2.1 环境优先还是发展优先：两难下的艰难选择

环境与发展，已成为当今国际社会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普遍关注的重大问题。由于环境污染所造成的公害构成了对现代人类生活的一个严重威胁，1972 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人类环境会议上，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发出了人类资源和环境已陷入危机和困境的警告。这次会议的宣言明确指出：“保护和改善人类环境是关系到全世界各国人民的幸福和经济发展的重要问题。也是全世界各国人民的迫切愿望和各国政府的责任。”《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提出：“地球并不只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而应属于我们的后代。”从而把环境保护问题郑重地提到了全世界各国，特别是环境污染严重、保护措施极为薄弱的广大发展中国家面前。

2.1.1 环境问题：南北关系的新焦点

正因为与整个人类的历史命运紧密相连，所以环境问题成为人



类共同关注的全球性战略问题，引起世界各国政府和人民的高度重视，也成为南北关系中的一个新的焦点。

长期以来，南北关系始终是围绕着原料、贸易、投资、市场、债务等问题展开，其核心是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争取在国际分配中使发展中国家获得更多的份额。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环境的迅速恶化已引起国际社会的深切关注和严重不安：人类为创造现代文明和保持经济持续增长，却付出了环境恶化的沉重代价，并已严重威胁到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从而成为南北关系的一个新焦点。为此，联合国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了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地球首脑会议），全球183个国家和70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出席了会议，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这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级别最高、人数最多，讨论内容最广泛、最深入，时间最长的一次盛会。会议就环境问题达成了一些共识。大会通过了《21世纪议程》等5个文件，阐述了有关可持续发展的40个领域的问题，提出了120个实施项目。以促使现代人类社会向可持续发展社会的转变，使人类的生存方式与地球有限的承载力相适应。这是自1972年6月斯德哥尔摩第一届人类环境大会以后，世界各国为保护环境所做的一次最重要的努力与合作。世界环境发展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是人类拯救地球的不朽里程碑。也正是在这次会议上，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摆在了世人的面前。

在环境问题上，南北双方存在着巨大的分歧，中心问题是如何认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或者更明确地讲，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时，是应该环境优先，还是发展优先。

在这一问题上，发达国家的意见是：

1．人类的发展导致了环境的破坏。尤其是工业化使环境每况愈下，已日益威胁到人类自身的生存。发达国家在这方面负有历史的责任。然而，当前发展中国家掀起的工业化浪潮对环境构成现实的威胁。所以，在环境不断恶化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

是发展中国家，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2. 人口的迅速增长和贫困的日益加深，是环境遭到破坏的重要原因。穷人既是环境破坏的受害者，也是制造者。因此，发展中国家有效地抑制人口增长和消除贫困是保护环境的重要条件之一。

3. 人类应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谋求经济发展，使人类与自然处于和谐状态。从而要求人类改变目前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同时，人类对其他生物不能以主宰者自居，无权剥夺其他生物的生存权利，应把它们作为大自然和整个生物的一部分，对其他生物采取尊重和保护，严禁灭绝其他生物的经济活动。

4. 环境问题是一个国际性的问题，应通过建立国际机构，制定国际条约，采取统一的环境管理，各国政府制定的环境政策应与国际战略相连接，不能将本国的污染转移到其他邻国。

5. 环境与发展的协调要以效率为基础。市场机制是实现效率的最好方式。因此，所制定的环境政策，应确保市场竞争性，根据污染者所造成的破坏程度对其征税或收费，消除鼓励过多地使用资源的扭曲现象，以有利于原材料和废料的减少，促进新技术的应用和污染的减少。

我们可以看到，发达国家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上优先考虑的是环境，它们强调作为人类生存的基本条件和发展的根本要素，环境和自然资源不仅要为当代人所拥有，而且应该为下代人所享受。因此在资源与环境的问题上，当今人类不应以牺牲今后几代人幸福的代价来满足其需要。

由于广大发展中国家仍然处于贫穷困苦的境地之中,缺吃少穿,缺医少药,连最起码的生存需求都难以满足,又怎能顾及到下一代人的繁荣和幸福呢？它们当前所面临的首要任务是谋求发展,摆脱贫困。因此,广大发展中国家认为,在处理环境和发展的关系时,不能实行发达国家所鼓吹的环境优先的原则,而应该坚持发展优先。

1991 年 6 月 14 日—19 日，世界 41 个发展中国家、10 个国际组织特邀代表和 9 个发达国家观察员参加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与发展部长级会议”在北京召开，通过并发表了《北京宣言》，在环境

与发展问题上，表明了南方国家的基本态度和立场：

1. 发达国家对于地球的退化负有主要责任。正是由于经济发达国家自工业革命以来持久的生产和消费方式过度地消耗了世界的自然资源，导致了全球环境的损害，而广大发展中国家则是主要受害者。

2. 发展中国家环境问题的根源在于它们的贫困。而贫困的根本克服有待于发展。所以，发展是克服贫困的惟一出路，也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根本措施。发达国家应该承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权利，不能利用环境问题阻碍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限制发展中国家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和利用。

3. 在全球范围内处理环境问题时，国际机构必须根据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确立国际经济新秩序，保证世界各国的广泛参与，使发展中国家有权根据其发展与环境的目标和优先顺序利用和开发自然资源，不能以环境因素为由干涉发展中国家的内政，或者作为提供发展援助与发展资金的前提条件，或者设置影响发展中国家出口的贸易壁垒。

4. 发达国家应该率先采取行动保护全球环境，同时也应向发展中国家提供优惠的非营利性资金和对环境无害的技术转让，建议建立“绿色基金”，以推动发展中国家和全球范围内的环境保护。

5. 发展中国家应通过加强相互间合作，在保护全球环境问题上做出贡献。同时，加强发达国家同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的协调与合作，共同为自己和后代开创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由此我们看到，在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比发达国家更为严峻的挑战。其核心问题就是发展中国家在发展过程中是否还要重蹈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的旧辙。实际上，自从人类开始迈入文明社会的门槛，环境问题就已经出现了。但是人类对环境问题的普遍关注和高度重视，却是在20世纪60年代末才开始的，而且当时仅限于一些发达国家。这主要由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从客观上讲，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工业化仅仅是少数经济先行发展国才能享用的“奢侈品”，这些国家

以世界资源为依托来推进本国的工业化进程，以地球空间为场所来吸纳生产、生活废弃物。由于当时人口少，工业不发达，污染较少，而且当今的许多公害（如核放射、温室效应等）那时还未出现或者即使存在也并不严重。而现在，工业化已成为几乎所有发展中国家全力奋斗的目标，人口迅猛增长，工业日益发达，资源问题、污染问题自然变得愈发尖锐。从主观上看，过去人们的生活水平与生活质量普遍较低，满足基本生存需求是生活的主要目标，至于环境污染还得不到广泛的重视。而在今天，生活水平迅速提高，追求生活质量，享受人生逐渐成为世人的普遍心态，人们变得更加关注卫生和健康，从而对环境问题愈发重视。在那些率先实现工业化的经济先行发展国，凭借着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和工业化所积累下的巨额财富，使它们有条件也有能力对由于工业化进程所导致的环境污染进行治理，即所谓“泰晤士河（Thames River）由清变混，泰晤士河由混变清”。然而目前广大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状况却更加严峻，且不说在“先污染”过程中所造成的严重污染已大大超过了自然环境的正常承载能力，并给国民生活与社会发展造成了重大障碍，更为严重的是，在许多国家出现了“未发展，已污染”的现象。由于政府与国民环保意识的薄弱和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为了谋求国民生产总值的少许增长，不惜大量耗费有限的资源，严重地污染环境。特别是为了抓住发达国家产业升级和转移的机遇，不计代价地将那些高耗能、高污染、低回报的产业引入自己的国家，重新构建一种业已陈旧过时，而一旦建成又很难改变的产业结构，不但牺牲了当前环境，也断送了美好的未来。

2.1.2 环境与发展：两难下的选择

由此我们看到，在环境与发展的问题上，广大发展中国家面临着两难的选择：不积极地谋求经济发展，就难以从根本上摆脱贫困和不发达的状态。而要通过实现工业化来消除贫困和不发达，又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严重的资源与环境问题。尽管发展优先是发展中国家所坚持的基本立场，但由于发展而引致的资源过度耗费和环境严



重退化却不能不引起世人的警惕与不安。在这种情形下，“边发展，边治理”，就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明智选择。鉴于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环境污染的不可避免性，广大发展中国家必须强化自身的环境意识，争取将由于发展而导致的环境损害降低到最低水平，并及时利用经济发展的成果，积极地治理遭到破坏的环境，恢复和维持环境与生态的平衡。

由于环境保护具有一定程度的公共性和存在着外部效应，因此，它对社会产生的价值并不是通过市场上的交易实现的。换言之，在解决环境污染问题时，由于市场失灵，必须由政府制定和实施环境保护政策。这种政策不是由私人制定的，它是一个社会决策，它是建立在改善环境质量的行为对整个社会的影响基础上，它追求的是最大社会利益。在制定社会决策时，所采取的方法是成本—收益分析方法。政府在确定社会环境保护政策时，它所考虑的是社会所有成员的全部成本和收益，而并非仅仅是决策者本身的成本和收益。只有利用成本—收益分析的方法，社会才能客观地对旨在改善环境的公共项目进行判断和评价。因此，成本—收益分析是社会决策方法的一种形式，是为社会决策提供信息的一种方法，它试图评价社会决策在制定和实施中所发生的一切成本与收益，而不管它们是否存在着市场价格。

政府如何确定一个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最优环境方案，关键就是如何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改善和治理环境的具体项目做出实际的评价。利用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对环保项目进行分析时，一般可以分三个步骤来进行：第一个步骤是初步鉴定待评价的、可供选择的方案。根据方案确定的目标加以选择，这个目标就是社会净收益为最大。第二个步骤是预测每个方案将带来的后果。这一般是对项目的直接影响和一些比较重要的间接影响加以考虑。第三个步骤是确定可供选择的方案及其后果的价值。在确定环保项目给社会带来的价值时，往往比较困难。例如，在衡量项目给社会带来的实际价值时，这种价值通常不具有市场价格，因此必须用影子价格来估算。影子价格是衡量边际单位产品对社会的贡献，它反映了环保

项目所创造的产品的实际社会价值。此外，有些环境保护项目实施后，它所带来的影响是长期的，因此在评估项目的价值时，就要根据社会贴现率，将未来发生的价值“贴现”为现值，再和项目的成本进行比较。当某一个项目给社会带来的实际价值为最大时，这个项目就应该是被选择的最优环保方案。

综上所述，尽管南北双方在如何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问题上存在着重大的分歧，然而，为了整个人类的现在和未来，必须要求环境与发展的和谐与协调，这已成为南北双方的共识，成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与归宿。尽管广大发展中国家无不热切盼望着经济的迅速腾飞，但它们已经注意到要吸取发达国家早期经济发展过程的经验教训，避免重蹈西方国家在追求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先污染、再治理”的覆辙，而是注重在发展伊始就力争做到“少污染、早治理”，既要谋求发展，更要减少污染，将环境保护视为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战略目标，即提出南北双方都能接收的“可持续发展”的概念。

2.1.3 可持续发展：人类的共同选择

可持续发展的概念是1987年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的报告《我们共有的明天》中首次使用的，其定义为“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满足这代人的需要，尤其是穷人的需要，实际上可以持续地满足今后几代人的需要”。因此不能抽象地、笼统地去谈及资源与环境的问题，而要做出动态的、具体的分析。譬如说在某个地区所形成的资源损失，应该在其他地区予以弥补，以求得总量的稳定和均衡。重要的是要累计资本的总体生产率，包括其对人类健康和审美情趣的影响，以及对收入的影响，应该补偿自然资源或生态资本所造成的损失，并且还要有正收益。这就决定了人类在进行决策时，要把发展与环境政策的制定建立在成本—收益分析的基础之上，惟有如此，才能使环境与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可持续发展。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反映了人们对经济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标志着经济发展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它不但杜绝

了那种将经济增长与经济发展混为一谈的现象发生，而且为人类的近期发展与长期发展寻找到一个结合的契机，也为在一个相当广泛的领域内实现南北合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正是由于从整个人类的共同利益出发，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但具有深刻的理论意义，而且还具有重要的政策意义和广泛的现实意义，是对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新贡献。

2.2　面向未来，重构发展理论的历史坐标

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类终于能突破自身的生存极限，从一个新的历史角度来考虑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问题。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不仅强调代内公平，而且强调代际公平，从而使人们能够以更为深邃的历史目光来重新审视经济发展理论，并使这一理论具有了强烈的时代特色和深远的历史影响。

2.2.1　可持续发展与“代际公平”

早在 300 余年前，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先驱人物威廉·配第（William Petty，1623—1687）在谈及土地资源经济价值的有效年限时曾经发表过这样的意见：“所以，我们必须确定一下某种有限的数字。在我看来，这种有限的数字，就是指有限的年数。我认为这种年数就是一个 50 岁的人、一个 28 岁的人和一个 7 岁的人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也就是祖、父、孙三代可以同时生存的年数。很少有人会挂虑再下一代的子孙。因为一个人做了曾祖父，他就已接近死期，因此一般说来，在直系亲属中能够同时生存的，只有上述三代人。”配第认为，这一有限的年数为 21 年。这是因为“我们估计英格兰这三代人可以同时生存的期间为 21 年”[①]。在此，配第实

---

① ［英］威廉·配第：《赋税论，献给英明人士，货币略论》，43 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78。



际上是要表达这样一个意思：由于人类自身自然寿命的局限，在人们从事经济和社会活动时，不管是出于理性考虑还是出于情感牵挂，他最多也只能顾及到自己的子、孙两代人，更为长久的事情便顾及不到了，因为一般而言，到那时他已不再活于人世了。在经济思想史上，能够从代际的角度来考虑人类经济活动的影响，配第恐怕是第一人。

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还是传统的经济发展理论，在论及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关系时，都没有考虑到经济发展与增长所造成的资源环境后果对子孙后代的影响，或者说从未从代际公平的角度来考虑这一问题。其中原由是多方面的。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人口有限和劳动生产力水平的低下，人们始终认为，相对于人类的有效需求，自然资源总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完全没有必要为后人的资源需求和环境退化而担忧。而在现代经济发展过程中，那些处于极端贫困和严重不发达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急于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它们自己的生存问题都未能得到很好的解决，又怎么能顾及到下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呢。正是在这些思想的主导下，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在工业化的进程中，都毫无节制地耗费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在短短的几十年中，导致了资源枯竭、环境退化、生态失衡，再加上人口爆炸、物种灭绝，对人类文明的延续造成了严重的威胁。

正是针对着这种状况，1992 年 6 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上通过的《21 世纪议程》的第一章序言开篇第一句话就是“人类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①]，这深刻地描述了在严峻的资源与环境问题面前人类所处的危难处境，更强调了在这一关键的历史时刻，人类通过重新确立自己的生存方式，以推进文明延续和发展的重要性。《21 世纪议程》指出：我们正面对国家之间和各国内部永存的贫富差距，不断加剧的贫困、饥饿、病痛和文盲，以及

① 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21 世纪议程》，1 页，北京，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1993。

人类所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的持续恶化等严峻问题。如果我们继续实施现行的政策，这种恶化的局面就会继续严峻下去。所以，我们必须改变现行的政策。而要改变当前南北两极分化和生态系统持续恶化的惟一途径，就是“建立促进可持续发展的全球伙伴关系”，只有这样，人类才能实现“基本需要得到满足，所有人的生活水平得到提高，生态系统受到更好的保护和管理，并带来一个更安全、更繁荣的未来”①。为了实现这一新的发展战略，不仅仅要考虑现存这一代人的生存与发展，而且要考虑到子孙后代。在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定义中，本身就包含了代际公平的深刻内涵，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在阐述“持续的发展”概念时指出：本报告完全赞同Brundtland委员会（国际环境和发展委员会）对这个词的定义“在不牺牲未来几代人需要的情况下，满足我们这代人的需要”。并解释说：满足这代人，尤其是穷人的需要，实际上是可持续地满足今后几代人需要的问题。② 正是基于这一认识，1972年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提出了《只有一个地球》的报告，《世界自然资源保护大纲》庄严宣告：“地球并不只是祖先遗留给我们的，而应属于我们的后代。”这标志着在经历了多年的探索和反思之后，人类终于能够正视现实与未来，勇敢地担负起自己的历史责任了。

那么，什么叫做“代际公平”呢？根据英国伦敦大学学院全球环境社会与经济研究中心主任皮尔斯教授（Pearce，D.W.）和世界银行高级顾问沃福德教授（Warford，J.J.）的定义，所谓代际公平就是指：“当发展能够保证当代人的福利增加时，也不会使后代人的福利减少”③。实际上，这一定义不过是可持续发展概念的经济学术语表达，是帕累托最优（Pareto optimality）在社会福利代

① 联合国环境发展大会：《21世纪议程》，1页。

②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8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③ ［英］D.W.皮尔斯，J.J.沃福德：《世界无末日——经济学、环境与可持续发展》，59页，北京，中国经济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

际分配方面的特殊运用，马勒（Maler）将此称为帕累托可持续性（Pareto sustainability）。用通俗的话来解释就是，当我们今天通过谋求经济发展而增加我们这一代人的福利时，不能以牺牲下一代人的福利为代价。如果仅仅为了我们的福利增加而过度耗费资源，损害环境，破坏生态，使下一代人的经济发展遭遇障碍，导致福利水平下降，这种发展就是不可取的。

2.2.2 “代际公平”的福利效应分析

在处理环境与发展的关系时，强调代际公平具有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造成的资源环境问题一旦出现就无法逆转。原始热带森林一旦被毁坏，一般说来，它们就无法再被培植起来；同样，生物物种一旦灭绝，它就无法再被创造出来；全球气候变暖一旦发生，就可能无法逆转。这种不可逆性意味着所有后代人的福利损失，而这种损失却完全是由于我们这一代人在谋求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自我约束不够才造成的。相对于人类的生产与生活需求，资源总是稀缺的。资源（广义的资源也包括环境）定义本身就包含有稀缺的意思在其中，而资源的稀缺性是由资源供给与需求两方面的因素决定的。资源的稀缺性主要取决于资源的供给特征。大部分资源，尤其是矿产资源，在供给上都具有形成困难、蕴藏有限、可耗竭和不可再生的特点。以矿产资源为例，像石油、煤炭、有色金属、黑色金属等都是在数千万年，甚至数亿年的地质作用过程中才形成的。这一无限漫长的自然再生产过程，相对于人类社会的短暂过程而言，它就是有限的、不可再生的。同时，矿产资源的消耗与土地和机器设备等生产资料不同，它不仅是肥力的递减或物质的磨损，而且是资源本身的耗竭。在社会生产过程中，矿产资源一旦被使用，就被融入到产品形成中加入社会经济的运转，而不再保持自身的独立形态。这种资源的不可再生和可耗竭性不仅决定了矿产资源消耗补偿的独特方式，而且决定了它的稀缺特征。从需求的角度来考察，随着工业化进程在整个世界的全面展开，尤其是众多的发展中人口大国加入进工业化的行列，人类对于资源的需求具

有无限上升的趋势。现代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人们对于生活质量的刻意追求，都使得现有资源的有限供给与人们对资源的无限需求之间的矛盾日益尖锐起来。例如发达国家的“石油农业”、“汽车文明”，新兴工业化国家对于发达国家消费模式的普遍偏好和盲目模仿，汽车、冰箱、彩电、空调的空前普及，一方面极大地增加了资源耗费；另一方面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在谈到人类进入工业化社会以后对于资源的耗费时，有人曾经做过一个形象的比喻：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历程中，从火的使用到水稻的培植再到蒸汽机的发明，直至今天的信息革命，可以将人类社会的发展划分为采猎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和后工业文明四个历史时期。如果我们用一个小时来描述人类文明的发展时刻表，那么，采猎文明占用了59分41秒，农业文明占用了17秒左右，工业文明仅占用1秒多，而留给后工业文明的仅有不到1秒长的瞬间。可就在这1秒多钟的时间里，人类所耗用的资源要比前58秒多所耗费的资源不知要多出多少倍。照此下去，还能有多少资源留给我们的后代呢？代际公平概念的提出，就是要警示世人，如果不立即改变当代人的资源消费模式，我们的后代将面临资源枯竭的威胁。正因为此，强调当代人对于子孙后代的历史责任就成为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一个重要特征。

代际公平不仅强调当我们这一代人谋求福利增长时要以下一代人的福利不减少为前提，而且强调要对已经或将要给下一代人的福利造成的危害进行补偿，即包含有“代际补偿”的含义。这是因为，就业已进行的工业化进程而言，已经造成了严重的资源耗费和环境污染，而为了追求经济增长和发展，对资源的进一步耗费和对环境的进一步损害也是不可避免的，尽管今天人们已经懂得要把这种损害控制在最低的限度内，而实际上，如果没有代际补偿的具体方式，所谓代际公平就只能是一句空话。根据经济学家的意见，利用帕累托准则（Pareto criterion ）来确定社会是否会有福利可得，在实际应用中具有局限性。这是因为，帕累托最优不会存在于经济活动的每一个场合，在代际间就更是如此。在许多情况下，既定的政策或项目给一些人（或集团）带来利益，却总是以另一些人（或

集团）的利益受损为代价的。根据帕累托改进准则（Pareto improvement criterion），没有任何一个政策或项目可以被认定为能够使整个社会受益。为了突破这一准则的严格限制，经济学家对其进行了修正，使之能够适用于一部分人有所得，而另一部分人有所失的状况。修正了的准则是一种考虑了假设补偿的思想。我们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状况。假定制定实施一项政策社会为之付出的成本为10美元，集团A由此获利20美元，而集团B则为此损失8美元。如果得失是可比的，我们可以说社会的收益为20－8＝12（美元）。社会成本为10美元，社会净收益为2美元。虽然集团A受益了，但是集团B却遭受了损失。根据狭义的帕累托准则，这一政策显然不可行。如果我们要找出帕累托改进准则是否有可能，一个办法就是要看集团B要求什么样的补偿。在我们的例子中，8美元足够补偿他们的损失了。如果集团B能够得到8美元的补偿，它们就仍能保持其原有的福利水平，或者说它们的福利没有减少。现在假定由集团A来支付这一补偿金，则它们的净收益为20－8＝12（美元）。从整体看，仍然存在着10美元的成本，为了方便起见，我们假定这些成本由集团A来承担，则集团A最终的净收益为12－10＝2（美元）。

应该指出的是，假设补偿的原则并不意味着实际补偿。也即是说，上述政策一旦被采用，集团A的实际所得仍为20美元，集团B的实际损失也还是8美元。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假设补偿所要解决的只是潜在的福利问题而不是实际的福利问题。即如果从某一政策或项目的实施中获得收益的一方可以补偿蒙受损失的一方且还有一定剩余的话，潜在的福利就是增加的。

当我们运用这一原则来考察代际公平的问题时，可以看到，代际公平的定义明确反对当代人获益却将费用强加给后代人的行为。在假设补偿的原则下，在一个项目对当代人产生效益却使后代人遭受损失的情况下，如果当代所得可以用于补偿后代所失，这个项目就是可行的，就会得到批准。显然，其挑战性就在于可持续发展的定义会阻止当代人采用那些事实上使后代人受损的政策。如果现在



这一政策的实施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惟一的解决办法就是应该要求代际补偿。

代际补偿的途径有两条：建立代际基金和防止资本存量的衰减。

为了确保后代人不会因为当代人的行为而受到损害，就需要有一种机制能够将资源转交给后代人。假定现在当代人制定了一项政策，他们清楚地知道，这项政策一旦实施，必然会给后代人带来成本，譬如说这是生命放射性废弃物的处置成本或是由于全球气候变暖而导致的海平面上升的成本。如果这一成本的数量是可以确定的，成本发生的连续年限也是可以确定的，便可以利用复利计算出这一成本的现值总额，这也就是应对后代人进行代际补偿的数额。因此，建立一项代际补偿基金是可行的。这样一项基金可以用来补偿由于当代人的行为而给后代人造成的损失。

那么，如何才能将补偿基金转移到下一代人的手中呢，一种可供选择的途径是将这种补偿通过资产或资本的形式转移到后人身上。随着经济发展理论的不断深化，人们对于资本概念的认识日渐丰富。除了厂房、机器、道路、桥涵等物质资本，还有知识、技能等人力资本，还包括土壤肥力、渔业资源、净化能力、臭氧层以及生物化学循环等自然资产与环境资产。另外，还有一些难以替代或不能替代的资本。由于这些资本形式的存在，从而使代际补偿可以将一定数量的资本传送给下一代而变得相对简便易行。这样的实际补偿过程对于后代人是公平的，这可以保证后代人不会比当代人的境遇更差。这也是代际公平的概念。将资本的概念引入到代际公平的概念的意义如下：如果当代人给下一代留下了一定的资本存量，其数量不小于当代人所拥有的资本量，那么下一代人就可以利用这些资本存量生产出与当代人相等的福利水平。由此我们看到，代际补偿作为实现代际公平的有效手段，保证了当代人在追求自身的经济发展目标时，对由此导致的下一代人所付出的成本做出补偿，从而避免了下一代人的福利减少。

综上所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标志着人类开始重新定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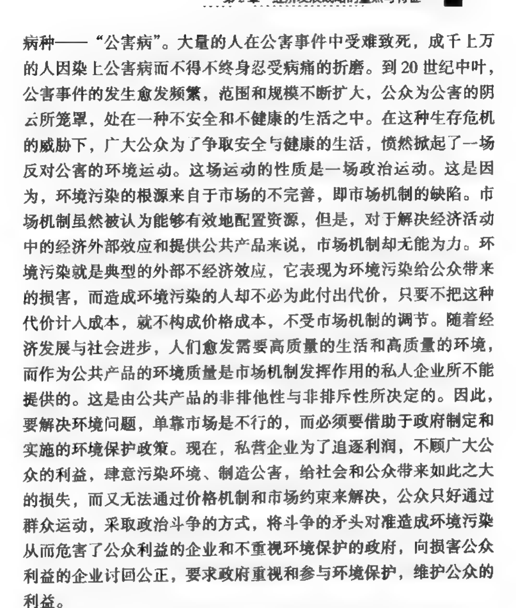
自身的历史坐标，从人类文明发展延续的角度来审视当今的经济发展，本着对子孙后代负责的原则，制定新的发展战略，将经济发展理论升华到一个新的高度，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开辟了新方向。

2.3 注重环保，突出发展理论的时代特色

环境与发展，是当今世界，尤其是发展中世界所面临的两个最为严峻的挑战。而这两个问题又是互相制约、紧密相连的。早期的经济发展理论，一味追求工业化的进程和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以惟资本化、惟工业化、惟计划化为特征，为了实现经济增长目标，不惜耗竭资源，污染环境，破坏生态，导致人类的生存危机。面对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所造成的人类生存环境的不断恶化，尤其是在遭受到日益恶劣的自然环境的无情惩罚之后，环境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重视，环境保护成为和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追求目标。

2.3.1 环境保护与环境治理

世界性的环境保护运动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最初起源于经济发达国家反对公害与环境污染的一场群众性的政治运动。长期以来，发达国家由于片面追求经济增长，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极大地危害了广大国民的利益。其中震撼世界的著名的“八大公害事件”是：(1) 马斯河谷事件，发生于1930年比利时马斯河谷工业区；(2) 多诺拉烟雾事件，发生于1948年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多诺拉镇；(3) 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初美国的洛杉矶市；(4) 伦敦烟雾事件，发生于1952—1962年英国首都伦敦；(5) 四日市哮喘事件，发生于1941年日本四日市；(6) 水俣病事件，发生于1935—1965年日本熊本县水俣市；(7) 骨痛病事件，发生于1955—1972年日本富山县神通川流域；(8) 米糠油事件，发生于1968年日本九州和四国等地。这些公害事件，主要是由大气污染和水污染造成的在广大公众中普遍流行的一种新的



病种——“公害病”。大量的人在公害事件中受难致死，成千上万的人因染上公害病而不得不终身忍受病痛的折磨。到20世纪中叶，公害事件的发生愈发频繁，范围和规模不断扩大，公众为公害的阴云所笼罩，处在一种不安全和不健康的生活之中。在这种生存危机的威胁下，广大公众为了争取安全与健康的生活，愤然掀起了一场反对公害的环境运动。这场运动的性质是一场政治运动。这是因为，环境污染的根源来自于市场的不完善，即市场机制的缺陷。市场机制虽然被认为能够有效地配置资源，但是，对于解决经济活动中的经济外部效应和提供公共产品来说，市场机制却无能为力。环境污染就是典型的外部不经济效应，它表现为环境污染给公众带来的损害，而造成环境污染的人却不必为此付出代价，只要不把这种代价计人成本，就不构成价格成本，不受市场机制的调节。随着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人们愈发需要高质量的生活和高质量的环境，而作为公共产品的环境质量是市场机制发挥作用的私人企业所不能提供的。这是由公共产品的非排他性与非排斥性所决定的。因此，要解决环境问题，单靠市场是不行的，而必须要借助于政府制定和实施的环境保护政策。现在，私营企业为了追逐利润，不顾广大公众的利益，肆意污染环境、制造公害，给社会和公众带来如此之大的损失，而又无法通过价格机制和市场约束来解决，公众只好通过群众运动，采取政治斗争的方式，将斗争的矛头对准造成环境污染从而危害了公众利益的企业和不重视环境保护的政府，向损害公众利益的企业讨回公正，要求政府重视和参与环境保护，维护公众的利益。

这场开创了世界环保新纪元的环境运动具有重要的意义：首先，它标志着人类现代环保意识的觉醒和产生。由于环境问题的外部不经济效应，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里，对于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政治家们视而不见，企业家们装聋作哑，致使污染肆虐，公害横行。而通过这次运动，表明了广大社会公众对于环境污染和公害危害已经忍无可忍并开始通过政治斗争的手段来捍卫自身的生存权利。公众开始认识到环境问题对于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重影响，开

始意识到环境污染对于人类生存的严重威胁，开始表示出对于环境问题前所未有的关注，从而揭开了一场轰轰烈烈、遍及全球、日益深入的环保运动的序幕。其次，它标志着环境问题开始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已经成为人类社会生活的中心事件。在既往的发展模式中，人们关注的中心问题始终是经济增长速度或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尽管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已经遭受到严重的损害，却没有引起社会的足够重视，致使环境问题愈演愈烈。经济发达国家尽管有比较完善的市场机制，但正如前面所述，由于环境问题属于外部不经济问题，再完善的市场机制对它也无能为力。相反，私营企业者出于对个人私利的追逐，形成了一种只要利润、不顾环境，甚至破坏环境的机制。如果没有强制性的行政干预措施，环境污染是难以得到根除和治理的。因此，在开始时，发起和参加环保运动的只是一些公害的直接受害者和少数环保主义者。而通过这次运动，环境污染的危害、保护环境的重要性、环境与人类生存发展的密切联系等问题开始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中心问题。这次运动无疑是一场全球性环保意识的启蒙，它从根本上影响和改变着整个人类的生产方式与消费方式，涉及人类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可以说它引发了一场人类对自身生存价值认识的革命。最后，正是这场波澜壮阔的环境保护运动，促成了当今人类环境保护事业的产生和发展。可以这样讲，当今世界上所有归类为“环境保护”的事业无不起源于这场环保运动。从各个国家的政府专门设置负责环境保护的机构，进行环境立法，制定各种保护和改善环境的长期规划，到开展多学科环境科学的研究，建立环境科学的科学体系，创办各种类型的环境保护科研机构，培育各种专业的环保科研工作者和专门人才；一直到组织各种由广大民众直接参与的声势浩大的群众环保活动，例如植树造林，治理“白色污染”等。总之，始于20世纪60年代后期的这场环保运动，在经历了近40年的发展历程后，已经成为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庞大、内容最丰富、意义最深远的世界性群众运动。

随着世界性环保运动的发展和深入，它早已从一场由民众自发的、带有明显抗议色彩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发展成为由政府与公众共

同参与的、涉及各个领域的、有组织、有纲领、包容整个人类的自觉活动。对于第三世界的广大发展中国家乃至整个世界，这场运动的一个重大发展或是重要转折，就是提出要在保护环境的前提下来谋求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将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正是这一变化，为环保运动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掀开了经济发展理论的崭新篇章。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以下简称《报告》）的主题便是“发展与环境”，正如当年新上任的世界银行行长刘易斯·T·普雷斯顿所说的：1990年以贫困为主题的报告，1991年以经济发展战略为主题的报告和这一年以环境为主题的报告，构成了关于发展的目标与方法的三部曲。实际上，世界银行《报告》的发表，构成了经济发展理论发展沿革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标志着人类对于经济发展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正如普雷斯顿在《报告》前言中所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人们对环境的价值认识不足，致使人类健康受到损害，生产率降低，未来发展的前景也受到破坏。本报告认为，继续甚至加速经济和人力发展的事业是可以持续的，它能与改善环境条件的工作取得一致，但需要实现政策、计划和机构的重大转变，需要实现一种双重战略。首先，要逐步开发有效的收入增长与环境需要之间的积极联系（“二者兼顾”）。其次，需要制定和设立强有力的政策和机构，它们应能使决策者——公司、家庭、农民和政府——采取破坏较小的行为方式。这两类政策都是至关重要的。[①] 作为经济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权威文献，《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的发表，标志着经济发展理论已经从根本上摈弃了过去那种以单纯追求经济发展速度为目标的发展模式，而转向以消除贫困和注重环保为基本特征的新的发展战略。这一战略的重要意义就在于将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作为与经济发展同样重要的任务。从此，环境保护不再是只供发达国家享用的“奢侈品”，而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使命。它强调广大发展中国家不仅要致力于

① 世界银行：《1992年世界发展报告：发展与环境》（前言），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

自身的经济发展，更要承担起保护环境、防止污染、维护生态的任务。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在谋求现代经济增长的进程中，如何处理好环境与发展的关系，发展中国家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这是因为作为导致环境恶化重要因素的人口过度增长和国民的普遍贫困，是当今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基本特征。值得指出的是，注重环保不仅构成了20世纪90年代经济发展理论的主旋律，而且也成为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积极行动。就在《报告》问世两个月以后，联合国第一届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于1992年6月3日至14日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隆重召开。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的召开标志着人类环境保护运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次大会上，第一次将环境与发展作为一个不可分割的问题展示于世人面前。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出席了这次大会，并承诺为拯救地球、保护环境承担起自己应负的责任，充分反映了新的发展战略正在迅速为广大发展中国家所接受并付诸实践。

十年以后，2003年的世界发展报告以“在一个动态世界中的可持续发展”为题，再一次就环境与发展问题向世人发出了警告。与十年前相比较，人们对于这一问题的认识日益深化也更为系统。《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一次从发展战略的高度将可持续发展作为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基本宗旨，在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框架下，将环境、社会的可持续发展与经济增长统筹进行考虑。探讨在一个长期的动态条件下，体制转换、经济增长、生活质量与可持续发展的关系。

那么，为什么在今天，环境问题对于人类会具有如此重要的意义，以至于要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呢？这首先要从环境的基本概念谈起。广义的环境是指围绕某一主体的外部世界。因此，所谓环境，总是相对于某一主体而言的。不同的主体拥有不同的环境。如鱼类环境、鸟类环境、人类环境等等。我们所要考察的是人类环境，即相对于人类这一主体而言的外部世界。我们所讲的环境，首先是一个整体，它是由包括人类以外的自然界中一切有生命和无生命的物质（如土壤、矿藏、森林、植被、水分、大气、阳光直至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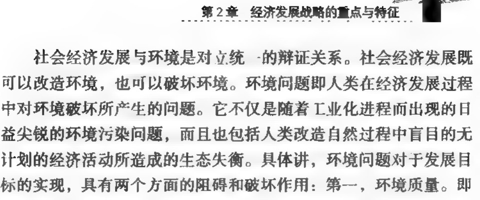
宙）组成。由于宇宙是无穷无尽的，环境的范围也是无限大的，只是受人类在各个阶段中认识与活动能力的限制而已。环境也包括人类产生后由人类自己所创造的人文景观（如堤坝、水库、运河、林带、道路、房屋等）和聚落环境（包括院落、村落、乡镇和城市环境等)。其次，是一个由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各种因素（子系统）组成的有序的庞大系统。从地下到地表，从地球到太空，各种事物都是相互依存、相互制约的。再次，是以人类为主体的环境。人类和环境以及他们的相互关系和相互作用都是发展变化的，人类所面临的环境问题实际上就是人与环境的关系问题。由于人类是以社会的形式存在的，因此，人类的环境问题实质上是社会与环境的关系问题，也即是社会经济发展和环境发展变化的相互关系问题。

2.3.2 环境与经济发展

对于人类的生存与发展，环境是不可缺少的必需条件。环境为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提供必不可少的空间场所，环境为人类的生产与消费提供各种各样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同时环境还要吸纳人类生产与生活所产生的各种废弃物（废水、废气、废渣)，也正是由于这一点，引发了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如果由于人类的生产与消费所产生的废弃物不超过环境的吸纳能力，从而没有导致环境质量的恶化（就像工业化时代以前人类所生存的漫长岁月那样)，就不构成环境污染，环境污染是环境物理学、化学或生物学条件的变化对人类生活所造成的有害影响。污染是以人们肉体的或自然环境的生物学的改变为基础的。按照物理学或生物学的标准，污染意味着某些物质或有生命的物体由于生产或消费而在生态系统中的积聚。以经济学家的观点来看，只有在环境的变化成为有害或不合需要的时候，才称之为环境污染。环境污染主要形式包括水污染和缺水、空气污染、固体废物和有害废弃物污染、土壤退化、森林砍伐、生物多样化的丧失以及大气变化等。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和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造成重大危害。关于环境污染的危害见表 2—1。

表 2—1　　环境管理不善对健康和生产造成的主要后果

环境问题	对健康的影响	对生产的影响
水污染和缺水	污染每年造成 200 多万人死亡，数十亿人患病，水缺乏造成贫困家庭卫生条件恶劣，并增加了对健康的危害。	渔业产量下降；为提供安全的饮用水，市政当局付出了费用；蓄水层的破坏造成了不可逆转的水源紧张；供水不足限制了经济活动。
空气污染	造成许多急性病和慢性病，过高的城市颗粒物水平是每年30 万人～70 万人提前死亡的原因，儿童慢性咳嗽有一半是由此引起的；400 万人～700 万人主要是农村贫困地区的妇女和儿童，室内空气受到烟尘的污染。	严重时会限制某些车辆的生产和停止工业活动；酸雨对森林和水体的影响。
固体废物和有害废弃物	腐烂的垃圾传播疾病，堵塞排水道，有害废弃物的危害一般带有地方性，但通常是严重的。	污染地下水源。
土壤退化	减少了在这种土地上耕作的贫困农民所需要的营养，更容易造成干旱。	在热带地区，农田生产率的降低直接造成 GDP 减少 0.5%～1.5%；水库坝内河道运输网以及其他水利设施的泥土淤积。
森林砍伐	造成局部洪灾，引起死亡和疾病。	丧失可维持的木材潜力，丧失对侵蚀的预防性，流域的稳定性，以及森林提供的固碳的功能。
生物多样性的丧失	失去潜在的新药。	降低生态系统的兼容性，丧失遗传资源。
大气变化	靠传播媒介传染的疾病可能发生转变，气候性自然灾害的风险；臭氧的减少造成疾病（每年可能在全世界新增加 30 万名皮肤癌患者，以及使 170 万人患眼疾）。	海面上升对沿岸设施的破坏；农业生产率的地区性变化，海洋食物链的中断。



社会经济发展与环境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社会经济发展既可以改造环境，也可以破坏环境。环境问题即人类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破坏所产生的问题。它不仅是随着工业化进程而出现的日益尖锐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也包括人类改造自然过程中盲目的无计划的经济活动所造成的生态失衡。具体讲，环境问题对于发展目标的实现，具有两个方面的阻碍和破坏作用：第一，环境质量。即安全和充足的水和有益于健康的空气，这本身就是发展所力图实现的改善福利的一个重要部分。如果提高收入带来的收益被污染对健康和生命质量所造成的损失所抵消，那么就不能称之为发展。第二，环境破坏能削弱未来的生产力。目前以提高收入的名义造成的退化的土地、耗尽了的蓄水层以及被毁坏的生态系统都将破坏未来获得收入的前景。

从上述环境的定义我们可以看到，环境的三个定义特征无不表现出环境问题的严重性与艰巨性。首先，环境是一个整体，包容了宇宙的万事万物，其影响源远流长。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从资源的过度耗费，到人口的迅猛增长；从日益加重的贫困，到对工业化目标的盲目追求；所有这些都会引起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生态的破坏。其次，环境是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巨大系统。由此，形成了"地球村"的概念。无论在地球的哪一个角落发生环境污染，都会通过种种渠道在不同的时间内将其危害传递到地球的其他地方。因此，尽管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环境问题上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分歧，但双方都清楚地知道，作为"地球村"的"村民"，无论是谁造成了环境污染，最终双方都会是受害者。环境已经将全人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保护环境、维持生态的平衡，是整个人类的神圣使命。最后，环境是一个以人类为主体的客观存在。人类既可以是环境的保护者，也可以是环境的破坏者，即人类对环境是能动的，在某种意义上讲，人类对环境具有主动权。然而，环境并不只是被动地接受人类的摆布，遭受到严重破坏的环境会以各种方式对破坏环境的人类进行惩罚。例如，森林的过度砍伐造成水土流失，会引起江河泛滥、洪涝成灾；大气污染严重导致臭氧层被破坏，形成

温室效应等。在遭受到来自日益恶化的环境的一次又一次的惩罚后,人类才认识到,遭受到破坏的外部环境,也会给人类带来灾难。环境以人类为主体,并不表明人类就是自然界的中心,只是意味着人类对保护环境责任重大。相对于包罗万象的大自然,和其他动物、植物和生物一样,人类只是其中平等的一员,如果说人类有什么特别的话,只能是人类对保护自然环境、维持生态平衡负有着更大的使命。

当人类满怀憧憬迈入新世纪的时候，环境问题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新的世纪里，环境问题将是人类所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社会问题甚至政治问题的集中体现，构成了南北关系的新焦点。日益严重的环境问题无疑会给人类，尤其是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重大的损失和灾害。值得庆幸的是，可持续发展战略的提出与实施，表明了人类在环境问题面前的清醒认识和理性选择。在新世纪的发展理论与发展实践中，保护环境、治理污染，实现可持续发展将始终处于核心位置，这是人类的未来与希望所在。如果过去人们曾经以“蓝色海洋文明”来赞誉20世纪以来人类通过工业化进程所开创的物质文明成果，那么今天我们则可以说，21世纪占据主导地位的必将是以保护环境为特征的“绿色环境文明”。

2.4 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又处在经济高速、持续、稳定增长的经济起飞过程中。20余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劳动生产率明显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改善，经济结构日趋合理，社会财富迅速增加。与此同时，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高速增长所积累下的深层次矛盾也逐渐暴露出来，人口压力、就业压力、资源压力、环境压力，构成了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严重障碍，环境与发展的矛盾，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尖锐和突出。无论是经济发展理论还是经济发展实践无不表明，经济起飞时期是一个国家经济成长的重要阶段，也是面临重重困难的时期。根

据以往的发展理论与实践，在这一阶段，最重要的任务是要保证投资力度，以维持稳定、高速的经济增长。然而，许多国家的发展实践表明，正是由于将主要精力放在了增加投资、确保增长速度上，结果忽视了对于环境的保护，以高耗能、高污染来换取高速度，从一开始就建立起一种一旦建立就很难改变的不健康的产业结构和技术结构，留下了无穷后患。

2.4.1 可持续发展：中国政府的庄严承诺

对于当代中国，在选择经济发展战略、处理环境与发展的矛盾时，面临着三种选择：第一，以牺牲资源、环境为代价来谋求发展，即把经济增长作为首要目标，暂时不考虑资源与环境代价，先把国民经济搞上去，等经济发展水平提高了，国民财富增加了，再来解决环境问题。说白了，不外乎是继续走发达国家"先污染、再治理"，"先破坏、再保护"的老路。尽管在理论上大家都知道这条路行不通，但在实践中，许多发展中国家都在自觉不自觉地重蹈覆辙。这主要是由于发展任务的紧迫性与环境问题的艰巨性所致。在生存与生态、眼前与未来的选择中，首先解决眼前的生存问题，无疑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选择，甚至是惟一的选择。况且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是这样走过来的。然而，对于当代中国，这条路却走不通。这是因为，中国作为世界第一大发展中国家，拥有十几亿人口，人均资源高度匮乏，环境问题异常严峻，根本不具备发达国家在谋求工业化进程时所具有的资源容量与环境空间。如果无视资源、环境而盲目发展，早已存在的资源、环境问题会更加深化，费尽千辛万苦所取得的发展成果也会由于高昂的环境代价而付诸东流，甚至会由此断送掉子孙后代的幸福。应该看到，中国作为世界第一人口大国，在世界范围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运动中居于特殊的地位，负有特别的使命。如果中国政府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自己的环境问题，那么世界性环境问题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决。因此，中国不能选择不顾环境、只求发展的发展道路。第二，环境优先，即采取当前发达国家高投入、高技术保护环境、治理污染的模式。然

而，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人口多、底子薄，又面临着繁重的发展任务，不可能置发展任务于不顾，倾所有国力去解决环境问题。可行的途径只能是第三条：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经济承负能力，探索一条“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走一条“边发展、边治理，边利用、边保护”的可持续发展之路，是中国在新世纪谋求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和必然选择。中国人口基数庞大，增长速度快，人均资源匮乏，利用效率低，技术落后，粗放经营，效益低下，浪费严重，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环境的大量污染和对生态的严重破坏，已经对未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造成了巨大压力，如不从根本上改变传统的发展战略和增长模式，就不可能真正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更难以为子孙后代开创美好的未来。正因为此，在八届人大四次会议审议批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明确提出了在中国未来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不仅提出了“坚持经济建设、城乡建设与环境建设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同步发展，所有建设项目都要有环境保护的规划和要求。搞好环境保护的宣传教育，增强全民环保意识。创造条件实施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健全环境保护的管理体系和法规体系”的总体目标，而且还制定了到“2000年，力争使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加剧的趋势得到基本控制，部分城市和地区的环境质量有所改善”① 的具体指标。对于什么是可持续发展，江泽民主席曾经给出了精辟的概括：“所谓可持续发展，就是既要考虑当前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未来发展的需要，不要以牺牲后代人的利益为代价来满足当代人的利益。”对于有着数千年文明历史的中国人民，对于历史、对于后代，有着更为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历史责任感。因此，可持续发展的概念不仅适应了中国当前和未来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从其文化内涵来看，也与中

①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国的传统文化和价值标准相吻合，在中国具有极大的实践性。

对于中国和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是发展。没有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没有比较雄厚的资金基础和比较先进的科学技术，环境保护尤其是环境治理是难以实现的。根据国际经验，美国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着手大规模解决环境问题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11 000美元（1980年价格）；日本则是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0 000美元水准时，开始大规模实施环境控制。而1992年，当时的中国总理李鹏代表中国政府做出履行《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时，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为470美元。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通过了标志着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正式确立的《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就在这一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也不过是530美元。这既体现了中国政府本着对中国和世界负责的精神，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坚定立场，同时也反映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艰巨性和发展经济的迫切性。实际上，没有一个经济上的大发展，保护环境、治理污染，不过只是一个良好的愿望。近些年来，中国之所以在环境保护和环境治理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其中的重要原因就在于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因此，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要把发展作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中心任务，以发展促进环保，以环保带动发展。

根据中国的具体国情，在当前实现可持续发展，就是要正确处理经济建设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对此，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五中全会的报告中进行了精辟的论述："在现代化建设中，必须把实现可持续发展作为一个重大战略。要把控制人口、节约资源、保护环境放到重要位置，使人口增长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使经济建设与资源、环境相协调，实现良性循环。"①

---

① 江泽民：《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在党的十四届五中全会闭幕时的讲话》，载《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中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战略逐步发生着重大转变：首先是在发展方针上，强调持续和协调发展，将保护环境、维护生态平衡作为协调发展的重要内容；其次在发展目标上，更加关注环境状况的改善；再次是在处理经济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的关系上，强调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追求经济发展速度和效益的统一以及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最后是努力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在保护环境、减少污染的前提下，减员增效，挖潜革新，不断增加物质财富的生产量。经过上述努力，中国正在稳步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

自从可持续发展战略提出以后，几乎在国际国内的每一个重大场合，中国政府首脑和主要领导人都一再强调要把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作为中国的基本国策，承诺在可持续发展战略的主导下去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除了上面所列举的例子，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届、十六届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一再重申：我国是人口众多、资源相对不足的国家，在现代化的建设中必须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必须把可持续发展放在十分突出的地位，并对如何实施这一战略提出了具体的要求。朱镕基总理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代表中国新一届政府对这一问题进行了更为深入的阐述："进一步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要以对人民、对子孙后代高度负责的精神，保护资源和生态环境。加强对资源的规划和管理，克服靠浪费资源求发展的短期行为，合理利用和保护资源，切实提高资源综合利用水平。要强化全民族的环境保护意识，继续增加环境保护投入，加强对重点城市、区域、流域、海域的污染治理"①。充分表达了中国政府坚定不移地贯彻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决心。然而，最能显示中国政府执行这一发展战略坚定立场的则是1994年3月25日通过的《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

---

① 朱镕基：《政府工作报告——1999年3月4日在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2.4.2 中国21世纪议程

1992年6月，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在巴西的里约热内卢召开，大会通过了著名的全球《21世纪议程》。这份文件的讨论始于1991年8月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筹备会议，经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四次筹备会议，在环境与发展大会上正式通过。虽然它并不具有法律约束力，但却是由183个国家的代表团，其中包括102位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共同签署通过的，充分反映了在环境与发展领域国际合作的全球共识和最高级别的政治承诺。全球《21世纪议程》的基本思想是：人类正处于历史的抉择关头。我们可以继续实行现行的政策，保持着国家之间的经济差距，在全世界各地增加贫困、饥荒、疾病和文盲，继续使我们赖以维持生命的地球的生态系统恶化。不然，我们就得改变政策。改变所有人的生活水平，从国家、区域、国际水平上更好地保护和管理生态系统，争取一个更为安全、更加繁荣的未来。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取得成功，而联合在一起，我们就可以成功。这一基本思想强调了人类正处于历史的关键时刻，惟有可持续发展才是人类的正确抉择。全球《21世纪议程》将经济、社会、资源与环境视为一个密不可分的整体，系统阐述了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各国解决好环境与发展问题提供了一个科学的可持续发展战略框架。因此，全球《21世纪议程》的发表，标志着人类可持续发展观的确立。全球《21世纪议程》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消除贫困，把消除贫困作为可持续发展的前提和最优先解决的问题。它提出了人口、消费方式在可持续发展中的作用，要求改变和减少存在于世界上部分地区的那种鼓励浪费的和无效的消费方式，同时提供了实现人口、消费和地球承载力相平衡的可持续的政策和方案，鼓励提高贫穷人口的消费水平，彻底摆脱贫困。可以说，全球《21世纪议程》是在世纪之交之际，人类通过对自己以往生存方式的反思，对传统的生存观、价值观的一个痛苦否定，是对迈入新世纪后生存方式的一个全新的选择。它是一个宣言，更是一个契约，它所追求的是人类、社会与整个自然界永恒的进步与和谐。

1992年联合国环发大会通过了全球《21世纪议程》，并且要求各国根据本国的情况，制定出自己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计划和对策。李鹏总理率先代表中国政府做出了履行全球《21世纪议程》等文件的庄严承诺。1992年7月，国务院环境保护委员会决定组织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并于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中国是自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和通过全球《21世纪议程》以来，在世界上第一个响应大会号召、制定国家级21世纪议程并积极付诸实施的国家。考虑到中国的人口、环境现状和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能够做出这样的抉择，足见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治理污染、保护环境，坚持可持续发展的坚定信念。

《中国21世纪议程》从中国的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促进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和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其主要内容包括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社会可持续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四个部分。在可持续发展总体战略部分从总体上论述了中国可持续发展的背景、必要性、战略与对策等，提出了到2000年各主要产业发展的目标、社会发展目标和与上述目标相适应的可持续发展对策。在社会可持续发展部分主要讨论了人口、居民消费与社会服务、消除贫困、卫生与健康、人类住区可持续发展和防灾减灾等问题。提出要控制人口增长和提高人口素质。引导民众采用新的消费和生活方式。在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中，发展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社区经济，注意扩大就业容量，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加强城乡建设规划和合理使用土地，注意将环境的分散治理逐步发展为集中治理。逐步建立城市供水用水和污水处理协调统一管理体制。增强贫困地区自身经济发展能力，尽快消除贫困。建立与社会经济发展相适应的自然灾害防治体制。在经济可持续发展部分，讨论了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政策、农业与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工业与交通、通信业的可持续发展、可持续的能源生产和消费等内容。提出利用市场机制和经济手段来推动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的就业机

会。完善农业和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综合管理体系。在工业生产中积极推广清洁生产，尽快发展环保产业。发展多种交通模式。提高能源效率与节能，推广污染少的煤炭开发开采技术和清洁煤技术，开发利用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在资源的合理利用与环境保护部分，讨论了包括水、土等自然资源保护与可持续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土地荒漠化防治、保护大气层和固体废物的无害化管理等问题。重点探讨了控制环境污染，改善生态环境，保护可持续利用资源，提出在自然资源管理决策中推行可持续发展影响评估制度。通过科学技术引导，对重点区域和流域进行综合开发整治；完善生物多样性保护法规体系，建立和扩大国家自然保护区网络；建立全国土地荒漠化的监测和信息系统；采用新技术和先进设备，控制大气污染和防治酸雨；开发消耗臭氧层物质的替代产品和替代技术；大面积造林；建立有害废物处置、利用的新法规和制定技术标准等。

作为中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纲领性文件，《中国21世纪议程》在制定过程中，既充分考虑到了国际社会的要求，能够与全球《21世纪议程》的战略分析框架接轨，更注重紧密联系中国的现实国情，其特点表现如下：（1）《中国21世纪议程》强调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是一个紧密相连的整体。深入阐述了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经济可持续发展与社会可持续发展之间的关系。从经济、社会与资源、环境不可分割的角度，提出了走向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政策和措施。明确提出要“建立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体系、社会体系和保护与之相适应的可持续利用的资源和环境基础”。(2)《中国21世纪议程》的主题是发展，并对发展的内涵进行了新的诠释。阐明振兴经济是摆在中国面前的首要任务，惟有发展才是硬道理。新的发展观要力求结合中国国情，有计划、有重点、分阶段地完成增长方式的转变，逐步由粗放型经济增长过渡到集约型经济增长。(3) 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如何解决好人口与发展的关系，自然构成了《中国21世纪议程》的战略重点。中国人口基数大，增长的绝对数量多，沉重的人口压力必然会转化为资源压力、环境压

力，对社会保健、卫生保健，以及普及教育和充分就业造成极大的困难。从而《中国21世纪议程》提出了要继续进行计划生育，在控制人口数量增长的同时，通过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健全城乡三级医疗卫生妇幼保健系统，完善社会保障制度等措施，提高人口素质，改善人口结构；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扩大就业容量，充分发挥中国人力资源的优势。(4)《中国21世纪议程》从中国人均资源高度匮乏的现实出发，提出中国21世纪环境战略的核心是环境的外部化转向环境的内在化。指明环境保护是“发展”自身的重要组成部分。从目前到21世纪初，中国环境保护的主要压力还是来自工、农业发展和城市化引起的环境问题。解决的关键在于产业政策与环境政策的协调、科学的管理与恰当的技术选择。此外，《中国21世纪议程》还充分注意到中国的环境与发展战略和全球环境与发展战略的协调。对于诸如全球气候变化问题，防止平流层臭氧损耗问题，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防止有害废物污染转嫁越境转移问题，以及水土流失和荒漠化问题等，都提出了相应的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

在《中国21世纪议程》的总体框架和原则指导下，作为实施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具体步骤，中央和地方政府又先后出台了一系列地方、部门和专项有关可持续发展的计划。如《中国环境行动计划》、《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行动计划》、《中国21世纪议程林业行动计划》、《中国海洋21世纪议程》、《环境保护21世纪议程》和《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与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本溪市21世纪议程》、《南阳市地方21世纪议程》等等。所有这些《议程》、《计划》、《纲要》，就如同一个个绿色的音符，谱写成一曲可持续发展的时代高歌。

第3章　经济发展目标的内容与意义

如前所述，经济发展理论有着庞大的理论体系、宏伟的政策目标、丰富的实践内涵。由于人类面临的发展使命的多元性和复杂性，有人甚至想构建一门无所不包的“发展学”，用以解决经济发展进程中所遭遇的全部问题。然而，发展经济学的本质属性就是一门“平民的经济学”，它总是对世界上那些最贫穷的民众最为迫切的问题投以关注。尤其是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格局变幻莫测，经济发展一波三折；局部战争狼烟迭起，金融风暴席卷全球。再加上各种自然灾害，不仅许多原本就非常贫困的国家经济发展举步维艰，就是那些号称早已“毕业”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在金融风暴的袭

击下，也是元气大伤。在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和不懈追求之后，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得不痛苦地承认：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依然是笼罩在他们头顶上的阴影。贫困、失业和收入分配的不平等，构成了不发达经济的三要素。

因此，消除贫困、充分就业和缩小收入分配的悬殊差距依然是今天发展经济学的首要使命。尽管经过了20余年改革开放，但是，中国作为一个经济刚刚起步的发展中大国，人口众多，基础薄弱，经济发展不平衡，摆脱经济不发达的任务依然相当繁重。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仍然是脱贫、就业和实现国民收入的合理分配。

3.1 永别贫困，新世纪的神圣使命

按照世界银行的说法，贫困是当前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紧迫的问题，减轻贫困是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1990年，当第三世界广大发展中国家经历了被称作是"被遗弃的十年"的20世纪80年代后，世界银行再一次将消除贫困作为世界银行发展报告的主题，重提"向贫困宣战"的口号。十年前，《1980年世界发展报告》曾经以消除贫困为主题，深入而全面地考察了贫困的原因和程度，想借此来推进人类消除贫困的事业。但是十年过去了，贫困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更加深重。当整个人类满怀欣喜和希望跨入新的世纪之门的时候，贫困依然是笼罩在发展中国家头上的一道挥之不去的阴影。在新的千年来临的时候，世界银行带给发展中世界最有意义的礼物，便是再一次吹响了"与贫困做斗争"的战斗号角。《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的主题仍然是世人关注的贫困问题。同样一个主题在世界银行的发展报告中一而再、再而三地出现，而且作为千年话题反复重申，这在世界银行发展报告中是绝无仅有的。它既表明了人类战胜贫困的勇气和决心，也反映了人类在贫困面前的尴尬与无奈。从《1990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发表到今天，又

一个十年过去了。令人不安的是，《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做斗争》(前言) 开篇的第一句话便是"富裕中的贫困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大的挑战"[①]。根据联合国《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提供的数据，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严重。世界上最富有的5%人口的收入相当于最贫穷的5%人口收入的114倍。20世纪90年代，撒哈拉以南地区极端贫困人口数从2.42亿增加到3亿。占有该地区一半以上人口的20个国家比1990年更贫穷，23个国家比1975年更贫穷。中东欧国家人均收入每年减少2.4%。按照目前的水平，人类将需要130多年的时间来消除世界饥饿。[②] 显然，这场与贫困的战争的长期性、艰巨性和残酷性，远远超出了人们预期的设想。从世界范围来看，当人类进入新世纪的时候，仍有相当于人口总数五分之一的人处于贫困的境地，这不能不说是人类文明与进步的一种悲哀。

3.1.1　贫困的概念与衡量

那么，应该如何理解贫困呢?"贫困"并不等于"不平等"，贫困是相对于社会上一部分穷人的绝对生活水准而言。在极端不平等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拥有一切，显然，贫困的程度也会十分严重；而在不平等程度极低的情况下，贫困程度可能为零，也可能是极端贫困。因此，所谓贫困就是指：缺少达到最低生活水准的能力。怎么来区别一个国家的国民是否处于贫困之中，如何来测量贫困的程度呢？首先是考察国民的生活水准。生活水准的高低主要取决于一个家庭的收入水平和人均支出的状况，当然还要包括医疗卫生、预期寿命、识字能力等福利内容以及对公共货物或公共资源的享受。其次是贫困线的确定。如果以消费水平作为基础来确定贫困线，要

---

① 世界银行：《2000/2001年世界发展报告：与贫困做斗争》(前言)，1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1。

②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2002年人类发展报告：在碎裂的世界中深化民主》，10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2002。

考虑两个方面的因素:购买最低标准的营养品和其他必需品的必要支出,以及各国间不尽相同的反映参与社会日常生活费用的另一部分支出。其中前一部分是比较明确的有关最低标准的、适合需要的卡路里摄入量以及其他生活必需品的支出。例如,只要了解一下构成贫困人口饮食内容的食品价格,就能确定其费用。相对来说,第二部分所包括的许多内容则缺乏客观的界定标准。例如在有些地方,室内自来水管线还是"奢侈品";而在另一些地区,却早已成为了生活必需品。应该指出,贫困是一个动态的概念,有一个历史发展的过程,而且因民族文化的不同而存在着很大的差异。一般而言,当一个国家变得越来越富裕的时候,它可以接受的最低消费水平——贫困线就会发生相应的变化。根据世界银行《1990 年世界发展报告》的规定,按照 1985 年购买力平价不变价格计算,世界通行的国际贫困线范围为人均消费 275 美元(下限)至 370 美元(上限)。也就是说,每天生活消费不足 1 个美元。图 3—1 是全球贫困人口分布状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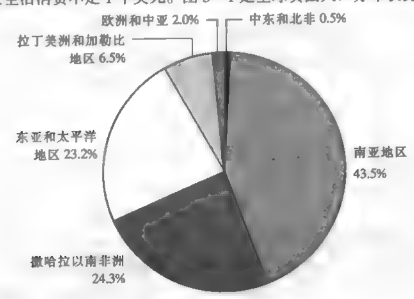


图 3—1　全球贫困人口分布状况*

* 日均生活费低于 1 美元的人口分布状况, 1998 年 (12 亿人)。
资料来源: 世界银行 (2000)。

根据这一通行的国际贫困线来衡量,如果按照其上限(370 美元),估计在 1985 年发展中国家约有 11.15 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

下，大约占了发展中国家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其中的6.3亿人口——大约占发展中国家人口总数的18%——属于最贫困的人，年消费不足270美元，即是说还不到贫困线的下限。到2000年，全世界依然存在着众多的赤贫人口。在60亿人口中有28亿人——约占总人口的一半——每天生活不足2美元。其中有12亿人——占总人口的1/5——每天生活费低于1美元（见表3—1）。

表3—1中数据资料表明，世界范围内贫困问题存在的广泛性和深刻性，决定了减少贫困的任务是艰巨的。在从1987—1998年这11年的时间里，发展中国家和经济转轨国家日均生活费用低于一美元的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从28%降至24%，仅仅下降了4个百分点，远远低于国际发展目标所确定的到2015年减少极度收入贫困所需达到的比率（年递减2%）。由于人口的增长，穷人的数量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尽管东亚以及中东和北非地区穷人的数量减少了，但是世界其他地区日均生活费低于一美元的人口数量上升了。例如南亚地区，虽然十年来穷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由45%降至40%，但穷人的数量却从4.74亿人增至5.22亿人。在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穷人数量上升了大约20%。在欧洲和中亚地区，穷人的数量从110万人增至2 400万人，与此同时，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穷人数量从已经非常高的2.17亿人增至2.91亿人，使得非洲几乎有一半人口生活于贫困之中。这意味着：同贫困的搏战在21世纪仍然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严峻使命。正因为此，无论是可持续发展战略，还是经济发展理论，无不把减少贫困作为经济发展与社会进步的首要目标和理论研究的核心内容；同时，也构成了衡量发展中国家政府发展绩效的主要标准，减少贫困将会成为21世纪人类共同奋斗的重要任务。

1996年5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的发展援助委员会发表了题为《塑造21世纪》的政策性研究报告。这一被称作“21世纪战略”的报告肯定了过去50年中取得的大量成就，强调了许多未竟议程。它要求建立一种全球性的伙伴关系，以便在21世纪初实施一种新的发展战略。该战略将着眼于从各种国际会议确

表 3—1 **1987—1998 年间部分年份各地区贫困状况**

地区	至少进行了1次调查的人口(%)	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人口(百万人)					日均生活费用低于1美元的人口所占比率(%)				
		1987年	1990年	1993年	1996年	1998年*	1987年	1990年	1993年	1996年	1998年*
东亚和太平洋地区	90.8	417.5	452.4	431.9	265.1	278.3	26.6	27.6	25.2	14.9	15.3
不包括中国	71.1	114.1	92.0	83.5	55.1	65.1	23.9	18.5	15.9	10.0	11.3
欧洲和中亚	81.7	1.1	7.1	18.3	23.8	24.0	0.2	1.6	4.0	5.1	5.1
拉丁美洲和加勒比	88.0	63.7	73.8	70.8	76.0	78.2	15.3	16.8	15.3	15.6	15.6
中东和北非	52.5	9.3	5.7	5.0	5.0	5.5	4.3	2.4	1.9	1.8	1.9
南亚	97.9	474.4	495.1	505.1	531.7	522.0	44.9	44.0	42.4	42.3	40.0
撒哈拉以南非洲	72.9	217.2	242.3	273.3	289.0	290.0	46.6	47.7	49.7	48.5	46.3
总计	88.1	1 183.2	1 276.4	1 304.3	1 190.6	1 198.9	28.3	29.0	28.1	24.5	24.0
不包括中国	84.2	879.8	915.9	955.9	980.5	985.7	28.5	28.1	27.7	27.0	26.2

注:贫困线以 1993 年 PPP 计算是日均生活费用 1.08 美元。表中的贫困指标是根据那些在 1985—1998 年间至少能提供 1 次统计调查数据的各国的收入或消费数据而得出的。如果统计年份与表中年份不一致。那么就利用与表中年份最近的一次统计数据,并采用国民账户统计中的消费增长率经过调整而得出。在测算各地区的贫困状况时,假定抽样调查的国家能够代表整个地区的情况,因此对穷人数量的评估是以地区为单位进行的。在统计调查所覆盖范围最低的地区,这种假定条件显然是不太成立的。关于统计数据及其方法的详细情况,请参见 Clun and Revallin(2000)。

* 初步估计值。

资料来源:世界银行(2000)。

定的众多目标中归纳出来的6个主要目标，其中的首要目标就是“到2015年，将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人口比重降低一半”[①]。具体讲，如果按照1995年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既定比率30%来推算，则贫困人口总数将会由于人口的预期增长而从1995年的13亿上升到2015年的19亿。如果人类能够在减少贫困方面有所作为，将贫困人口的比率降低到15%，则贫困人口的数量就会降低到9亿。因此，21世纪的减贫目标就是在从1995年至2015年的20年中，使近10亿的人口摆脱贫困。

如何才能使这一目标得以实现呢？从一个国家的内部经济政策来看，首先是要加快经济增长的速度。尤其是对那些极端贫困国家，没有一个初始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基础，就难以摆脱贫困恶性循环的束缚，更难以消除普遍的贫穷。其次是要改善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对不同经济发展程度国家的比较研究表明，越是经济落后的贫困国家，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就越是悬殊。实际上，只要收入和财富的分配差别悬殊，贫困就会永远存在。只有当全体国民都能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贫困才能得到有效的抑制。第三是要推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改善卫生状况，提高教育水平，提高妇女地位，保障儿童健康成长等。从外部国际环境来看，发达国家和国际机构要全力支持和积极援助经济落后国家的减贫努力，把贫困国家的脱贫目标视为人类进步的共同目标。而贫困国家也要积极主动地去争取，甚至通过不懈的斗争来获得这种支持和援助。总之，要想真正实现这些战略目标，所需要的是全人类的共同努力与合作。

3.1.2　中国的反贫困战略

在世界范围反贫困的斗争中，中国占有特殊的位置。由于中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发展中国家，因此从绝对数量上来看，中国也就拥有了世界上最为庞大的贫困人口。根据世界银行提供的数据，

① 世界银行：《1998世界发展指标》，23页，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9。

按照每人每天消费不足1美元的世界贫困线，1993年，中国的贫困人口占到人口总数的62%，中国消除贫困的任务的艰巨性由此可见一斑，同时也说明了中国消除贫困的努力在世界反贫困斗争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根本上解决中国贫困问题，既是解决世界范围贫困问题的前提，也是对解决世界性贫困问题所做出的重大贡献。

与国际上通行的贫困定义和确定标准不同，中国在现阶段所说的贫困与反贫困指的都是绝对贫困而不是相对贫困。1994年，中国有绝对贫困人口9 200万人，其中城市绝对贫困人口1 200万人，农村绝对贫困人口8 000万人。中国政府确认和集中扶持的贫困人口，主要是指居住在农村的物质生活特别困难、只能维持甚至不能再维持简单再生产的8 0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农村绝对贫困的标准是：食品支出占农户生活消费支出的60%以上，日摄热量不足2 100大卡。这个标准是根据中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制定的，与国际通行的标准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贫困标准相比较，还是很低的。如果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的规模，显然要比公布的8 000万人大得多。

中国的绝对贫困问题具有三大特征：第一是社会经济结构特征，表现为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绝大部分分布在农村，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全国绝对贫困人口总数的87%。这是发展中国家双元经济结构特征在中国贫困问题上的必然反映。居住在城镇的居民，可以享受到各级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种种社会福利保障。而占全国人口总数近80%的农村居民，却与这些保障制度无缘，他们的衣食住行、生老病死完全要由自己来承担。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政府对于城乡人口流动的控制，又使这种社会福利分配不均等的现象长期存在并且固定化。其结果必然是贫困在农村的集中。第二是自然地理区域特征。中国的绝对贫困人口相对集中地分布在若干个自然条件极为恶劣的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主要是西南喀斯特地区、南方红壤丘陵地区、北方黄土高原地区、西北荒漠化地区。在当时中国的8 000万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有70%以上集中在592个贫困县中。

这592个贫困县分布在中西部的深山区、石山区、荒漠区、高寒山区、黄土高原区、地方病高发区以及水库库区。这些地方自然环境极为恶劣，基础设施极为缺乏，社会服务极为落后，地处偏远，交通闭塞，远离社会经济活动中心。长期以来，政府所实施的人口控制政策所导致的人口的非流动性，又使这些地区的贫困问题日益严重。第二是民族阶层群体特征。中国的贫困人口往往是那些在社区的政治资源和经济资源的分配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的人。阶层性贫困首先反映为贫困地区内也存在着非贫困人口。实际上，就是在贫困地区内，不同阶层的群体之间生活质量的差异也是很大的。另一方面，中国的阶层性贫困问题突出地反映为少数民族的贫困问题。在8 000万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中，少数民族人口占了很大的比例。区域性贫困问题也是如此，绝大部分贫困地区是少数民族人口居住的地区。因此，用一个通俗的表述方法，中国的贫困问题，绝大部分存在于老、少、边地区。①

1978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高达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这么庞大的贫困人口规模，如此高幅度的贫困人口比例，既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统治的桎梏，近代一百余年三座大山压迫的历史遗产，又是改革开放前极左路线所造成的恶果。党的改革开放路线和富民政策，为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的贫困问题提供了政治前提，经济的迅猛发展和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高为消除贫困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改革开放以后，政府广泛动员全社会的力量，按照统一的部署，筹集巨额资金，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地长期开展扶贫开发工作。从1978—1985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2.5亿人减少到1.25亿人，下降了50%，平均每年减少1 786万人，贫困人口的比例从1978年的30.7%下降到14.8%。从1986—1993年，农村绝对贫困人口由1.25亿人减少到8 000万人，平均每年减少640万人。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总人口的比例，也从1985年的14.8%下降到1992年的8.8%。15年间，中国农村绝对

---

① 胡鞍钢等：《中国地区差距报告》，390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贫困人口减少了1.7亿人。

进入90年代，随着国民经济持续、稳定、高速发展，中国的综合国力有了明显的提高，物质基础更加雄厚。按可比价格计算，从1979—1993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每年增长9.3%；1994年，按当年价格，国内生产总值达到43 800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比上年增长11.8%。已经具备了消除绝对贫困的物质条件。而国际反贫困的理论和实践表明，当一个国家的绝对贫困人口下降到总人口的10%以下时，这部分人口难以在短期内通过全面的经济增长摆脱贫困状态，并且单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实际上也不可能彻底摆脱绝对贫困，必须要通过政府或专门的社会机构通过有组织的扶贫活动，甚至要在整个社会范围内掀起一场声势浩大的反贫困的斗争才能彻底根除贫困。随着地区收入差距和阶层收入差距的日益扩大，一方面，处于绝对贫困境地的人口的“相对被剥夺感”会愈发强烈；另一方面，这部分绝对贫困人口的生存状态也难以为社会公众所接受，“反贫困”已成为包括穷人和富人的全体社会成员的共同要求。更为重要的是，按照中国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和生活富裕程度，用不着耗费很大部分的社会财富量便能使这部分绝对贫困人口摆脱贫困的境地，过上温饱生活。按照1994年43 800亿元的国内生产总值，只要拿出1%，便可以实现这一目标。

3.1.3 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制定了《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提出到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即是说到2000年，要使其时存在的8 000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在中国农村彻底根除贫困。经过5年的不懈努力，到1998年，中国农村的绝对贫困人口从8 000万减少到4 200万，从而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占农村人口的比例进一步下降到4.6%。扶贫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贫困地区的生产条件明显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各项工作都有了巨大进步。改革开放的20年，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最快、贫困人口减少最多的历史时期。近20年来，中国的



贫困人口以平均每年1 000万的速度迅速下降，农村绝大多数人口的温饱问题已经基本得到解决，中国人民进入和建设小康社会的基础更为坚实。而在同一时期，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的贫困状况日趋严重，还有大量人口处于赤贫状态。正如江泽民同志所说的："这不仅具有重大的经济和社会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件事在中国的发展史上是值得大书特书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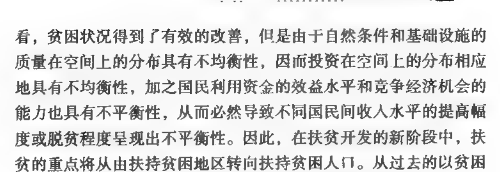
为了胜利完成在2000年根除贫困的任务，中共中央于1999年6月9日在北京召开了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江泽民同志在大会上发表了题为《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的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江泽民同志全面总结了中国20年来扶贫开发工作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及其伟大意义，并就决战阶段的扶贫开发工作做出部署。江泽民同志指出：目前尚未解决温饱问题的农村贫困人口还有4 200万，除去不适合参加生产劳动的残疾人和社会保障对象，以及一部分缺乏基本生存条件的极度贫困人口，还有2 000多万人。现有的贫困人口大多数分布在地域偏远、交通闭塞、资源匮乏、生态环境恶劣的地方。解决这部分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是扶贫工作中最难啃的硬骨头。今后两年，每年要力争解决1 000万左右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难度是很大的。扶贫开发已进入最艰难的攻坚阶段。不论今后两年的扶贫攻坚任务有多么艰巨，全党全国都要同心协力啃下这块硬骨头。接着，江泽民同志满怀激情地宣布："到2000年基本解决农村贫困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我们党和政府向全国人民做出的庄严承诺，并向世界作了宣告。这个战略目标必须实现，也完全有条件实现。实现这个战略目标，标志着中国人民将在新的发展起点上进入新世纪。"①

为确保2000年根除农村绝对贫困这一伟大目标的实现，中国政府对扶贫工作进行了重大的改革：第一，从道义性扶贫向制度性扶贫转变，即是说要把扶贫开发工作视为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职

---

① 江泽民：《全党全社会进一步动员起来　夺取八七扶贫攻坚决战阶段的胜利——在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载《人民日报》，1999 07 21。

责，要提供制度保证。各级政府都要设立专门的组织机构并拨发专门的经费，还要有一套相应的法律和政策来指导和约束这些机构的活动与经费的使用。这一转变使得政府的扶贫开发活动与国民或民间组织的扶贫活动有了根本的区别，它意味着对于政府而言，扶贫开发决不仅仅是基于道义的自愿选择，而是一项不可推卸的责任。第二，由经济性扶贫向开发性扶贫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帮助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处境的工作已不同于一般的社会救济工作，而成为一项独立的社会工程。社会救济工作的对象是那些丧失了劳动能力的个人和家庭，以及由于不可抗拒的自然灾害或不利的宏观经济条件的冲击而暂时陷入贫困状态的个人和家庭。它所使用的方法主要是目标明确的补贴计划和社会安全保障网络。扶持贫困人口工作的对象是那些具有劳动能力和劳动愿望的个人和家庭，他们由于所在地区的自然条件恶劣和基础设施短缺而长期处于贫困状态，在没有外部帮助的情况下，将永久性地处于贫困状态。开发性扶贫的方针是鼓励贫困地区广大干部群众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国家的扶持下，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依靠科技进步，开发利用当地资源，发展商品经济，解决温饱进而脱贫致富。其基本途径是重点发展有助于直接解决贫困人口温饱问题的种植业、养殖业和相关的加工业；积极发展能够充分发挥贫困地区资源优势、又能大量安排贫困户劳动力就业的资源开发型和劳动密集型的乡镇企业；发展有组织的劳务输出，引导贫困地区的劳动力合理、有序地转移；对极少数生存和发展条件特别困难的村庄和农户实行开发式移民。开发性扶贫的中心是帮助贫困人口形成自我发展的条件，并以此作为贫困人口脱贫致富的基础。第三，由扶持贫困地区向扶持贫困人口转变。这意味着国家的扶贫对象不再是贫困地区（主要是贫困县），而是贫困人口；国家扶贫工作的直接受益者不再是贫困地区的各级政府，而是贫困地区的贫困人口。以贫困地区为对象的反贫困战略追求的是贫困地区整体经济实力的增长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形成。然而在整个区域的经济成长过程中，不同国民群体的人均收入水平提高的程度是不同的。随着扶贫工作卓有成效地进行，从区域范围来



看，贫困状况得到了有效的改善，但是由于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的质量在空间上的分布具有不均衡性，因而投资在空间上的分布相应地具有不均衡性，加之国民利用资金的效益水平和竞争经济机会的能力也具有不平衡性，从而必然导致不同国民间收入水平的提高幅度或脱贫程度呈现出不平衡性。因此，在扶贫开发的新阶段中，扶贫的重点将从由扶持贫困地区转向扶持贫困人口。从过去的以贫困县为主转向以贫困户和以贫困户占绝大多数的贫困村为对象。

以绝对贫困人口为对象的根除贫困战略由四个相互联系的部分组成:第一,为贫困人口提供经济机会,使他们仅有的经济资源——劳动力能够用于生产活动,从而使他们能够依靠自己的劳动解决自己的温饱问题。第二,为贫困人口提供基本的社会服务,特别是初等教育、职业培训、初级卫生保健和计划生育服务,通过提高贫困人口的劳动力素质,进而提高他们利用经济机会、竞争就业岗位的能力。第三,为贫困人口建立社会安全保障网络,使那些因永久丧失劳动力、因不可抗拒的自然或社会灾难而暂时地或永久地陷入贫困状态中的人的基本需求得到保证。第四,在贫困地区深化社会改革,进行根除贫困的制度创新,为根除贫困创造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制度保证。

总之，在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史上，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这场根除贫困的斗争是一场伟大的革命。在短短20年的时间里，使全中国2.5亿最贫困的人口摆脱了贫困的境遇，过上了温饱的生活，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也是中国对世界所做出的重大贡献。尤其是在世界贫困日益深化、反贫困斗争举步维艰的时刻，中国根除贫困的伟大成就，对于广大第三世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反贫困斗争，是一个巨大的鼓舞，也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必将被记入人类文明发展的光辉史册。

3.2 充分就业，是手段也是目的

对于各国政府来说，充分就业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宏观经济目标



之一。根据经济学的基本原理，所谓充分就业并非一定是100%的就业，一般而言，只要每年的失业率（即在改变工作过程中所发生的摩擦性失业和自愿性失业）不高于2%～3%就可以认为是实现了充分就业。

而对于发展中国家的政府来说，为广大国民创造尽可能多的就业机会，减少和消除失业，具有更为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对于发展中国家那些没有任何替代财产的广大国民，稳定的工作是他们收入的惟一来源。一旦他们失业了，就丧失了谋生的基本手段，必然要陷入贫困。因此，经济发展理论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描述发展中国家失业存在的严重状况，探讨这些失业存在的原因，提供减少失业的政策措施。从刘易斯的结构变动模式，到钱纳里和斯特劳特的满足人民基本需要的战略，无不把解决失业作为发展中国家的头等大事。

3.2.1 以小为好的"中间技术论"

英籍德国著名发展学者E.F.舒马赫于1973年发表了他的著作《小的是美好的》，在这本书中，他格外强调就业问题。他在描述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贫困人口状况时说："在大部分所谓发展中国家里，穷人的典型状况是什么？他们的工作机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以致不能摆脱苦难。他们是半失业或全失业者，而且当他们找到临时工作时，他们的生产率也是十分低的。"① 他认为，一个人受到的最大剥削是失去照顾自己和谋生的机会。就业是人的最基本的需求。因此，解决就业问题就成了贯穿全书的一个基本思想。

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存在着如此严重的失业问题呢，舒马赫认为，根本原因在于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的双元经济结构。舒马赫指出：几乎所有的所谓发展中国家都有一个现代经济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与发达国家近似，但是它们还有一个占人口绝大

①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15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多数的非现代部门，那里的生活方式和劳动方式不仅极其不能令人满意，而且处在迅速衰退的过程中。……几乎在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出现的不良倾向之一是越来越明显的“二元经济”。二元经济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它们之间相互隔绝，犹如两个世界。这不是一部分人富有、另一部分人贫穷、通过一种共同的生活方式各自团结在一起的问题，而是两种生活并存、然而一种生活方式中即使最卑微的人的每天的收入也比另一种生活方式中最辛勤劳动的人的收入要高出许多倍的问题。在一个典型的发展中国家的二元经济中，15%的人口生活在现代化区域内，主要局限在一两个大城市里，其余85%的人口则生活在农村和小城镇中。由于大部分发展力量都投入到大城市里，这意味着基本上忽视了85%的农村人口。正因为此，城市和乡村在收入水平、生活状况、基础设施、公共福利等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天壤之别，这必然会引起大量的农村人口为了城市的高收入和高福利而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在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中，正是这种农村潜在失业人口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为城市现代工业部门的成长提供了大量廉价的劳动力，既支撑起现代工业部门的拓展，又解决了农村大量存在的隐蔽失业。但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型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它是以城市已经实现了充分就业为基本前提的，它假定城市现代工业部门吸收剩余劳动力的能力是无限的。因此，在面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城市失业人口时，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这个模型都显得那样苍白。舒马赫注意到了这一状况，他看到，对于新独立的国家，“特别是两种现象：大量失业和大量向城市移民，正在引起全世界的关注。”舒马赫把这两种现象视为二元经济的“孪生灾害”，他警告说：“直到最近，发展专家们还很少提到二元经济及其孪生的灾害——大量失业与大量向城市迁移。当他们提到时，也只是表示痛惜，将其视为一种过渡性现象。但与此同时，人们普遍认识到，仅仅用时间并不能治疗创伤。相反，如果不有意识地加以抵制，二元经济就会产生我所说的‘相互毒化过程’，城市工业的顺利发展破坏内地的经济结构，内地则以人口大规模流向城市的行动来报复，使城市受到毒害，而且使

城市完全失去控制。”①

显然，面对着如此众多已经生成和正在生成的失业人口，传统经济学所提供的解决办法是难以奏效的。针对着这种情况，舒马赫提出：至少有一部分重要的发展力量应当越过大城市而直接开始在农村和小城镇地区建立“农业—工业结构”。在这方面，必须强调首先需要的是工作场所，要提供几百万个工作岗位。当然，没有人会认为个人产量是不重要的，但是主要考虑的不能是最大限度提高个人产量，而必须是最大限度为失业者与半失业者提供工作机会。对一个穷人来说，工作的机会是所有需要中最大的需要，即使是工资微薄或者相对没有收益的工作也比闲着没事做要好些。因此，任务就是在农村和小城镇创立几百万个新的工作场所。很显然，发达国家里已经兴起的现代工业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现代工业是在资金充裕、劳动力短缺的社会里兴起的，因而不可能适应资金短缺、劳动力充足的社会。要满足发展中国家如此规模庞大的就业需求，所建立的工作场所和所提供的生产技术必须能够满足下列要求：第一，必须在人们现在居住的地区，而主要不是在他们想要移民的大城市地区建立工作场所；第二，一般说来，这些工作场所的建立成本必须低廉，以便大批建立而无须高不可达的投资额与进口；第三，采用的生产方法必须比较简单，以尽量减少生产过程本身乃至组织工作中的原料、财务、销售等方面，对高度熟练技术的要求；第四，生产应当主要是就地取材，而且主要是供当地使用。而能够满足上述要求的生产技术就是舒马赫所大力提倡的“中间技术”。

那么，什么是中间技术呢，舒马赫定义说：如果我们根据“每个工作场所的设备费用”来评定技术水平，就可以象征性地把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本地技术称为 1 英镑技术，把发达国家的技术称为 1 000镑技术。这两种技术之间的差距如此之大，以至于从一种技术转变到另外一种技术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实上，发展中国家当前

① ［英］E.F.舒马赫：《小的是美好的》，109～112 页。

将1 000英镑的技术渗透到本国经济中去的企图，不可避免地会以惊人的速度扼杀1英镑的技术，其摧残传统工作场所的速度要比建立现代化工作场所的速度快得多，从而使穷人处于比以前更加绝望、更加无助的境地。如果要给最需要帮助的人以有效的帮助，那就需要一种介于1英镑技术和1 000英镑技术之间的中间技术。我们也可以象征性地称它为100英镑技术。同那种1 000英镑的技术相比较，这种中间技术能够适应比较简单的环境，设备与生产方法简单，容易掌握，对原材料的依赖性较小，对市场的适应性很强，人员易于培训，组织管理也比较单纯。在舒马赫看来，贫穷国家的经济只有立足于中间技术，才能获得较迅速的发展。

在观点各异、流派众多的经济发展理论中，舒马赫的“中间技术论”以其强调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适应性，为贫困中的人们提供最广泛的就业机会而著称于世，他的《小的是美好的》一书也因此在从1973年发表至1979年的6年中先后再版12次，成为发展经济学的经典之作。

3.2.2 中国严峻的就业压力

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又处在从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工业转变，从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的双重转轨过程中，其就业压力是非常大的。统计数字表明，我国15岁～64岁人口2000年为8.5亿，2010年将达到9.7亿，2020年将达到9.97亿。预计今后几年，全国新生劳动力供给将达到4 650万人，城镇现有下岗职工和失业人员1 400万，农村剩余劳动力1.5亿人以上。无论城镇还是乡村，劳动力的总供给都明显大于总需求。[1] 中国目前到底有多少失业人口，由于统计口径不一，运用概念不同，众说纷纭。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市场化进程的加速，我国城镇失业人口（不包括农村失业人口）的迅速

---

① 杨凌隆：《深化分配体制改革，不断改善人民生活》，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21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增长，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1992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393.9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2.3%；1993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420.1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2.5%；1994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476.4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2.8%；1995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519.6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2.9%；1996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552.8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3%；1997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557.58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3.1%；2001 年，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为 700 万人，登记失业率为 3.6%；2002 年登记失业率增长到 4.5% 左右。与经济发达国家相比较，尽管它们的失业率有时也会远远高于 3%，但其所表明失业的绝对数量并不高。而我国 4.5% 的失业人口仅仅涵盖登记的失业人口，事实上，在我国还存在着一个庞大的隐性失业人口群体，再加上国有企业的 3 000 万人的冗员，未来的就业压力会更加严重。

我国就业形势的严峻性不仅体现在失业人口的增多上，而且还体现在下岗人数的增加上。自 1993 年以来，我国下岗职工逐年增长：1993 年，有大约 300 万人下岗；1995 年，下岗人数迅速增长到 564 万人；1997 年，全年下岗职工 1 200 万人；到 1998 年 9 月份，我国已有下岗职工 1 070 万人，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714.7 万人，占下岗职工的比例为 66.8%。到 2001 年，在各方面的努力下，下岗职工的数量有所减少，其中国有企业下岗职工 515 万人，比上年底减少了 142 万人。尽管每年的下岗职工中大约有一半左右的人都得到了妥善的安置，但仍然还有大约一半左右的人在待业。譬如 2001 年共有 227 万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实现了再就业，但再就业率仅为 30.6%。这对我国的就业和再就业显然是个严峻的考验。[①]

如前所述，在未来的 20 年中，15 岁～64 岁人口将一直呈增长状态。到 2020 年将比现在增加 1.47 亿人。也即是说，在未来的

① 张建华：《十六大之后——关注中国面临的紧要问题》，197 页，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2003。

20年中，除了要解决目前已存在的失业和下岗问题以外，还要为这增长的1.47亿人口提供就业岗位。面对如此旺盛的劳动供给，就业问题将成为长期困扰我们的一个难题。

同经济发展理论对于发展中国家存在失业的解释相比较，中国面临的局面远比发展学者所讨论的情况要复杂得多，也严峻得多。中国人口规模庞大，农村人口众多，由于经济成长和经济结构转型从农业部门游离出来的潜在失业人口数以亿计，这部分人口盲目地流入早已是人满为患、失业严重的大城市，进一步加重了城市的就业负担。实际上，在各国实现工业化的进程中，农村人口在总人口中比例的减少（即所谓“去掉农民”）完全是一种正常现象，是社会进步和经济发展的标志。然而，中国农村人口基数大、增长率高，长期计划体制下严格的户籍制度等特殊国情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阻碍了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正常流动。因此，无论是当年处于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发达国家，还是当今的发展中世界，都没有面临过像今天中国这样庞大的农业人口转移任务。而现在中国一方面城市化进程相对滞后；另一方面“都市病”日益严重，现有的城市根本就无法接纳如此众多的农村剩余人口。更直接的就业压力却是来源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结构调整所导致的城市在业职工的下岗和城市新增就业人口的就业困难。和农业转移人口不同，农民是小生产者，拥有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与生活资料，譬如土地、住房等，因此即使一时在城里找不到工作，回到农村维持温饱也不成问题。而城市的工人却是实实在在的“无产者”，工资收入是他们惟一的生活来源，一旦失去了工作，丧失了工资收入，其生计必然出现问题。考虑到很不健全的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制度，这一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和严峻。尤其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对于国有企业来说，企业职工在理论上是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是企业的主人，为他们提供就业岗位，保证他们有一个稳定的收入和不断提高的生活水平，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基本表现，也是他们当家做主的基本权益。然而，由于体制上的原因，国有企业摆脱困境，“减人”是关键。因此，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对外开放的扩大，

继续沿用行政办法来保护亏损企业的办法是行不通的，必须走规范破产、鼓励兼并、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实施再就业工程的路子。而富裕职工下岗分流是一个方向，是一项大的政策，是振兴国有企业的一项根本措施。这样，国有企业的解困与体制创新就与保证充分就业的目标形成了尖锐的矛盾。国企改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决定了国企职工的下岗和再就业必然是一个曲折而又痛苦的过程。这是因为下岗是改革所必需的，而再就业却仅是一种可能。由此我们看到，在构成当前中国就业压力的原因中，改革的因素比发展的因素更为重要。但是，要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问题、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还有赖于经济发展。无论从哪个意义来讲，发展经济都是增加就业的最有效措施。此外，新增的就业人口也是导致就业压力的一个重要原因。这部分人与下岗职工不同，他们刚刚完成学业，年富力强，对新的生活充满了希望，如果不能顺利地得到工作岗位的话，对他们来说将是步入社会后所遭受的第一个、也是最沉重的打击。

通过上述我们看到，改革与发展的不断深化，使就业问题变得日益严峻，而体制改革的艰难和经济增长乏力，又使就业问题的解决面临重重困难。可以说，当中国跨入新世纪的时候，改革、发展与社会进步所面临的最大挑战就是就业压力。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得到很好的解决，所有的改革成果与发展成绩都难免会毁于一旦。这是因为，改革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发展也只是手段而不是目的，但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来说，就业既是手段也是目的。就业能使国民满足温饱，摆脱贫困。对于各国政府而言，就业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所以，著名经济学家厉以宁教授不止一次地强调说，失业和通货膨胀是所有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然遭遇到的两大难题，而失业问题远比通货膨胀更令人担忧。对于社会主义的中国来说就更是如此。

3.2.3 增加就业的多元战略与政策措施

构成中国就业压力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治理的方法和政策措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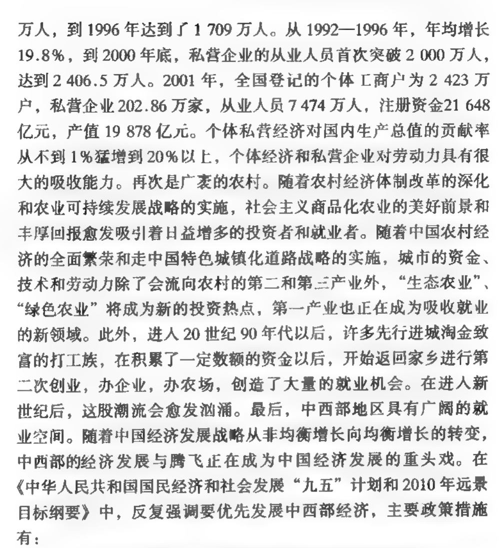
也是多方面的。发展经济，保持既定的经济增长速度，尤其是加速农村的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是解决失业问题的根本途径。正如舒马赫和托达罗反复强调指出的，应当高度重视农业和农村的发展，尽量减轻城乡经济机会不均等的现象，通过建设小城镇和促进城乡中小企业的发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弱化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的经济动机，减少城市的就业负担。一个先进而现代化的农业，一个繁荣富裕的农村，不仅不再是"劳动力无限供给"的源泉，反而会成为吸纳劳动力的新场所。

鉴于城市国企改革的艰难性，减员增效又是国企改革的根本措施，因此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国有企业很难成为吸收就业的主要渠道。解决城市就业问题必须开拓新的思路。随着中国经济所有制结构的重大变革，非公有制经济将成为城镇就业的主渠道。有资料表明，从1980—1990年，个体经济单位的就业增长率高达22.5%。进入90年代以来，个体经济等非公有制经济单位吸收劳动力的能力又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成为城镇就业的主渠道。1991—1995年，个体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高达20.5%，私营经济单位就业增长率更是高达53.5%。"八五"期间，个体私营经济从业人员净增加了2 190万人，相当于同期城镇新安置就业人员的63.2%。1994年，在城镇从业人员中，个体私营的非公有制经济新增就业人员212万人，恰好是当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减员数。1996年，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城镇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减少182万人的同时，从业职工人数比上一年增加65万人，总数已达到942万人。截止到2001年底，全国私营企业202.9万家，私营企业投资者460.8万户，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2 433万户。城镇非公有单位从业人员已达4 329万人，占城镇从业人员的29.3%。其中外商和港澳台商投资经济单位从业人员达671万人，私营个体单位从业人员达3 658万人。[①]

① 王岐山：《坚持和完善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载《十六大报告辅导读本》，16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2002。

具体来说，非公有制经济作为经济发展新时期吸收就业的主渠道，对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将发挥重要的作用。首先是“三资”企业。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利用外资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取得了很大的发展。1980 年北京航空食品有限公司成为在国家工商局注册的 001 号合资企业，到 2003 年 11 月底，全国已累计批准外商投资企业 460 812 个，合同外资金额 9 285.62 亿美元，实际利用外资金额 4 951.20 亿美元。从 1993 年起，中国已连续多年成为利用外资最多的发展中国家，2002 年使用外资 527 亿美元，超过美国，首次成为世界上吸引外资最多的国家。全球制造业 500 家最大的跨国公司，已有 400 余家在中国投资。“三资”企业在中国的大发展，吸收了大量的劳动力就业。1985 年，在“三资”企业就业的职工仅有 13.2 万人，到 1994 年已增加到 700 余万人，年均增幅达 48.7%，高于同期城镇公有制企业 40 多个百分点。到 1996 年，“三资”企业职工已达 900 多万人。到 2000 年底，又增加了 300 余万人。到 2003 年底，在外商投资企业直接就业人数约 2 350 万人，约占全国城镇非农业劳动人口的 22%。其次是私人经济和个体经济。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进行，中国的私营企业和个体经济也有了迅速的发展。1994 年，注册的私营企业已达 33 万家，注册从业人员为 510 万人，分别比上一年增加 37%和 34%。1996 年私营企业从业人员为 620 万人，1992—1996 年，私营企业从业人员年均增长 55.6%。1997 年 9 月 12 日，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的报告中明确指出：“非公有制经济是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要继续鼓励、引导，使之健康发展。这对满足人们多样化的需要，增加就业，促进国民经济的发展有重要作用。”① 从而极大地促进了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的发展。1991 年个体经济从业人员为 692 万人，到 1994 年已达到1 225

① 江泽民：《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 21 世纪——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7-09-22。



万人，到1996年达到了1 709万人。从1992—1996年，年均增长19.8%，到2000年底，私营企业的从业人员首次突破2 000万人，达到2 406.5万人。2001年，全国登记的个体工商户为2 423万户，私营企业202.86万家，从业人员7 474万人，注册资金21 648亿元，产值19 878亿元。个体私营经济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率从不到1%猛增到20%以上，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对劳动力具有很大的吸收能力。再次是广袤的农村。随着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农业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社会主义商品化农业的美好前景和丰厚回报愈发吸引着日益增多的投资者和就业者。随着中国农村经济的全面繁荣和走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战略的实施，城市的资金、技术和劳动力除了会流向农村的第二和第三产业外，“生态农业”、“绿色农业”将成为新的投资热点，第一产业也正在成为吸收就业的新领域。此外，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许多先行进城淘金致富的打工族，在积累了一定数额的资金以后，开始返回家乡进行第二次创业，办企业，办农场，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在进入新世纪后，这股潮流会愈发汹涌。最后，中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就业空间。随着中国经济发展战略从非均衡增长向均衡增长的转变，中西部的经济发展与腾飞正在成为中国经济发展的重头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反复强调要优先发展中西部经济，主要政策措施有：

1. 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

2. 理顺资源性产品价格，增强中西部地区自我发展的能力，加大中西部地区矿产资源的勘探力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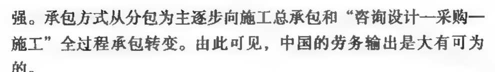
3. 实行规范的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逐步增加对中西部地区的财政支持。随着全国经济的发展和中央财政实力的增强，逐步提高中央财政用于支持中西部地区的比重。

4. 加快中西部地区改革开放的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提高国家政策性贷款用于中西部地区的比重，国际金融组织和外国政府的贷款60%以上要用于中西部地区。



5. 加强东部沿海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经济联合与技术合作。鼓励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投资，组织好中西部地区对东部沿海地区的劳务输出。东部经济发达地区采取多种形式与中西部地区联合开发资源，利用中西部地区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加强人才培训和交流。

正是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导下，在"九五"和"十五"计划期间，中央政府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人，尤其是在基础设施和基础产业上向中西部地区倾斜，先后建设了京九铁路、喀什——库尔勒铁路、兰新复线，开始建设青藏铁路，三峡、小浪底水利工程，塔里木油田，陕甘宁油气田，西气东输、西电东送，新疆和甘肃河西走廊农业后备基地等。像美国的阿莫克集团、埃索公司、英国糖业集团、日本住友商社、意大利阿吉姆公司等外国投资商也纷纷看好中国西部这块充满希望的热土。自 1999 年党中央提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到 2002 年的三年中，国家在西部地区开始建设 36 个重点项目，总投资 6 000 多亿元，涉及水电、铁路、公路、机场、水利枢纽、油气管道等基础设施领域。三年中，西部地区建设和改造大型水库 30 多座，新增公路通车里程 5 万千米，新建铁路新线 1 641千米、复线 1 311 千米、电气化线路 1 370 千米，新建和改扩建机场 31 个，西电东送工程在建装机容量 2 200 多万千瓦。显然，中西部地区的开发热潮必将提供一个广阔的就业空间，并将在全国范围内决定劳动力资源重新配置的格局。最后，通过向海外组织劳务输出，开拓就业机会。冷战结束以后，随着西方国家的经济复苏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腾飞，国际劳务市场日趋活跃，中国作为处于经济起飞过程中的发展中大国，劳务输出具有巨大的潜力。1998 年，中国的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取得重大进展，在外劳务人数 35 万余人。截至 1998 年底，中国累计签订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合同金额 834.7 亿美元，完成营业额 583.7 亿美元，带动国产设备材料出口 35.4 亿美元，外派劳务人数超过 177 万人次。仅 2001 年，全国对外承包工程和劳务合作完成营业额就达 121 亿美元，在外劳务人员 47.5 万人。目前，我国已进入国际工程承包的世界十



强。承包方式从分包为主逐步向施工总承包和“咨询设计—采购—施工”全过程承包转变。由此可见，中国的劳务输出是大有可为的。

正如前面所阐述的，失业问题是当前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所面临的最大威胁。如果我们能通过以非公有制经济为主渠道的多元就业战略在比较短的时期内卓有成效地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也就为彻底根除中国的贫困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也为维持社会稳定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关键在于转变就业观念，拓宽就业渠道。在改革与发展的双重压力下，必须把中国的就业问题纳入市场化的轨道，突破传统就业观念的束缚，将非公有制经济作为吸收就业的主渠道，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就业问题。

3.3　合理分配，坚持走共同富裕之路

无论是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还是发展经济学说，都把公平的收入分配作为经济发展的重要目标之一。然而如何实现公平分配，不同的学派却有着不同的政策建议。

3.3.1　收入分配理论与收入分配格局

作为发达国家历史经验的理论抽象，凯恩斯的“收入分配决定论”认为：一个国家的不同收入阶层，其储蓄倾向也是不同的：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高，储蓄倾向也高，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低，储蓄倾向也低。因此，在经济发展初期，不要急于消除收入分配的差距，而是要继续保持甚至扩大这一差距。在进行分配时要向富裕阶层倾斜，即追求所谓“马太效应”（《马太福音书》中说：让贫困者更贫困，让富有者更富有）。由于低收入阶层生活贫困，即使收入增加了，也要把增加的收入用于衣、食、住、行等基本生存消费，不可能提高储蓄水平。而高收入阶层，已经丰衣足食，再有收入便可提

高储蓄水平，储蓄转化为投资，投资形成资本能力，资本推动经济增长。等经济产出这块“蛋糕”做大了，再通过“涓滴效应”一点一滴地惠及整个社会。当年经济发达国家便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积聚了巨额资本，推动了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进而提高了整个社会的福利水平。然而今天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状况与当年发达国家的状况相比，有着很大的不同。法国的发展学者杜森贝利（J.Duesenberry）深入考察了发展中国家收入、消费和储蓄的关系，提出了著名的“消费示范效应论”，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储蓄和资本形成困难的情况做出了说明。杜森贝利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状况与凯恩斯所讲的大不相同，在那里人们的消费模式并不取决于他们的收入水平。尤其是对于少数富裕阶层，由于存在着“攀比心理”，并不是根据他们的收入水平来决定他们的消费模式，而是攀比发达国家上层的消费水平，即所谓“像琼斯家那样生活”(getting with Jonses)。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中国家的富裕阶层即使在收入分配政策的倾斜下不断提高收入水平，也只是促使他们盲目地效仿发达国家的上层人物进行奢侈消费，而不会提高他们的储蓄水平。显然，凯恩斯的“收入分配决定论”并不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更不能用来指导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实践。相反，根据广大发展中国家贫富差距日益扩大的事实，应该尽可能地做到公平的收入分配，尽量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鸿沟。在发展中国家，也只有比较公平的收入分配，才能有效地克服相互攀比的心理，有利于储蓄的增加。因此，经济发展理论格外重视公平的收入分配，将公平的收入分配和消除贫困、充分就业作为谋求发展的三个基本目标。与“收入分配决定论”所鼓吹的“马太效应”相反，发展经济学强调在进行收入分配的时候必须向贫困阶层倾斜，要格外关注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贫困人口，通过社会财富在不同阶层之间的再分配，抑制暴富，救助贫困，缩小差距。

发展中国家的收入分配差距为何如此悬殊呢？如果我们把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的收入分配格局作一个比较分析的话，就会发现二者间存在着明显的不同：在发达国家，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呈橄

榄球状，即两头小、中间大。在发达国家虽然也存在着悬殊的收入分配差别，但富裕人口和贫困人口在人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比较小，而处于中间位置的所谓“中间等级”则占了绝大多数的比重。随着收入分配格局的不断调整变化，高收入阶层在收入减少后会跌落入中间等级，低收入阶层在收入增加后也会跃升到中间等级。中间等级就像一个硕大的蓄水池，通过不同收入阶层的升迁变化，调节着整个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维持着社会的稳定。而在广大发展中国家，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则呈金字塔形，顶端小，基础大。少数富裕阶层居于社会的顶端，垄断性地占有绝大多数的社会财富，广大国民则居于社会的底层，生活贫困。社会财富分配的严重不公导致了社会的高度不稳定，成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大障碍。通过两种不同收入分配格局的比较，经济发展理论更是清醒地认识到对于收入分配差距悬殊的发展中国家来说，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减小收入分配差距是如此重要。

3.3.2　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衡量

如何来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程度呢？经济学中常常以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作为衡量分析的工具。经济学家们用洛伦兹曲线来描述经济中的不平等程度。洛伦兹曲线表示由人口最穷的5%、最穷的10%、最穷的15%等所挣得的收入在总收入中的累积比例。如果收入分配是完全平等的，则20%的收入将会由社会人口中收入最低的20%的人获得，40%的收入将会由社会人口中收入最低的40%的人获得，如图3—2（A）所示，洛伦兹曲线将是一条直线。另一方面，如果收入非常集中，则社会人口中收入最低的80%的人几乎没有任何收入，而社会人口中收入最高的5%的人可能获得总收入的80%，在这种情况下，洛伦兹曲线将是向下弯曲的，如图3—2（B）所示。当收入分配的不平等达到很高的程度时，图B中的45°线和洛伦兹曲线之间的阴影面积会很大。在收入分配完全平等时，如图A所示，该面积为零，也就是说，洛伦兹曲线将表现为45°线。收入分配越是不平等，洛伦兹曲线距离45°线就越远。

基尼系数是一个被广泛使用的衡量收入分配不平等程度的量化指标。它是图B中阴影面积同45°对角线右下方全部三角形面积之比。如果收入分配是平等的，洛伦兹曲线与45°对角线重合，基尼系数为零。如果收入分配不平等，洛伦兹曲线则比较靠近右下方，阴影面积较大，基尼系数也就较高。显然，基尼系数的最大值为1。随着洛伦兹曲线向右下方移动，阴影面积越来越大。如果一个人挣得全部收入（而其他的人得不到任何收入），那么，阴影面积将同三角形相等，其比率也即基尼系数等于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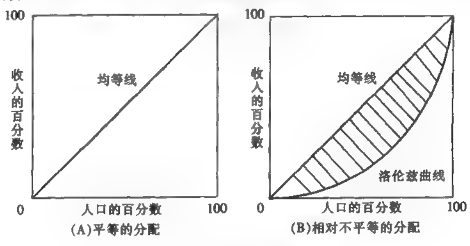


图3—2 洛伦兹曲线和基尼系数

3.3.3 中国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与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长期实行“低工资、低收入、低消费”的政策，在一个相当低的生产力水平下实行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政策，其结果必然是少数的特权和普遍的贫穷。改革开放以后，党中央提出了以打破平均主义和“大锅饭”为核心内容的富民政策，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且在改革开放伊始就再三强调要坚持劳动致富，避免出现收入分配差距悬殊和两极分化的状况。邓小平同志明确地指出：“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改革开放给中国经济注入了活力，也使中国的老百姓过上了富裕的生活。然而

与此同时，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开始拉开，并且逐步加大。1994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530美元，按照世界银行的分类法由低向高排处于低收入组第39位。然而在同一年，中国最贫困的20%家庭仅占有全部收入的4.27%，而最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50.24%，这个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同期的数据。根据美国《商业周刊》披露的材料，1994年美国最贫困的20%家庭占有全部收入的4.4%，而最富有的20%家庭则占有全部收入的44.6%。如果以居民的个人存款额来大体上表示当时中国社会财富的分配状况，也可以反映出收入分配差距的悬殊程度。截至1999年6月底，全国城乡居民储蓄余额已达到59 100亿元。然而在这59 100元的居民储蓄中，10%的高收入居民掌握了66%以上的储蓄额，其集中程度令人瞠目。在如此短暂的时期中，中国收入分配格局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是人们所始料不及的。其原因也是多方面和复杂的。即使不去分析这种状况的生成原因，仅是这一结果，就足以引起广大社会公众的心理失衡和社会的不稳定了。实际上，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并非是坏事，问题在于当这部分人致富的同时，大部分人的收入水平不但没有明显的提高，有的甚至下降了（例如国企大量的下岗职工）。经过20余年的改革开放，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从过去低水平的平均主义转变为金字塔形，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以后，社会财富的迅猛增长并没有导致社会全体成员财富占有的同步增长，而是强化了社会财富的集中程度，拉开了收入分配的距离。据李培林主编的《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所提供的数据：中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改革开放以前的1978年，世界银行测量的数据为0.16，这在当时恐怕是世界上最低的，反映了当时平均主义、“大锅饭”的收入分配格局。80年代中期以后，收入分配的差距开始迅速拉开。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6年为0.19，1987年为0.20，1990年为0.23，1994年为0.370。农村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1982年为0.22，1983年为0.25，1984年为0.27，1985年为0.30，1986年为0.31，1988年为0.34，1994年为0.411。如果将城乡的

状况综合起来考察，1979年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31，1988年为0.382，1994年为0.445。显然，无论是城市还是乡村，中国收入分配的差距已经明显拉开，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城乡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上通常认为是中等贫富差距水平的0.3～0.4的标准。① 而且这一差距目前还在扩大。

如前所述，收入差距的迅速扩大是与经济发展的预期目标相背离的，更有悖于改革开放的初衷，如果经济增长的成果仅仅是增加了少数高收入阶层的收入，那么不仅经济发展的目标难以实现，还会引起社会公众的不满并加大社会的紧张程度。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要通过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改变社会的收入分配格局，以“抽肥补瘦”的方式，促进社会财富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流动，提高社会财富分配和占有的公平程度。正是在这一思想的主导下，党中央、国务院做出重要决定，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大幅度地提高社会低收入阶层的收入水平。

1999年8月30日，九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1次会议表决通过了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开始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随着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国民的个人收入有了较大的增长，但个人收入分配差距迅速拉大，个人收入中的相当一部分转化为储蓄存款。根据典型调查分析，在将近6万亿的人民币存款和超过800亿的美元存款中，大部分存款集中在少数高收入者手中。这次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就是本着“抽肥补瘦”的原则，通过税收杠杆的调节，抑制少数人收入畸高而形成的收入悬殊差别。由于储户存款数额差别很大，按统一比例对利息所得征税的绝对额实际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个人收入水平。国家明确规定，对储蓄存款利息所得征收个人所得税，作为中央财政的收入，由国家税务局负责征收管理。这部分收入主要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生活补助、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

① 李培林主编：《中国新时期阶级阶层报告》，336页，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5。

补发所欠的离退休人员养老金和农村扶贫资金等。从而完成社会财富从高收入阶层向低收入阶层的转移。

一个星期后，党中央、国务院再次做出重大决策，对城镇中低收入居民收入政策进行调整。这次调整收入政策涉及面广，包括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失业人员、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对象。此外还将提高企业在职职工养老金标准，一次性补发1999年6月底前拖欠的离退休人员的基本养老金，以及提高部分优抚对象的抚恤标准等，直接受益人员达8 400多万人。为了解决下岗职工等低收入人员的生活保障问题，政府建立了三条社会保障线：一是国有企业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二是失业保险制度，三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这次提高"三条社会保障线"水平，国家原则要求对上述三类人员的保障标准在原有基础上提高30%。这实际上也是对城市贫困阶层扶贫解困的有力措施。为了实施这一收入分配的调整政策，需要支付的总费用大概是1 000亿元左右（见表3—2）。

表3—2 1999年城镇居民收入调整方案

对象	调整内容	增幅
国企下岗职工	基本生活保障费	30%
失业人员	基本生活保障费	30%
城镇最低生活保障对象	基本生活保障费	30%
机关事业单位在职职工	基础工资和级别工资	30%，平均约120元
机关事业单位离退休人员	离退休费	按同职务在职人员相应增加
企业离退休人员	养老金	一般应比1998年月均水平提高15%左右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时报》，1999-09-06。

这次收入分配政策的调整当然有刺激消费、扩大需求、拉动经济的动因和意图，然而从发展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其最重要的意义还是在于对不同阶层收入差距的调整，使收入分配的重心向低收入阶层倾斜，提高他们的收入水平和生活质量。尤其是和关于征收利息税的政策措施联系起来，反映中央政府已经意识到不同阶层收入差距悬殊的严重性，并开始采取积极的政策措施来扭转这种状况。当一项收入政策的调整能够惠及8 400余万城镇人口，特别其中大

多数是低收入和贫困人口时，我们没有理由不为之感到鼓舞。

然而，“抽肥补瘦”、济世扶贫并非是长久之计，更不是消除收入分配悬殊差距的治本之方。根据国际经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关键的是要逐步改变社会财富收入分配的格局，使之从金字塔形转变为橄榄球形，而要做到这一点，首先就要培育起一个规模宏大的“中间等级”阶层，以保证社会最大多数成员收入的公平性与稳定性。中间等级形成的前提是原有社会成员固有身份的淡化和转变，并以对个人收入和私人财产权的认可与保障为基础。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第一次提出要“以共同富裕为目标，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为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完善和发展，经济收入多元化和经济利益多元化所导致的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的大分化，正在拉开这一过程的序幕，并将重新构建中国收入分配的基本格局。

3.4 全面小康，中国经济发展的新跨越

在发展中国家谋求经济发展的伟大实践中，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辉煌业绩给世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开拓进取，勇于创新。经过 20 余年的艰苦奋斗和不懈努力，从根本上改变了贫穷落后的状况，创造了令世人瞩目的奇迹。对此，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江泽民同志给予了精辟的总结：“经过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我们胜利实现了现代化建设‘三步走’战略的第一步、第二步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①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8 页。

3.4.1 “小康”目标的提出

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确定了“三步走”发展的战略：第一步满足温饱，第二步实现“小康”，第三步基本实现现代化。在这一战略思想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牢固确立发展的主题，坚持把发展作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始终用发展来解决前进中的问题。在发展的基本思路上，坚持以结构调整为主线，以改革开放和科技进步为动力，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为基本出发点，以可持续发展为根本战略，以科教兴国为基本国策，并努力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终于顺利地实现了从贫穷到温饱、从温饱到小康的历史性跨越。

跨入新世纪的当代中国，如何迈开实现现代化的新步伐呢？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做出了回答：“综观全局，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对我国来说，是一个必须紧紧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根据十五大提出的到二〇一〇年、建党一百年和新中国成立一百年的发展目标，我们要在本世纪头二十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使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这是实现现代化建设第三步战略目标必经的承上启下的发展阶段，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扩大对外开放的关键阶段。经过这个阶段的建设，再继续奋斗几十年，到本世纪中叶基本实现现代化，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① 党的十六大所确立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描绘了21世纪头20年中国现代化的宏伟蓝图，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随着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新世纪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宏伟目标，小康社会正在日益成为全中国乃至整个世界关注的焦点。在经历了20余年改革开放并

① 江泽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19页。

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小康之后，中国共产党所提出的这一新的奋斗目标，对于中国社会的富裕强盛和长治久安，对于整个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小康？为什么要把建设全面小康作为中国在21世纪头20年的奋斗目标？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与实现全面小康的关系是怎样的呢？“小康”是中国古代儒家提出的一种社会发展观。如果追溯其历史渊源的话，小康一词最早源出《诗经》。《诗·大雅民·劳》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而作为一种社会模式，“小康”最早在西汉成书的《礼记·礼运》中得到系统阐述。《礼运》中的“小康”，东汉学者郑玄注释为“小安”，即相对安定之意。从小康社会的基本特征来看，其经济特征是财产、劳动力私有；政治特征表现为阶级礼制；伦理特征是等级规范制；社会保障模式是家庭赡养制；社会秩序的维持依靠兵刑制。与“小康”相对的是“大同”，在《礼运》中所描述的大同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则是：经济上的财产公有（天下为公）；政治上的民主制度（选贤与能）；伦理方面的社会文明（“讲信修睦”、“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社会保障上的全面保险；以及社会秩序上要实现天下太平，等等。由此我们看到：在儒家的社会理想中，“小康”与“大同”分别为两个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在儒家这两种社会理想模式中，大同社会是儒家理想社会的高级阶段，是人类社会的理想王国；小康社会则是理想社会的初级阶段。“大同”固然美妙，但却因遥远而难以企及，相比之下，小康作为近期目标，更富吸引力。继孔子之后，孟子设计了更为完善的“仁政”、“王道”的小康社会，除了以往的社会相对安定的含义外，更突出了经济上的含义，使“小康”成为摆脱贫困、丰衣足食、安然度日的生活状况的典型概括。清朝末年，康有为在变法维新中，用托古改制的名义对儒家小康社会理想作了实质性的修正，用近代资产阶级价值观对儒家小康社会思想进行了具有积极意义的改造。

随着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历史新阶段，邓小平在创造性地批

判、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小康社会”思想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代化的进程，提出了“小康社会”这一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新概念，将其作为中国现代化发展进程的阶段性社会发展目标，为这一古老的历史概念注入了现代科学内涵。1979年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方时，邓小平第一次用“小康”、“小康之家”的概念来描述中国式的现代化。他说：“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所以，我只能说，中国到那时也还是一个小康的状态。”① 邓小平所提出的“小康社会”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政治概念，而是有具体的量化标准，这便是翻两番：即以1980年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250美元为基数，用10年时间翻一番，到1990年达到500美元，再用10年时间再翻一番，到20世纪末达到1 000美元。邓小平在1981年4月14日提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指出：“在本世纪末，我们只能达到一个小康社会，日子可以过。经过我们的努力，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 000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探索，看来达到1 000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800、900，就算800，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这一设想后来作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战略目标写进了中国共产党的十二大报告。从此，人均800美元，就成为中国实现小康的基本指标。随后，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在征求12个部委意见后，联合提出了包括16项分指标的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同时提出的还有全国城镇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和全国农村小康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上述这些标准恐怕是从中国的现实情况出发，对小康社会最权威、也是最具体的诠释了。关于小康水平的标准见表3—3。

① 《邓小平文选》，2版，第2卷，23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表 3—3　　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

指标类型	指标名称	单位	指标临界值		
			1980 年	小康值	权数**
一、经济水平	1. 人均国内生产总值	元	778	2 500	14
二、物质生活					48
收入	2. 人均收入水平				16
	(1) 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974	2 400	6
	(2) 农民人均纯入	元	315	1 200	10
居住	3. 人均居住水平				12
	(1) 城镇人均使用面积		5.5	12	5
	(2) 农民人均钢砖木结构住房面积		4.5	15	7
营养	4. 人均蛋白质摄入量	克	50	75	6
交通	5. 城乡交通状况				8
	(1) 城市每万人拥有铺路面积		2.8	8	3
	(2) 农村通公路行政村比重	%	50	85	5
结构	6. 恩格尔系数	%	60	50	6
三、人口素质					14
文化	7. 成人识字率	%	68	85	6
健康	8. 人均预期寿命	岁	68	70	4
	9. 婴儿死亡率	‰	34.7	31	4
四、精神生活					10
	10. 教育娱乐支出比重	%	3	11	5
	11. 电视机普及率	%	11.9	100	5
五、生活环境					14
	12. 森林覆盖率	%	12	15	7
	13. 农村初级卫生保健基本合格以上县	%		100	7
总　计	共 16 项分指标				100

* 表中价值量指标均按 1990 年价格计算。此标准为原国家计划委员会与国家统计局联合提出并征求 12 个部委意见后，于 1995 年 1 月修改完成。

** 权数单位为%。

3.4.2 解析“全面小康”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经济增长水平与质量的不断提高，中国的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于1995年提前5年实现了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于1997年提前3年实现了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两番的目标。根据2002年世界银行发展报告，2000年中国人均国民总收入为840美元。全国在总体上平均实现了小康的初始水平，全国约有74.84%的人口基本达到了小康水平，有12.82%的人口接近小康水平。在16项小康测评指标中有12项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小康标准值。因此，从整体上说来，尽管在小康建设过程中仍然有许多工作还有待于努力去完成，但经过20年卓有成效的不懈努力，中国人民在20世纪末已经圆了小康之梦。正如江泽民在十六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人民生活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这是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

然而，目前达到的这个小康还是低水平的、不全面的、发展很不平衡的小康。所谓低水平，就是虽然从经济总量上来看，中国已排名世界第六，但是从人均水平来看，却还处于较低的水平。2000年，世界国民总收入（GNI）的总量值大约为310亿美元，世界上大约60亿人口，人均国民总收入5 150美元，而中国才840美元，仅为世界平均值的16.3%。所谓不全面，就是目前的小康基本上还处于生存性消费的满足，而发展性消费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满足。例如目前许多国人买房购车，虽说生活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但很多人的房、车都是向银行贷款购买的，固定资产虽然增加了，但银行存款却成为负的了。很多家庭的丰衣足食不过是衣食不愁了，如何进一步追求个性化发展，满足精神上的需求，培养兴趣，发挥特长，还没有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所谓发展很不平衡，就是指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实现小康在时间上有先有后，在水平上有高有低，这是发展中国家经济上的二元结构与发展不平衡在中国实现小康问题上的必然映象。2000年，全国还有12.34%的人口没有实现小康，从《全国人民生活小康水平的基本标准》规定的五个方面的

指标来看，城镇居民生活已达到小康标准的为94%，农村居民实现程度为84%。地区分布指标东部地区小康实现程度为97.86%；中部实现程度为93.18%；西部实现程度为84.18%。综上所述，中国进入小康社会的初始水平无论是和世界平均水平相比，还是和所要实现的现代化目标相比，都还存在着较大的差距，还需要通过不懈的努力，才能实现普遍的、高水平的小康。正因为如此，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更高水平小康社会的目标，即经济更加发展、民主更加健全、科教更加进步、文化更加繁荣、社会更加和谐、人民生活更加殷实。

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发展目标，是一个综合性的指标，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从中国现实的国情出发，考虑国际上通行的现代化衡量指标体系，专业人士认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基本标准包括以下十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人均GDP）超过3 000美元，这是建成全面小康社会的根本标志。200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854美元。按照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的发展速度测算，到2020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将超过3 000美元，达到当时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二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1.8万元（2000年不变价，下同）。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3倍。预计今后20年，中国经济将继续保持高速发展，城镇居民的收入水平持续增长的势头不减，到2020年将有望达到18 840元，可以略超过小康水平。三是农村居民家庭人均纯收入达到8 000元。过去20年中国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增长了3.5倍，其中近10年增长了1.6倍，到2000年为2 253元。可以预计，今后的20年，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升，农民收入有可能增长3.2倍，农村居民家庭人均收入将达到7 210元，基本实现小康目标，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也有所缩小。四是恩格尔系数低于40%。近10年来，城镇居民消费的恩格尔系数下降了15个百分点，农村居民消费正处于新的升级过程。2000年，全国恩格尔系数为46%，预计到2010年将下降到40%，2020年前后将下降到

35%左右。五是人均住房建筑面积30平方米。近10年来，全国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每年人均增加0.5平方米，2000年达到19平方米，预计2020年可以超过30平方米。六是城镇化率达到50%。中国近10年城镇化率年均提高一个百分点，2000年为36.2%。今后的20年，中国将加速城镇化的进程，维持既定的增长率，到2020年城镇比率将达到56%。七是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20%。到2000年，中国城乡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约为4.2%左右，其中城镇居民家庭计算机普及率为9.7%。近年来，计算机普及率呈现迅速增长的趋势，到2020年基本上可以实现计算机普及率20%的目标。八是高等教育普及率20%。目前，中国大学人学率为11%。随着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办学渠道不断拓展，中国大学人学率2005年可以达到15%，2020年有望达到25%。九是每千人医生数2.8人。到2000年，中国实现了每千人拥有医生两人，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到2020年预计每千人医生数将超过3人。十是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95%以上。2001年，城镇居民最低生活保障率达到了71.6%，预计2020年可达到小康水平的95%。当然，全面小康还包括民主法制和精神文明等方面的内容，但还没有制定出具体的量化指标，因此以上十项指标只能是一个基本标准。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意义。如果说我们可以用大约十年的时间来摆脱贫困，大约十年的时间来实现小康，那么，我们最终要实现现代化就要付出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不懈努力。尤其考虑到中国拥有着世界上最多的人口和严重的二元经济结构，这一过程可能会更加漫长。作为21世纪头20年的阶段性目标，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任务进一步分解，划为2020年（建党100年)、2050年（建国100年）和到21世纪末三个时期，从而一方面明确了在实现第二步战略目标以后，中国现代化建设进一步的前进方向；另一方面又为实现第三步更为宏伟的目标奠定了一个坚实的良好开端。党的十六大所描绘的这一宏伟蓝图，将中华民族富民强国的千年企盼、万年梦想化为看得见、摸得

着、实实在在的阶段性发展目标，尤其可以使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生力军——那些正值英年的现代化建设者在自己的有生之年便可享受到这一“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所带来的文明、进步和富裕，这无疑会极大地推进中国人民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进程。

第4章 结构调整：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的首要任务

随着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入，中国的经济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人们有理由充满憧憬和期望。然而，我们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只是刚刚开始。经济国际化、市场化、现代化和结构合理化越来越成为经济发展的焦点，挑战逐步显现。其中，经济结构优化最为关键。经济结构是一国资源禀赋条件、资源配置效率和综合国力的反映，其核心是产业结构。对中国而言，落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已成为经济发展的严重束缚，主要体现在：农业、工业、第三产业之间的比例不协调；产业结构的内在不平衡与质量低下；区域经济之



间的失衡；企业的“小而全”、“大而全”和规模小、重复建设；整个经济建设重数量轻效率，效益低下；发展中国家特有而且更加严重的城乡二元结构现象对经济的制约等。中国中长期发展中一切重大难点问题的解决，包括持续增长、启动内需、实现工业化、提高国际竞争力、规避国民经济运行风险以及实现可持续发展等，都有赖于经济中结构性矛盾的缓解。因此，要把结构调整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中心任务，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深化改革，在调整的同时加速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从适应性调整转向战略性调整，结合可持续发展战略，实现国民经济的两大转变，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奠定坚实的基础。

4.1 传统国民经济结构对经济发展的束缚

通常所说的经济结构，是指生产要素在行业、地区、企业之间的分布状况，以及其所体现出的资源配置效率。产业结构是经济结构的核心，一般所说的经济结构调整，均指产业结构的调整。对一国经济而言，在生产高度社会化、分工和协作高度发展的情况下，社会生产的各环节和部门之间的合理资源配置显得日益重要，此时，各部门之间保持合理、协调的比例关系，是社会生产正常进行下去的关键。影响和决定产业结构的因素有：(1) 需求结构，包括消费需求结构、社会总需求结构、投资结构；(2) 自然资源禀赋和生产要素供应状况，包括自然资源供给、劳动力和资本供给、科技进步。因此，产业结构的变化也必须与上述制约条件相符。就产业结构的一般演化规律而言，呈现低水平均衡向高水平均衡有序的阶段性演化特征，产业结构的中心明显按一、二、三产业的顺序转换，即农业→轻工业→基础工业→重加工业→轻重结合高技术加工业→现代服务业（包括信息产业）。

本章所指的产业结构落后，是指与上述两个约束条件不一致的落后。我国产业结构的不合理由来已久，从建国前的一穷二白到建



国初期超前跨越农业、轻工业重型化，随后就是“大跃进”、三线建设、“洋跃进”等超前跨越基础产业、机械工业“高加工度化”，改革开放之后虽然有步骤地进行调整，但急于求成的思想和“再加速”的政策使得跨越机械、化工等行业的生产手段改造超前转向“耐用消费品”。上述经济建设中的一系列超前行为导致了我国产业结构中产业之间、产业内部、区域之间的落后，资源的优化配置难以实现。

4.1.1 总体经济结构的落后

一定的产业结构总是与一定的经济发展水平相联系的，经济发展水平的状况，必然会在产业结构上明显地体现出来。我国产业结构的落后，既与经济发展总体水平比较低的实际相联系，又是由中国经济发展的特征和多种因素决定的，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产业结构失衡的三大表现：首先是第一、二产业或农业与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衡，突出表现为农业和轻工业结构矛盾；其次是加工工业与基础工业的比例关系失衡，主要表现为加工制造业与原材料工业的结构矛盾；最后是基础产业部门与国民经济发展的比例关系失衡，主要是能源、电力、运输、通信等基础部门与经济发展的结构冲突。

国民经济总体结构的问题：

1. 经济活动的主体产业仍然是物质产业部门。从国民经济中占优势比重的产业来看，发达国家无一例外都是第三产业，比重一般在60%左右。与第一、第二产业相比，如果把第三产业（主要是服务业）视为非物质生产部门，那么以非物质生产部门为主体的产业结构，是经济发达和结构先进的标志。当前我国占优势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比重接近50%，再加上农业，其比重就高达65%～70%（见表4—1）；在对GDP增长的贡献率中，第二产业占了绝对优势，在60%上下，这是发展中国家向工业化发展过程中产业结构具有的一个基本特征，如此高的比重则是我国产业结构落后的主要表现之一。

表 4—1　　中国三次产业的增长率、占 GDP 比重和贡献率（%）

年份	GDP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对 GDP 增长贡献率		
	增长率	增长率	比重	增长率	比重	增长率	比重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1952	25.9	15.2	45.4	33.7	40.0	37.1	14.6	26.6	52.0	20.9
1957	6.1	3.6	33.5	7.9	51.2	5.9	15.3	19.8	66.3	14.8
1978	11.7	4.1	28.1	15.0	48.2	13.7	23.7	9.8	61.8	28.8
1984	15.2	12.9	32.0	14.5	43.3	19.4	24.7	27.2	41.3	31.5
1988	11.3	2.5	25.7	14.5	44.1	13.2	30.2	5.7	56.6	35.3
1992	14.2	4.7	21.8	21.7	43.9	11.6	34.3	7.2	67.1	28.0
1994	11.8	4.0	21.0	17.4	47.3	8.2	31.8	7.1	69.7	22.1
1996	9.7	5.1	20.2	12.1	49.0	7.8	30.8	10.6	61.2	24.8
1998	7.8	3.5	18.6	9.2	49.3	7.6	32.1	8.3	58.2	31.3
1999	7.1	2.8	17.6	8.1	49.4	7.5	33.0	6.9	56.4	34.9
2000	8.0	2.4	16.4	9.6	50.2	7.8	33.4	4.9	60.2	32.6
2001	7.3	2.8	15.2	8.7	51.1	7.4	33.6	5.8	60.9	34.1

资料来源：根据 1952—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

此处要指出的是，第二产业的比重过高，与我国需要大力发展制造业并不矛盾。我国要致力成为有能力的“制造大国”，这并不是说制造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要占 50%。我国制造业虽然名列世界第 4 位，但总体规模仅相当于美国的 1/5，日本的 1/4 强，而第三产业在这两国早就成为经济主体。从制造业的质量来看，我国在效率与结构上存在很大的问题。制造业人均劳动生产率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仅为美国的 1/25、日本的 1/26、德国的 1/20；制造业中装备业比例偏低，不到 30%，而美、日、德三国都超过 40%；技术创新能力十分薄弱，产业主体技术依靠国外，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少，依附于国外企业的组装业比重大，工业增加值率仅为 26%，远低于美国的 49%、日本的 38%、德国的 48.5%。

2. 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发达国家在 70—80 年代就将第一产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降为 2%～3%，而我国目前的比重虽然从 20%降到了 15% 左右，但还是过高，与此对应的 64%的人口比例则显得更加不协调。这表明农业的发展水平比较



低，生产效率和发展潜力均有余地。同时，二、三产业的发展相对滞后也制约了农业的发展，农村难以充分转移出剩余劳动力，提高效率以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事实也正是如此，20 世纪 90 年代初，非农业劳动生产率是农业劳动生产率的 4 倍，现在则上升到 5.3 倍。从就业人口来看，在第一产业就业的人口仍然占总人口一半以上（见表 4—2）。

表 4—2　　　　中国三次产业从业人员分布

年份	总　数	第一产业		第二产业		第三产业	
	（万人）	人数（万人）	构成（%）	人数（万人）	构成（%）	人数（万人）	构成（%）
1978	40 152	28 313	70.5	6 970	17.4	4 869	12.1
1990	63 909	38 428	60.1	13 654	21.4	11 828	18.5
1994	67 199	36 489	54.3	15 254	22.7	15 456	23.0
1996	68 850	34 769	50.5	16 180	23.5	17 901	26.0
1998	70 637	35 177	49.8	16 600	23.5	18 860	26.7
1999	71 394	35 768	50.1	16 421	23.0	19 205	26.9
2000	72 085	36 043	50.0	16219	22.5	19 823	27.5
2001	73 025	36 513	50.0	16 284	22.3	20 228	27.7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3. 第三产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偏低。第三产业的高度发展是经济成熟的主要标志，其基础是发达的物质生产力和社会经济水平。我国当前第三产业的发展水平远低于发达国家，在 GDP 中的比重只占 30% 左右，比一些发展中国家还要低。第三产业近年来的贡献率不高，其就业人口比例则严重偏低。

经济结构落后的综合表现是我国经济增长方式的落后，即以产值型、速度型、数量型为主要特征，长期以来主要靠粗放型的经营，用资金、劳力等的高投入来支撑，采取以“上项目、铺摊子”为特征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方式来实现经济增长。这种重数量轻质量、重外延轻内涵、重速度轻效益的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生活中许多矛盾和问题的症结所在。改变粗放型的增长方式为集约型的经济增长方式，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相适



应，是我国经济发展的核心目标。

4.1.2 农业的结构问题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特别对我国这样的人口大国来说更是如此。总体来说，我国农业基础仍然十分薄弱，农产品供应增长缓慢，农业生产效率低下，尚不能充分满足当前人民生活的需要，更难以支持经济的更大发展和满足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的需要。

1. 效率低下。农业中投入与产出相比，产出大于投入的量很有限，农业经营的规模小，地点分散，导致成本高、效益低，利润率极为低下。据统计，中国的每个农民能养活 3 个人，而在美国每个农民能养活 63 个人，差距为 21 倍。

2. 物质技术基础薄弱。农业中，收入、消费、储蓄和投资以及农业生产要素的供给和需求之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只能逐渐达到一种低效率的均衡状态，农业生产基本上只能维持简单再生产。由于长期以来国家对工业实行倾斜政策，对农业投入严重不足，农业水利基础设施失修、老化，抗灾能力极差，从我国每年频繁发生的洪涝灾害就可见一斑。其直接后果是农业生产长期徘徊，难以适应国民经济的发展。就粮食生产量而言，1996 年迈上 5 亿吨台阶后，2000 年开始出现倒退，呈现长期徘徊不前的局面。

3. 低技术含量的耕作制度。长期以来我国形成一种低技术含量的耕作制度并且没有质的变化，因而农业的发展主要依靠生产要素投入的增加。我国耕地中 2/3 属于低产田，年农业增长中科技贡献率一直不到 40%，直到近几年情况才有改观。

4. 农业的发展难以与大市场相衔接，农产品竞争力差，农民在市场竞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加上长久以来工农产品“剪刀差”的影响，较落后的农业与较先进的工业并存，形成明显的二元经济结构。

因此，在我国进入工业化中期阶段之后，本应成为支持产业，为工业提供充足的农产品、市场、资金和产业发展的广大空间的农业，现在却成为滞后产业，成为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



4.1.3　工业的结构问题

工业结构的落后表现为部门结构、技术结构和产品结构的落后。工业是我国经济的支柱产业，工业的落后构成了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落后的主体部分。

首先是部门结构的落后，部门结构的落后是指工业处于低水平的技术建设和比例不协调。

1. 短线产业的供给不足，基础产业仍然薄弱。长期以来，能源、原材料的发展滞后，对整个经济发展产生了比较明显的“瓶颈”制约，很长一段时期内成为困扰国民经济的重大问题。经过努力，现在有些基本原材料如钢铁、水泥、平板玻璃等已经能够满足需要。但是应该看到，结构型与周期性平衡等问题远远没有得到解决，近年湖北等地出现的电力紧缺尤其是周期性紧缺就是明证。

2. 长线产业的供给过剩，低水平的重复建设严重，主要体现在机械加工工业和制造业低水平的生产能力相对过剩。机械工业的发展总是在走低技术繁衍的路子，因而虽然生产能力扩充很大，但技术水平非常低下。制造业的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重复引进主要集中在彩电、冰箱、汽车、摩托车等行业以及化工、石化等行业，还有VCD、微波炉等行业。以彩电这种典型的寡头行业为例，1995年彩电生产能力已达4 467万台，当年产量只有2 058万台，利用率仅46%。但当年又投资彩电项目有14个，建设规模为541万台；1996年全国有彩电生产厂家90多个，年生产量3 000多万台，远远超过需求量。VCD行业1997年已经投产的企业有380多家，其中30家骨干厂家的年产量就达到1 500多万台，全国的需求量仅为1 000万台；1998年全行业总产量可达5 000万台，全国市场容量不会超过1 300万台，除去20%的进口商品市场，过剩达4 000万台，从而导致恶性竞争，降价销售。VCD行业的利润率1997年从13%下降到了8%，1998年利润率更低。即使是一些新行业，也存在这种现象，如我国的集装箱生产能力目前已达到148万国际标准箱，大大超过全世界约120万箱的市场总需求，导

致40%的生产能力闲置，80%的企业亏损。[1] 数据显示，900多种主要工业产品有一半左右的生产能力利用率在60%以下，最低的只有10%。重复建设、重复投资造成的投资效益低下、生产能力闲置和浪费现象是非常严重的（见表4—3）。

表4—3　　我国工业品生产能力利用率统计

生产能力利用率	80%以下	70%以下	60%以下	50%以下	31.1%～38.5%	25.5%以下
产　品	铜、盐酸、铁合金、塑料、纤维板、乙醇、大规模集成电路、化肥、收音机、缝纫机、钟表	啤酒、浓硝酸、铁路货车、小型拖拉机、甲醛、矿山设备、吸尘器、钢材、大中型拖拉机、合成洗涤剂	电冰箱、中成药、电话单机、食用植物油、轮胎外胎、自行车、摩托车、食糖、照相机	录像机、洗衣机、内燃机、汽车、彩电、金属切削机车、油漆	精制铝制品、房间空调器、复印机、农药、化学原料药、微波炉、传真机	发电设备、微型电子计算机、照相胶卷、电影胶片

资料来源：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

3. 传统工业的比重大，新兴产业的比重小。前者是在现代经济中难以成为新经济增长点的行业，后者是具有广阔发展前景、能够成为经济发展增长源的产业，主要是指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新兴产业的比重小（据估算我国高附加值产品在整个工业中的比重大概在8%左右），导致国民经济无法形成主导产业带动的经济发展态势。

其次，技术结构的落后。技术结构是反映一国工业生产水平的最重要指标。我国的落后表现在三个方面。

1. 在工业生产技术进步的状况方面，企业普遍缺乏推动技术进步的有效机制。由于长期以来我国工业发展采取的是一个集中财力不断建设新企业、丢掉老企业的畸形的外延扩大再生产的思路，

① 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载《中华工商时报》，1998-01-12。



企业积累过多，留成太少，折旧基金又经常提取不足，无法形成足够的技术开发能力，也没有力量进行技术改造和技术引进。其直接表现就是装备老化，技术落后，厂房破旧。中国企业的技术装备大多处于六七十年代的水平，机电行业产品达到世界水平的只占5%，以集成电路为代表的电子工业比世界先进水平落后25年～30年（见表4—4）。

表4—4　　我国企业设备出厂年代比例（%）

	80年代出厂	70年代出厂	60年代及以前出厂
全部设备	36.4	54.1	9.5
其中：进口设备	26.1	69.7	4.2
国产设备	45.5	40.4	14.1

资料来源：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

2. 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低。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科技进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增加到了30%左右，而早在1950—1970年间发达国家就已达到了49%，有的甚至高达60%～70%，发展中国家平均达到35%，有的地区为50%。现在发达国家的科技进步贡献率已经达到了60%～80%，而美、日则到了70%～80%。

3. 高新技术产业发展速度较慢，在GNP中的比重不大。从反映一国技术发展的重要指标研究与开发（R&D）经费来看，我国R&D经费在1985—1992年一直徘徊在0.7%左右，1994年降到了0.5%。而同期发达国家和一些发展中国家加大了研究与开发投资，印度都达到了1%。1997年，我国R&D经费占GNP的比重为0.64%，美国为2.45%，日本为2.90%，瑞典为3.05%，韩国为2.61%；直到2000年，我国R&D经费占GNP的比例都不超过1%①，处于较低水平，甚至处在很多发展中国家之后，属于创新能力缺乏之列。在2002年度瑞士国际管理学院（IMD）发布的《国际竞争力报告》（参评49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总体排名第

① 《2002中国统计年鉴》：1997—2001年R&D/GDP的比例分别为0.64、0.69、0.83、1.00、1.09；载《经济日报》，1999-02-02。

31位，其中科技竞争力排名第25位；同期的《全球竞争力报告》（参评75个国家和地区）中，我国的创新能力排名第43位，处于偏下水平。从企业方面来看，我国高新技术企业的R&D经费也大大低于发达国家的水平。美国通用电气公司R&D经费占销售额的比重是6%，日立公司是7%。从行业R&D占销售额的比重来看，航空业为27%，电子技术行业为7.8%，精密机械为7%，化学工业为4.8%。反观我国企业的R&D，一般为0.7%，高的也不过1.5%，而且大部分被挪作他用，并没有用于技术开发。R&D经费的低下，直接导致了企业技术创新能力的不足，难以形成良好发展的态势。

再次，产品结构的落后。产品结构的落后总的来说表现为产品结构不合理，缺乏市场竞争力。

1. 畅销产品少，平销、滞销产品多。国家经贸委与中国全国商业信息中心发布的《2003年上半年全国市场供求情况》显示，600种主要商品中，供求基本平衡的商品有87种，供过于求的商品有513种，没有供不应求的商品。这直接导致大量的库存，反过来又使得生产能力闲置，生产能力利用率低下。产品滞销成为厂家与商家头疼的一个大问题，导致资金大量积压和资源的严重浪费。

2. 名牌产品少，一般产品多。随着经济的发展，我国也已经涌现了一批名牌产品，如海尔、长虹、一汽、红塔山、康佳、三九、五粮液、联想、美的等，但是我国名牌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其他很多方面都有差距。从品牌的价值看，1997年我国品牌价值最高的是红塔山，其价值为353亿元人民币，世界最有价值的品牌是可口可乐，为479.78亿美元；2002年，我国价值最高的品牌是海尔，为489亿元人民币，世界最有价值品牌可口可乐则达到700亿美元，差距仍然维持在12倍左右。[①] 从产品出口能力上看，世界名牌产品一般有25%的产品出口到国外，可口可乐更是有70%

① 《中华工商时报》，1998-02-22；《北京青年报》，2002-12-03；《商业周刊》，2002-08-05。



的收入来自国外，我国名牌产品出口仅占总额的10%左右。

3．高技术、深加工产品和新产品少，老产品、一般技术产品、粗加工产品多。在我国产品中，劳动密集型产品、高物质消耗型产品以及粗加工型产品一直占据绝大比重，这已经成为我国产品结构的一个老大难问题。如在轻工业中，纺织、服装、鞋帽等轻纺产品是大头；在重工业，普通机床、粗钢产品等高物质消耗的产品比重大。这些产品要耗费大量的物质资源和能源，导致的污染也比较严重，但是附加值却很低，加上产品质量、品种等各种问题，整个工业产品所显示的工业绩效不高。

4.1.4　第三产业的结构问题

大力发展第三产业并使之成为国民经济的主体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我国的第三产业发展已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从总体看，其与产业结构优化的差距还相当大，产业内在的发展质量与客观需求之间亦很不匹配。就第三产业的大略分类而言，可分为两大类：一是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如商业、交通运输、邮电通讯、金融保险、证券、房地产、信息咨询业等；二是为生活服务的部门，如旅游、娱乐、生活服务业（如餐饮、医疗卫生、家政业）等。我国第三产业的结构问题表现在：

1．为生产服务的部门发展落后于经济的发展。交通运输、邮电通讯有一段时间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成为“瓶颈”行业，经过多年努力，问题虽然已经缓解，但仍然任重而道远。商业的发展还没有形成统一的全国大市场，没有真正起到商品流通和调剂余缺的作用。金融、保险、证券等的发展远远不足，金融风险和金融市场的建设是近来人们关注的热点，资本市场的发展有待时日。房地产业也没有如预料的那样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信息咨询业还非常不规范。同时，这些行业特别是金融、证券、房地产又出现了一定程度上的泡沫经济现象，给国民经济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2．规模小，作用不强。为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最大的问题是

没有脱离小商品经济的轨道，规模小，没有起到引导国民经济增长和解决大量就业的强大作用。很多服务业存在于企业，与社会化、专业化、产业化有很大差距；同时也导致成本过高，效率低下。另一方面，许多原来城市中以配给制为特征的生活服务系统正在被自发性、流动性、小规模、以手工劳动为特征、以小商小贩为主体的生活服务系统所代替。这种小商品经济方式的生活服务系统与大机器工业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和现代城市经济并不相容，不仅存在服务质量、服务成本以及扰民、污染、妨碍交通、影响规划等弊端，而且实际上使中国第三产业的发展立足于一个低起点、低质量的基础之上，以社区服务为核心的城市生活服务系统的重组已经迫在眉睫。

此外，我国总体产业结构上的落后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是产业组织长期以来的不合理。"大而全"、"小而全"企业大量存在，企业的专业化水平很低，"全能工厂"、"全能车间"等低效率建设大量存在，发展至今日，企业的专业化水平低下和企业办社会现象成为企业改革的一大负担。同时，分散化生产下的规模不经济严重存在，企业规模太小。如大量效率低下、经济外部负效应严重的小矿井、小玻璃厂、小水泥厂、小火电厂、小炼钢厂、小炼油厂的存在；在彩电、冰箱、摩托车、汽车等寡头行业，企业众多等。就汽车产业而言，最小规模是 2 000 辆，20 000 辆是一个门槛，较理想的生产规模是每年 20 万辆[①]，而 1997 年我国共有汽车企业 115 家，汽车总产量为 1 577 898 辆，所有产量还不及世界排名第九的意大利菲亚特公司一家的产量。在这 115 家企业中，年产量在 2 000 辆以下的有 68 家，占 59%，其中 1 000～2 000 辆的 15 家，100～999 辆的 26 家，100 辆以下的为 18 家，有 9 家的产量为零。[②]即使在 2001 年，全国汽车产量也才达到 234.17 万辆，其中产量在

① 参见杨治：《产业经济学导论》第四章第二节"规模经济"部分，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5。

② 《中华工商时报》，1998-02-25。



20万辆以上的生产企业只有4家，2万辆以上的只有15家。

二是部门、地区分割严重，形成了经济发展中的条条块块，使全国难以形成统一市场，造成资源配置的效率低下，重复建设不断出现，造成严重的生产过剩和生产能力闲置；同时，这也是“大而全”、“小而全”等企业现象出现的重要因素。原来由于计划经济的原因，造成行业的分割，行业内部大搞“大而全”、“小而全”；后来，对地方的放权让利，原有打破行业封锁的意图，结果导致地区分割，全国市场不统一的现象更加严重，地方和行业保护主义盛行。可以说，我国很多经济结构的问题都与部门、地区分割有关，它是对资源优化配置的最大障碍。比如“南京四‘鹤’难以齐飞”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扬子石化公司、金陵石化公司、仪征化纤公司和南京化学工业公司，本来存在相互协作、相互依存、相互提供原材料及中间产品等经济上的内在联系，可以组成一个紧密的、互相衔接的工业体系，但是由于四家企业分别隶属于中国石化总公司、纺织总会和江苏省，致使本可以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经济效益的协作难以进行，四家企业都走向“大而全”的重复建设道路，造成了经济效益和市场竞争力的严重下降，最后，由国务院办公会议协调，才使这种由部门和地区割据引起的问题得到了初步解决。

4.2 区域经济的失衡发展

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空间结构，即一国的生产力地区布局。在谈论我国经济发展时，出于自然、社会和历史的因素和经济发展水平的考虑，习惯上把我国分为三大经济地带：东部地区（或沿海地区），包括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广西、海南；中部地区，包括山西、内蒙古、吉林、黑龙江、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四川（含当今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下文所讲的区域经济结构，就是指此三大区域。

要研究区域经济的失衡发展，先要了解一下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简史。建国前，中国3/4的工业集中在东部沿海地区，而广大的内地，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没有工业。1949年，工业总产值最高的上海与工业总产值最低的宁夏相比，两者相差292倍。从建国以后的发展来看，我国经济结构的区域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经济恢复和“一五”计划期间，以协调沿海与内地的关系为主线，开始改变工业过分集中在沿海地区的状况，新建工厂尽量靠近原料产地，生产力布局的重点由沿海转向内地。第二阶段从“二五”计划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此时基于急于求成的发展战略和战争不可避免的判断，生产力布局重心大规模地向内陆地区推进，建设“大三线”、“小三线”，强调各地区要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号召“建设完整的工业省”，漠视分工与协作的重要，导致重复建设、重复劳动、效益严重低下。第三阶段从改革开放后到现在，以速度和效益为目标，生产力布局大幅度向东部倾斜。“七五”在地区生产力布局上提出了“梯度发展战略”，强调资源配置上的效率优先原则。具体说来，就是加速东部地区的发展，同时把能源、原材料建设的重点放到中部，并积极作好进一步开发西部的准备，充分发挥各自的优势和发展三者之间的横向经济联系，使经济发展呈现逐步由东向西的趋势，实现产业发展和转移的“梯度态势”。从“八五”到现在，区域发展差距的拉大引起了极大关注，此时的区域发展战略开始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加大了对中西部地区的投资力度。

上述的区域经济发展历程，形成了我国今天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的现状：严重的不断扩大的区域发展差距和严重的区域产业结构趋同化同时并存，各地的重复建设和盲目引进，导致资源的严重浪费和效率的低下。区域失衡导致的地区利益的严重冲突，是地方保护主义和地区割据的重要根源，而且还蕴涵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2000年的社会发展水平综合评价（包括社会结构、人口素质、经济效益、生活质量、社会秩序五个方面）显示，东、中、西部的



差距相当大，综合得分比例为1:0.8:0.7（见表4—5）。

表4—5　　2000年各省市区社会发展水平综合得分表

位　次	地区	综合得分	位　次	地区	综合得分
	全国平均	54.5	15	海南	51.7
	东部地区	63.1	16	内蒙古	50.6
	中部地区	50.2	17	山西	50.3
	西部地区	44.2	18	陕西	48.9
1	北京	82.0	19	重庆	48.8
2	上海	79.7	20	湖南	48.4
3	天津	72.2	21	安徽	46.1
4	江苏	64.2	22	宁夏	44.9
5	浙江	64.1	23	广西	44.9
6	广东	64.0	24	四川	44.2
7	辽宁	61.8	25	江西	43.8
8	福建	59.2	26	云南	43.8
9	黑龙江	59.0	27	河南	43.3
10	山东	58.8	28	甘肃	42.2
11	吉林	56.1	29	青海	40.1
12	河北	55.4	30	贵州	37.6
13	湖北	54.6	31	西藏	37.3
14	新疆	54.4			

资料来源：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290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2.1　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

总的说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不但没有缩小，而且有所扩大，从绝对和相对上都扩大了，特别是东部与中部之间差距扩大较多。

1. 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据统计，从建国到1979年的30年间，东、中、西部GNP的年平均增长速度比为6.81:6.78:7.25，而1980年到1994年的15年间，三个地带的GNP年平均增长速度比

为19.88:16.20:15.78，东部高于西部4.1个百分点（见表4—6）。

表4—6　三大地带GDP年均增长速度比较

时　段	年增长率（%）			差距值（%）		
	东　部	中　部	西　部	东　中	东　西	中　西
①1979—1990	9.6	8.9	8.7	0.7	0.9	0.2
②1991—1996	15.0	11.7	9.7	3.3	5.3	2.0
差距：②-①	+5.4	+2.8	+1.0	+2.6	+4.4	+1.8

资料来源：程建国等：《中国地带差距与中西部开发》，5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0。

自1981年以来，地区间经济增长格局发生了很大变化。“六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6个，其中东、中、西部省份的数目分别是6、6和4个；“七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9个，东、中、西部分别有4、1和4个；“八五”期间，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的省份有14个，东、中、西部分别有9、4和1个。通过分析，可以发现地区的经济增长率差异在逐渐增大。计算各地区经济增长率标志变异系数（即平均增长率与增长率均方差之比）可以得到：“六五”为0.150 8，“七五”为0.271 6，“八五”为0.332 7，呈逐步扩大的趋势。特别是1990年以后，三个地带的经济增长速度有了明显的差距，1979—1989年年均增长率比较接近（9.6:8.9:8.7），相差不到1个百分点，其后的差距超过了3个百分点，东部与西部的差距甚至超过了5个百分点。

经济发展速度的差距首先导致各地区经济总量在全国所占比重的差距不断扩大，东部地区的份额逐年上升（见表4—7）；其次导致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不断扩大。1997年，城镇居民中，人均可支配收入最高的上海的水平是8 438.9元，是水平最低的山西4 989.9元的1.69倍；到了2000年，这一差距变为2.48倍。再来看农村，农村居民收入的不平衡表现更突出。1995年，最富的上海农民平均收入为4 245.61元，最穷的甘肃农民平均收入则为



880.34元，前者是后者的4.82倍；而在1981年，只有2.8倍。2000年收入最高的上海郊区农民平均收入是5 596.37元，贵州农民平均收入只有1 374.16元，前者是后者的4.07倍。全国5 000万贫困人口，主要分布在中西部地区；1996年全国592个重点扶贫县中，中西部有510个，占86%。

表4—7　三大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工业总产值占全国比重（%）

年份	东部地区		中部地区		西部地区	
	GDP	工业	GDP	工业	GDP	工业
1980	52.75	60.77	31.13	25.94	16.12	13.29
1985	52.66	59.58	31.26	26.76	16.08	13.66
1990	53.78	62.73	29.92	25.36	16.30	11.91
1995	58.51	66.39	27.44	23.43	13.99	10.18
1996	57.92	65.41	27.98	25.35	14.10	9.24

资料来源：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2．经济结构差异有加强的趋势。从轻重工业结构来看，1995年全国重工业的比重为56%，轻工业的比重为44%。由于资源等开发的原因，中西部的重工业得到了发展，如山西重工业比重为80%，东北三省重工业比重均超过了70%，西北地区的比例在65%～80%之间。与之相反，浙江、广东、福建等沿海省区的生产结构正在朝轻型结构化方向发展，不仅轻工业的比例超过了重工业，而且现代轻工业迅速发展，逐步取代传统轻工业的地位。

3．区域生产率的差异。区域差异从最根本上说是由地区生产率的水平差异导致的。由于资金、技术条件、科研开发力量、劳动力素质等的差异以及东部对中西部人才的吸引，我国区域之间的生产率差异巨大（见表4—8）。从表4—8中可以看到，东部的劳动效率绝对高于中西部，中西部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西部又低于中部。从资金利税率来看，情况也非常类似，除了云南因为具有烟草这一高利税行业之外，东部地区的资金使用效率要普遍高于中西部地区。

表 4—8　　　　东、中、西部劳动效率比较

	人均增加值（元）	人均利税（元）	增加值/工资（%）	工资利税率（%）
全国平均	18 310.81	5 986.99	3.54	1.16
东　　部	21 522.49	6 930.59	3.68	1.19
中　　部	14 325.22	4 662.66	3.34	1.09
西　　部	15 780.13	5 574.27	3.32	1.17
扣除云南省后的西部*	13 766.91	3 427.34	2.94	0.73

* 云南省情况特殊，利税很高的烟草工业在经济中比重很大，在统计时烟草工业的增加值占当年全省工业增加额的 56%，利税总额占全省的 80.2%，从而使云南的劳动效率在全国名居前列，故此处比较西部地区时排除该省。

资料来源：全国第三次工业普查资料。

4．发展潜力和发展机会的差距。东、中、西部劳动生产率的差异，加上东部吸引人才、投资等的优势（所谓的“孔雀东南飞”，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持续到现在），使得区域发展差距从动态上看有越来越大的趋势，除了传统经济的部分，在新兴的网络领域，人均网络使用率也存在着严重的区域差距：北京、上海、广州的网民数量占全国的 30%还多，而甘肃、贵州、内蒙古、青海等 10 个省区网民所占比例都在 1.5%以下，广东一个省份比这 10 省市的总和还多。这些差距更深远的影响是造成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潜力偏低，从而经济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如不对此加以纠正，中国有可能重蹈意大利的覆辙，这正是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的重要政策依据。

4.2.2　区域产业结构趋同问题严重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有其特定的内容，它并非指地区三次产业结构趋同化，也不是指地区工农业结构或轻重工业结构的趋同，而主要是指各地区工业行业结构变化中存在的趋同现象。地区之间产业结构趋同，在我国是由来已久的事情。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一些地区片面追求高速度、高产值，盲目上项目、铺摊子，重复投资、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已经成为影响国民经济发展全局的突出矛盾之一。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起源于初级产品的加工，进而延伸



到以家电为代表的机电产业，以后又进入到主导产业领域。

国际上一般用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系数来衡量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趋同情况，从表4—9的数据中可以看出，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至90年代初期，我国各省区工业内部结构趋同化是日益加强的。从1981年按全部工业部门计算的结构相似系数来看，达到0.9以上的省区有19个，占省区总数的65.5%（如果剔除几个资源稀缺型产业，相似系数在0.9以上的省份为24个，占82%）。1987年增加到23个，占75.9%。进入90年代以后，这种工业内部结构趋同的趋势稍有缓和，1995年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在0.9以上的为19个，比1987年减少4个。工业结构相似系数减少的基本上属于两类地区：一是资源开发型省区，如山西、内蒙古、云南、甘肃、贵州；二是沿海经济发达省区（市），如广东、上海、江苏、山东等。

表4—9　　各地区工业内部结构相似系数比较

地区	1987	1991	1995	地区	1987	1991	1995
北京	0.95	0.96	0.91	河南	0.98	0.98	0.97
天津	0.97	0.97	0.93	湖北	0.99	0.99	0.98
河北	0.98	0.98	0.96	湖南	0.98	0.98	0.96
山西	0.80	0.71	0.70	广东	0.99	0.98	0.93
内蒙	0.87	0.87	0.83	广西	0.93	0.91	0.87
辽宁	0.96	0.96	0.95	四川	0.98	0.98	0.95
吉林	0.95	0.96	0.94	贵州	0.90	0.85	0.83
黑龙江	0.77	0.69	0.67	云南	0.80	0.70	0.67
上海	0.96	0.94	0.90	西藏	0.67	0.47	0.50
江苏	0.97	0.96	0.94	陕西	0.96	0.96	0.93
浙江	0.96	0.94	0.92	甘肃	0.92	0.89	0.88
安徽	0.93	0.96	0.90	青海	0.97	0.95	0.92
福建	0.94	0.94	0.92	宁夏	0.92	0.92	0.89
江西	0.98	0.98	0.96	新疆	0.73	0.69	0.71
山东	0.96	0.97	0.94				

资料来源：1 《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历史统计资料汇编》。
2. 历年《中国统计年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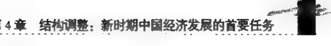
更为严重的问题是，从存量上看，地区间产业、产品结构趋同程度已经很高，中部与东部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3.5%，西部与中部的工业结构相似率为97.7%。虽然中央政府和经济理论界一再提醒要坚决改变地区经济结构趋同现象，以提高我国整体资源的利用效益，但是在现有地方割据和官员地方意识浓厚的情况下，并没有有效的制度和措施来阻止这种趋势，地区经济结构趋同现象还在继续发展，有可能变得更加严重。根据1996年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府工作报告，在“九五”计划和2010年远景目标纲要中，各地区主导产业选择严重雷同（见表4—10）。从表4—10中可以看出，各地区“九五”期间和今后15年经济发展的重点都集中在机械、汽车、石化、钢铁、电子等行业，预示着更大规模的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到来，如果这些计划得以实现，我国地区之间产业结构的相似和趋同问题会更加严重。

表4—10　“九五”规划和2010年远景纲要各省区主导产业情况

主导产业	机械、汽车	电子(通信)	化工	冶金	建筑、建材	农副产品
选择省区(个)	26	24	25	18	20	14
主导产业	轻纺	医药	森工	烟草	民族手工业	
选择省区(个)	9	8	3	1	1	

资料来源：根据1997年3月6日《经济日报》“议政参考”专栏汇编。

应该看到，除了上述所说的三大经济区域的发展失衡，还存在其他形式比较下的失衡。如果把我国划分为南方地区（包括苏、浙、沪、皖、赣、闽、鄂、湘、粤、桂、琼11省区）、北方地区（包括黑、吉、辽、京、津、晋、冀、蒙、鲁、豫10省区）和西部地区（包括西南、西北9省区），就可以发现，现在我国的经济中心大幅南移。就是三大区域之一的东部地区，也存在东南沿海四省（广东、福建、浙江、江苏）迅速崛起，北方沿海三省（山东、辽宁、河北）相对滞后的情况。同时在一省之间、一个地区之间，也存在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就广东来说，粤西北地区与珠江三角洲相比，差距在数倍以上；珠海市区的人均收入与该市最低的乡村收入相比，差距并不亚于东西部之间的差距。经济发展不平衡现象无



处不在也是我国二元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特点。

4.3　亟待调整的国民经济结构

经济结构的落后和区域经济的失衡，已经是我国实现新时期经济发展战略的重大制约。经济结构不优化，发展就无从谈起。现存的经济结构已经构成了国民经济发展的诸多矛盾，对其进行调整已经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可以说，没有调整就没有发展。

4.3.1　生产结构和资源结构矛盾：经济结构最大的深层次矛盾

中国要实现跨世纪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保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稳定增长，但从可预见的前景看，资源供给的增长难以满足现有产业结构下的经济扩张，可持续发展战略面临严峻考验。

1. 资源产业仍是“瓶颈”，资源禀赋前景不容乐观。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就将能源、矿产产业开发列入了战略重点；在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产业政策和资源投入又加强了向原材料产业的倾斜。然而，直至今日，能源、原材料产业并未从根本上摆脱国民经济中的“瓶颈”地位。能源、原材料产业面临的新形势是：一方面很多的能、矿基地经过长期开采后，资源趋近枯竭，生产成本大幅上升，效益急剧下降，而且追加投入的新增生产能力大多必须用来递补原有生产能力的递减部分；另一方面，为了摆脱国民经济增长对资源产出增长的依赖，调整与适度加快加工工业发展速度的任务已经展开，增量结构中对资源以及原材料产业的高投入比重已经很难在一个新的战略内长期维持。例如曾以拥有优质露天矿而闻名的本钢，“九五”期间仅仅为保持矿山原有开采能力与产量，就需要投入12亿元人民币，即使如此，矿山开采也只能持续5年～7年。许多支撑工业化的重要资源已经面临采储比例

严重失调的局面，21世纪“无油可采”、“无矿可挖”并非危言耸听。同时，我国的资源利用率很低，仅为30%，比发达国家低20%。中国每创造1美元的GNP，其能耗相当于德国的4.97倍，日本的4.43倍，英国的2.97倍，美国的2.1倍，印度的1.65倍；钢材、木材、水泥的消耗强度分别为发达国家的5倍～8倍、4倍～10倍、10倍～30倍。“九五”期间，我国的钢产量已经突破1亿吨大关，但吨钢能耗平均水平达1.4吨标准煤，而世界先进水平仅为0.68吨，世界平均水平则是0.9吨。

2. 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使新的增长过程面临重大考验。在中国的一次能源结构中，煤的比重一度占到70%以上，直到1998年才降到70%以下，但接近70%，石油只占20%多一点。中国的石油、天然气资源并不丰富，已经投入开采的除大庆（其开采成本已高过国际市场价格）外几乎都面临产量急剧递减的困境。就石油而言，中国已经从原来的出口国变成石油进口大国，2000年中国进口石油达到7 000万吨，估计到2010年将超过3亿吨，有可能超过日本成为第一大石油进口国。当前，石油后备资源大部分位于开采难度很大的区域，因此不可能指望明显改变石油在一次能源结构中的比重。如不能解决好能源结构与利用效率问题，就会面临较大的困境。中国的水力资源虽然名列世界前茅，但是大都分布在远离工业化集中区域的偏远地区，况且水力发电投资大、周期长、丰枯水期季节性限制大，电力远距离输送的技术性、经济性障碍仍然存在。

所以，支撑中国工业化的一次能源结构只能“以煤为主”，而且是以热值较低的煤为主。由于煤存在热值低、运输量大、污染严重、利用设备投资巨大等弊端，世界其他国家工业化过程中通常采用石油、天然气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少数国家依靠水力或核电。以煤为主力能源在大国型工业化过程中是没有先例的，在满足能源需求的急剧增长和控制能源成本以提高产业竞争力方面，以煤为主的一次能源结构将使我国面临重大考验。

3. 资金长期短缺和劳动力无限供给，是增长方式转变的重大



障碍。中国社会性资源的构成情况明显表现为发展中国家型结构，其特点是：积累能力限制导致的资金长期短缺状况与13亿人口为基数的劳动力无限供给并存；工业化中、后期要求产业结构尽快脱离劳动密集型阶段向资金、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的任务与资金短缺和就业压力形成对结构转换和增长方式转变的双重阻碍并存。现实的资源供给状况和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产业结构转换方向、增长方式转变要求之间矛盾尖锐。

4．城市化过程中土地资源的非合理利用与水资源的短缺。工业化过程必然伴随着城市化过程，与此同时，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工业与农业在土地资源合理利用方面的矛盾日趋尖锐。另外一个重大的制约因素就是水资源的短缺。

4.3.2 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的矛盾：相对过剩与消费不足并存

生产—消费，实现的中介是市场，否则生产就没有意义。消费结构是决定产业结构的必要条件。中国产业结构的深层次矛盾不仅表现在经济扩张的资源制约上，而且表现为现有产业结构下经济扩张已经遇到市场抵抗，低质量和低水平的生产结构与正在不断变化的消费结构存在着尖锐矛盾。到目前为止，连续几年的内需不足导致的大面积的“过剩”更加突出了这一点，使之成为各方关注的焦点。

1．产品结构与消费结构变化的不匹配。长期以来，我国存在着高积累、低消费的问题，改革开放之后，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实行收入向居民倾斜的政策，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收入也开始拉开档次，与此相适应，人们的消费水平和消费方式也趋向多样化、多层次化。在消费方式中，城镇居民是潮流的领导者，广大农民逐渐向城镇居民看齐。从城镇居民的消费结构来看，已经基本上脱离了温饱型，正在向小康型、宽裕型过渡，开始重视生活质量，在从追求物质消费的同时开始注重服务消费。这就对商品和厂家提出了更高、更多的要求。现实来看，中国的众

多生产厂家并没有适应这种转变，导致了市场的丢失和产品的滞销。

外商抢占中国市场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国外著名品牌充斥中国市场，并且市场占有率不断扩大，其特点表现在以下方面：一是在特定领域市场占有率增长速度极快，如在通讯器材业、碳酸饮料业和信息产业，外国商品或外商投资企业占据了市场的绝对优势地位；二是国外著名品牌不仅在微电子、新型材料等中国短缺的领域“抢滩登陆”，而且向服装、食品等中国传统长项产业，包括消费地指向性明显的冷饮业“大举进攻”，文化电影产业的情形亦是如此；三是排他性明显，不仅急剧挤占原有国产品牌市场，而且由于所占领域一般具有“先行者垄断”特点，对后起品牌也形成了强大的进入壁垒。在这场商战中，很多曾经辉煌过的品牌在合资和收购中消失了，如天府可乐、公元胶卷等。分析一下，就可以发现这些产品都属国内无法满足需求的类别：(1) 国内还不能生产，如电脑芯片；(2) 国内虽能生产但产量和质量不能满足需求，如汽车；(3) 国内有但档次远不如国外同类产品高的产品，如家用电器、食品和洗涤用品。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国内厂家则惊呼中国已经进入了供大于求的买方市场时代，许多产品滞销、库存积压严重，难以在市场上得到实现。

2. 产品档次低度化与“假冒伪劣”产品生产对资源的严重浪费。与第一个问题相关，低质量、低档次的产品、“假冒伪劣”产品充斥市场，其资源消耗不仅与高质量产品差不多，而且消费者不得不为同样功能、同样使用价值的产品支付更多的资源成本和生产成本，由此造成巨大浪费。产品档次低度化以及“假冒伪劣”盛行是生产结构与消费结构矛盾的重要表现，这导致低水平产品的生产过剩与生产能力的闲置，如纺织工业、食品业、饮料业、服装业等。

3. 结构性过剩与产品积压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和宏观经济良性运行造成重大障碍。“九五”期间，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



矛盾对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影响日益显露。国家宏观调控在产销率下降和经济增长速度下降之间处于两难境地。刺激生产的措施导致库存积压增加，紧缩银根又有引发“宏观经济偏冷”的忧虑。关键就在于生产结构与需求结构之间的矛盾。这种状况直到现在也没有明显改善。

4.3.3　技术结构滞后与外部竞争加剧的矛盾

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现有产业结构中技术结构滞后的缺陷正日益凸现，我国在国际竞争中获取比较利益困难重重，也使我国经济结构升级和经济发展上台阶严重受阻。

1. 低成本技术已成为提高产业竞争力的障碍。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期开始的“翻两番”战略中，由于资金和成本限制，国民经济发展战略中较多采取了倚重初级技术、适用技术的结构选择，主要表现为大量引进二手设备、接替发达国家和东南亚新兴国家（地区）淘汰产业、“三来一补”推动下的劳动密集型组装业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这种过度依靠初级技术、中间适用技术为主的技术构成的缺陷日益突出，成为我国产业竞争力不强的基本原因。1998 年，我国的外贸依存度为 33.7%，2001 年则达到 44%。[①] 与之并存的是，几乎所有重要产品的主体技术都明显落后于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目前比较有竞争力的产品集中在技术含量不高、附加价值低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如纺织、玩具、手表、箱包、鞋帽等）和技术较成熟的家用电器产业（如洗衣机、电冰箱、电风扇、空调器、电视机等）；造船业具有一定的竞争力；至于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如汽车、通讯设备等，还需要国家高度保护才能得到发展。由于依靠高关税壁垒保护国内产业的政策在与国际经济社会接轨的过程中难以长期维持，而且出口产业“赔本换汇”的竞争方式引起发达国家越来越强的“反倾销”政策的抵制。这一矛盾已经构成对国民经济进一步持续稳定增长的严重威胁。

---

① 根据《中国统计年鉴》（1999 年、2002 年）计算，美元折算汇率为 8.28。

2．21世纪谁来武装中国：装备业滞后的忧虑。在中国现实的产业结构中，经过前一阶段的战略发展，尽管农业、能矿产业滞后的情况仍然存在，但是从产业质量、技术及装备水平、规模经济等来看，比过去有了较大的提高。从相对增长速度、产品结构改善速度、外资引进速度、与世界先进水平差距等方面来看，最薄弱的产业环节是加工工业，特别是装备业。我国工业化进程中深层次的战略目标是效率，是生产手段的彻底改造，而恰恰是对工业化最有意义的机械制造业，几乎没有出现过快速增长的局面，加工（家电业除外）、制造业中达到接近世界先进水平的大型企业屈指难数。装备业的滞后，极大地制约了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的升级。1985—1996年，全国独立核算的机电企业产值增加率由34%下降到24.7%，低于全国工业平均水平，占有资金增加率由39.3%降到28.5%。与此同时，新增设备对进口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加了。1990—1996年每年进口机械设备的费用占当年固定资产投资设备购置费的2/3左右，1995年更是达到了72%。从行业来看，汽车的70%的设备、石化的80%的设备均靠进口；数控机床、纺织机械、大型工业机械、胶印设备和各种信息产业设备等高新技术设备的市场70%以上被进口产品所占领。[①] 从经济发展周期和提高产业国际竞争力的必要性看，国民经济的主要产业都将面临固定资产大规模更新的浪潮，机械设备必将成为跨世纪发展过程中的需求热点。中国目前的机械工业远不能承担这个重任，我国目前机械工业开工严重不足，而与此同时机械设备仍是进口中的主项。工业化阶段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基本任务与产业结构自我装备能力严重弱化形成尖锐矛盾，装备业的技术滞后已成为国民经济战略发展的重大隐患。

3．高新技术产业发展仍然任重道远。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虽然有了一定的发展，但是作为产业结构转换的先导，离“产业化”的差距仍然十分大，其内在优势和带动产业结构向技术密集化方向

---

① 吕薇：《关于加速重大技术装备国产化的建议》，见马洪主编：《98'中国发展研究》，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1998。



发展的作用并未真正发挥出来，这对我国经济的长远发展将会是一个重大制约。

4.3.4 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资源产业间优化配置的重大障碍

至"九五"末期，区域经济发展的差距已经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区域经济振兴的关键是因地制宜，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发展策略，进行结构调整势在必行，结构调整的重点是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的调整。地区经济结构的趋同化虽然有一定的好处，如可以促进企业竞争，可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加工工业产品价格上扬的势头，反映了我国工业重心西移的客观要求，但是从总体利益上看，地区经济结构趋同化是弊大于利。首先，违背了"发挥比较优势，优化资源配置"的地区经济增长首要原则，使地区之间分工与协作关系淡化，降低了国家整体经济效益；其次，引起投资的分散和生产的分散，无法获得规模经济效益；最后，地区产业结构的趋同，必然导致宏观产业结构的扭曲。趋同化妨碍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和发展，导致地方保护主义，不利于地区之间的经济联系，对生产的分工和专业化的发展产生极其不利的影响。目前，地区产业结构趋同化态势已经成为实现资源优化配置目标的重大威胁。

4.3.5 农村经济滞后：制约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

农业是我国经济的基础，然而，从实际上看，先是由于工业化的需要采取了长期以牺牲农业为代价发展工业的政策；改革开放后，由于种种原因，对农村经济的重视亦大都停留在文件和口号上，对农村经济的实际投入难以符合发展的要求，导致欠债过多，农村经济落后，形成了制约经济发展的二元结构局面，集中表现为城乡结构对立。

通过对需求结构的分析可以发现，导致当前我国经济内需不

足，以致最终消费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份额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农村居民消费份额的相对下降，城镇居民消费20年来则基本持平。农村居民消费对经济增长贡献的份额，从20世纪80年代的35%左右降到20世纪90年代的20%多。农村居民消费占整个居民消费的份额从1979年的79%降到了1998年的47%，城镇居民消费的比重则从32%提高到了53%。最终消费需求是中国经济持续健康增长的关键，增加农民需求则是保证最终消费需求增长的关键。农民的需求出现断层是现在需求不旺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城镇居民已经向小康转变的时候，许多农民却仍然没有能力消费城市中早就普及的彩电、冰箱、洗衣机等耐用消费品，许多产品的积压就不足为怪了。刺激农民需求，关键是提高农民收入。提高农民收入，除了发展农村经济以外，根本的措施是减少农民。此时，我国城乡结构不合理的表现——“城市短缺”——就成了瞩目的焦点。一般来说，工业劳动力增长1%，考虑到家属等情况，城市化程度将增加2%；但是1999—2003年，我国工业劳动力增长了1%，但是城市化程度只增加了0.5%，要解决城市化严重滞后这个问题，城乡对立状况尽快得到改善是一个关键环节。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直大力提倡发展乡镇企业，倡导农业剩余劳动力实现“就地转移”，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在本乡本土“就地转移”的方式，至少有两个宏观负效果是未曾充分估计的。首先是就业门路的缩小。由于乡镇企业一般布局分散，农村工业化的结果没有带来相应的人口集中，难以满足第三产业发展的消费、生产同一性以及最低的“人口门槛”（即必须人口集中达到一定规模，第三产业才能盈利）的要求，第三产业的发展受到了极大的局限，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主要出路挤向工业。在我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1979—1996年，乡镇企业中的第二产业职工净增7 839万人，而交通运输、商业饮食及其他行业新增职工只有2 739万人（不是第三产业全部），两者就业之比为1∶0.35，即使考虑到统计遗漏，也不会超过1∶0.5。而韩国、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20世纪70年代初期到90年代初期农业剩



余劳动力大规模向非农产业转移时，其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新增就业之比分别为：1:1.5、1:2.9、1:2.5、1:1.9。可以看出，同样的投资在我国创造的就业岗位少了很多。若我国的就业比达到 1:1，20 年下来，也至少可以多创造 3 000 万个到 4 000 万个第三产业就业岗位。其次是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及需求的缩小。“就地转移”实际上是相对封闭城市劳动力市场，使城市职工保持了一个高于全社会劳动供给与劳动需求平衡点的工资率和高于劳动生产率提高幅度的工资上涨率，实际上，按中国的劳动供给与需求，供需均衡的城市工资不应该这么高。现状是在国民收入分配中，平均收入较高的城市居民继续得到增量中更多的份额，平均收入较低的农村居民则得到相对较少的部分；就边际消费倾向来说，后者要高于前者，如果能够增加农村居民的收入分配份额，总需求增加的效果要好得多。因此，大力发展农村经济，致力于相对集中的农村“城市化”，是一个重要的任务。

4.3.6　第三产业发展存在战略性缺陷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第三产业发展严重滞后，不仅流通资本职能未能从生产企业中剥离出来，金融资本职能也被附加于生产企业；依赖分散经营的小商品经济方式的社会流通、服务系统日益成为城市消费品供应与生活服务系统的主体；金融、保险、信息服务等新兴产业刚刚起步，规范化、规模化任务繁重；房地产业一直没有走出低谷，商品房积压严重，而且存在着严重的建筑质量的问题，房地产中介服务亦亟待规范。

4.3.7　区域经济差距扩大：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挑战

我国经济发展的最终目标是共同富裕，区域经济发展差距日益扩大的情况显然与此背道而驰。经济差距的扩大，不仅会激化地方矛盾，无助于地区产业趋同化问题的解决，而且由于中西部地区特别是新疆、西藏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域，经济发展协调不当，可能影响国家的长治久安。中西部拥有我国大部分的资源，从资源配

置和经济合理布局来看，向中西部的倾斜发展也势在必行。

其他存在的问题：一是企业组织结构不合理，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过程中，不仅原有体制遗留下来的分散化生产、企业“大而全”和“小而全”的状况未能得到有效调整，而且由于改革措施不完善，一些新兴产业中又多次出现了重复建设、重复引进的现象。二是经济中的条块分割、诸侯经济现象严重阻碍市场经济统一大市场的形成，不利于经济体制的转换和资源优化配置。

总的来说，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七大问题，对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已经成了当务之急。

4.4 优化经济结构，拓展经济发展的广阔空间

经济结构的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关键，只有结构理顺了，才可能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我国经济建设的任务是实现经济体制由计划体制向市场体制的转变，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的转变，实现两个转变的重要前提是经济结构的调整。因此，江泽民在十五大报告中指出：“经济调整”是“国民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和长期任务”，同时指出必须根据我国经济发展状况，充分考虑世界科学技术加快发展和国民经济结构加速重组的趋势，着眼于全面提高国民经济总体素质和效益，增强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对经济结构进行战略性调整。只有两个转变做到了，建设全面小康社会才有坚实的基础和持续的动力。

应当看到，我国新时期的结构调整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压力，一方面需要解决前期渐进式改革遗留下来的最艰难部分的问题：国企改革问题、就业问题、社会保障问题、收入分配问题、区域差异问题、农村经济问题；另一方面必须面对国际竞争，为中国在新世纪的经济王国中谋求应有的地位。可谓头绪众多、任务繁重，此时只有胸怀全局，转变思路，才能抓住关键，取得战略性突破。

为此，我们必须在下列问题上形成共识，这是进行调整的前提。



第一，经济结构的问题不是改革带来的，恰恰是改革不深入、市场经济体制不到位的反映。必须继续深化改革，尽快建立、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市场为导向优化资源配置。

第二，政府在调整过程中将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恰当的产业政策是关键，必须转变产业政策的战略思想，基于中国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的判断，把原来主要依靠农业积累支撑工业高速发展转向依靠广大农村市场刺激工业发展上来。产业政策的重点是产业升级，主要目标是技术升级。

第三，调整方式必须从原来的适应性调整转变为战略性调整，坚持全局观念，打破地区、部门封锁，放眼全球，在调整的同时加速产业优化和产业升级，依靠科技进步，以求建立适应新世纪经济发展的经济结构，树立“早调整、早优化、早升级”才能够“早主动、早脱困、早收益”的观念。

第四，高度重视制度创新问题，为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制度对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能够激活微观主体的创新动力，引导企业正确决策，降低经济发展成本，减少经济发展引起的社会摩擦。我国经济发展中过于强调增加投入、注重技术引进、忽视制度创新的局面必须迅速扭转。目前，不管是农村改革还是城市改革，都遇到了制度创新不足的严重问题。因此，必须增加制度供给，在土地使用权制度、产权制度创新、政府职能转换、道德行为规范方面取得突破，加快体制模式转换的步伐。

第五，立足长远，与可持续发展战略结合起来，坚持科教兴国战略，追求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结构调整的总原则是“以市场为导向，使社会生产适应国内外市场需求的变化；依靠科技进步，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发挥各地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协调发展；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改变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的状况。”① 结构调整要有利于提高经济增

①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载《人民日报》，1997-09-22。

长质量，有利于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利用，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维护生态平衡，有利于提高中国的国际竞争力，其总体思路是：(1) 改造传统产业，发展新兴产业，开拓新的市场空间和消费空间；(2) 优化三次产业框架，调整三次产业比例关系，提高二次产业水平，改善三次产业内在素质。产业结构调整的目标是：实现生产经营的规模化、产业技术的高度化、产品营销的市场化和生产协作的专业化。

4.4.1 切实加强农业，深化农村体制改革，全面发展和繁荣农村经济

农业结构调整要解决三个问题：农业规模经营，提高农民收入，农村城市化。为此必须做到：

1. 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树立大农业观念，确保粮食稳定增产。引导农民增加适销对路的优质粮食品种的生产，积极发展多种经营，全面发展林副牧渔各业。强化科技兴农，提高农业的集约化水平和综合生产能力，加快农业高新技术开发及其产业化，加快优良品种的选育和繁育，推广先进适用的增产增收技术。

2. 增加投入，大力加强以水利为重点的农业基本建设，加大对大江、大河的治理，继续加强十大防护林体系的建设，做好退耕还林、退耕还山、退耕还水、退耕还草的工作，实施天然林保护工程，做好防洪、防旱工作等。

3. 大力推进小城镇建设，调整乡镇企业结构。引导乡镇按照市场需求调整产品结构和企业组织结构。抓好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等试点工作，加快小城镇建设，在注意节约用地和保护生态环境的基础上，适度集中，提高农村城市化水平。

4.4.2 继续深化企业改革，促进企业组织的合理化

企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必须尽快解决企业“大而全”、“小而全”和规模不经济问题，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企业改革的核心是建立政企分开、产权明晰、权责明确、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政府的重大职责应当向



为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转变。

1. 大力推行政企分开，改变在资源配置中的权力分配的情况，使企业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政府要转变职能，把工作重点放到为经济建设和企业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环境的中心上来，比如打破地区封锁，建立全国统一市场，以降低市场交易费用；加强立法，加大执法力度，维持正常的经济秩序，打击假冒伪劣等。政府逐步从竞争性行业中退出，除了某些公共事业和关系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不再承担在企业领域投资的责任，倾向性的产业政策必须通过企业化的行为来实施。

2. 重点抓好国有企业改革，以市场为导向，重点解决产权问题、企业法人治理结构问题、企业经营者选用及激励约束机制问题、企业资产重组问题、人员分流和社会保障体系建设问题。必须掌握改革的整体性，加快系统配套改革，坚持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在勇于承担改革风险的基础上，推动改革措施尽快到位。通过"抓大放小"、推进股份制等措施，盘活国有资产，提高其利用效率和效益。

3. 适当提高行业进入门槛，贯彻产业规模政策，以解决企业生产过度分散的规模不经济现象和竞争过度导致生产能力过剩的问题。在此基础上，打破地区、部门、所有制之间的限制，加速资源重组，改善我国的企业规模结构。同时，采取措施解决企业退出困难问题，建立、完善行业退出制度，使市场真正成为企业的评判标准。应当注意的是,企业的规模经济也要注重效率,除了与专业化程度提高和分工细化密切结合外,最终要体现到市场占有率上来,而不能只单纯体现在资金和固定资产集中程度上,不能只讲工厂规模。

4. 加速发展服务业，建立服务商品市场，规范服务业的价格，提倡竞争，反对垄断，使服务业实行专业"生产"，走向产业化的道路，改变小商品经济经营方式，同时解决企业办社会问题。

4.4.3　大力发展制造业，特别是装备业

实现产业结构的升级，首先必须实现自我装备能力的升级，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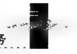
生产资料的角度为产业结构的升级打下良好的基础，也就是所谓的“兵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装备工业是保障一国经济安全和政治独立的重要产业。装备业是我国产业结构中的最大弱项，对此我们必须有充分的认识。国民经济的超常规产业扩张过程将是一个较长的周期，以自动化技术为代表的机电一体化进程的发展是完成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装备能力不足将成为重大隐患。我们必须自己来回答“下世纪谁来武装中国”的问题。因此，必须加大投入，以战略产业的高度加快制造工业的发展，特别是装备业。把装备工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可以有力地促进产业技术升级，也可为经济增长产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4.4.4 确立国民经济的战略产业，为新世纪经济发展做准备

战略产业是指对提高和保持国家竞争能力有重要意义，对国民经济运行有重要影响力的产业。它既与主导产业（又称支柱产业）类似，又存在区别。两者的区别在于，主导产业是现阶段支持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战略产业则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现阶段和将来都对国民经济起主导作用的产业，即部分现阶段的主导产业；另一部分是未来阶段将成为支持经济增长主要力量的产业。因此，战略产业更强调前瞻性，简单来说，战略产业是未来阶段的主导产业。科学选择战略产业是提高我国综合竞争能力的需要，也是为经济发展奠定基础和潜力、培养后劲、实现持续增长的需要。从我国的实际情况和国际竞争来看，必须确立如下产业为战略产业。

1．农业。促进农业由传统农业→混合农业（以多种经营为特征）→现代农业（以机械化、专业化、科学化为特征）的转变，发展生态农业。

2．环保产业。随着国际上对环境保护的日益重视，目前环保产业（又称绿色产业）已经发展成5 000亿美元的大市场，21世纪初将增加到6 000亿美元。同时，许多国家对进口产品的环保要求也越来越高。我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实施，使得环保产业在21世



纪成为主导产业，而20世纪末我们才刚刚起步。因此，我们要把环保产业列入战略产业，积极开拓下列环保市场：(1) 净化水和空气的设备市场；(2) 农业生物化学市场；(3) 低污染源能源市场；(4) 对传统污染工业的改造及其替代的设备市场。

3. 高新技术产业。随着国际竞争的日益激烈，抢占产业制高点就成为经济发展中的焦点，高新技术及与之相关的产业正逐步成为国家竞争力的决定性力量，关系到国家命运，其战略产业地位毋庸置疑。尽管我国在航天工业、核工业等方面具有一定的实力，但发展高科技产业仍然任重道远。扶植和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尽快把它们培养成新的主导产业，是我国产业结构调整中最具战略意义的举措。

高新技术产业在我国的发展重点是生物高效农业、生物医药产业和海洋产业；电子元器件制造业、计算机产业、软件产业、精密数控机床等产业；复合材料、陶瓷材料、半导体材料、超导材料产业；核能及再生能源产业。在发展高科技产业体系的同时，不断进行高新技术对传统产业的改造，使其成为提高我国产业结构水平的重要途径。就当前而言，要着重发展微电子产业，它是所有制造业产品、工艺、管理和设计开发的中枢，已经使传统产业发生了质的飞跃。我国当前工业产业部门的产业主体技术仍停留在机械技术水平上，微电子产业有着紧迫的发展需要和广泛的发展前景。

4.4.5 培育和发展主导产业，以新的增长点带动经济的全面发展

主导产业必须具有产业关联度大、波及效果广、规模效益好的特点，对国民经济具有巨大的带动作用。就此来看，我国要大力发展下列主导产业。

1. 汽车制造业。汽车产业的上游可以带动冶金、化工、有色金属、石化、电子、橡胶、玻璃、仪表、电力等产业，下游可以带动交通、城建、旅游及相关的轻工业。根据比较保守的估计，汽车产业每增加一单位的产值，相关行业就可以至少增加2.67单位的

产值。如果轿车年产量达100万辆，保有量达到600万辆，其工业产值将达1 200亿元，关联产业增加值将达3 000亿元，创造500万个就业机会，购买和使用轿车的税收可达220亿元。从市场需求看，人均月收入在500美元～1 000美元时，汽车开始进入家庭，1 000美元～1 500美元时，需求出现高潮。据此分析，我国的汽车需求已经开始，今后20年～30年是汽车需求量大幅度发展的时期。当前发展汽车工业，除了产业政策倾斜之外，制定全国统一的汽车消费政策和大力发展汽车消费信贷是当务之急。

2. 建筑业。经济发展到了一定阶段，建筑业必然成为主导产业，而且将持续相当长的时期，如现在建筑业在美国还是主导产业。住宅建筑业规模大，可以带动钢材、水泥、玻璃、砖瓦、木材、陶瓷、塑料、家具、家用电器、房地产中介等50多个行业，关联效应强，而且吸收的劳动力数量巨大。从需求看，我国人均收入在390美元～1 230美元的发展阶段，住宅收入弹性为1.4，远远高于食品、燃料、电力、家用商品等，对住宅的巨大需求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目前，由于城镇人均居住面积小（远未达到8平方米）及其收入水平，城镇住宅业是拉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主导产业。当前要采取的主要措施有：加快推进城镇住房制度改革；扩大城镇住宅建设投资资金来源渠道，使居民成为建设投资的主体；建立合理房价形成的机制，尽快把房地产业的税费降到合理标准。

3. 电子工业。电子工业是信息社会的基础产业，是推进我国产业结构升级、实现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关键部门。电子工业在新技术革命中具有高渗透性，技术扩散和带动能力位于各部门之首。中国的电子产业已经成型，目前的关键是要扩大规模、提高技术含量以扩大竞争力。在国家加大扶持和投入力度的同时，企业也要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通过投融资体制的改革，加快以微电子工业为核心的电子工业的发展，促进跨地区、跨部门的联合，集中力量，重点突破。

4. 高效农业。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加强精品农业、绿色食品、创汇农业的综合开发，重点强化名、特、优、新和鲜活农副产



品生产，逐步向高档精细和无公害方向发展，使高效农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

4.4.6 逐步实现地区经济协调发展

地区经济的协调发展，是我国新时期结构调整的重要内容。这里包含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解决地区产业趋同化问题；二是逐步解决区域经济差距问题。

1. 完善干部考核与任用体制，正确引导地方政府官员的经济行为，改善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情况。解决产业结构趋同问题，需要从两个方面着手：首先，使企业成为真正的投资主体，对自己的经营行为负责，这在上面已经提及。其次，改变地方政府的扭曲行为。在我国现行的体制下，一个地方只要上项目、开始投产并有了产值，就可解决一部分人的就业问题，增加本地财政收入，增加本地工业产值和 GDP。如此一来，地方官员就有了政绩，就可能被提升、被重用。至于投资项目是否有效益，他们并不负责任。效益好当然皆大欢喜，投资失误至多易地为官，由后任解决。这种权责不对称的投资行为只能说是政府行为或计划行为，不是市场行为，所以重复引进、重复建设在所难免，而且往往效益极差。据对“八五”期间投产的 475 个大中型项目的调查，投产即亏损的有 120 个，占 25.3%，其中严重亏损的有 89 个。因此，在进行体制改革的同时，当前亟须改变干部考核与任用办法，在考核时除了看任期内建成项目、产值增加的多少外，还要考核这些项目对该地区、对全国的经济发展效益，建立大中型项目的长期责任制度。这样，可以减少一些重复建设项目的上马，在一定程度上缓解地区产业结构趋同的问题。

2. 采取适当政策，逐步解决区域经济差距问题。我们一方面要承认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客观存在；另一方面要想方设法缩小差距，实现协调发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要反对急于求成的思想和行动。

(1) 中央政府应该实施向中西部倾斜的政策：制定鼓励向中西

部投资的税收、银行贷款优惠政策；有针对性地对外开放，吸引外资投资中西部；大力运用国家财政转移支付手段，扶持中西部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增加对中西部的财政投入，主要是用于基础设施、主体项目的财政倾斜，而不是大幅增加解困津贴；指导东部与中西部对口经济协作方式的进一步完善和深化。同时，中西部地区要转变观念，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利用自身优势，积极主动地促进经济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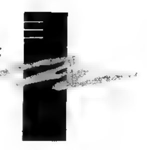
(2) 根据我国经济发展态势的变化，重新划分经济区域，打破原来的三大区域的格局，以此来促进经济协调发展。可以重新划分为：长江三角洲和长江沿江地区；东南沿海地区（广东、福建)、环渤海地区，包括辽宁一部分、河北、山东、山西、北京、天津和内蒙古一部分；东北地区，包括吉林、黑龙江、辽宁大部和内蒙古东部；西北地区，包括陕西、甘肃、宁夏、新疆、青海、内蒙古西部；中部地区，包括河南、湖北、湖南、安徽、江西；西南和华南部分地区，包括四川、贵州、云南、广西、西藏、海南。此外，长江三峡地区、重要交通干线的沿线区域（特别是京九铁路）也值得重视。总之，要打破地区观念，积极协作，主动出击，优势互补，通过各种渠道促进经济协调发展。

4.4.7 深化投融资体制改革，大力优化投融资结构

结合经济调整加快投融资体制改革，培育和形成适应市场经济的市场投资主体。建立、完善金融、证券市场，建立投融资风险责任约束机制，引导企业投资行为和改变企业融资渠道单一的状况。

通过上述调整措施，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从整体经济建设出发逐渐解决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中的三个核心问题：提高经济增长质量（包括投入质量、运行质量、产出质量)、发挥规模经济的效益、加快技术进步及其扩散效应，取得经济增长方式与资源条件、产业结构、积累与投资的协调，从而实现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为国民经济的长远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5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压力



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25个年头，目前正面临着一个关键的转折时期。从易到难、由浅入深、“摸着石头过河”的“渐进式”改革，如今已经进入了深水区，原来小心翼翼绕开的各种矛盾，再也无法回避。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国家要把改革推向深入，就必须有勇气而又有技巧地兼顾效率与公平，进行一系列的利益调整，同时想方设法把社会转型带来的冲突与碰撞控制，缓解在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尽力保持社会的稳定，这有赖于大量民间机构与中介组织的出现与良好运行。

在放权让利、原有体制能量释放阶段基本结束之后，改革从1994年开始进入了攻坚的“中期阶段”，国企改革、就业问题、社会保障、社会效率与公平等，成了改革的难点和热点，社会发展表现为利益分化、整合以及社会结构转型。旧的结构已经出现“解组”，新的结构尚未建立起来，中国进入了一个复杂的社会转型时期，并因为新旧结构交替的“时滞”而处于社会问题的高发期。社会转型，实质上指社会结构的变迁，是社会中传统因素和现代因素此消彼长的进化过程，是社会的结构性变革和整体性发展。具体表现为借助社会规范体系的重建而实现生产方式、交往方式、生活方式的转型，其目的是寻求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为人的生活提供更为有效的社会环境和价值保证。社会转型对一国有着重要的影响，有学者认为，它是影响中国资源配置和经济发展的“第三只手”。[①] 从经济发展上看，中国已经进入了国际上公认的“人均600美元～1 700美元的阵痛期”，经济、就业、消费结构以及城乡、社会政治结构都处于大变更时期。与其他国家有所不同的是，中国的社会转型是在经济基础尚未到位的情况下进行的，并明显具有几个转型过程同时交织的浓缩型特征。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农业社会到工业社会、农村社会到城市社会、封闭社会到开放社会、同质单一性社会到异质多样性社会、集权伦理型社会到分权法治型社会，几个转变过程的同时交织，使中国的社会转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各种社会问题几乎同时凸现出来，给民众造成倍加的精神压力和物质压力。

社会转型的重要意义是将在结构、制度、组织的层面进行历史性的重建，其中尤为重要的是社会力量的重新组织，权力和社会利益的重新分配和转让成为主要内容。因此，利益关系已经成为左右中国改革的决定性力量，民众的心理压力和生活压力突然增大，他们必须承担进一步深化改革的成本，而改革的收益又不十分明确的

---

① 参见李培林访谈：《中国社会结构转型》，29页，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8。



情况下，社会进入了一个紧要和微妙的关头。不同利益集团的冲突，贫富分化的继续发展，道德沦落和价值观念混乱的危机，社会解组现象和社会整合能力的下降，严重威胁着社会的稳定，给经济发展造成了巨大的社会压力。在这种权衡考虑的背景下，许多改革措施的选择也就相应地从最佳方案让位于具有可操作性的“是否为大多数人所接受”作为标准。

5.1 社会急剧变革中不同利益群体的形成与定位

在中国改革初期，社会利益的分化和再分配迅速进行，国家承担了巨大的改革成本，从农村的“联产承包责任制”、城市企业的“承包制”等等，民众普遍得到了改革所带来的好处，此时对改革的拥护可谓万众一心。比经济繁荣更为重要的是，改革使社会出现了自由流动资源和自由流动空间，整个社会有了发展的动力，呈现出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在改革中期，改革的深入要求参与者承担成本与代价，而其收益则常常是一种预期，这就越来越触及利益格局的刚性方面，改革的难度明显增加了。至此，各个群体不再无条件地支持改革政策的推行；相反，各群体不仅会根据自己的受益情况调整对改革参与的态度和程度，而且会根据相互之间的矛盾程度和受益程度来调整与中央政府和其他参与者之间的合作程度和方式。在目前的体制创新阶段，长期结构性矛盾和现实的体制性摩擦纠缠在一起，国家的利益补偿能力尚不充足，同时又需要在稳定中以果断的改革开辟前进道路，因此对社会基本阶级、阶层的利益分析显得格外重要。

5.1.1 八大利益群体

所谓利益群体，是指利益个体基于一定利益的结合形成共同利益的集合体，通常以阶层来称谓和描述，本小节所说的利益群体，

也包括对阶层进行一定组合的综合体。

自1978年以来，伴随经济高速增长而来的是加速转型的社会结构，就业结构、产业结构、消费结构也都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市场机制成了中国经济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机制，原有的利益格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社会利益结构深刻变化的表现，一是利益主体多样化，原来的单一化利益主体多元化；二是利益分配格局的多元化，不同利益群体的多种利益分配渠道已经初步形成；三是利益关系的复杂化，存在国家、群体、个体之间利益的矛盾，政治利益和物质利益的矛盾，也有工业劳动者、农业劳动者、知识分子、党政干部等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矛盾。其中，经济生活中两方面的变化对我国利益群体的重新布局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是公有制之外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和壮大，如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三资企业等，它们的出现极大冲击了原来的社会利益结构，在培育了一批高收入者的同时，也使工人阶级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二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内部发生的变化，特别是乡镇企业工人的出现和农民的经济自发性流动给农民阶级和工人阶级带来了深刻的变化。至此，中国原有计划体制下的干部、工人、农民的三大利益格局被打破，原来赖以评价个人地位的身份体系被收入、权力、声望、教育程度等标准所取代。资源配置多元化格局的形成导致了利益群体的分化，原来阶级阶层结构的重新整合在所难免，并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就整个利益格局的变动情况而言，城乡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了；在行业之间，重工业和物质生产部门的工资水平已经没有明显优势，一些服务业的工资水平迅速上升，现在工资水平较高的是金融业、交通和邮电行业、信息产业、房地产业、旅游业、烟草制造业等；较低的是制造业和采掘业。在不同所有制之间，三资企业职工的平均工资最高，其次分别是国有企业职工、城镇集体企业职工；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劳动者的收入则明显的高出一般职工很多。至此，原来的两个阶级（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一个阶层（知识分子阶层）的分类已经不能概括现在社会阶层多样化和复杂



化的情况。

划分利益群体的标准不同，因而也就出现了多种多样的分类方法。一般而言，最常用的分类标准是职业（身份）标准，以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为基础把利益群体区分为各个阶层。在描述社会变革下中国的阶层所组成的利益群体的时候，必须指出的是，各阶层之间的交叉现象是非常普遍的，阶层亦是处于动态的发展变化之中。

阶层有两种基本的类型，一是阶级内部的阶层，这是由于阶级内部的阶层分化而形成的；二是基本阶级以外游离出来的社会阶层，如现阶段我国的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主阶层。就目前而言，我国相对独立的社会阶层有：(1) 社会管理者阶层；(2) 知识分子阶层；(3) 企业经营管理者阶层，或称企业家阶层；(4) 国有企业工人阶层；(5) 城镇集体企业工人阶层；(6) 乡镇企业工人阶层；(7) 雇佣工人阶层；(8) 个体劳动者阶层；(9) 私营企业主阶层；(10) 农村村务干部阶层；(11) 农业劳动者阶层；(12) 农民工阶层；(13) 失业、半失业者阶层；(14) 离退休人员阶层；(15) 无职业者阶层。在一定的综合之后，可以把上述阶层分为八大群体。

1. 工人群体。工人，指具有工人身份，从事工业生产、商业和服务工作，以其工资收入为主要生活来源的体力劳动者，是我国财富创造的主体。该群体包括全民所有制工人、城镇所有制工人、乡镇企业工人、个体经济和私营企业中的雇工、三资企业工人，以及在国有企事业单位、集体企事业单位、私营企业中的临时工、常年季节工。就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来说，工人群体介于干部和农民中间，在改革中的受益情况比较复杂，除了原来从农民中转出来的工人，普遍受益不多。与改革前相比，工人群体的队伍壮大了，但是，在社会上的相对地位下降了。

2. 农民群体。该群体指从事种植业为主，包括养殖业、林业、牧业、渔业的广大农民，是我国最大的社会利益群体，构成社会群体结构的基础。农民是改革最早的受益者，但由于长期的城乡隔离和重工轻农政策的影响，农民的利益地位仍处在底层。

3. 知识分子群体。这个群体比较特殊，与其他群体经常交错，

分化也最为频繁。一般来说，是指直接以自己脑力劳动从事知识的生产与传播，不直接参加生产领域的体力操作，而是以知识，包括技术服务于生产或管理的人员，由从事教育、科技、文化、医疗卫生、艺术等行业的专业技术人员构成；具体来说有教师、工程技术人员、医生、律师、作家、编辑、新闻记者、科学家、社会科学工作者、艺术家等。知识分子群体是一个多序列、多层次、不断发展的群体，也是一个利益关系比较复杂的群体。在社会中，知识分子具有重要的地位，是知识的拥有者和传播者，改革政策的拥护者、评论者和引导者，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发展并出谋划策，是社会进步的中坚力量。

在改革初期，出于对改革可能带来的自由学术气氛的向往和根据自身知识做出的改革是“中国的惟一出路”的判断，知识分子们近乎献身般地支持改革。然而，在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下，知识分子发现，除了已经下海经商不再属于知识分子的那部分人之外，自身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当中。他们已经由过去的高收入阶层，变成了今天的低收入阶层。许多知识分子再也无法“一心只读圣贤书”了，严酷的经济压力使得“为稻粱谋”成了许多知识分子生活和心理失衡的写照，社会对知识分子的评价也因为他们对金钱的崇拜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知识分子对改革政策的态度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表现出对改革热情的下降；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与对改革的冷淡态度形成鲜明对照的是，知识分子对腐败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知识分子群体是社会中影响力巨大和分化最为迅速的群体，他们的取向和态度将对改革产生重要的影响。

4．党政干部群体。该群体指从事党务、政务管理工作的社会成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他们处于重要的地位，在改革开放前处于社会利益群体的高层。改革开放后，一方面他们是改革的决策者和领导者，对改革的发动和推进、改革的具体实施和实际进程，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另一方面，改革也把党政干部的利益变成了调整的对象，对干部人事制度的改革本身就是改革的一项重要



内容，特别是现在的政府机构改革力度相当大，他们也要为改革付出代价，做出某种牺牲，其社会地位的稳定性也因此大为降低。同时，社会上高收入群体的出现严重冲击了该群体的优越感意识，人们对社会地位的评价也从政治地位和权力向经济实力倾斜。党政干部的社会地位出现了下落的趋势，一些人为了重获以前的地位，在权力参与资源配置的情况下，通过非常规手段和非法手段来致富，从而出现了权钱交换、贪污受贿等腐败现象，也使这一群体颇受争议，特别是那些官商结合的部分人员。总体来说，党政干部群体将过渡为公务员群体。

5．企业家群体。本书中的企业家指在国有、集体、“三资”企业、混合型经济企业，以及乡镇企业中担任法人代表的生产、经营主要负责人，而不包括私营企业主，尽管私营企业主更接近典型意义上的拥有完全经营自主权并有明确产权责任的企业家。本小节在此的划分仅仅是出于对各自利益关系界定的方便。这个群体是市场经济中无可替代的骨干力量，是改革中的弄潮儿。该群体具有相当高的社会地位，虽然其经济收入由于所在企业的不同而差别很大，但是如果统计了所有的显性收入、职务灰色收入及职务消费之后，他们是改革中受益较大的一个群体，并已成为社会精英阶层的一部分。

6．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主群体。该群体是改革开放的产物，可以说是改革政策中获益最大的群体。他们大多勇于进取、吃苦耐劳、富于开拓性，并很快在国民经济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基本上形成了“四分天下”的态势。作为经济中最活跃的一个部分，他们的发展非常迅速。一部分私营企业家已经在社会上颇具影响力，其企业也成为国民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

7．离退休人员群体。该群体主要由离休、退休人员组成，国有企业的离退休人员占了大部分。他们原来分属于各个阶层，离退休之后，随着角色的转换，其生活方式、社会地位、经济地位、价值观念趋于一致。对于他们来说，能够安度晚年是最大的心愿。由于近年来物价上涨和国有企业经营状况的持续下滑等原因，离退休人员在货币贬值的同时，被拖欠的养老金日益增加。总体来说，他

们现在成了改革中的利益受损群体，有可能成为贫困阶层。

8. 失业、半失业者群体。该群体是由于企业经营不善而出现的，现在已经成了令人关注的社会群体。这部分失业人口构成了社会无归属群体的主体，是改革深化中必然出现的。但是，由于人员队伍的庞大和突然的涌现，他们也构成了对社会稳定的威胁。他们感觉是改革中的被抛弃者和落伍者，同时也是改革的绝对受损者。由于经济收入的大大缩减，该群体的部分人生活困难，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开支。

此外，社会上还有宗教职业者、自由职业者、流浪者等人员，由于规模较小等原因在本小节不作详细介绍。

关于改革中各个群体的受益程度，一般的评价是（由高到低）：私营企业家、个体劳动者、党政干部、专业技术人员、国有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农民、其他、工人（见表5—1）。从表上可以看出，公众认为，有两部分人是改革的最主要受益者，一部分是从事非国有经济活动的人们，一部分是在社会行政等级序列中占有一定地位或掌握一定权力的人们。引人注目的是，农民和工人成为改革中受益最少的两部分人，这应该引起警惕。直到今天，农民和工人受益最少已经成为现实并滋生出一批低收入群体，“社会弱势群体”一词在近年的频频出现并在“两会”上被多次提及就是对此现象的生动概括与写照。

表5—1　社会主要阶层对改革中受益情况的基本看法（%）

改革受益者	受调查者职业分类							
	工人	农民	机关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	服务人员	街道居民	在校学生
工人	3.65	10.90	2.62	1.80	9.41	3.25	2.89	8.32
农民	6.93	7.12	7.91	6.20	15.19	7.61	10.20	7.92
党政干部	45.89	32.62	24.17	35.12	39.04	35.03	30.51	37.72
专业技术人员	17.26	27.13	22.87	13.58	32.83	22.66	22.52	34.05



续前表

改革受益者	受调查者职业分类							
	工人	农民	机关干部	专业技术人员	个体劳动者及私营企业主	服务人员	街道居民	在校学生
国有企业家	22.75	11.50	19.34	18.38	17.75	15.56	12.99	12.60
私营企业家	46.57	45.49	54.29	54.44	37.54	48.01	52.07	44.25
个体劳动者	39.01	41.37	44.93	45.63	18.72	46.22	50.24	28.93
自由职业者	13.50	15.11	16.98	18.38	14.22	15.72	13.38	18.99
其他	3.39	7.64	5.13	5.54	10.27	5.26	3.85	5.51

资料来源：社会蓝皮书：《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35～3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其中，对受益者的调查选两项。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对利益群体的划分只是暂时的，随着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划分标准将越来越转为以经济收入为主，利益群体的重新分化和组合也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其中，有两个阶层的发展将对今后社会结构产生深远影响是值得注意的。

5.1.2 需要关注的新阶层

1．“白领”阶层。所谓白领，是指一批从事脑力劳动的工薪阶层，主要是专业技术人员、企业管理人员、商业营销人员等。他们一般有良好的教育背景，较为丰厚的收入和较高的职业地位，讲究生活的品位和质量。在中国，白领产生于改革开放后，最早出现在各类三资企业，并且迅速成长起来。目前，白领的来源已经相当广泛，日后的公务员队伍也当归入此类。白领阶层因为他们的工作地位、工作内容和生活观念、生活方式成为改革开放中引人注目的群体，并成为城市中领导潮流的一个阶层。对社会发展而言，他们对未来中国社会利益构架和社会结构有着非常重要的影响，是构筑未来中国中产阶级的骨干力量，对中国社会的稳定意义重大。

2．私营企业主：尚未形成新资产阶级。改革开放之后，私营

企业开始在我国重新出现，1987 年 1 月，私营企业在政策上获准存在，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迅速发展。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之后，呈现出连续高速增长、规模扩大和结构改变的趋势（见表 5—2），增长势头超过国有、集体、外资等经济形式，颇为引人注目。私营经济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力量，自九届人大二次会议做出的修改宪法决议以来，社会各界对于私营企业在经济发展动力与就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持肯定与支持态度。

表 5—2　　中国私营企业发展状况

年份	户数（万）	从业人员（万人）	注册资本总额（亿元）	产值（亿元）
1990	9.8	170	95	122
1991	10.8	184	123	147
1992	13.9	232	221	205
1993	23.8	373	681	422
1994	43.2	648	1 448	1 140
1995	65.5	956	2 622	2 295
1996	81.9	1 171	3 752	3 227
1997	96.1	1 350	5 140	3 923
1998	120.1	1 710	7 198	5 853
1999	150.9	2 022	10 287	7 686
平均增长	35.50%	31.67%	68.29%	49.08%

资料来源：根据张厚文等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00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整理。

1990—1999 年，私营企业的经营规模不断扩大，户均注册资金从 9.68 万元增加到 68.18 万元，增长了 6.04 倍。1999 年，私营企业实现产值 7 686 亿元。考虑到形形色色戴“红帽子”的假集体企业和私营企业的庞大后备军——约 2 700 多万家个体工商户，中国私营企业主人数与注册资本规模将有更大的增长，在国民经济中将占有更加重要的地位。

由于私营企业主拥有资本和以雇佣劳动的方式发展企业，其收入相当高，同时存在对雇佣劳动的剥削，人们开始议论中国是否出现了以私营企业主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应当说，私营企业主群体现在不仅是一支重要的经济力量，同时也是不可忽视的社会政治力



量。但是，从总体上看，该群体并没有形成一个新的阶级。

首先，经济基础不完备，私营企业发展时间很短，其规模还比较小。从发展形态上看，处于公有制经济的强大环境之中和现代经济形式下，其雇佣和剥削方式受到了很大的限制。同时，中国现在存在的是占有生产资料相对不足的剩余劳动者，而并非一批“一无所有”的雇佣劳动者，不具备产生资产阶级的重要条件。从雇佣劳动上看，现阶段并非普遍形式，其形态还不典型，劳资矛盾也不尖锐。

其次，私营企业主的群体意识还不成熟，虽有共同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处境，但由于个人背景、经营行为、企业状况的差异，他们本身的认同感、身份感还不强烈，与原来的社会身份有着不同程度的联系。私营企业主的群体意识还处在幼稚的、自在的、原始的阶段，内部的自组织程度很低，没有区域性和全国性的统一的政治组织，更没有形成一支有组织的政治力量。他们的阶层意识都不太成熟，更不用说独立的阶级意识了。上述特征在社会生活中的表现，就是私营企业主在市场经济中的冒险精神和政治生活中的保险精神相结合的行为。

因此，现阶段私营企业主在我国还没有形成新的资产阶级，他们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企业资产属于个人所有，以经营管理为职业的、处于中间状态和过渡阶段的社会集团，具有双重社会属性，即同时兼有资产所有者和劳动者的身份。但是，由于经济发展中少数人掌握较多的货币资本和长时间内大量剩余劳动力存在的现实，在对私有产权保护日益加强的情况下，并不排除形成新的资产阶级的可能性。然而，私营企业主的转化趋势并非惟一的，只要国家正确引导、管理得当，通过税收、行政和社会舆论的手段，就可以使他们融入社会其他各个阶层，成为公有制经济中的一个特殊群体，而不是一个阶级。

可以断言，社会的分化使简单的社会结构复杂化，使同质的社会不断异化。在新时期，我国利益群体的分化和整合体现出以利益为中心和以市场为导向的特征。在现代社会中，除了能力和机遇，个人也越来越依靠社会和集体的发展。社会分化打破了原有的社会

结构关系，新的社会结构又因流动、重组和整合等因素难以迅速建立起来，社会结构变化异常活跃，其主体就是各种利益群体所代表的各种社会力量的发展和组合过程。密切关注这个重组和整合过程，避免社会阶层分化的失控现象是保持社会稳定的重要前提条件。

5.2 收入分配差距与社会地位的分化

中国历来是一个“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国家，改革开放前实行共同贫穷的“平均主义”，是世界上贫富差距最小的国家之一。改革之后，走出几乎令人窒息的高度意识形态化的政治气氛，中国呈现出生机勃勃的经济气氛。外边的精彩世界、松动的政策极大地激发了中国人追求美好生活的热情和积极性。不过，在收入有了很大提高的同时，收入分配的差距也日益突出，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已经成为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短短 20 多年间，中国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贫富差距高于国际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差距拉大之快为世界少见。据估计，现在全国有亿万富翁近千人，百万富翁 300 万人，与此同时，中国还有近 5 000 万人没有解决温饱，越来越多的人感到了生活的压力、失落与无奈。贫富分化问题成为备受关注的焦点问题，在历次“两会”上屡屡提及。江泽民在中共十六大的报告上指出，要在本世纪头 20 年，集中力量，全面建设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真可谓是“任重而道远”。

5.2.1 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情况

在国际上，通常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两种量模是“基尼系数”和“五等分欧希玛系数”。基尼系数是一个从 0 到 1 之间的数值，它表示 1%的人口所占有的社会总财富的比重。比如基尼系数是 0.5，就表示 1%的人占有 50%的社会财富。基尼系数为 0 表示绝对平等，收入完全平均分配；基尼系数为 1 表示绝对的不平等，



全部收入集中到一个人手中。一般情况下，根据国际上多年的测量数据显示，基尼系数低于0.3为最佳状态，0.3～0.4为正常状态，高于0.4属于差距过大，超过0.6则处于社会动乱的危险期。

我国城镇居民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在1978年为0.16，在全世界几乎是最低的。自从开始实行"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后，以农村出现万元户为开端，中国到现在一共产生了三代富翁：一是改革初期的个体户；二是80年代前、中期下海的知识分子和技术工人；三是1985年价格双轨制后的"下海者"（大部分具有权力关系和背景），90年代的"股份制改造"、"圈地运动"形成的"股票热"、"房地产热"中迅速致富的一批人；现在则是能够与"国有资产流失"挂钩的人士。当然，还包括一批上述人士之外的私营企业家。其中，第三代富翁的出现以及他们非常规的暴富方式给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与此同时，在城镇、农村中都出现了贫困者阶层。自8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开，基尼系数节节攀高（见表5—3）。需要说明的是，由于长期以来形成了二元分割的社会，因而计算中国的基尼系数时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城市居民的基尼系数，二是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三是城乡居民的基尼系数。显然，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会高一些。

表5—3　　个人收入的基尼系数

年份	1978	1987	1990	1994（家庭人均收入）	1994（家庭户均收入）	
城镇居民	0.16	0.2	0.23	0.37	0.377	
年份	1982	1988		1994（家庭人均收入）	1994（家庭户均收入）	
农村居民	0.22	0.34		0.411	0.427	
年份	1979	1988		1994（家庭人均收入）	1994（家庭户均收入）	1996
城乡居民	0.33	0.382		0.434	0.445	0.458

资料来源：根据李强、洪大用、宋时歌：《中国社会各阶层收入差距分析》（《科技导报》，1995（11））和李强：《中国居民收入差距研究与展望》（《新视野》，1998（4））汇编。

从以上数据看，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贫富差距都有大幅度上升，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贫富差距有加速拉大的趋势。在短短十几年时间，我国的城乡居民个人收入基尼系数超过了中等贫富差距的0.3~0.4标准，从一个平均主义盛行的国家转变为超过国际上中等不平等程度的国家，而且差距还在扩大，这是令人忧虑的。上述数据已经超过了美国，美国的基尼系数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近几年，基尼系数出现缓慢攀升态势，1998年为0.456，1999年为0.457，2000年又达到了0.458。①

再来看“五等分欧希玛系数”的情况。该系数就是按收入水平的高低，将人口分为五等分，然后计算各个1/5人口层的收入在全部收入中所占的比例。根据此种办法，计算结果与基尼系数大同小异，但更为直观一些（见表5—4和表5—5）。

表5—4　我国城乡居民家庭按五等分法计算的各人口层占有收入的比例

按家庭年收入从低到高分为五组	各组占有全部收入的比例（%）				
	中国城镇（1994）	中国农村（1994）	中国城乡（1994）	中国城乡（1996）	美国（1990）
最低的1/5	6.04	4.59	4.27	4.06	4.60
次低的1/5	11.16	9.79	9.12	8.63	10.60
中间的1/5	15.77	15.01	14.35	14.14	16.60
次高的1/5	22.57	21.82	22.13	21.77	23.80
最高的1/5	44.46	48.79	50.13	51.40	44.40

资料来源：同表5—3

表5—5　中国城镇居民的贫富差距扩大趋势

年份	最高20%收入户与最低20%收入户年人均收入之比	最低2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	最高2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	最高10%收入户所占总收入的比重	被调查个案数N
1990	4.2倍	9.0%	38.1%	23.6%	1 082
1993	6.9倍	6.3%	43.5%	29.3%	966
1998	9.6倍	5.5%	52.3%	38.4%	2148

资料来源：许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信息产业的分析和预测》，载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① 《经济日报》，2001-08-30。



可以看出，我国的收入差距已经超过了美国1990年的水平，这与基尼系数的结论是一致的。再来看城乡收入差距，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是世界上最高的。按照世界劳工组织发表的资料，绝大多数国家的城乡收入比通常小于1.6，超过2的国家只有寥寥几个，中国则是其一。国际一般的情况，人均GDP水平在800美元～1 000美元阶段，城镇居民收入大体上是农村居民的1.7，而后会渐渐缩小，中国的情况与此相左，并且差距进一步扩大，从1990年的2.2扩大到2001年的2.9（见表5—6）。如果扣除农民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费用，再把城市居民各种福利也计算进来，那么中国的城乡差距实际已经达到了5:1或者是6:1。在三大差距中，城乡差距已经成为中国最大的经济问题，这与三农问题直接相关，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全面小康就无从谈起。

表5—6　　中国城乡居民家庭人均收入　　单位：元

年份	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乡居民收入比
1990	1 510.2	686.3	1:2.2
1995	4 283	1 577.7	1:2.71
2000	6 280	2 253.4	1:2.79
2001	6 859.6	2 366.4	1:2.9

资料来源：《中国经济年鉴》(2002)，776页。

此外，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已是老生常谈，1990年最高收入行业与最低收入行业之收入比为1.72:1，到2000年上升到2.63:1①，考虑到其他的收入来源，差距远远不止这个。北京市统计局的调查显示，2001年全市86个大类行业中，最高工资行业与最低工资行业相差6.6倍，二者间的差距比2000年加大了1.9倍。2000年收入最低的三个行业是农林牧渔业、餐饮服务业、采掘业；收入最高的是科研与技术服务业、金融保险业和房地产业。地区收

① 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45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人差距就不用赘述了。

5.2.2 收入分配中的效率与公平

分析我国收入分配差距变化的情况，可以发现差距的迅速扩大是与 1985 年开始的价格双轨制同时出现的。在权力介入资源配置而且缺乏有效的法律监督的情况下，出现了大批的“官倒”、权钱交换和贪污受贿的腐败者，产生了一批钻体制空子和非法致富的富翁；其后的“股票热”和“房地产热”也是如此，延续至今的国有资产流失就更加令人关注。与此同时，工薪阶层已然成了当今社会贫困的代名词。收入分配差距导致的贫富分化现象已经成为人们对社会不满的一个重要因素。从主观感受方面来看，多数社会成员认为贫富差距已是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在社会调查中 1994 年有将近 72.8%的调查者认为社会贫富差距很严重和比较严重，关注的社会问题是惩治腐败；2000 年调查中，认为收入差距太大不能接受或完全不能接受的比例为 36.5%，一般的占 40.8%，表明人们开始接受市场经济与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但对于其程度却是有所抱怨的；到 2002 年，领导干部对 2002 年存在的问题的判断中，收入差距问题列在第一位，与之密切相关的失业问题列在第二位；在不同社会阶层城市市民对城市社会问题的认定方面，收入差距拉大问题列在第三位，与之密不可分的失业问题列在第一位。①

人们并非不能接受市场经济中按劳分配和按资分配导致的收入分配差距的出现，人们不满和愤慨很大程度上是针对不正当致富现象的。老百姓最为不满的分配现象主要是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各种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挥霍公款、变相侵吞国有资产的非法致富行为；二是钻体制的空子，通过权钱交易获取巨额价差、利差、汇差和租金而暴富的现象；三是收入序列的混乱与大众社会价值观发生激烈冲突，即所谓“该富的没富，富了不该富的”的问

① 《中国青年报》，1994-11-22；社会蓝皮书：《200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和社会蓝皮书：《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题，典型的民谣是“搞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等等；四是“大锅饭”的衍生弊病，即一部分人享受着体制内的国家福利，赚着体制外的个人收入。

至此，必然要涉及社会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我国一直强调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发展原则将随着贫富差距日益加大受到重大的挑战。高收入的20%人口已经占据了全部收入的一半还多，低收入的20%人口却只有区区4%左右，差距太大。公平有三种含义：机会公平、条件公平和结果公平。以前，我们片面强调结果公平，“干多干少、干好干坏一个样”，现在当然不可能再走老路，应该转为强调以机会公平和条件公平为主，兼顾结果公平。然而，我国现在公平的最大问题恰恰出现在机会和条件的不公平。权力参与资源配置的现状使社会难以出现一个公平的竞争环境。此外，现阶段对许多体制内的人来说，社会地位的决定，往往并非取决于个人之间的公平竞争关系，而是行业、部门、单位的性质，如金融、房地产、电信等行业人们趋之若鹜，行业内的近亲繁殖现象进一步加剧了社会的不公平。

5.2.3 收入分配的层化趋势

中国收入分配差距的另外一个特征是高收入阶层增长快，低收入阶层增长缓慢，中间阶层基本变化不大而且略有下降，高低收入呈现进一步层化的趋势。不同收入阶层形成金字塔形分布，年均收入接近和超过2万元的占总人口的3.5%左右，而一半以上人口的年均收入在2 000元以下。这与橄榄形的健康社会是背道而驰的。

在城乡居民中已经形成了一个高收入阶层，收入大大高于一般居民，虽然具体收入难以准确测算，大致估计为一般居民收入的数倍至数十倍。目前，高收入阶层主要由以下人员构成：部分私营企业主和个体户；部分证券经营中的炒股者；出场费很高的歌星、影星、舞星、职业节目主持人及其经纪人；部分新办流通性公司的负责人；部分经营者和承包者；部分“三资”企业中的中方管理人

员；部分金融、房地产、传媒业从业人员；部分交易经纪人；部分承包科技开发的科技人员；部分紧缺行业的从业人员（如律师、美容师、高级厨师）；部分利用体制漏洞，通过以权谋私、贪污受贿、偷税漏税、走私欺诈、变相侵吞公有资产的非法致富者；部分从事第二职业者；再就业的部分离退休人员。高收入阶层无论在城乡，都集中于经济发达地区。就重要的金融资产的分布而言，差距更大。据统计，1994 年中国城镇居民金融资产总额达到 18 547 亿元，其中占居民家庭总户数的富裕、富豪型家庭（富豪型家庭占家庭总户数 1%）占据了 30.2%，而占全部城镇家庭总户数 38% 的贫困、温饱型家庭却只有 11.9%。① 国家统计局调查表明，在城市，1999 年 6 月底，拥有金融资产量最多的 20% 城市家庭，拥有的金融资产量占全部城市居民的 55.4%，户均拥有 146 615 元，而最低 20% 家庭仅拥有全部金融资产的 1.5%，户均为 4 298 元，高低之比高达 34:1。

与高收入层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低收入阶层在逐渐分化的基础上趋于稳定。2001 年 10 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农村扶贫开发》公布的农村贫困人口为 3 000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3%，其划分标准是年人均纯收入低于 625 元；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调查研究，最低 20% 收入阶层的人均消费支出是划分低收入群体的适宜标准。按照这个标准，2001 年农村低收入群体为人均纯收入在 872 万元以下的人口，有 9 029 万人，占农村人口的 9.8%，他们的收入仅相当于农村平均收入的 30%，其中实物性收入占一半左右，现金收入只有 352 元。这些低收入者主要集中于中、西部地区，占到 86.2%，其中西部地区达 5 535 万人，占 61.3%；② 特别在西部，有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除农村外，城镇中的贫困问题近年来也日益突出，出现了层化现象。特别是一些大

① 《中国青年报》，1994－11－22；社会蓝皮书：《2002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和社会蓝皮书：《2003 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

② 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低收入群体保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载《统计研究》，2002（12）。

城市，作为资本、财富的聚集地，贫富反差更为明显。亚洲开发银行进行的“中国城市贫困问题”的研究表明，1999年全国的城市低收入贫困人口为1 480万人，但是他们的人均月收入约为社会人均水平的30%左右，与国际公认的50%～60%相比，有很大的差距。调查表明，他们的收入仅够糊口，买最便宜的菜，不常吃肉，极少买新衣服，有病不敢去医院，负担不起孩子的学费等，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得不到满足，更远远谈不上生活质量和做人的尊严。根据这一标准2001年人均可支配收入在2 634元以下的城镇低收入群体约有2 510万人，占城镇总人口的8.1%[1]，只能满足最基本的生存需求（见表5—7）。

表5—7　　五大城市*贫困家庭的收入状况

类别	上海	武汉	天津	兰州	重庆
调查时间	1998.12	1999.7	1999.7	1999.10	1999.10
①贫困家庭人均月收入	243	108	135	114	139
②当地社会人均月收入	731	521	643	427	486
比例：①/②	33%	21%	21%	27%	29%

* 上海、天津、武汉数据为1999年最低生活保障标准调整以前，按30%调整幅度计算，调整后上海达到了40%左右，武汉和天津则在27%上下。

资料来源：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193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在贫困人口中，主要是下岗职工、失业人员、无业人员、困难企业职工、因健康状况差或残疾不能工作者、无亲友抚养或赡养又无储蓄的人员、多子女家庭、重灾重病户家庭等。困难企业很多是经济效益不好的国有、集体企业，分布在纺织、煤炭、森工、轻工、军工行业；特别是像河南、东北这样的老工业基地，低收入群体有分布普遍、相对集中和增长较快的趋势，同时，他们的困难程

① 国家统计局宏观经济分析课题组：《低收入群体保护：一个值得关注的现实问题》，载《统计研究》，2002（12）。



度在增加，收入趋于减少，从数量动态上看，城镇居民中的贫困人口将进一步扩大。考虑到近年来下岗与失业情况的增多，有人预测城镇贫困人口将扩大到10%左右。

贫困人口的另外一个来源是进入城市中的农村人口。对于流入城市的农民而言，除了一些工厂主、包工头、个体户之外，大部分人从事的是脏、累、差的工作，还有很多无固定职业者或无职业的盲流，有些以拣破烂儿和乞讨为生。他们大都收入较低，几乎没有社会保障，大部分居住在城乡结合部，肮脏破旧、居住拥挤是典型特色，如北京的“浙江村”、“新疆村”、“河南村”等，成为都市中的村庄。在收入和社会地位上，他们处于城市的底层，大部分人除去生活开销之外，所剩无几，只是在城市讨个生活。

值得注意的是，在贫富差距扩大的过程中，中等收入阶层增长并不快，甚至受到了侵蚀。这种“两头大，中间小”的现象不利于我国中产阶级的形成。只有形成了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以庞大的中产阶级为基础的社会结构才是稳定的。

事实上，现阶段我国利益分化不均有可能继续发展。如果在改革中期出现少数利益群体占据大部分改革收益，面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问题，那么利益分化不公平将会恶性膨胀起来，在中央和地方之间，中西部和东部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之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并形成四个受益阶层：（1）特殊受益阶层，即新富阶层和暴富阶层，包括私营企业主、拥有总体性资本的精英集团、企业承包人、部分暴富的干部、涉外企业经营管理层及各类明星、经纪人等；（2）普通受益阶层，构成较为复杂，农民、工人、知识分子、干部等都有很大一部分人成为普通受益者，他们是改革最主要的社会基础；（3）相对被剥夺阶层，包括农民和国有企业的下岗、失业职工；（4）绝对被剥夺阶层，指的是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从趋势上看，工人、农民和离退休人员、工薪收入者在改革中期的利益将进一步受损，而知识分子则会进入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去发财致富。如此，中国将出现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其他社会成员无法紧紧跟上，形成一种垄断的、有利少部分人致富的环境，其



他人处于致富无门或利益受损的境地。更进一步的问题是，中国的部分高收入者并未为社会做出与其收入相匹配的贡献，倒是相当多的低收入者为社会做出了重大的贡献。如此一来，部分的中等收入者将向低收入者群体靠拢，我国两极分化将不可避免，社会将会出现重大的危机。

贫富差距的扩大，导致了人们被剥夺感的增强，引发了尖锐的社会矛盾。虽然说我国现在还没有变成两极分化的国家，但却存在很强的演变趋势，应当引起高度警惕。否则，中国广大的农民和工人，包括参加过国有资产原始积累的两代人，无法容忍严重的两极分化、腐败和对国有资产的瓜分。如果不能限制“官商结合”的既得利益，保障工农的基本权益，因少数人暴富而导致大多数人利益受损，社会危机就在所难免，出现经济的绝对下降和失业问题的总爆发，改革的成本将无限超过改革收益，从而使改革在中期遭受重大的挫折和反复。

即便是在比较典型的市场经济国家，再分配的调节力量也是很大的。例如，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就对家庭收入的再分配起到重要的调节作用。1994—1995年，英国全部家庭的年收入按五等分划分，最上层20%家庭的平均初始年收入与最下层20%家庭相比，二者的收入差距是19.8倍（以下层为1），但在加上家庭的货币福利收入以后，二者的税前毛收入的收入差距缩小到6.2倍，在减去收入税、国家保险税和地方税以后，二者的可支配收入的收入差距进一步缩小到5.4倍，而在减去间接税以后，虽然仍是富有的上层家庭纳税多，但二者的税后收入的收入差距又扩大到6.4倍，最后在加上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各种实物津贴和补助以后，二者的最终收入差距为3.7倍（见表5—8）。

为此，我们必须强调收入的再分配调整，初始分配继续坚持主要由市场调节，再分配要强化政府调节，采取税收与转移支付等形式，兼顾“效率与公平”。需要强调的，在初始分配和再分配都必须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必须靠法律和制度来建立一个长期的、稳定的分配规则与秩序，保持社会的稳定。

表 5—8　　　1994—1995 年英国的税收和福利政策
对收入再分配的影响　　　单位：英镑/年

家庭收入	全部平均	上层 20%	中上层 20%	中间层 20%	中下层 20%	下层 20%
初始收入	16 720	40 330	22 250	13 380	5 600	2 024
+ 货币福利	3 080	1 180	1 950	3 160	4 480	4 676
税前毛收入	19 800	41 510	24 200	16 540	10 080	6 700
− 收入、地方税	4 050	10 140	5 050	2 930	1 320	840
可支配收入	15 750	31 370	19 150	13 610	8 760	5.860
− 间接税	3 130	4 800	3 960	3 090	2 060	1 740
税后收入	12 620	26 570	15 190	10 520	6 700	4 120
+ 各种实物福利	2 950	2 070	2 780	3 170	3 140	3 600
最终收入	15 570	28 640	17 970	13 690	9 840	7 720

注：实物福利中包括教育、医疗、住房、交通等方面的福利待遇和津贴以及中小学校学生用餐和福利牛奶，其中教育和医疗平均占实物福利的 95%。最终收入 = 初始收入 + 货币福利 − 收入税、地方税 − 间接税 + 各种实物补贴。

5.3　市场法则的建立与道德范式的危机

中国是一个有着深厚道德基础的国家，举世公认的礼仪之邦。道德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最为重要、成熟的部分。儒家强调的仁爱精神和伦理精神在组织社会、笼络人心方面的功力是如此强大，以至社会可以主要不靠武力、不靠宗教，乃至不靠法律而维持两千年一以贯之的“大一统”局面。以“德”治天下，是中国文化独有的智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大力进行精神文明建设，使人们在素质上得到很大的提升。所以，重视道德潜移默化与法律规范的作用，是能否迅速树立新价值观，建设文明社会的重要基石。

改革开放以来，市场经济所奉行的价值利润原则，极大地刺激了人们过去被压抑的私欲，对金钱和物质生活的追求就像打开闸门的水一样不可阻挡。在拜金主义、享乐主义、个人主义到处蔓延的时代，人们似乎成了“惟利是图”的经济动物。为了金钱，人们可



以不择手段，变得冷淡无情，价值取向是典型的实用主义和功利主义，过去为人称道的奉献精神、集体主义精神，道德上的自律和高尚人格的追求，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显得如此苍白无力甚至成为笑柄。社会上充斥着权钱交易、损公肥私、贪污受贿、价格垄断、哄抬物价、投机取巧、假冒伪劣、坑蒙拐骗、偷税漏税、经济泡沫等非常规甚至非法的经济现象，甚至于见死不救已经屡见不鲜。过度市场化意识的“极端个人主义”成了洪水猛兽，道德在社会转型时期也呈现出一种焦躁、动荡、无序的特征，道德水准的暂时下滑在所难免，人们发出了“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的感叹。

毋庸讳言，市场经济是一种逐利的竞争性经济，虽然不可能遵守中国古代所倡导的“舍利取义”的原则，但是同样必须遵循法律、平等、自由、信用、质量等道德规范。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和信用经济，这才是世界上的共识和共同准则。每一种经济体制都有相应的道德观念和法制基础，综合为经济伦理，包含的内容主要有市场交换中的道德秩序、分配法则和占主导的价值体系，在市场经济中表现为对他人生命、财产、自由权利的尊重。职业道德和经济信用属于经济伦理的第一层次，构成了市场经济运作的基石和市场有序化的保证。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居于主导地位的经济体制，市场经济与道德规范并非是冲突，而是统一的。在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由于市场经济发展的不完善，其负面效应表现明显，例如，经济行为不受社会道德和法律规范的制约，纯粹的金钱和物质利益追求，经济生活的短期行为和混乱无序及其衍生的恶性商业价值和游戏规则。这其中最大的表现就是经济伦理规范的缺乏，道德范式出现了严重的危机。因此，有识之士大声疾呼，中国出现了道德危机和信仰危机，文化道德建设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

5.3.1 职业道德的缺乏和行业风气的败坏

所谓职业，从本质上看，是社会职能专业化和人的角色社会化的统一。由于职业所固有的社会性质和地位，决定了每种职业在道德上有自己的特殊要求，形成了本行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规范，表

现为对本职业责、权、利的正确处理。进入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各行各业都出现了职业道德危机，无论商业事务、求职、调动，还是上学、求医、利益分配等，凡是需要与人打交道的地方，几乎所有的中国公民都不同程度地品尝了行业不正之风的苦果。许多人获取财富不是依靠履行职业责任，而是依仗职权、破坏其职业的基本道德准则来实现的。如社会上出现了“电老虎”、“房老虎”的称谓，看病动手术要给红包，小孩上学要送礼，盖章批条要行贿等。行业不正之风已经存在了很长时间，公众无不切齿痛恨却又无可奈何，其主要表现是：公款吃喝；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乱收费；利用特权索要财物；乱罚款；乱摊派；党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无偿占用下属单位和企业的钱物。这些“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腐败和不当行为严重扰乱了社会正常秩序，败坏了社会风气。

调查资料显示，1993、1994、1995年分别有87.1%、93.3%和89.6%的人对社会风气表示强烈的不满。[①] 1996年全国的工商企业、行政单位“一窝蜂”地推出“承诺制”，许多承诺内容其实只是将外在的强制性内容纳入承诺范围，如反腐倡廉、不乱收费、不管卡要等；有些本就是分内之事，就像母鸡下蛋保证要有蛋黄和蛋白一样的内容，如水质和燃气值指标、不销售伪劣商品、不短斤缺两等。本是商业或社会行为应有之义，却要作为“承诺”的内容推出，正好可以作为中国社会经济伦理畸变的有力佐证。

5.3.2 经济信用的失常状态

经济信用和职业道德一样，是市场经济的基石，也是任何社会经济实体生存和发展必不可少的一项道德资本，其重要性可概括为“信用就是金钱”[②]。中国传统上也非常强调信用是个人品质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并有“人无信不立”、“诚信乃经商之本”等警句。

---

① 《中华工商时报》，1996-03-15。

②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

然而，到了20世纪80年代后期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出现了严重的经济信用失常现象。一是经济合同失效，典型的表现是中国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或服务费的现象非常严重（俗称“三角债”），导致经济信用严重梗阻，社会经济无法正常运行。以至于必须由总理办公会议来过问。即便如此，拖欠问题不仅没有得到解决，反而陷入“剪不断，理还乱”的困难境地，且还在发展。根据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1994年的“三角债”为6 314亿元，比开始清理时的1991年多出1 600亿元；1995年上半年，拖欠情况有增无减，到5月末已经超过7 000亿元[①]，严重影响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乃至于需要专门在总理办公会上专题研究。二是假冒伪劣商品越来越多，充斥全国各个市场，绝大多数消费者都受过假冒伪劣商品的侵害，甚至出现了假药、假酒、伪劣建材、假种子、假化肥等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健康和农民利益的恶性案件。由于中国市场自我调节功能较弱，市场准入制度很不严格，制售假冒伪劣商品的人，获得成功的几率比失败的几率要大得多，高额利润使不少人趋之若骛、铤而走险。用“发如韭，割复生；头如鸡，割复鸣”来形容当今中国的假冒伪劣商品和地下工厂最贴切不过了，正是“有300%的利润，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绞首的危险”[②]。泛滥成灾的假冒伪劣商品，严重破坏了中国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导致市场失效，其直接表现就是产品质量的下降和消费者权益的严重受损。中国的产品质量抽样合格率1992年为73.3%，1993年为70.4%，1994年为69.8%，1995年第一季度更下降为65.9%，到2002年第三季度中国产品抽样合格率也仍然只有75.4%。在国际市场上，我国产品质量、品种、档次缺乏竞争力，质量总体水平比发达国家落后10年～15年。

中国近年来出现的严重经济信用失常现象，从表面上看是由于体制性、政策性原因和历史性原因造成的，如企业自有资金缺乏、

① 《金融早报》，1995-12-20。

② 卡尔·马克思：《资本论》，1版，第1卷，82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

宏观调控的波动性、信用约束软化、金融机构的不良信贷等，但是其深层原因则是关系到一个民族的经济伦理观念劣变问题。大量事实表明，中国目前在经济交往中发生的硬性违约，不完全是企业生产经营不景气或自有资金缺乏而造成的，许多经济主体从成立之日开始就准备设置陷阱，利用欺诈手段来骗取财物，根本就没有想到日后承担义务、履行合同的问题。如湖南岳阳荣家湾一时就有“骗子湾”的“美誉”。商业欺诈行为在中国广泛存在的原因，在于当代中国信用观念的缺乏：既缺乏传统道德范畴的“信用”，又缺乏现代法律意义上的契约意识。在管理和监督不力，法律建设未健全的情况下，个人利益的肆意伸张导致不少人把坑蒙拐骗当作市场经济的交易谋略，给经济建设带来了严重的混乱和重大的损失，甚至直到今天在中国许多交易还必须用现金来进行。

在经济信用失常和大量经济行为失范现象的背后，人们往往能够看到“地方保护主义”的影子，并已经成为“打假”的严重阻力。有些地方处于对本地利益的狭隘认识，对辖区内的制假、售假现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打假采取敷衍、刁难、阻挠的行动，无异于给制假、售假分子以鼓励。

与经济信用的失常同时存在的是中国的商业道德危机。在现实中，虽然许多经营者期待诚信、公正、合乎人情的商业伦理关系，但利益和现实功利的驱动使大家往往屈从于违反道德价值的现实。在一个调查中，企业经营者认为应该坚持的前几位原则是：诚实信用、自信自强、尊重和信任他人、不断创新，而实际奉行的原则却是：随机应变、稳定发展、只重视效益与利润。相当一部分的经营者对非道德行为采取高度容忍的态度，或持道德中立立场。企业对商业伦理采取了矛盾的双重标准：对于非道德经营行为的批评，多着眼于指责他人或归咎于社会环境，是一种他律规则；在自律方面则宽以待己，拒绝为自身的不道德行为承担道德责任。最常听到的说法就是“社会风气就是这样，没有办法，否则要吃亏”。特别是在维护自身利益时，企业对于非道德行为不仅接受，经常还推波助澜。



5.3.3 道德范式的危机

中国陷入了一个道德范式的危机。表面上人人都对社会风气的败坏痛恨之至，但是经常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在批判“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的格言的同时，人们同样把“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的传统警句置之脑后，完全罔顾市场经济是有序的规范化经济这一历史事实。社会风气的败坏使“平等—公平”期望失去之后，人们的社会责任感和信任感就没有了，更遑论是非感。追求效率、功利和成功似乎成为人生的全部意义，使得人们急功近利、斤斤计较。我们熟悉的是如何面对贫困和苦难，却没有应付财富和富裕的经验。于是，在贫困大量存在的同时，出现了一群被形容为“穷得只剩下了钱”的人，外表富丽堂皇，内心却空虚寂寞，成为现代的行尸走肉和精神乞丐。中国人出现了普遍的精神危机和信仰危机，表现为认同丧失、没有信仰、理想冲突的道德危机。正如美国文学家马修·阿诺德所说：

> 他们徘徊在两个世界之间，
> 一个世界已经死亡，
> 而另一个则无力诞生。

无情的事实告诉我们，商品经济的发展并未自发地带来一套崭新的价值体系和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据社会调查显示，超过80%的人认为“如今生活水平提高了，道德水平反而下降了”[①]。今天的道德生活，呈现出一派浑然无序、无规则、非理性的反文明状态，其集中表现就是道德危机。

1. 道德评价失范，道德准则处于真空期。道德评价即道德主体对自身行为的合理性、正义性、崇高性的理解，在一个道德价值整合度较高的社会文化环境中，人们对荣辱善恶、洁污美丑有约定

① 郑杭生等：《转型中的中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转型》，274页，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

俗成的判断和评价。而现今中国在传统（主要指儒家伦理及其所代表的道德）基本消逝，新规范（指共产主义道德和社会主义道德）名存实亡，在荒凉的道德殿堂的废墟上并无新建筑的应运而生，无论是社会公德方面还是职业道德领域。我们处于道德转型的过渡时代，人们受到双重标准或多元标准的影响，似乎无论哪一种标准都可以有一定的“合法性”，同时在其背后又都可以找到反向标准，同样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在道德评价上不再有一个适合于一切的恒定的标准，变成模棱两可，常常陷入自相矛盾的窘境。

2. 既无是非感也无耻辱感的道德心态，各种非道德主义泛滥。非道德主义指反对任何道德约束，主张放任自流，用虚无主义来对待社会提倡的道德理想和行为规范的行为取向，其实质是极端个人主义和颓废主义的结合体。在伦理精神发生历史性嬗变的过程中，中国人的传统道德约束相对松弛，各种社会越轨和失范现象时有发生。国人虽然向来缺乏自律精神，耻辱感却相当强烈，是世界上最爱“面子”的民族。不幸的是，到了今天，中国人非但没有形成为商品经济所需要的是非感和自律精神，反而连传统的耻辱感心理也淡化了，整个社会给人的印象有时是无耻之至。请客送礼、行贿受贿成了普遍性的行为模式，崇高感、卑琐感、义愤感、悲壮感在现在社会中已经变得陌生了。任何一种选择，似乎都可以获得一种价值观的文化支援，受到一种价值标准的肯定和赞扬；同时又会受到另一种价值标准的否定和批评，这个价值取向呈现一种紊乱的状态。人们的敬业精神和工作质量无法得到保证，各种社会工作低效化。

3. 社会道德控制机制弱化。一个社会要形成稳定的道德秩序，创造良好的社会风尚，保证精神文明的健康发展，必须建立高能有效的道德控制机制，一是要有强有力的社会舆论监督，二要有每个社会成员的“良知自律”。道德控制的主要手段是通过道德评价和舆论监督来形成一种“道德法庭”的约束和规范。然而，面临道德价值观念上的新旧交替，价值标准双重或者多元的时代，缺乏统一的权威性的道德理想，必然造成社会舆论监督的混乱和道德评价的

淡化。人们现在全都变得非常识趣，只同别人谈论风花雪月、生财之道、真假美丑，闭口不提善恶、好坏与是非。于是，“有口皆碑”的殊荣、“千夫所指”的耻辱成了久远的历史故事。团体内部、家庭内部、朋友之间的道德劝戒和道德批评成为罕见的举动，对于报刊影视中偶尔出现的道德楷模宣传，人们反应冷淡。舆论既已不存，法庭安在？做了牺牲与奉献，可能得不到社会赞美；做了有欠道德之事，也受不到社会谴责，良心一样不会自责，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道德困境。

4. 萎缩并扭曲的道德教育。道德品质是后天培养的结果，道德教育对人形成良好的道德人格有着关键的作用，其最主要的途径就是学校和家庭教育。现在普遍性的问题是，道德教育的内容往往缺乏一致性和相对稳定性，有时出现把相互对立的东西一起向受教育者灌输的现象。在学校中，由于德育课程内容陈旧或者同实际的社会赏罚方向不合辙而信从者少，在宣扬共产主义理想和集体主义精神的同时又把斤斤计较的市侩习气带给了学生；在家庭中，父母在培养独立、自强性格的同时，又把自私自利、不吃亏的豺狼式行为准则教给了子女。道德教育的理想性和现实生活中非道德性之间的巨大反差，社会不良风气的影响，使道德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甚至助长受教育者的逆反心理，严重降低了道德教育的水准和影响力。现代社会所需要的勤劳进取、宽容善良，既具有独立创造气质又富于合作精神的健康现代人格得不到鼓励，而胡作非为、损人利己、投机取巧、反文化反科学的痞子式人格因其在无规则状态下具有强得多的生存“竞争力”，反而被普遍效法。

5.3.4　素质建设的危机

上述种种危机，归根到底是人的素质的危机，是中国文化建设的危机，文化和道德建设的落后将成为现代化建设的最大障碍，而文化和道德的重构才是社会转型的核心内容。在现代化过程中，人的现代化是根本。一个强大、自尊和优秀的民族，肯定不单纯是经济强盛，而且必定有着深厚的文化根基和高度的文明素养。经济发

展必须有一种人文精神作为支柱和动力，这种人文精神对经济发展起规范和推动的作用。否则，追求财富的欲望最后必然沦为纯利欲的冲动，导致人们动物性的膨胀、人性的泯灭、社会秩序的混乱和财富的浪费。文化系统所提供的，是维系社会共同体的文化和价值认同、礼仪教化、道德良心等，同时决定着社会发展的方向和人生的意义。任何竞争归根结底是人的竞争，我们或许可以用几十年的时间使中国经济振兴，但是恢复已破坏的社会公德和基础文明，提升整个民族的整体素质，再现文明古国和文化大国雄风的文化复兴则需要几代人坚持不懈的努力。

在经济伦理沦落和道德失范的过程中，经济学者和政府的责任同样不可推脱。在经济学者对经济学和人文思想的介绍中，在政府的宣传中，对市场经济的基本经济假设如个人私有制、自由竞争、个人均是自私自利的经济人等作了充分的介绍，却没有充分认识到介绍其中的社会道德规范和法律约束的重要性，在一定程度上使人们把市场经济片面理解为欲望经济，片面地强调经济决定论和物质决定论，从而造成了认识和行为上的严重偏差。对于政府来说，应该改变大至全国，小至市、县，均以大集团公司的董事会面目出现来大搞经济建设的现状，让官员从“权力分配资源”中走出来。政府的干预手段，要达到以下三个目的：“社会需要”与满足社会需要、伸张正义与公平和道德教化；干预的限度是不能损害社会的效率。政府要以德治国，求义不求利。因此，政府倡导和工作的重点是要为社会建立一个良好和公平的竞争环境，目标是道德、行为规范和法律建设，而不是倡导致富，追逐金钱利益，以至各级政府成了追逐自身利益的经济人，各级官员成了经济指标的狩猎者。一个有效率的社会，应该使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政府的任务就是创造这样的条件，并保证每个人的努力不损害他人和整个社会的利益，而不应谈论自身的利益。

建设市场经济并非如发展经济那么简单，国家的发展更是经济增长，文化、政治民主和科技水平提高和自然生态平衡等的综合体现。在市场经济的后面，是相应的组织制度、法制建设和道德文化

基础，这才是整个社会进步的核心所在。世界先进国家，不在于它们没有危机、弊端、阴暗面，而在于它们有制约和消除这些危机、弊端和阴暗面的先进机制，其根基就是高素质的国民。“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在我国连遵纪守法、讲究公德、清洁卫生、文明礼貌等基础文明都尚待建设的时候，真正的发展就任重道远。一位英国学者曾经说过：“发展并非只从商品开始；它是从人民以及他们的教育、组织与纪律开始。……任何国家只要具有高度教育、组织与纪律，不管遭到怎样的破坏，都能创造出经济奇迹来。”市场经济是一个有道德的规范化经济，除了法制等制度建设之外，经济伦理的重建也非常重要。包括经营哲学、行为准则、人格追求等内容的伦理规范，将给人们带来终极关怀，使浮躁漂荡的人心有所归依。对于一个国家来说，这是一种根本意义上的建设。

5.4　经济发展、体制变革下的利益调整与社会稳定

社会转型时期，我们将遇到多次考验，这些考验均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与调整有关，并引起社会整合的不平衡，从而导致社会问题的出现和激化。如果处置不当，则有可能引起社会危机，社会稳定将遭到重大破坏，改革将付出重大的成本并有可能出现反复。社会阶层分化之后，社会的弹性在增强，同时，张力也在积蓄，原来联动性很强的特征虽然不复存在，但由于社会问题在转型时期的集中出现，孕育着各种危机，绝对不能掉以轻心。

由于中国转型期所内在的复杂性，以及经济改革超前而社会与政治改革滞后的实际条件，在改革中期可能会出现“利益分化与整合的不平衡”，从而使经济增长面临日益不稳定的外部环境，这是改革中期的重大隐患。

从社会结构的总体上说，按照各种影响社会走势的社会力量来区分，社会可以分为国家、中间组织、民众三个基本结构因子。此



处的国家，特指国家机构，是具有明显自主性的实体，有着独立目标和利益的社会行动者。中间组织是指身在民间（或者处于国家机构之外），在公共领域中起到领导、整合、协调、仲裁等社会作用的力量，其领导人往往是民间精英。民众则是构成社会成员大多数的普通老百姓。改革前的中国社会，是一个结构分化程度很低的总体性社会，其结构是“国家—民众”的二层结构，缺少中间缓冲的民间精英群体，具有僵化和联动的特征。改革之后，以体制外的资源出现为基础，中国社会的中间层开始重新出现，开始向形成“国家—中间组织—民众”的正常结构方向转变。目前我国的社会精英集团有私营企业家（包括部分国有企业家，特别是新经济体制中的企业家）、知识分子集团、社区取向日益明显和离心力越来越大的地方行政精英集团。对中国的改革而言，理性的知识分子、明智的行政官员和真正的企业家，是促进改革的关键力量。

5.4.1 中产阶级和中间组织的缺乏

对于社会的稳定而言，多元参与决策机制是重要条件，即社会各阶层均有反映自己意见的渠道。社会中间层由于处于中间地位，易于协调上下之间的关系，既承上启下，同时又是民众与国家之间的重要缓冲地带，因此，中间层参与决策往往是多元参与的核心问题。对于一个社会而言，形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才能有利于稳定，也就是中产阶级占人口多数的结构。前面已经提到，虽然中国已经有一部分的私营企业主和“白领阶层”，但从收入分配中可以看出，中国的高收入层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重过大，不仅侵占了低收入层的份额，而且侵占了中等收入层的份额，形成了一个中层比较小，中下层比较大的类似马鞍形的结构。因此，中国的中产阶层还未成气候。另外值得注意的是，作为以前社会的中间阶层的城市居民，在改革中也受到了威胁，大量的失业和下岗工人就是例证。中间阶层的形成需要一些基本的条件，与经济结构、职业结构和教育结构均有关系。中国今后所面对的，可能是中产阶层的发展和定型过程，也有可能与拉丁美洲的情况相似，是两极分化的过程。

就现代社会中对社会稳定具有重要意义的中间组织而言，其建设同样大大滞后。中间组织即社会中间层，在我国泛指党政组织以外的社会组织，包括社团、社会专业组织及各类非政府组织，其共同特征是民间化。社团工会、共青团、妇联、各类行业协会、学术团体，具有非盈利的特点；专业组织包括新型的企业组织、市场组织和为商品经济提供服务、保障的组织。改革后，我国出现了不少带有一定现代意义的社团组织，社会生活的自组织性有所增强。但是，此类社团组织的共同特点是官办色彩强烈和盈利倾向明显，而缺乏现代社团组织至少具有的三个基本功能：协调个人和国家的关系；协调个人和市场的关系；充当利益表达的工具。从其他国家的经验来看，中间组织对社会的稳定和持续发展具有关键的作用，是人们相互之间沟通思想、表达意志，是国家和个人之间重要的沟通渠道和缓冲地带，是促成社会生活有序、高效进行的有力工具。在我国，民间社团的缺乏或者虽然存在但不能发挥社会生活中应有的作用，使得一些在市场经济制度构架基础上形成的新的冲突和矛盾缺乏应有的解决机制。

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大量的反倾销指控已经让广大厂商痛感行业协会的缺位所导致的被动局面，加快中间组织特别是各类行业协会的建设已经迫在眉睫，否则，单纯以政府出面的传统方式难以与国际接轨。

5.4.2 国家机器的日渐钝化

中国现在的转型由原来国家包办一切的社会开始，因此，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使得国家的行政力量在经济发展和转型中具有不可缺少的作用，特别是利益的分化和重新调整分配的过程，国家更是不可缺位。目前，一个令人担忧的趋势是国家由于财权和事权的下降，国家的自主性在降低，国家机器日渐钝化。对于国家而言，具体上是由各级代理人即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官员构成的，其意志和政策必须依靠它的各级官员的行动才能化为现实。然而，"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对上级制度安排的"层层截流"、"曲解规则"、"补充

文件”、“改头换面”等早就成了公开的现象。

各个经济部门和各级政府日益追求自身的利益，加上官员的腐败行为，使得国家在政策制定上明显地存在有利于富人的倾向。在实际生活中，国家越来越多地表现出作为自己独特利益或者作为垄断集团的特殊利益的代表在活动。同时，政府行为的市场化和企业化，使政府的功能发生畸变，导致功能的失效、社会生活的无序、公共事业的衰败和政府超越性的降低。所有这些，使国家日益丧失作为全社会代表者的角色，其在公众心目中的“社会公平”象征意义也岌岌可危。新时期新情况，对国家处理各种公共事务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政府必须在“有所为有所不为”准则中把握好范围与专业的尺度，恪守公开、公正与公平的原则，否则，将很难取信于民，也难以适应经济发展情况变化的需要。

5.4.3 总体性资本和垄断集团的出现

在分析中国民间精英集团的时候，不容忽视的部分是一个总体性资本的出现。所谓总体性资本是指改革后在中国出现的一个掌握文化资本、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的精英集团，即在国家政权层面上进行的总体性血缘资本代际交换，强化了不同资本的可转换性；其典型表现就是“不落空现象”，换言之，由于与权力阶层的紧密联系，在社会每一次资本转换和资源占有的风潮中，他们都成了利益获得者。20 世纪 70 年代末的高考、80 年代初的出国、80 年代中期的“官倒”、80 年代末的第三梯队、90 年代初的下海、90 年代中期的买文凭、目前的“国退民进国有”导致的国有资产私有化浪潮等成为总体性资本积累的重要环节。由于善于从体制和市场两个领域中动员和吸纳资源，总体性资本在短期内迅速聚敛了巨额的财富，从而对社会资源形成了可观的垄断，掌握了部分经济生活的命脉。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同时占有政治、经济和权力资源，加上一部分高级知识分子特别是经济学者的加盟，总体性精英集团虽然人数少，但是对社会决策的影响力颇大。在最近几年有关经济政策的讨论中，如股票市场政策、货币政策、产业政策特别是房地产



政策等，都可以听到他们的声音，看到他们的影响。出于自己集团利益的考虑，他们可能罔顾甚至侵害其他阶层的利益，这个趋向值得警惕。

5.4.4　社会失控的存在危险

1. “两极分化”的高风险社会。在以上转型背景分析的基础上，在改革中期由于利益分化过程中的不平衡，中国有可能形成高风险的“两极社会”，给社会稳定带来严重的威胁。

第一，利益主体行为缺乏规范。各个利益主体对利益的追求，没有采取“公开博弈”的民主化、法制化形式，而是采取了非规范的、不正当的方式，除了“寻租”、向政府寻求特殊保护和优惠之外，还有垄断、欺诈、膨胀投资、集团消费、地区封锁、走私、偷税漏税、转移成本、侵蚀国有资产、损害消费者利益、股票和金融投机等。双重体制的长期并存，腐败成为联系新旧体制的纽带。在非规范化的利益转移中，“官”与“商”结合的部分，获得了主要的改革收益，形成了改革中期的“既得利益集团”。

第二，中央政府已经无力承担改革成本。在财政、外债、内债等方式都已采用过后，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已经降到很低的限度，再也无力承担改革成本，向社会转嫁成本是必然趋势，这是改革中期的一个重要特点。

第三，利益整合存在制度障碍。中国各个利益集团，能否公平分配改革收益，共同承担改革成本，将是改革中期政府调整的重要内容。然而，由于政府自身能力的下降，存在着少数既得利益集团（如上述的总体性集团），利用其政治经济优势，独占大部分改革收益，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危险。如果政府不能通过行政改革解决自身的行政失效问题，不能通过财政手段（主要是向富人征税）来承担改革成本，而是被动承受改革成本，并通过货币政策向社会转嫁，那么将出现恶性的通货膨胀，从而导致社会问题的总爆发。

第四，利益分化不均并有可能继续发展。在改革中期如果出现少数利益集团占取大部分利益，而向全社会转嫁改革成本的问题，



那么在改革初期已经出现的利益分配不公平问题将会恶性膨胀起来，在中央与地方之间，中西部与东部之间，各个社会阶层中间，出现严重的两极分化。工人、农民、离退休人员三个社会阶层，将成为改革中期可能受到绝对损失的阶层；企业家将继续获得巨大的利益，知识分子则有可能急剧分化，最大的可能是进入各个既得利益集团去发财致富或者与垄断集团联合。

由此可见，总体性资本所代表的垄断集团的存在导致了两个后果：一方面是国家在这个由其亲手培养起来的怪胎面前日渐显得束手无策，他们正逐渐成为社会的实际主宰者；先天发育不足的民营经济精英和一批"长不大"个体户则受到垄断集团的压制，在发展道路上困难重重。另一方面，垄断集团对决策的影响形成了对中间层参与决策的最大威胁，使得国家政策的制定产生了以牺牲下层利益和整个社会发展的长远利益为代价的政策制定过程。其最终表现就是两极社会的出现，从而导致社会的冲突和对抗，特别是底层社会对上层社会的敌视和反抗，导致转型期社会的失控。

2. 底层社会的反社会倾向。近年来，中国底层社会已经形成并有扩大的趋势。同时，在这个阶层中，出现了明显的反社会倾向。反社会倾向可分为比较温和的"社会不满"和比较激进的"社会仇恨"。底层社会在资源分享中处于相对被剥夺的地位，自然会产生不满情绪。社会仇恨则是一种强烈的反社会情绪，一般伴随反社会行动。随着社会张力的蓄积，新的抗拒形式开始出现，并有继续演化的趋势。在大中城市中，由于单位制的解体，对居民的控制手段也在弱化之中，而相应的新组织形式如社区、民间社团组织并未有效建立起来，使很多人觉得没有向国家反映自己意见的渠道。于是，企业职工、离退休人员以要求基本生活保障为口号的请愿、罢工日渐增加，并已经成为不报道的公开秘密；同时，城乡企业中的雇工因为劳资纠纷等问题，采取了焚烧厂房、毁坏机器和伤害管理人员等多种手段，在南部经济发达地区已屡见不鲜。反社会倾向的集中表现，就是犯罪行为。从目前来看，社会治安的形势非常严峻，城乡犯罪率多年来居高不下。同时，出现了犯罪有组织化，带



有黑社会性质的团伙犯罪严重；经济犯罪急剧上升；毒品犯罪严重，“黄赌毒”泛滥；青少年犯罪问题；流动人口犯罪问题突出；犯罪国际化等六大趋势。犯罪的猖獗造成了极大的不安全感，给社会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

3．农村稳定问题的隐患。在社会转型中，由于我国二元社会结构的特征，农村的转型程度就代表着整个社会的转型程度，可以说，中国的社会转型核心就在农村。因此，农村的转型是整个中国转型的基础，农村的稳定也是中国稳定的基础。然而，恰恰是农村情况令人担忧，蕴涵着严重的社会问题。

经济上的农村滞后情况和城乡差距在此不再赘述。从社会结构上看，改革后，农村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农村出现了组织真空。在广大的农村地区，建立何种有效的社会组织形式，迄今还是悬而未决的问题。农村家庭单元管理的井井有条与农村公共事物管理的混乱和无人负责形成了尖锐对比。近年来实行的农村自治组织——村委会，也没能发挥应有的作用。据1994年9月的调查统计，全国农村基层组织中有10%属于“软弱涣散村”，即村级党支部、村委会没有凝聚力和整合力①，目前的状况也没有改善多少。农民在获得相对自由的同时丧失了组织的保护，失去了集体缓冲层。其后果是：一是农民更容易屈服于中央政府的命令，使得农民在面对市场和面对国家代理人的时候同样的脆弱；二是由于国家权威的丧失，农村中开始出现新的权威形式，一些宗教组织或者“黑社会”势力的地痞、村霸把持了当地的实际权力，甚至出现了“黑白合流”（“黑社会”帮派与“白道”势力——政府中某方面掌权人物互相勾结）。农村基层社会组织的“非组织化”现象出现普遍化趋势。上述势力对基层政权的掌握，使得农村社会稳定的状况复杂化：宗族势力的发展意味着个人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国家”模式退化为由家族向社会负责的“个人—家族—社会”模式，对国家具

① 社会蓝皮书：《1994—1995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316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

有潜在的威胁，社会成员将以家族利益而不是正义和公理作为个人态度和行为的首要因素，甚至形成宗族势力和政府对抗；地方恶势力对农村的控制，使政治权力成了他们奴役下层人民的工具（如河南虞城县的长利镇① 和湖南沅江市四季红镇② 就是两个典型的例子），对社会的危害极大，对政府声誉造成的损失就更是不可估量。

据调查，当前农村问题的焦点是负担太重和缺乏安全感，农村中干部与群众的关系非常令人担忧，某些农村集体上访具有经常性，形成农民与地方政府的对立。③ 在协调农民与国家关系方面的组织手段明显缺乏的情况下，农民的抗拒体现出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抗拒信息传达的延迟性（如以撂荒形式来抗拒粮食价格过低，但需要漫长的时间才能引起中央政府的注意）；二是暴烈抗拒发生的突然性。农民的无组织情况令人担忧，可能成为社会失控的发源地。

5.4.5 对策初探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面临着经济发展的诸多挑战和社会问题的重重考验。改革的配套要求提高了，同时开始触及敏感的利益格局的刚性部分。结构变迁、职业分化、多种产权的并存和竞争以及市场驱动机制的形成，使不同社会群体的利益主体化、独立化趋向日益明显。利益格局的调整成为社会转轨的主旋律，利益的分化和冲突成为造成新阶段出现的各种社会问题的重要原因，社会凝聚力下降，以社会中心呈现疲弱与紊乱的状态、价值体系的紊乱和社会焦虑为特征的社会解组现象大量存在，社会整合能力下降，社会控制弱化。多元、无序和冲突的社会发展格局使得社会稳定面临前所未

---

① 《基层恶势力》，载《南方周末》，1995-01-13。

② 《一个基层政权的失而复得》，载《南方周末》，1996-06-14。

③ 《当前农村社会稳定的问题与对策——首都“百名博士百村星”专题报告》，载《东岳论丛》，1996（4）。



有的挑战。

改革进入了一个新的公共选择过程，对重大利益格局处理，将遇到人心向背的载舟覆舟问题，对贫富分化进行控制避免出现两极分化和保障工农的基本利益成为社会稳定的前提。从目前来看，保持社会稳定必须解决好以下问题。

1. 现在公众对于改革措施的支持，愿意承担改革成本，是基于改革能够给自己带来相应收益的预期。因此，经济的持续发展特别是农村经济的发展就成了问题解决的关键。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基本战略不能动摇，把国民经济的“蛋糕”做大，是实现社会转型和为解决社会问题提供更大空间与余地的经济基础。深化改革，尽快完成两个转变是中心任务。

2. 当前社会保障体系的改革将成为调节国家和社会关系、精英和民众关系的焦点领域。核心的问题是在国家主导下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改革，如何配置有限的资源：是配置给那些日增的城乡贫困化群体，还是配置给垄断集团和各种精英。在“雪中送炭”和“锦上添花”的问题上，考虑到社会上一部分成员的生存压力越来越大的现状，利益分配的倾向是不言而喻的。对中下层群体进行社会保障方面的倾斜并逐步还清以前的欠债，是我国进行利益分化调整中实现社会公平目标的最后机会，否则社会将面临空前危机。

3. 虽然希望出现一个无所不能的政府的想法是典型计划经济思想的表现，但是，在社会转轨时期，政府在利益调整和社会控制方面仍然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与经济结构的迅速转变相比，文化由于是一种伦理习惯，其转型是非常缓慢的，比观念的变革缓慢得多。从我国的实情来看，原来国家包办一切的集权社会，导致民间缺乏企业精神和合作意识，表现为人们没有协调的能力，也无意自愿和公司、政党、社区等群体合作，这些习惯使人们在过分注重自己和家庭利益的同时，又往往存在对国家有严重依赖的思想。自发性社会交往和合作能力的严重缺乏，使得社团组织难以大量涌现，也严重阻碍了民主或市场经济的实现。市场经济和民主社会的建



成，需要诚实、可靠、合作、责任感在内的社会道德和具有上述素质的民众，庞大的中间组织，这些并非一蹴而就的过程，需要长期的努力和培育。即使在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中间，中央政府的财权也是非常巨大的。因此，目前来说，调整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加强中央政府的财权和事权，逐步提高中央政府的权威是社会稳定的一个重要条件。

4. 大力扶植社会中产阶层，使之成为社会的主体部分和中间力量，使我国形成橄榄形的稳定社会结构。一方面，杜绝新富群体，特别是总体性资本通过各种非经济手段谋求超额利润的途径，通过各种制度安排将之转化为在市场经济中谋求正当利润的道路。应该指出的是，必须采用规范化的手段，而并非是要消灭新富阶层。同时，通过税率调整和开征遗产税来对这个阶层实行控制。另一方面，通过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制度的建设，在救助社会贫困层的基础上，努力创造使之再结构化的条件，让其中的大部分人能够借助于各种渠道上升到中产阶层来，扩大中产阶层的队伍，引导社会走上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稳定状态。在我国，中产阶层形成的标志就是“小康大众”的大量涌现，从而使中国向“公民社会”转变，完成社会的转型。

“公民社会”的内涵，是指社会成员按照契约性规则，以自愿为前提、自治为基础进行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的私域，以及经济、议政、参政活动的非官方公域。从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的情况看，包括企业、志愿团体、教育机构、俱乐部、工会、媒体、慈善机构、医院、宗教组织、商会和行业协会等中间组织的存在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基石，根据中国的实情借鉴其发展道路不失为一个有效的途径。“公民社会”的建设，就要求从原来的关注政治上层建筑转向关注社会力量，从关注政治权威转型转向关注社会结构转型；从而逐步摆脱精英式路径的束缚，在对社会力量关注的基础上，放弃一步到位的民主政治的幻想，探索和实行民主政治赖以建立的结构性基础的渐进道路。实现“公民社会”同样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我们社会转型的长远目标。

5. 在建立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的同时①，要充分认识到社会冲突的常规化是社会转型期的重要特征。因此，改变以前你死我活的冲突模式，必须尽快建立有效的解决社会冲突的制度安排和机制建设，加强各种民间团体的建设，形成广泛有效的对话和协商渠道，把社会冲突置于理性的基础上并保持在理性的范围之内，这是当前紧要攸关的重大课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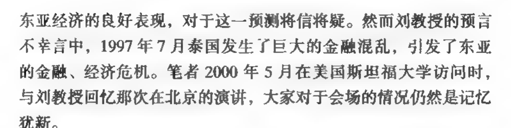
我们已经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美好的前景似乎就在眼前。然而，经过百年患难的中华民族，其前进的道路并非也不可能一帆风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能没有自信；自信基于对国情的客观分析和把握自己命运的决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不能没有忧患意识；忧患意识源自对民族和人类前途的危机感和使命感。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内外的社会压力都将是空前的，其中社会的稳定是中国实现经济腾飞和民族昌盛的基石。我们已经走过了一段艰难的历程，也要勇于接受更大的考验，在千头万绪中张弛有序、主次分明地向自己的目标迈进。经历凤凰涅槃般的洗礼之后，中国必将迎来灿烂的辉煌。

---

① 吴忠民：《社会问题预警系统研究》，载《东岳论丛》，1996（4）。

第6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所面临的国际压力

1995年9月26日，一位美籍华人教授，美国斯坦福大学的刘遵义博士在南非共和国首都比勒陀利亚的一次国际会议上，用计量经济学的方法、精选的指标体系，论证了20世纪80年代墨西哥式的金融危机将在亚洲重演，并认为菲律宾、泰国、韩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国家在劫难逃；1996年7月，在北京的货币金融国际研讨会上，在中国央行行长以及众多中国部长参加的午宴上，刘教授的午餐演讲语惊四座，再次重申了自己的观点，并明确指出泰国在第二年将首当其冲，爆发金融危机。笔者当时也在场，与其他人一样，由于



东亚经济的良好表现，对于这一预测将信将疑。然而刘教授的预言不幸言中，1997年7月泰国发生了巨大的金融混乱，引发了东亚的金融、经济危机。笔者2000年5月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访问时，与刘教授回忆那次在北京的演讲，大家对于会场的情况仍然是记忆犹新。

东亚金融危机是1997—1998年国际金融领域中的重大事件，具有极为深远的影响。虽然中国由于稳健的金融开放政策，几乎成为本地区惟一未受到根本性冲击的国家，但东亚各国货币的相继贬值，在当时却对中国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从而商品出口的进一步发展，增加了很大的麻烦，对引进外资工作也产生了负面影响，对中国进一步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压力，提出了挑战。1997—1998年中国的理论与经济界以及广大的老百姓都在议论这件事，本文在讨论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时也不得不对此进行分析，这里主要探讨东亚经济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和中国所采取的政策措施。

6.1 世纪末的金融混乱

1994年一位美国经济学家，当时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经济学教授、著名的国际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外交季刊》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东亚没有奇迹，有的只是高投入与低效益结合的高速度，这与原苏联东欧的模式如出一辙。该篇文章在学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在亚洲则是一片批判声（笔者当时正好在斯坦福大学作富布赖特研究学者，虽然没有那么强烈的不满，但也觉得克氏所言未必是实）。但是，这一论断却引起了华尔街国际金融投机家的重视，他们集中了一批学者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发现了亚洲，尤其是东亚的弱点，进行了一系列有针对性的打击，其结果在1997年7月显示出来，首先是泰国，继而蔓延，东南亚的经济“神话”突然破灭了。

6.1.1 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蔓延

1997年7月的曼谷，过去的繁荣消失了，一夜间世界发生了巨变。过去拥挤的车流不见了，香港巨商胡应湘斥资修建的高架铁路停在了半空，为第十三届亚运会修建的设施也放缓了脚步，曼谷数百栋大楼处于半停工状态，已经盖好的楼宇大半闲置起来，曼谷甚至在午夜之后不得不将路灯关闭以节约用电，这一切是泰国人根本没有想到的，也是其他国家未曾预料到的。真正应了一句话：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发展前。事情的起因要从泰国货币贬值说起。

在经济高速发展了20年之后，泰国的经济结构在房地产泡沫的拖累下出现了问题，它以出口导向为基础的发展，在周边国家高速出口的竞争下，出现了出口不畅，国际收支逆差增长，开始大量借入外债，于是从1997年开始，泰国的货币铢就出现了贬值的压力。国际投机家已经看出了泰国货币的贬值趋势，但又看准了泰国政府不愿意轻易使本国货币贬值的意愿，于是开始向泰国中央银行购入了大量的泰铢的远期合约，1997年5月时已经积累了相当于150亿美元之巨的泰铢，便向泰国发难进行攻击。他们大量抛售泰铢购进美元，泰国中央银行为了维持汇率，不得不吃进本币，售出美元，几个月损失了近50亿美元的储备，随着外汇储备的枯竭，面临外国投机家排山倒海般的卖盘，泰国政府再也无力护盘，据守泰铢与美元的汇率。终于，泰国铢在1997年7月2日被迫贬值，在损失了50亿美元之后，一个月之间贬值25%，同时引发了股市的暴跌，不仅金融出现混乱，整个经济甚至大众的信心也受到影响，出现商品抢购，社会稳定遭到威胁。

泰国经济出现危机后，东亚经济如同多米诺骨牌一样，出现了连锁式的反应：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货币的对外汇率下跌，股市狂泄，就连一向以稳健著称的新加坡货币的对外汇率也受到了冲击，出现下滑。1997年的7月，虽然东南亚受到的打击已经令人担忧，但是韩国、台湾、香港以及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货币仍然比较稳定，没有出现大的问题。1997年8—10月，新的一轮



金融危机开始浮现，这次一些原本金融稳健的国家和地区也在劫难逃，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终于被卷进了危机，以香港为例，1997年8月7日借回归的东风，恒生股指一度高达16 673.27，但10月28日则仅为8 876.4，这意味着香港的富豪们的身家缩水近一半。1997年11月17日，金融危机之风吹到了韩国，韩元贬值，从890韩元兑1美元跌破1 000韩元大关。与其他国家不同，韩国经济发展的咄咄势头，使它在1997年之前，经济居世界第11位，出口居12位，而且是世界富人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除日本之外亚洲的第二个成员。这次在巨大的经济困难之中，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谈判，不仅极其艰苦，为获得贷款，韩国打掉的牙和血咽，公务人员减薪10%，举国的妇女捐献金首饰出口以渡过难关。情况更为可怕的是印度尼西亚，印尼盾兑美元的汇率从1997年7月2日的2 450:1贬为1998年1月23日的15 500:1，几乎成废纸。金融危机引发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了苏哈托总统的下台，20世纪90年代的最后的时光，是印度尼西亚社会动荡的日子，在中国人信心十足、高唱迈进新时代歌声的同时，印度尼西亚经济却在困难中向新世纪蹒跚而行。

这次开始于东亚的金融危机，不仅给东亚造成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困难，发展大受挫折，本节的形容——“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发展前”来自民间，它引起了发展经济学关于经济发展可逆性的讨论，而且以东南亚的危机为发端，金融风暴继而刮向了东欧，造成东欧、俄罗斯股市、汇市的暴跌，拉丁美洲国家似乎也没有能够逃脱金融动荡的厄运，其中巴西首当其冲，股市、汇市双双落败，经济几乎陷入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穷于应付，拿出的治病药方，被讥讽为“致病”药方，令人无法接受，印度尼西亚等国多次违规，韩国民众甚至认为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无异于“国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无奈与力不从心，进一步造成全球金融危机的加重和蔓延。这时，甚至动荡的积极兴风作浪者，如索罗斯等也开始大谈金融稳定的重要性，各种说法此起彼伏，1997—1998年的各种事实确实令人担心，为什么金融的一步不慎，会造



成翻船之灾，经济发展大步滑落呢？尽管今天东亚经济已经开始有了长足的恢复，但发展中国家的这次世纪末的金融大危机从各个方面仍然引起了人们的深思。

6.1.2 东南亚金融危机因果探讨

对于20世纪的后半叶，笔者曾经将世界经济大概总结为：20世纪70年代是美国失去的十年（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元失去了过去等同黄金的地位，1973—1975年，1979—1982年一直处于经济衰退与通货膨胀并存之中）；20世纪80年代是拉丁美洲、非洲失去的十年（债务危机、经济困境和大饥荒）；20世纪90年代是日本、俄罗斯失去的十年（体现为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长期不振）。1993年笔者作为富布赖特学者在美国进行过一年的合作研究，当时最深的感触是，日本人20世纪80年代以大量贸易顺差为基础，在美国大肆投资，购买了房地产、娱乐业资产（美国人曾经惊呼日本人要把美国买下来）。这些资产在90年代开始不断亏损，经营上输给美国人，或廉价返卖给美国人，其数额之巨大，甚至超过了当初的投资，这种过程给了人们这样的印象：日本人以其发达的制造业和出口立国，从（包括美国在内的）全世界获得贸易顺差，但通过美国人绝对控制的金融领域、房地产领域和其他高科技领域，这部分资金又源源不断地流进了美国人的腰包，这种“回流”的过程，使得日本的经济活动在另一层含义上体现为在给美国人“打工”，这种贸易的商品流动和金融资源流动的格局是各国学者和政策制定者们始料未及的，它极大地影响了今天人们对于世界经济格局的看法。东亚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笔者认为某种意义上这是美国、日本长期经济矛盾的一次解决。

近20年～30年东亚（包括中国在内）的持续高速经济增长从区域产业结构角度来看，我们认为有三个突出的特点，第一，经济属于政府主导型的资源配置和外向型产业突出发展的倾斜结构；第二，亚太地区经济群体之间形成了雁行梯次的产业转移过程（日



本—亚洲四小龙—印度尼西亚、马、菲、泰—越、老、柬）。产业不断转移主要是由于成本周期而非技术周期因素造成的；第三，地区内生产 销售 金融服务体系不完整，在生产上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产品结构相近，外部市场的作用十分重要，许多产品、服务需要在北美、欧洲市场上实现。日本曾经设想在上述三个特点的基础上，形成东亚地区内较为完整的生产—市场—金融体系，它力图把在新、马、泰、印尼生产的日本型号的汽车、家用电器，尽力在中国销售，将资金回流日本，日本在这一体系中充当金融资本、技术以及服务的供给者，希望在美国的范围之外形成一种新的亚太地区生产体系，并使得21世纪成为日本世纪。但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产业结构迅速变化，经济内部出现了结构性过剩，国内消费需求不振，大宗消费品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如空调大战、彩电大战、微波炉大战、冰箱大战、VCD大战），在东南亚地区生产的日本品牌的家用电器，由于质量、功能和价格等因素，竞争力不足，基本被从中国市场上淘汰出局，而东南亚地区由于自身收入及市场规模，根本无法消化如此大量的产品（这种情况在其他消费、生产领域也呈现出很强的趋势和发展方向），形成了过剩（黄，1999）。日本自身由于长期的金融困扰，日元汇率先高后低，在生产—市场循环不畅的情况下，金融注入也很难发挥应有的效应。日本在亚太地区建立的以日本为中心的经济体系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且冷战结束后，美国在东亚的战略利益已经出现变化，不需要以较大经济利益（吸纳东亚的商品）为代价换取其他的安全利益，迫使东南亚必须减少对北美市场的依赖程度，这无疑从另外的角度加剧了东亚经济体系的困难。另外，应该看到的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经济结构新一轮的调整已经展开，原有的雁行梯次产业转移关系已不能适应经济结构变化的要求，亚洲四小龙逐步开始游离出以日本为头雁的产业转移链，绕过日本直接与技术的发源地（美欧）打交道。这一时期，中国香港、新加坡、中国台湾等向外转移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过程已逐步完成，需要新的具有更高知识含量的产业来填补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

形成的产业真空。但此时由于日本陷入金融困境和经济停滞时期，自身尚无明确的产业结构调整方向，因而不能形成具有规模效益的产业转移。东亚原有的产业转移链出现断裂，日本构筑的以此为平台的经济体系便不得不进入了艰难的调整期。

如果讲实话，我相信，绝大多数中国人（当然笔者也在内）并没有预料到世纪之交，东亚会出现这样的金融危机，面对金融危机，肩负中国经济发展的重任，人们更多地谈起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担心在外部压力下中国对外开放受到冲击，人民币的汇率难以保持稳定，甚至会影响经济发展的大局，但是如果客观地进行分析，东亚金融危机对于中国的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放缓了经济增长的速度，然而它却很难阻止中国经济发展的步伐，即便是在中国的对外经济开放方面也是如此。笔者愿意与读者共同探讨个中原因。

6.2 东亚金融危机：中国经贸分析

经济发展要求有内部条件与相应的外部环境，同时要辅之以制度的因素。今天的世界，一个国家在发展时，必然要与世界其他国家产生不同程度上的经济联系，尽管各个国家的具体国情不同，开放的程度各异，闭关自守不能推动经济发展已经形成了共识。因此，开放的国家，它的经济必然要介入国际间的资本、人员、技术和商品的流通，加入到世界市场中去。中国的进出口并不例外。国际贸易存在着乘数效应，也就是说，出口的增长，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引发一轮又一轮与这一出口增加有关的（直接或间接）国内各相关产业的产出扩张，最终使得经济总量得到乘数或倍加的扩大。进口存在着相反的效应，即倍加的递减。而经济的扩张与递减，除了财富的多少之外，还直接、间接地影响着一国的就业水平，这样，该理论便给出了为什么各个国家总是不遗余力地扩大出口、限制进口的根本原因。



6.2.1 世纪末的金融危机对中国出口增长的压力

历史告诉我们，中国的出口一直肩负着几重的重任：它作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每年给予经济增长1～2个百分点的动力；由于中国出口产品结构中劳动密集型产品占有相当大的比重，它又肩负着吸收中国剩余劳动力的任务，而且是最为重要的任务；出口同时还是中国外汇收入的主要来源、偿还外债的基础，因此，当东亚金融危机爆发时，人们首先想到它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就不足为怪了。从笔者的经验看，东亚危机对中国和其他国家是系统风险，无人能够幸免，但结果却可以因国而异，中国的出口具有特殊的性质，在金融动荡中，能够维持平稳，甚至在困难中得到调整和发展。分析的结果与事实证明，1997—1998年间，东亚货币贬值提高了该地区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笔者认为，这一情况对中国出口的威胁远小于该地区经济危机造成的进口需求的急剧下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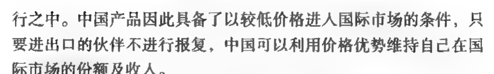
东亚金融危机爆发后，人民币的走势成为国际政治与经济界人士关心的一个焦点，笔者曾经连续三年在年终时到电视台介绍人民币的走势（当然结论都是稳定这两个字），接触到的不少国内外的金融、学术圈的人士曾经多次预期人民币在中期内将会贬值（但是都未兑现），他们对人民币贬值的猜测多来自中国为了确保20世纪末经济增长率，不得不对出口提出更高要求，从而中国将利用人民币贬值作为促进出口的有力工具（理论上讲，本币的对外贬值，可以使本国出口商品的外币价格下降，进口商品的本币价格上升，从而促进出口抑制进口，调整一国的国际收支状况）。中国对外贸易面临来自东亚的各种压力，人们对于中国出口增长率将下降的种种预期，即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货币对外贬值，会对中国出口造成不利竞争，这又将导致中国出口增长放缓，就业压力加大，难于利用出口带动经济增长。如果情况比较严重，中国的国际收支状况出现逆转，则必然在主客观两方面引发中国人民币贬值：主观方面是为了保持出口竞争力，维持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中的市场份额，中国货币主管当局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客观方面则是中国为缓和国际

收支平衡压力的进一步加大，在各种市场和政策因素的左右下，不得不实行一定程度的本币贬值。然而，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至世纪末经济的基本运行看，中国出口表现良好，人民币在当时没有贬值的必要。当时的南斯拉夫驻华大使翁科维奇教授在2000年春节宴会上曾经对作者讲过，1998年，许多中国和外国学者在与他交谈时，均预期人民币汇率会对外贬值，而当时笔者对来访的50余位南斯拉夫教授论定人民币汇率将是十分稳定的，所分析的人民币币值稳定的道理，给了他们深刻的印象，而且事实也证实了人民币币值在20世纪90年代末的稳定（那次演讲的讲稿在翁大使的推荐下，在贝尔格莱德大学的学报上得到了发表）。

6.2.2 中国经贸供给条件分析

从1997年下半年起，中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放缓，随着中国经济中的过剩现象越来越严重，投资和消费不旺，凸显出出口日益成为带动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在东亚经济危机的冲击下，1997年，中国出口的增长率从上年的1.64%一举上升到20.9%，尽管1998年全年出口在金额上与上一年基本持平（出口实物量增长了10%），但是在周边地区面临金融动荡，经济多呈负增长、出口低迷的情况下，实属一枝独秀。其原因主要应归功于内部因素和美国新经济造成的需求增加。

事实上，1998年中国的宏观经济环境对增加出口是有利的，一方面国内生产能力大量闲置，产品供应能力过剩，需要出口消化；加上国有工业和外贸企业在过去两年中进行了前所未有的结构性调整（许多外贸企业和工业企业实现了联合和兼并，大大降低了成本和重复建设，由此也带动了乡镇企业等其他所有制企业的调整），工资、福利等内部成本急速下降，雇员对于失业、下岗已经无可奈何地接受，过剩与几乎是零的通货膨胀率更带动了出口收购价格出现一定程度的下降（许多产品价格下降的幅度甚至超过20%），这些有效地抵消了国外同类产品贬值带来的某些负面因素。而且，随着企业改革的深化，这种企业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还在进



行之中。中国产品因此具备了以较低价格进人国际市场的条件，只要进出口的伙伴不进行报复，中国可以利用价格优势维持自己在国际市场的份额及收人。

另一方面，由于 1998 年中国有效需求不足、相对过剩的宏观经济环境没有根本变化（即使放松财政货币政策，内需和投资都需要一定时间才能出现明显效果），要维持一定的经济增长，依然只有出口是最现实和见效最快的手段，各级政府不遗余力地推进出口。中国政府在出口退税（如即报即退、在财政状况许可的条件下继续提高增值税出口退税率等）、银行贷款（如提供优惠利率）、减免重点出口企业税收和其他负担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力图切实抓好出口增长，保证了中国出口的良好势头。另外坦率地说，1997 年出口 20.9%的高增长是不正常的，多少带有对 1996 年 1.64%低增长的恢复性质。1998 年中国出口没有下降，仍然能够与上年持平甚至保持一定的低速度是很正常的。

6.2.3　中国经贸竞争力的外部因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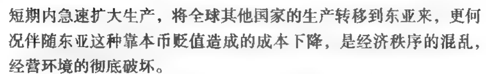
1997—1998 年东亚地区各国货币出现的几次大幅度贬值，是金融和经济危机中的被动贬值。从对出口和国内经济的刺激作用看，主动贬值和被迫贬值的效果完全不一样。中国 1994 年的汇率并轨属于主动贬值，或者是对官价、市价差异的主动调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从供给的角度看，东亚这次金融和经济危机带来的被动贬值实质上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生产力和生产体系。而且，韩国以外的东亚经济都属于出口导向的"飞地式产业"，一旦出现危机便是出口能力和经济体制的双重破坏，一方面出口能力因为经济危机而遭到破坏；另一方面出口这一经济增长的龙头出现问题，这又会导致整个经济运行机制出现问题，进而引起一连串后果。近几年的实际情况已经表明，这种危机一旦发生，短期内很难完全康复，1997—1998 年的情况表明，多数东亚国家经济增长放缓，甚至出现了负增长，1999—2000 年东亚出现了恢复性增长，但由于经济结构的调整却体现为一个长期的过程，经济发展的起伏必然会存

在，2001—2002年仍然处于低速，这与中国的情况是不同的。

1997—1998年由于东亚国家的汇率大幅度波动、利率飙升、银行和金融结构倒闭、股价狂跌、人们对政府的信心丧失，倒闭风潮之下，当地企业的正常经营环境面临严重威胁，短期内基本没有办法利用汇率贬值的优势扩大生产能力和出口能力。例如，到1997年底，尽管印尼盾贬值了60%，但印尼对外出口商品的报价只降低了6%，年底印尼出口增长率3%都不到，1998年印度尼西亚出现的经济、政治混乱，苏哈托政权的下台和长期的民族冲突，致使若干出口订单转向了中国等国家，例如表现较好的韩国，1998年出口顺差大增，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疲软、进口不旺造成，从整个经济看并未见到贬值的好处。虽然从1997年11月开始，泰国、马来西亚等受到危机冲击的国家相继恢复经常账户顺差，但其代价无不是大幅度降低进口（如韩国1998年1月份的进口下降了40%），从汇率贬值中获得的正面效果很难评估。已有的资料表明，东亚各国除菲律宾外，1998年以美元计算，出口均呈持平甚至下降态势，但由于本币大幅度贬值，如果以本国货币计算出口却有很大的增长，然而它们偿还外债需要的却是外汇（黄，1999）。

东南亚国家的出口多属于外资加工性质，即“两头在外”型出口，有很强烈的外发分包（sub-contracting）和OEM加工性质，机器设备、零部件和原材料极其依赖进口，汇率贬值带动了它们进口成本的上升，贬值对降低出口商品报价不会产生很大的帮助。进口成本上升，带来国内物价的高速上升（如印度尼西亚和泰国发生的状况），以当地货币计算的劳动力价格和其他成本也急速上升，抵消了贬值对出口的刺激作用。

东南亚这种外资加工性质的出口，相当大一部分是由外资建厂、设公司运作的，属于跨国企业的内部分工，跨国公司总是从全球经营的角度来考虑在东南亚生产的地位，东南亚地区也只能与跨国投资企业在全球其他地区的生产能力和市场相配合，成为其全球经营战略的一个环节，即便东亚地区成本出现降低，也不太可能在



短期内急速扩大生产，将全球其他国家的生产转移到东亚来，更何况伴随东亚这种靠本币贬值造成的成本下降，是经济秩序的混乱，经营环境的彻底破坏。

从出口商品结构看，中国与它们的出口有交叉，但更多的是差距。中国出口的产品中，有11%～15%左右在产品上重叠，更多的产品东南亚国家并不生产。它们以生产日本品牌的电子消费产品为主，而中国出口与韩国在档次上又存在有一定的差距。在主要的出口产品中，服装和纺织品有配额限制，汇率贬值在短期内无法起到迅速扩大出口的作用。同时，在中国的出口中，45%以上属于加工贸易，基本不受人民币汇率高低的影响。在那个时期，东南亚国家经济的混乱已经使得发达国家进口商，为了维持自己在国内的交易信誉而不敢轻易将大笔订单投放到经济出现问题的东南亚国家，这对中国却是十分有利的机会。

6.2.4 中国经贸竞争力的内部条件

事实上，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实际上是一种综合实力，不仅仅是由汇率体现的价格来决定的，贬值不能说明一切。1994年人民币汇率并轨和贬值时，80%的外汇交易已经是市场调剂，当时的调剂价是9.10元，8.70元的统一并轨汇率实质是升值而非贬值；1994年至今，由于中国的利率下降和通货膨胀率下降等因素，人民币实际汇率大约上升了40%。即使在这种局面下，中国出口都在发展，1995年增长率达到22.9%，1996年下降到1.64%，1997年又进一步上升到20.9%的高水平，显然价格因素不是如此重要，更重要的是内在的竞争力（黄，1999)。笔者认为，到上世纪末中国的出口竞争力因素大致有三个方面。

第一是劳动力价格的因素。直到今天，与东南亚地区相比，中国的劳动力仍然属于价格偏低而素质较高，危机之前大约只是东南亚地区的1/6左右，泰国在货币贬值50%之后，其劳动成本依然高于中国。由于中国内陆较贫困省区有源源不断的劳动力供应给沿海的出口加工地区，大量劳动力涌入，压低了普通劳动力的工资水

平，这一优势因为劳动力的供求关系会在长时间内维持下去。据香港理工大学中国商业中心的调查显示，广东珠江三角洲一带，在管理层、技术层工资有较大跃升的同时，外省流入的非技术劳工的工资水平在过去10年中基本保持了稳定，实际工资甚至略有下降，这种情况在20世纪末因经济大盘的走势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陈、朱，1998)。中国劳动力的价格低廉，使得中国的出口商在交易中大多采用FOB价格报价成交，而将运输、保险、物流中创造的价值拱手交给了外商，这使得经营中国产品的外商能够利用价值空间压低价格，与东亚的低价商品进行竞争。

第二是产业优势。与东南亚地区的飞地式经济不同，中国依托巨大的劳动力优势，结合本身的综合工业基础和广大的内部市场，在过去10多年中中国已经成为世界巨大的产业加工基地，具有了从农产品、纺织品和服装到机电产品的系列出口，由于物美价廉、供给充足，在世界上出现了中国产品的比较稳定的消费群体，从供给到需求，从欧美到东亚，形成了一个非常有竞争力的出口综合体系。而东南亚地区，金融危机中外商直接投资撤退或增速极大减缓，已对过去依赖外资建立起来的区域经济产生了重大影响，在传统市场竞价销售见效不大，改变这种经济危机的状况却又有待外资的重返。它们在世纪末才出现了再次获得恢复性发展的可能性，但与中国连续发展相比较又有了新的差距。

第三，中国的出口与香港和台湾的资金、技术和市场网络形成了地区整合的优势，短时间内地区和地区之间的组合，如欧盟与北非、拉美，甚至NAFTA，基本无法替代这一优势。中国东部的加工能力、香港的资金与销售网络、台湾的辅助结合在一起，具有别国所不具备的比较优势。同时，华东一带企业与日本企业形成的合资和加工关系也比较牢固，对开拓日本市场和巩固中国出口竞争能力大有帮助。美国等国家目前所谓的进攻型进口，在全世界主动寻找货源的做法，也对中国的出口维持一定速度起到了相应的作用。



6.2.5 中国经贸的需求条件分析

1998年国内大宗消费品市场的竞争进入白热化状态（如空调大战、彩电大战、微波炉大战、冰箱大战、VCD大战），进口商品纷纷被排挤出主要耐用消费市场，国产货和国产成分含量越来越大的合资产品受到了中国消费者的欢迎，其中耐用家电表现得最为明显，在东南亚地区生产的日本品牌的家用电器，基本被从中国市场上淘汰出去了。这种情况在其他消费、生产领域也呈现出了很强的趋势和发展方向。

从投资看，中国国内的投资将主要集中在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和中西部的发展，对进口产品的需求不像20世纪80年代的生产线那么大；由于外商直接投资进入中国的速度可能会因资金来源和供给出现问题而放缓，外资带来的投资产品进口增长幅度也不大，从另一方面推动着国际收支顺差的增长。因此，由于国际经济环境没有发生意料之外的逆转，中国的出口保持了一定的增长速度，进口方面没出现特殊的情况，中国的外贸便不可能出现巨大逆差。事实是，整个1998年中国的出口，从实物通过海关量来看，增加了10%，但从价值来看，却仅增加了0.5%，而1999年则出现了较大程度的恢复。

1998年中国出口显然受到了东亚经济危机的影响。影响最大的因素来源于东亚市场的根本性疲软，中国50%的出口市场在东亚，日本、中国香港（主要转口）、韩国、新加坡都是中国排名前十位的市场，金融风波导致了该地区的经济危机，影响了个人收入的水平，整个东亚的需求不足，购买力下降，这对1998年中国出口非常不利，是影响我国20世纪末出口增长的主要因素，如果东亚危机在2000年恢复性增长之后逐渐演变成为几年的慢性停滞，其影响将更为深远。不过，由于中国对这些地区的出口有相当部分是这些地区的外商进行投资的企业生产的，又会在某种程度上抵消不利因素。当然，在第三国市场，贬值的国家的商品也会与中国的产品进行竞争，尤其韩国的钢铁、造船、电子等产品，东南亚地区的消费电子、轻纺产品会与中国类似档次的产品展开竞争。

6.3 东亚金融危机：引进外资的挑战

举债确实能够应急，如果操作得当，借鸡下蛋是最好的结果。然而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抱着良好的愿望，从官方、非官方借入了大量的外债，最终却深陷债务泥潭，给经济发展带来了无穷的后患，前有墨西哥的教训，今有韩国之鉴。如果缺乏调控能力，利用外资便成了外资利用，那样，与其借入外债，就不如引进国外的直接投资了。东亚金融危机之后，由于中国的外来资金来源地域较集中，在世纪之交中国引资面临着困难，因为外资除了带来资金之外，更重要的在于带来技术，促进中国产业结构的变革，这种体现在外来资金方面的困难将对经济发展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

6.3.1 中国引进外资面临的挑战

值得探讨的问题是，除了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特别是生产性直接投资增加中国的能力之外，如果中国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数额大幅度下降，也会对国际收支状况带来沉重的压力。应当看到，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50%左右来自港澳台地区，60%以上来自包括东南亚在内的地区，加上来自日本和韩国的投资则几近70%。由于这些地区股市大跌，银行坏账层出不穷，金融体系运作不灵，金融机构和企业倒闭成风，1998—1999年当地资本没有大规模资金输出能力，从而在当时使得中国外商直接投资的来源面临严重的挑战，1998年、1999年中国的实际外资流入增长率为负数，显现出了很强的下降趋势。尽管1998年、1999年中国在引进外资方面仍然居世界第三位，仅次于美、英两国，列发展中国家首位，但世纪之交的困难是非常突出的，经过不懈努力才有了2002年中国570亿美元的外资引进，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

1997—1998年由于金融危机引发经济萧条，造成东亚地区进口能力大幅度下降（各国普遍下降了20%以上），使得原来投资中国的返销型企业销路不畅。这方面，韩国是一个典型。在韩国爆发



金融危机和韩元大幅度贬值后，韩国在山东半岛和辽东半岛设立的返销型企业纷纷停工。另一方面，中国国内市场疲软，过剩经济逐渐形成，市场竞争激烈，加上2003年非典的冲击，有可能使得原来看好中国市场的外商直接投资意愿减弱，大部分内销型的外资也可能出现缓行的趋势（电子、电信、信息等行业可能是例外）。因此，在中期内，中国的内销型外资和返销型外资会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减缓甚至衰退的局面。外资投入的主力，会从港台、海外华侨为主，转入跨国公司（欧美和日本）为主，其市场对象是中国全国性的市场和东亚的区域市场，投资意在占领中国的巨大市场，这些公司的规模较大，投资额巨大，但公司的数目却较少，容易形成在中国市场的垄断和寡头竞争，对国内企业造成一定的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经济将无法重演过去几年依靠外商直接投资填补国内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下降的历史，原来依靠外资投入来增强中国经济增长动力的模式恐怕会落空，尤其是中国西部各级地方政府把经济增长、结构改善、生活提高依托在外资身上的想法会越来越不现实。

6.3.2 引进外资与国际竞争力

应当看到，外国直接投资的流入是决定东南亚和中国出口竞争能力的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90年代中期东南亚在与中国的出口竞争中失利，一定程度上是1992年以后大量外资涌入中国，东南亚失去了对外资的吸引力而造成的。

从表6—1和表6—2可以看出，1992年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占发展中国家的比例从1990年的10.73%翻了一倍，达到22.48%，1993年进一步增长到37.67%，之后一直保持三分之一左右的比重。而东南亚四国所占的比重一直维持在12%～14%之间，与中国比重的飞速上升形成鲜明对比。就绝对数而言，1992—1994年基本没有明显增加，1996年的增长主要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进一步开放。而同期，中国实际利用的外资数量一直在高速增长之中，在相当一个时期列世界第二位（仅次于美国），有时甚至第一（2003）。

表 6—1　　1997—1998 年金融危机前中国吸收的外商直接投资

	金额（亿美元）	占发展中国家比重
1985—1990 年平均	26.54	10.73%
1991	43.66	10.47%
1992	111.56	22.49%
1993	275.15	37.67%
1994	333.87	36.91%
1995	358.49	37.21%
1996	423.00	32.86%
1997	450.00	—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1998。

表 6—2　　危机前东盟国家吸引的外商直接投资　　单位：亿美元

	马来西亚	泰国	印度尼西亚	菲律宾
1985—1990 年平均	10.54	10.17	5.51	4.13
1991	39.98	20.14	14.82	5.44
1992	51.83	21.14	17.77	2.28
1993	50.06	17.30	20.04	12.38
1994	43.42	13.22	21.09	15.91
1995	41.32	20.03	43.48	14.78
1996	53.00	24.26	79.60	14.08

资料来源：《世界投资报告》，1997。

在东亚经济危机之前，利用引进外资形势的此消彼长，配合中国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使全世界的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基地集中到中国。而东南亚国家因为劳动成本上升、地价上涨、经济泡沫化等方面的发展和影响，吸引的外资逐渐集中到电子、电器和汽车零部件等较高附加值产品方面。其他劳动密集产品，因为劳动成本上升、配额限制等因素，或停止生产，或者转移到柬埔寨、老挝等地。当然，这种结构性变化，一方面反映了东南亚国家的产业升级，另一方面也使产业发展范围越来越窄，在不利的国际环境下很容易出现问题。1996 年，国际半导体产品市场价格大幅度下降（有的产品价格下降达 80%），它们原来生产的监视器、鼠标、键盘、电源等电脑周边产品又受到中国同类产品的强烈竞争，加上与日本合作进行生产的汽车零部件在日本轿车销售衰退的背景下无所作为；而日

本在该地区建立的家用电器工厂质量一般，明显无法应付中国国内市场的减价战，因而在中国市场被逐渐排挤出去；由此导致东南亚地区的出口局面逆转，终于被国际投资者炒作，引发汇率大幅度波动。东南亚地区出现的问题，固然与本国经济基础过于单薄，开放速度过快有关，但从国际大背景看，它们吸收生产性的外商直接投资的能力下降，或遇到了外部的强烈竞争而显示出在吸收外资方面的颓势，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6.3.3 引进外资优惠政策探讨

经过多年外资流入的高速发展，在1997年吸引外资协议额、签约合同数、合同平均投资额全面下降的情况下，世纪之交中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的势头有较大增长，但今后也还存在着增长速度减缓甚至下降的趋势。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政策建议，如果说在今后的国际经济竞争中，外资的作用不可低估，世纪之交，中国虽然可能会失去部分外商直接投资，但如果工作做得好的话，借加人WTO的机会，完全可以以中国稳定的政治和经济局面，不断扩大的开放领域，稳定外来投资者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世纪之交适当的恢复对外资的优惠政策，仍然可能保持中国在国际上吸引外资的优势地位。

实际上，世纪之交提出恢复对外商直接投资的优惠政策，绝对不是原来政策的反复，而是充分兼顾到中国国内经济状况、开发西部和国内特别是国有企业竞争能力提高和经营环境改善所做出的理性选择。因为在经历对外资政策的争论之后，目前中国外资企业与国内企业经营的环境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国内企业（国有企业、上市企业乃至民营企业等）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政策环境非常有利，无论是贷款、集资、还是税收减免都获得照顾，过去那种外资企业和内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状况已大大缩小了，甚至出现了逆转的势头，具体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第一，国内效益好的企业已经能够非常容易地获得银行贷款的支持。在各级政府“抓大放小”的方针下，随着效益差的地方“五



小”工业的生产力被果断地压缩，那些占据市场份额大的国内企业往往成为银行主动上门给予贷款的对象，好企业根本不用担心流动资金和技术改造资金的来源。这些企业在银行资金方面具有竞争力量。另外，国内 1 100 家国有企业通过“债转股”也将摆脱过去的困境，经营状况有所好转。

第二，企业通过上市集资，获得了大量资本金。这两年，中国的资本市场发育很快，大部分有效益的企业都被地方政府推荐上市，并借此获得了大量的资本金。由于经营状况良好，这些企业自有资金充足。即便在东亚金融危机的 1997—1998 年，中国企业存款也有 26 000 亿元，大多属于这些绩效非常好的企业。

第三，地方政府给予税收优惠。过去，内外资企业的不平等竞争状况十分严重，外资企业可以获得多种政策优惠，内资企业却要承担种种社会包袱和方方面面的额外负担。近一两年来，地方政府为了维持地方税收，尽力吸引企业留在本地，帮助企业走向全国市场，大大加强了对企业的扶持。例如，北京的燕京啤酒就一直得到所在的北京顺义县政府的大力支持，已经倒下、原来的中央电视台广告“标王”山东秦池酒，也曾经是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才投标成功的。

政府政策和市场环境的改善，也使中国国内企业在市场上的表现突出。近一两年来，中国过剩经济的特征十分明显，企业对市场的争夺战进入白热化，各地区、各种产品都掀起一轮轮的价格大战，为了扩大市场份额，各路商家都绞尽脑汁，力图先拔头筹。经过两年的市场竞争、兼并和整合，中国市场优胜劣汰的形势十分明显。一大批企业和名牌产品在市场竞争中（而非计划安排下）涌现，它们形象新颖，市场份额急速扩大，往往成为同行业的带头者。例如，各类家用电器都涌现出了一两家“巨无霸”型企业。微波炉的格兰仕几番降价之后，目前市场上的销售价格只有 400 元～1 200 元，远远低于国际市场上的价格，市场份额占到了 80% 左右；彩色电视机的长虹、康佳、TCL 王牌，经过去年的价格大战，也占了将近 70% 的市场，而且在大屏幕彩电等原来不具优势的领域，以低价格向进口产品发起猛攻；洗衣机的小天鹅、海尔、荣事



达等，电冰箱的海尔、美菱、新飞、上菱等，基本已占了大部分市场份额，不但淘汰了中小型的杂牌产品，也将一向受国人信任的日本和韩国品牌的进口家用电器打的毫无还手之力，甚至像手机这样的产品国产品牌也是三分天下有其一。其他产品亦是如此，无论价格还是质量都极具竞争力。例如，三年前人们一直担心的啤酒合资热，并没有让外资和外国品牌占据中国市场，反而是燕京啤酒异军突起，1997年产量就突破了70万吨，1998年形成了百万吨的规模。汽车行业追赶的势头也很猛，已经把过去坐而论道失去的10年时间赶回来了，2002年生产了325万辆，已经成为世界八大汽车生产国之一。

可以预计，在降价和大规模广告等促销手段下，以中国的市场容量，这些大企业的规模还会继续扩大，它们中的许多很快会成为世界某类产品单一的生产地，到21世纪中期，中国显然会成为世界最大的产品加工基地。而且，青岛海尔等一些企业还在走集团化的扩张道路，力图成为中国的“松下”和“三星”。内资企业在市场竞争中的成绩，令人们对外资企业和进口产品的认识发生了变化：外资不是洪水猛兽，在正常的市场竞争中，它们照样输给了中国本地的民族工业；民族经济也不是一盘散沙，只要策略得当，照样可以打败外资。同样以家用电器为例，天津与韩国三星合资生产的家用电器并未受到中国消费者的特别青睐；而日本的松下、索尼等在东南亚生产的进口家用电器柜台前，则可以说是门可罗雀。如今中国的消费者，根本看不上在东南亚生产的日本电器，反而是对自己的国产货充满信心。因此，从全新的角度考察给予外资的优惠政策，利用国内的竞争促进外资的升级上档，提高利用外资的水平，同时利用外资促进国内经济的结构转换和持续发展，中国已具备了这样做的条件和基础。

总之，由于东亚金融危机的发生，如何进一步增强中国对外资的吸引力的问题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通过中国内资企业与外资企业的正面交锋，在消除了对外资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垄断中国市场的心理阴影后，中国吸引外资的优惠政策有



必要进一步放宽，需要陆续出台一些对外资的优惠政策。而且，这种优惠政策的恢复，还可能需要属于长期性质。当然，中国在提出新的优惠政策时，一定要考虑国内产业结构和市场结构的调整等多方面的因素，而不是单纯实行地域倾斜。

6.4 世纪之交的人民币汇率

对于人民币汇率的走向，根据国内外大量的研究报告，普遍认为在充足的外汇储备下，只要中国不放开资本账户，短期内人民币不存在贬值的必要性，中国的外汇储备列世界第二（1996 年，笔者一次在中南海紫光阁听到朱镕基讲，中国的外汇储备将很好地维持在 1 000 亿美元～1 400 亿美元之间）。进入 21 世纪已经很少有人非要坚持人民币的贬值，甚至开始准备迫使人民币升值了。但国外投资银行的报告仍然担心中国由于出口遭受竞争，面对亚太地区经济的恢复性增长，会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本节将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人民币短期内贬值（升值）的不可能性。

6.4.1 外汇市场供求奠定人民币稳定的基础

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截至 2002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居世界第二位，达到 2 864 亿美元，出口保持一定的增长，进口基本得到控制，外资不断流入，人民币没有遭受多大的贬值压力，如果中国的外汇管理局能够采取适当的措施，单从外汇市场的供求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人民币的汇率完全可以维持稳定，当然从国家利益讲，现实采取升值的政策也是不可取的。

1998 年，当时中国对美国有大量贸易顺差（1998 年美国外贸逆差，主要来自中、日两国），人民币如果再主动实行竞争性贬值，难免会加剧中美贸易争端；同样，根据日本方面的统计，1997 年中国对日本也有超过 200 亿美元的贸易顺差，作为中国第二大出口市场的日本（包括转口因素在内，美国仍是中国最大的出口市场）

也不希望人民币进一步贬值，因此单从贸易角度看，1997—1998年美国、日本都不希望中国贬值；不仅如此，由于人民币贬值会严重影响周边地区稳定汇率的信心，正如美国财政部部长萨默斯1998年（时任副部长）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表示，美国严重关切人民币汇率稳定与否。因此，在20世纪末，中国的人民币汇率没有贬值的外部政治压力，反而有强大的压力要求稳定。即使从推动出口的角度出发，策略上似乎也应以调整国内政策（如微调出口退税率）为主，而不应贸然改变人民币汇率。

6.4.2 人民币汇率重大调整的时机探讨

1999年尽管当时东亚经济已经出现了恢复的势头，关于东亚地区经济遭受打击的程度，需要多少资金、时日方可恢复元气，尤其是一些学者仍然考虑东亚存在巨大危机的可能（克鲁格曼，1999），国内外众说纷纭，看法莫衷一是，有些意见相当对立。从这次金融风潮已有的过程出发，如果把这次金融风潮放在美、日经济矛盾和斗争的大背景下考虑，对于这次金融风潮的分析仍然有待进一步深化，目前难下结论。在仍然存在变数的情况下，在当时进行人民币汇率的重大调整，时间上未必适宜，当然，从中国金融的进一步深化改革和利率的市场化看，应该说当时汇率浮动幅度的进一步加大对中国是有益的。

6.4.3 人民币汇率是经济发展状况的反映

从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的经验来看，本国货币对外汇率随经济发展大多经历了"高估—贬值—稳定—升值"这样的过程。尽管在经济发展的不同阶段，汇率作为调节经济的手段之一，可以人为地使之升降，并在一定时期内维持高估或低估，但总的来说，汇率必然要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总趋势，人民币并不能例外。1948年1月18日在天津首次公布人民币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货币的官方比价，当时为1美元兑换80元旧人民币；从1948年1月18日到1950年3月13日，共下调人民币对美元汇价

52次；1955年人民币改革后则为1美元兑换2.461 8元人民币，这一兑换率一直维持到70年代；70年代因美元危机，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一路上扬，从1971年12月的1美元兑换2.267 3元人民币调整至1978年1美元兑换1.683 6元人民币，而1980年，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兑1.47元人民币，此后该兑换率一路下滑：1985年为1美元兑换2.8元人民币，1990年调整为1美元兑换5.2元人民币，1991年则为1美元兑换5.8元人民币，而在1980年10月开始的外汇调剂业务中，人民币对美元的比价是随供求浮动的，1993年6月曾经达到过1美元兑换10.9元人民币的水平，1994年外汇汇率并轨时，1美元兑换8.7元人民币，目前则维持在1美元兑换8.27元人民币上下。这一兑换率是中国近年来进行宏观经济调控、深化改革开放在一个方面的客观反映，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趋势，是一种均衡，人为去破坏这种均衡并不一定十分有利。

目前在中国人民币汇率是市场力量作用的结果，是由同业拆放市场中的供求决定的。人为干预在一定时期内会使之变动，但在长期中，市场力量最终要对它进行符合实际的校正。中国1994年1月1日实行双重汇率并轨，1994年4月形成同业间市场，1996年底在经常项目下开始实行人民币的自由兑换，2000年9月又决定外汇利率的相对放开，加大市场的作用，人民币汇率的决定日益市场化。在这方面，改革的步伐一步深似一步，市场的作用在不断加大，人民币汇率作为一种配置资源的手段、利益格局调整的工具，日益受到市场的规范、制约和决定。在我国对外贸易存在较大顺差、投资环境对外资有较大吸引力的今天，中国外汇总供求的格局是十分清晰的，这一供求状况必然会影响、调节人民币的对外汇率，人为因素的作用很难在长期起主导作用。

6.4.4 中国经贸竞争力的实证分析

保持对外贸易出口竞争力不能长期依赖人民币汇率的贬值，通过非价格因素形成的产品竞争力才是对外贸易出口增长的长久动

力，这既是世界各国发展出口具有共性的经验，也是我国对外贸易出口深化改革、促进发展的趋势。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已经使传统体制所具有的普遍短缺格局产生了根本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经济已经从买方市场主导逐渐转化成为卖方市场主导，加之近年来就业压力的不断增强，出口的增长实际已经成为稳定社会经济生活、促进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在全国上下形成了共识。但是，单纯的货币贬值对于提高一国出口的长期竞争力并无帮助，反而会因过分依赖价格因素阻碍长期竞争力的真正提高。更深一步说，世界上绝少单纯通过贬值实现经济繁荣的先例。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阿兰·格林斯潘在1997年11月14日的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上讲过："贬值对国家有益？答案是：错！贬值可能在短期内为本国创造一些竞争优势，但非常短暂。贬值后通货膨胀飙升，它所创造的竞争优势也就随之灰飞烟灭。"这句话是有道理的。除了价格因素外，商品出口竞争力还取决于产品创新、体制创新、质量、花色、规格、售前售后服务、促销手段、销售渠道、支付条件、处理争议等方方面面的情况。在上述这些因素上下功夫，一方面是我们深化改革、力促"两个转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是创造长期出口竞争力所必需的。中国的对外贸易发展和经济发展已经到了这样的阶段，转换思路、转换机制、转换行为方式势在必行。

1998年，人们普遍认为，为了与东亚其他国家竞争出口市场，人民币小幅度贬值对于促进出口没有作用，但笔者认为，仅从经济上考虑，当时根本不存在人民币大幅度贬值的条件。假设人民币按照当时人们的预料需要贬值30%，按照当年希望有1 600亿美元的出口业绩，和5%的出口增长来衡量，如果将占50%左右的进口加工贸易也包括进去，则受人民币贬值影响的出口额将为800亿美元，即中国将用相当于240亿美元的出口实物量的增量，来保证1 600亿美元的出口数量。但是，我们很难想像，在一年之内，世界市场在东亚经济危机打击而极度萎缩之下，可以毫无障碍地额外吸纳中国240亿美元增量的货物，从历史上看，中国的出口也很难在一年内增长240亿美元的实物。另外，用240亿美元的货物实物

的出口增长，换取 5% 的出口价值（约为 80 亿美元）增长，从经济角度实际是很不可取的，如果进一步分析，中国的贸易条件也将极大恶化，即单位出口只能换回更少的商品，即用 1 300 亿元人民币进口过去 1 000 亿元左右的货物，经济效益将大幅下降。从理论上分析，人民币贬值，在国内价格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国内产品的外币表示价格降低，从而具备了相对的价格优势有助于扩大出口数量。但是人民币贬值同时也意味着出口单位产品所赚取的利润减少，只有当出口数量增加带来的利润增大抵消由于单位产品价格下降导致的利润变小，人民币贬值才会最终达到增加收益的目的。马歇尔-勒纳条件解答了这一问题：当一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与该国对国外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之和小于 -1 时，该国货币贬值有利于改善国际收支，创造更多的外汇收入，公式为：$dx + dm < -1$，其中 dx 为该国出口产品的价格需求弹性，dm 为该国进口产品的价格弹性。北京大学的厉以宁教授在 1991 年对我国 1970 年到 1983 年的统计数据进行分析后认为：我国的进出口需求弹性分别只有 -0.687 1和 -0.050 6。而陈彪如教授于 1992 年利用外经贸部统计的 1980 年至 1989 年的进出口价格指数和贸易量指数进行回归后，得到以下结果：我国的进口需求价格弹性为 -0.300 7，出口需求弹性为 -0.724 1，进出口需求的价格弹性之和为 -1.024 8，恰好位于临界值，人民币的升贬对改善贸易收支作用不大。但是，也有的学者并不同意这一看法，中山大学的戴相祥通过对 1981 年至 1995 年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我国的出口价格弹性为 -1.033 1。该数据表明如果在国内外价格水平保持不变或发生同等程度变化的情况下，人民币贬值 1%，即出口产品价格下降 1%，则出口数量增加 1.033 1%，因此出口总收汇上升。虽然进口需求受国家宏观计划影响，但因为我国进口产品主要是一些必要的资本品，而非奢侈品，故无论如何进口需求的价格弹性必然为负。IMF 的统计分析结果我国进口需求价格弹性约为 -0.3，而且在短期内，相对价格和进口需求之间存在显著的反方向变动关系。至此，我国的进出口需求价格弹性为：



$$-1.0331-0.3=-1.3331<-1$$

不等式说明我国可以采用人民币贬值的办法扩大出口，改善国际收支。历史同样印证了这一点。从 1981—1995 年间，人民币汇值前后五次调低，其中四次出现了贸易收支顺差额明显扩大。下面的表 6—3 显现了人民币几次对外贬值后中国对外贸易变化的情况，1994 年人民币对外双重汇率并轨，此后尽管人民币对外汇率变化不大，但中国的对外贸易的状况却出现了很大的变化。

表 6—3　　1981—1994 年的五次汇率下跌　　单位：万美元

时间	贬值前汇率	贬值后汇率	贬值百分率	之后贸易变化量
1981.01	153.03	280.00	82.97	+623 000# *
1986.07	320.00	370.00	15.63	+394 100
1989.12	372.21	472.21	26.87	+1 534 800（1990 年数据）
1990.11	472.21	572.21	10.59	−69 400（1991 年数据）
1994.01	580.00	870.00	50.00	+1 760 800

* #数据单位是万元人民币。

资料来源：戴祖祥：《我国贸易收支的弹性分析：1981—1995》，载《经济研究》，1997（7）。

1989 年和 1990 年是两个不十分正常的年份，由于 1989 年的政治风波许多西方国家对中国进行贸易制裁，使 1990 年进口锐减，相应的贸易顺差异常扩大；而在 1991 年一些国家先后与中国达成妥协，放松或放弃了严厉的制裁，部分被延缓的进口计划重新被执行，结果导致进口激增 104.46 亿元，完全抵消出口的增长，贸易收支表现为逆差。笔者运用 TSP 统计软件对中国 1986—1999 年的对外贸易和汇率之间的关系作过相应的回归分析，其结果表现为：对于中国的出口，在正常环境下，人民币的贬值对于出口具有相应刺激作用，但对于进口却缺乏较强的限制作用，因此，从整个对外贸易角度，人民币贬值的作用被削弱，即便对于出口笔者认为 1997—1998 年的特殊情况使得人民币对外贬值的效应将在今后相当长的时间内大打折扣：T 为时间因子；X 为出口；$E(t)$ 为当年汇率；$E(t-1)$ 为上一期汇率；样本区间为 1986—1999 年。

其多元回归方程为：

$$X=-258.219+25.654\times T+82.191\times E(t)+90.496\times E(t-1)$$

$$[-7.0819\,1]\ [2.8427\,9]\ [6.309\,75]\ [7.244\,58]$$

$$(0.206\,402)\quad (0.398\,248)\quad (0.420\,604)$$

$R^2=0.995\,959\,5$

$F\ (3.7)\ =764.07$

$S.E=21.146$

上述回归方程公式中的各个系数，均有其固定的经济含义：

1. 方括号内的数值为 t 统计值，圆括号内的数值为标准回归系数，$S.E$ 为被解释变量的统计标准差。R^2 表示回归方程中的各个解释变量，如 $E\ (t)$、$E\ (t-1)$ 等与出口 X 之间的相关程度，本方程表示，该数值非常接近 1，说明各个解释性变量，如上期汇率、当期汇率等均与出口密切相关。

2. F 值是检验回归方程总体效果的统计量，用于考察回归方程对于样本观察值拟合的情况。在 5% 的显著水平下，F 的临界值为 4.35，式中的数值明显大于 4.35，$S.E$ 较小，因此方程总体拟合较好。

3. t 统计值在 5% 的显著水平下，查 t 分布表，临界值应为 2.365，式中 t 值的绝对值均大于该数值，说明解释变量对于被解释变量具有显著的解释关系。

4. 标准回归系数说明式中各解释变量的相对重要性，其中 $E\ (t-1)$ 的标准回归系数最大，说明上期汇率对于出口有着重要的影响，或汇率在影响出口时具有时滞效应。

同样对于进口的多元回归方程为：

$$M=-69.497\,2+32.533\,4\times T+51.223\,1\times E(t)+78.121\,1\times E(t-1)$$

$$[-0.569\,867]\ [1.078\,997]\ [1.177\,868]\ [1.872\,656]$$

$$(0.300\,767)\quad (0.285\,21)\quad (0.417\,064)$$

式中 R 的平方也接近 1，在 5% 的显著水平下，F 值超过临界值，说明进口与汇率和时间因素有关，但 t 检验均通不过，统计标准差



S.E 值也很大（90 以上），表明进口受汇率影响之外，其他因素也有很大影响。

6.4.5 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有助于引进外资

中国在 1997—1998 年的东亚金融风潮中几乎是惟一没有受到巨大金融冲击的国家（我国在海外的部分资产也遭受了一定的损失），现在被视为东亚金融秩序的巨大稳定因素，同时也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从金融的稳定发展来看，中国在金融服务领域有序开放、稳健推进的政策被证明是正确的，它使得中国在这场风潮中游刃有余，从容总结吸取他国（地区）的经验教训。但是，中国处于东亚经济之中，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金融状况息息相关。首先，人民币汇率今后的稳定对于香港金融市场恢复增长至关重要。香港是内地吸收外部资金的重要来源地，例如 1997 年香港股市就为内地企业筹资超过千亿港币，反过来内地经济的繁荣，也是香港稳定和持续发展的重要推进因素。1997 年 10 月 23 日香港股市大幅度下跌，主要是投机资本在香港汇市、股市大轮卖盘引发的，1998 年 6 月股市再次暴跌，则可归因于日元不负责任的大幅度贬值，两次冲击的影响较大，尽管在 1998 年 8 月香港对投机大鳄进行了致命的一击，但香港经济至今恢复得似乎慢于其他东亚国家与地区，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对于香港金融市场克服困难、建立信心仍然是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其次，人民币汇率的稳定将会带给世界对东亚经济发展的信心，有助于东亚国家的经济恢复；最后，人民币汇率在这一阶段的稳定，也将有助于缓和中美之间的贸易麻烦，同时将有助于中国更深入地融入世界多边贸易体制和经济全球化的进程。

总之，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既是现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需要，也是中国长期以来经济稳定高速发展、近年来低通货膨胀率、银行存贷利率下调、对外贸易长期顺差、大规模长期资本净流入以及较高素质、较低成本劳动群体辛勤工作的结果。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进一步深化，这种良性的经济形势还将持

续下去。人民币汇率作为中国对外经济状况的反映，必然会与之一致，坚挺的趋势仍将存在。另外，中国在加强出口竞争力方面，不应该也不会把注意力更多地放在人民币的对外贬值上，而是会采取更为积极的进取手段如转换对外贸易机制、促进进出口商品结构的转换、加强出口产品的技术含量以及更多地运用非价格竞争手段，等等。当然，随着经济发展的需要，汇率在稳定的基础上也必然会产生变动。但从非市场因素看，当前绝对不是人民币贬值或升值的时机。从决策者的角度看，汇率贬值，应该符合市场供求走势和人们的预期，如果时机不对，在前景不明时贸然实行贬值，很容易导致外汇市场信心崩溃，如果加上外围因素兴风作浪，则可能在长时间内失去汇率的稳定。目前的周边环境，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动为上，有关人民币浮动的决策，应当在风平浪静时做出。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在金融风潮中实行货币贬值，其负面影响在多数情况下总是大于正面影响的。

当然，人民币贬值与否要取决于中国经济和政治的实际需要，也取决于国际周边环境的变化。如果某种意外情况出现，人民币真的需要贬值，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既没有资格和能力，也没有必要以牺牲自己利益为代价，去稳定东亚乃至世界经济。应当说，人民币汇率稳定，是中国为东亚经济稳定做了贡献，但中国绝对没有义务为维持东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而严重牺牲自己的根本利益，现在有一种说法，要求中国人民币对外汇率升值，这将不利于中国出口而使进口增加，至少目前中国还不具备作为世界商品实现者的条件，更何况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本身需要克服的困难就很多。

6.5 中国对外开放：理论的归纳

对外开放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外部资源（包括有形与无形的资源）对于中国经济至关重要，可以缓和中国经济发展中存



在的某些瓶颈，有利于世纪之交中国经济发展的平稳过渡，更有利于中国与世界各个国家的往来。可以讲，中国的经济发展就是将自己融入世界经济的过程，是开放不断深化的过程。

6.5.1 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南北关系

十几年的经验表明，在和发达工业化国家的经济往来中，中国与它们在经济结构、劳动生产率、商品需求强度、科学技术水平、商业运作惯例、市场需求等方面的差异，各自拥有的对方相对稀缺的资源、要素和市场条件的情况，以及国内经济生活中存在着的矛盾和困难，使双方结成了基于利益的互补关系和相互依存关系。当然，这种依存关系是不对称的，即中国对发达工业化国家的依存程度（在商品、资金、技术等方面）大于他们对于中国的依存程度。但是，从另外的方面来看，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在各方面的差异，尤其是经济结构的差异（彼此间最根本的差异），使二者间经济关系的主导面是互补的，且这种互补性远大于彼此间的竞争性，依存、互补产生了具有特色的国际分工格局，差异又带来了基于比较利益的好处，双方均有收益。

从中国方面讲，获得的外部资金、技术、设备和市场，不仅比靠自己的“自力更生”节省时间、节约成本，而且为中国积累了日益强大的经济实力，给日后的发展奠定了全新的基础。这一趋势在上世纪末及下世纪初期，很难发生根本的扭转。只要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之间的依存、依存的不对称性依然存在，双方间的互补性就会大于竞争性，尽管会有这样、那样的冲突发生，合作将是彼此经济关系的主旋律，竞争则是副旋律。

在与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中，中国在发展的“雁行结构”中与他方的差异，使彼此基于比较利益开展的商品、资金、技术交流有很好的前景，双方亦有现实的收益。但是，由于中国本身就是发展中世界的一员，因而在总体上，与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相比，在经济结构、资源禀赋、要素存量、需求层次、科学技术方面的差异较小，互补、依存的不对称性较弱，这使得双方除了因利益

的交叉而存在的合作外，还存在着在引进外国资金、争取国际援助，尤其在争夺出口市场等方面的利害冲突和竞争。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以及同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间差异程度的减弱，这些方面的矛盾日益突出，彼此经济关系中的竞争已经成为不可忽视的问题，这种冲突与矛盾出现的越来越频繁，并且愈演愈烈，影响着中国与其他发展中世界成员（尤其是周边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往来，也影响着中国经济未来的发展。中国必须正视和解决这些冲突与矛盾，否则将对自己经济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

6.5.2　南南关系中的中国经济发展

首先，世界市场吸纳来自发展中世界的商品的能力是有限的，但发展中世界向世界市场供给商品的能力（尽管自身存在着总体供给约束）却似乎正在向无限的方向发展，造成了发展中世界内部的竞争。根据世界银行 1998 年发展报告的统计数字，全世界 132 个国家和地区的出口统计在册，其中来自 23 个高收入国家和地区的占近 45%，其余的则留给了 109 个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和地区去“分享”，这是一个极大的不平衡。另外，近十几年来，发展中世界成员在看到了东亚地区外向型经济道路的巨大成功后，大多认同了走出口导向进而带动经济结构转化的发展道路，事实上在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中，东亚地区（含中国）占了近一半，强烈的示范作用促成了很多后来者的仿效，形成了众人争过独木桥的现象，中国如果不努力则有被挤下桥的危险。

其次，中国与发展中世界的大多数成员，尤其是周边的发展中世界成员，出口产品结构趋同，出口市场归一，竞争（在第三国市场中）态势已经日显紧张。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与周边发展中世界成员的出口市场指向相同且集中，出口结构虽然有差异但基本属于同类，美国、日本和西欧是大家的主要出口市场，消费类电子产品、服装和日用轻工产品则是出口的主要大类商品。以中国大陆、中国香港、中国台湾为例，由于市场拓展集中，美国、日本、德国、法国、新加坡和意大利都是占排名前 10 位的出口市场，而



美国又是占各自出口 1/6～1/4 的最主要的出口市场，出口商品“撞车”时有发生，多家竞争，难以相让。近几年中国台湾在美国、日本所丧失的市场份额，基本上被大陆所获得。

再次，在产业结构方面，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互补性较好，合作具有基础，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则因结构及要素优势具有相似性，竞争性明显。以环太平洋圈为例，据太平洋经济合作第四次会议文件的分析，美国、日本在本地区的要素结构比较优势在于市场、资本、技术和资本货物，国际分工的部门结构比较优势在于电子、机械、中间产品和服务业；亚洲四小龙的要素优势为市场、资本货物、技术和劳动力，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相对集中于纺织、中间产品、消费型电子产品、普通机械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中国的要素优势在市场、资本方面与亚洲四小龙类似，技术和资本货物方面稍逊，劳动力和自然资源方面优势明显，国际分工的部门优势集中于纺织、机械、农业、资源、消费型电子产品，在服务业、中间产品、电子产品方面略输（黄，1997）。从要素、部门结构优势的分布表明，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起，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因结构差异大易于产生互补关系，而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则因结构差异较小，除了水平型层次上的合作外，更易于产生竞争。

最后，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在争取外部资源的流入方面也存在着矛盾与冲突。中国是个发展资金缺口较大的国家，东亚地区的发展中世界成员，除了亚洲四小龙外（事实上在东亚危机之前作为整体它们已经成为本地区的资金提供者了），大多都在尽力争取外部资源以投入本地区的建设和发展，大家对条件优惠的国际经济机构和双边官方援助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这样便在彼此间产生了争取外部资源的矛盾，这一矛盾由于东亚金融危机而显现得格外突出，不仅是争取，而且在竞争，在短期内很难得到彻底解决。

6.5.3 竞争中的合作，合作中的竞争

综上所述，中国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之间的经济关系，既存在着合作，更存在着竞争与利害冲突。目前，尽管这种竞争与利害

冲突尚较为间接（争夺第三国市场，争取第三国资源），但发展趋势却不容忽视。由于发展层次的差异，中国与发达工业化国家间的竞争，大多局限于彼方的所谓“夕阳产业”领域（高技术间的竞争如空间技术，占的比重极为有限），尽管有时显得激烈，却只是互补关系的补充；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间的关系，则是合作中的竞争，且竞争的态势由于东亚危机的出现日趋明显，已经影响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进一步深化和发展。笔者认为：中国经济欲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需首先与发展层次差异较大的发达国家合作，吸取资金、技术等先进的生产力，同时与经济发展水平相近的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尤其是周边国家展开竞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进而与发达工业化国家进行竞争，以取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应有的地位。在对外开放中，合作与竞争的关系应该是，合作使双方互利，竞争使双方互促，相反相成。从长远来看，中国在对外开放中不强调竞争不行，强调竞争而忽视与发展中世界其他成员的竞争，尤其是与周边者的竞争则更不行，竞争将是中国经济进一步发展的动力。因此，竞争中的合作与合作下的竞争将是中国发展和深化对外开放中最强的时代主旋律，只有竞争的优胜者才有资格成为21世纪乐章演奏中的首席小提琴师。

6.6 中国对外投资：东亚金融危机中值得探讨的一个问题

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发生后，中国对外投资受到的影响并未得到人们更多的重视。由于中国（包括地方政府和产业部门）在香港有大量的投资，香港股市下跌、金融市场动荡、红筹股和H股指数下降，使得中国内地在香港的金融资产缩水，蒙受一定程度的损失。根据中国有关部门的统计，香港市场大约占了中国海外资产的1/3，新加坡的比重也不小，因此，一些专家在探讨东南亚金融危机时，认为中国企业可以置身事外，中国从中得到的是警示性作



用，这种观点应当是不确切的。但如今，基本没有专家甚至仅仅是从警示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海外投资的损失。

首先，金融危机的发生，使中国企业海外筹资的一些行之有效的办法短期内无法继续下去，如在香港发行H股、发行红筹股、红筹股注资等方面，可能会面临熊市。而单在1997年，中国就通过红筹股的方式，从香港市场筹集了900亿港元的资金，单是中国电信一家就得到了300亿港元。在东亚股市低迷的情况下，这种引进资金的好景短期内难以完全恢复，需要向欧美国家拓展引资的渠道。

其次，1997—1998年的金融和经济危机导致东南亚和韩国股市大跌，资产大幅度贬值，给中国企业进一步对外投资、购买外国资产，提供了一个大好时机。1997年底至1998年底，东南亚地区许多资产，已经跌到了原来价格的10%左右，远远低于其实际市场价值。看中这一点，美国企业当时曾经进军韩国收购当地大企业(如传说中的通用收购韩国大宇汽车50%的股权)，美国金融企业大肆收购这一地区的金融机构等；连台湾也利用了这次危机，再次推动南向政策，鼓励台湾企业的收购活动，力图在今后的东南亚廉价资产抢购战中先行一步。按照台湾企业的兴趣，它们收购了当地一些金融机构，如京华收购泰国一家商业银行、香港山一证券的一家分公司，台湾半导体企业探讨了收购韩国半导体工厂的可能，其他企业则成立了投资基金和股份公司去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等地集体收购当地的能源工业、外向型企业和旅游业等资源。应当看到，在金融危机中人民币汇率巍然不动，虽然给中国的外贸出口带来了压力，但也给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带来了巨大的机遇。应该说在东南亚地区的金融市场完全恢复到危机之前，是进军东南亚市场的大好时机。金融危机过去，东南亚地区的资产将会随经济复苏而迅速升值，从而失去投资机会和利益。

最后，如果中国的海外直接投资能够在此时有所作为，实行“走出去”战略，无疑会大大加强中国企业的适应能力和国际竞争能力，扩大中国经济的对外开放，壮大中国经济的实力，大大增强



中国经济在世界经济一体化中的地位，这也是中国经济发展过程中所需要经历的必然过程。

东亚经济和金融危机的爆发，其时间之长、蔓延范围之广、破坏性之大，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研究这次危机与中国对外经贸发展的关系，研究东亚危机对于中国经济发展外部环境的变化，研究面对危机，中国在世界经济中地位的变化仅仅是一个起点。今后对于东亚这次经济危机的成因、过程、后果乃至对策的研究，将逐渐深化，不仅涉及中国的对外开放、发展战略和道路以及国家利益，而且也会对现时国际经济关系、世界经济发展格局产生重要的影响和作用。

第7章　新时期的农业转型与农业发展

“国以粮为本，民以食为天”，在跨入新世纪的今天，这句谚语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具有悠久农业传统、人口中农民仍占绝大部分的国家，依然具有深刻的含义。不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状看，农业问题在中国一直是个根本性的问题，粮食生产也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中国的发展，从根本上说，就是要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中国的现代化水平，就是要看农村的现代化水平，农民的现代化程度。农村、农民、农业的“三农”问题，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也是中国解决许多重大经济问题最后一个“扣子”所在。这个问题解决

了，许多问题将迎刃而解。“三农”问题的核心是农业问题。故此，农业的转型与发展，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根本性的意义，是整个国民经济的根基所在。根深才能叶茂，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才能实现国家的现代化。“小康不小康，关键看农村”，只有农村实现小康了，才能谈到整个社会的全面小康。

“面朝黄土背朝天”的中国农民，在改革的进程中，特别是在初期，多次像“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中所说的那样，走在了改革的前列，表现出惊人的创新和开拓精神：小岗人开始的“包产到户”成了后来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社队企业为开端的发展后来成为占据三分天下的乡镇企业，袭动全国以至全世界的“农村人口大流动”给改革带来了勃勃生机。农业生产、农村经济、农民生活在短短的十几年内连上几个台阶，成为中国经济大发展中的悦耳旋律。不过，近几年来，农业生产出现了徘徊不前的局面，农民收入增速减缓（1998 年、1999 年还出现绝对额下降），农村经济同样如此，农业发展处于一个重要的转型关头。对于农业的基础地位和重要意义，我们自建国以来一直有着清醒的认识。1998 年 10 月召开的中共十五届三中全会，再次提出了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关系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重大问题，并相应做出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强调“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积极探索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村改革和发展的重大课题”。

中国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包含着夯实现代化的农业体系，实现农业的产业化、市场化；认真落实环境保护的工作，切实提高农民的收入水平；积极消化和转移农村的剩余劳动力，大幅提升农民素质等内容，千头万绪，任重道远，是一组历史重任的浓缩和融合。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具体途径，是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在市场化的基础上获取农业的大发展，最终走上集约持续农业发展的光明大道。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然而，却又势在必行，加大农业投人，特别是加大对农民的教育投资，进行农村经济的配套改革，是农业现代化的重要措施。



7.1　农业的基础作用与“去掉农民”

在经济发展中，现代化的意义，必须首先实现工业化，对于中国来说也同样如此。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技术水准的进步，一二三产业之间是顺次提升的过程，作为第一产业的农业，其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逐渐下降，农业中的就业人口在总就业人口的比重也同样出现下降趋势，这在我国的发展中也得到了验证，趋势是一致的。但是，农业大国的悠久传统以及占人口64%的农民大军，使得农业在中国具有特殊重要的基础作用，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也必须结合实际国情慎提“去掉农民”。

7.1.1　农业的基础作用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其基础作用的下降，作为“百业之基”，农业仍然在现代经济中具有重要的基础地位，尤其是在中国这样一个拥有8亿农民的国度里。在发展经济学的论述中，虽然也提到了工业化过程中农业在经济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去掉农民”的转变过程，但同样也没有否认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在中国的实际情况中，工业化进程呈现出一种复杂性和特殊性，农业在我国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更有其特别重大的体现。

从历史上看，建国之后的经济发展很大程度上实施了超前工业化的政策，整个国民经济建设向工业倾斜，农业成了受剥夺的产业；即使如此，农业仍然为经济发展提供了粮食、原料、资金、市场、劳动力等，起到了发展经济学中所说的重要贡献，在今后的经济发展过程中，这些作用依然存在，有些还可能会强化。

1．农业为国民经济的发展提供了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各种工业原料，对于有超过60%的人口居住在农村的中国来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无论任何时候、从任何角度看，粮食的基本自给均是国家稳定和发展的前提。即使在市场全球化、一体化的过程中，农业

中的粮食生产仍然为重中之重。为了保障粮食供给，国家做出了许多努力，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正是政府的大目标之一。

首先，农业提供了粮食、棉布、油料、水果等必需的生活资料，是人们生存的基础。没有了农业，这些食物就丧失了来源，人类的生存都成了问题，更不用说其他了。粮食生产更直接与人民的生活水平密切相关，人均粮食占有量是一个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在不可能大量进口粮食的情况下，自身的粮食生产就尤其重要。其次，农业是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从人类的历史来看，社会的几次大分工，都是建立在农业发展的前提和基础上。工业特别是轻工业中的许多原料都依赖农业来提供，如棉花、亚麻、糖料、蚕茧、皮毛、烤烟和其他畜产品。在当今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工业的发展都离不开本国或者外国的农业，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几乎所有经济发达的国家，战后都建立在农业发达的基础之上。如果把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当成一个大循环，那么农业无疑是这个循环的起点。

2. 农业为国民经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要素——大批廉价的劳动力。在中国农村经济发展中，一个最为亮丽的风景就是乡镇企业的崛起，其中重要的支持就是农业当中转移出来的大批廉价劳动力。由于人工成本的低廉，使乡镇企业得以在低起点上凭借新兴产业的产品、低廉的价格迅速地进入到整个市场当中，并马上就有了不错的销售业绩，从而有了发展壮大的基础，就连当今赫赫有名的中国鞋王——森达集团，也是以小作坊发展起来的。对工业部门而言，农业中释放出来的劳动力数量充足、成本低廉，促进了它们的极大发展，特别是改革开放初期发展起来的各类“三来一补”企业，价格的优势是它们得以在国际市场上立足的重要原因，这个时期的出口迅速增长又为整个国家经济发展积累了宝贵的外汇。同时，在城市经济的迅速发展中，农村的劳动力也大大缓解了环卫、建筑、餐饮、服装等行业人手不足的紧张状况。闻名全国的“民工潮”就是对劳动力要素贡献的一大注解，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区工业的发展，这些“外来工”功不可没，他们的辛勤劳动和低廉价格



是当地经济发展的重要支撑。从经济发展和社会分工来说，农业部门的劳动力转移为整个国民经济的腾飞提供了一个基础，是经济起飞的一个重要前提。

3. 农业的发展为整个经济提供了一个广阔的市场。农村由于其地域广阔、经济发展差异错落，为工业产品提供了一个广阔无比的市场。在改革初期，轻工业得到了巨大的发展，农村的市场需求在其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中国而言，广大的城市和广大的农村构成了分层的良好结构。中国是一个大国，长期依靠出口来促进经济的长期发展是不可想像的，国内市场的需求从根本上讲是关键因素，建立完善的国内市场体系也就越发重要起来。城市的相对先进和农村的相对落后可以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一个完善的市场链条，使得产品能够在满足城市需要的同时向农村转移，以延长其生命周期。同时，由于农村发展水平的差异可以为各种产品提供需求层次不同的各类市场。

对于工业来说，城乡之间消费链条的连接具有异于寻常的意义。农村市场广大而又充满空白，亟待开发，许多已经在城市处于饱和状态的产品，在农村可能刚刚开始消费，还具有广阔的市场。在近几年的经济调整中，农村市场的重要性正日益体现出来。启动内需迟迟难以奏效，重要的原因就是农民的消费没有上升，反而有下降的趋势，从而使得工业品的库存有增无减，包括家用电器以及很多其他工业品。城乡之间消费断层的出现，使得产品转移的链条断裂，产品生命周期的平缓过渡受到严重阻碍，内需的启动因而变得益发步履艰难。农村市场需要开发，也需要培育，切实增加农民的可支配收入是启动农村市场的关键，这就需要农业的发展与适当的政策倾斜。农民的消费倾向明显比城镇居民高，农民的消费能力和农村这个市场绝对是商家必争之地。农村市场的存在，使得中国的内需市场可以形成一个较为完整的体系，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现在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尽快地重视和以实际行动来激活和开发、培育这个市场。

4. 从经济发展过程看，农业中初级产品和各种土特产品的出

口为经济的发展争取了宝贵的外汇。中国的初级产品、土特产品的出口在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初期都在出口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并进而在国际市场上创下了不小的声誉。

除了上述所说的发展经济学中“农业四大贡献”之外，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具有悠久传统的农业大国，中国的农业基础地位更有其特殊的重要性。从我国经济发展历史来看，经济的发展受制于农业发展的趋势非常明显。我国曾几次企图加速工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都因农业承受不了，难以提供足够的支持，导致国民经济的比例严重失调，被迫降低发展速度。对于中国来说，国民经济愈向前发展，必须愈益重视农业，这已经成为共识。同时，农业还是我国大部分人口谋生的基本手段。因此，在我国的工作布局上，必须始终把农业放在第一位，正如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大力发展农业不仅是保障人民生活的要求，也是发展工业和第三产业的要求。”

7.1.2 “去掉农民”与工业化

在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中，有一个“去掉农民”的说法，就是指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慢慢下降，农业的生产效率将逐步提高，同时大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将由农业部门转向非农业部门，农民在国民经济中就业的比重将以比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更快的速度下降，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去掉农民”，实现工业化，这个进程已经被经济发达国家和部分后起国家所验证。然而，在中国，问题有其特殊性和复杂性。

中国具有庞大的农业人口，9亿农民的存在不是说去掉就能去掉的，也不仅仅是工业化如此简单。在考虑到中国庞大的就业人口后，农业人口向工业部门的转移绝非易事。随着工业化进程的深入，其对劳动力的吸收呈现下降的趋势，而且随着资本、技术密集型产业的不断涌现和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日趋上升，对劳动力有一种排斥的情况；中国赖以转移农业人口的重要部门——乡镇企业，在“去掉农民”的过程中也越来越步履维艰，城市对农村人口

的吸纳也已经不堪重负。故此，“去掉农民”在中国并不如字面那么简单。实现“去掉农民”的目标，必然要大规模减少农业就业人口，实现农业的规模经营。但当前中国的“小农经济”仍然是汪洋大海，加上各地农业生产条件千差万别，在非农产业就业机会有限的情况下，在全国进行农业的规模化经营还必须因地制宜，不能无限制推广。因此，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重申要“长期稳定以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只有“少数确实具备条件的地方，可以在提高农业集约化程度和群众自愿的基础上，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适度规模经营”。因此，“去掉农民”在中国来说应赋予新的含义。在慎提“无工不富”的同时，“去掉农民”也应该慎提。可以说，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解决农民问题的着眼点仍然有很大分量在“农”上，在争取“去掉农民”的同时，要让农民具有更多的现代商品经济色彩，从大农业的角度出发，大力发展各种除种植业之外的产业，使农业生产具有经济价值高、规模适度、技术含量高和具有生态价值的特征，以农业发展的新思路来解决一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在短时间内难以有很大的改变，工业化的程度和广度也具有很大的地区差异，一味地强调农业人口向工业的转移，并不适合中国的国情。

所以，与“去掉农民”的工业化目标结合起来考察，中国农业的基础作用就有了更重大的意义。农业发展的状况，直接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经济发展综合水平相关。农业的发达程度，直接影响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没有发达农业支撑的工业化只能是一个“跛脚”的工业化。同时，中国“发达农业”的含义又不仅仅是国外发达农业的模式，必须探索出新路子，既要解决农民的收入问题、农业的效率问题，还要解决相当部分农民的就业问题，不能向工业部门“一转了事”。因此，农业的发展问题，与中国能否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能否维持社会的稳定，实现长治久安关系重大。只有在农业发展的同时妥善解决农民问题，中国的一切经济发展蓝图方有意义。当然，这并不是说农民向其他部门的转移就不重要，

而是必须防止把“去掉农民”简单化、绝对化、极端化。

对中国而言，在努力实现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同时，争取产业内部的最大消化能力，是新时期农业发展的重大挑战，也是农业基础作用的另一种表现，而且从我国历史上看，这个重要作用与上述的“四大贡献”相比并不逊色。长远看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化，“去掉农民”最终也是要实现的。但是在工业化深入和扩大的过程中，有很长一段时间内农业人口的大规模转移还难以实现，农业还必须承担重要的任务，其基础地位重要性更有特别的意义。

7.2 农业转型的途径选择

在农业现代化的过程中，曾经出现过各种思潮，在国际上也有争论。对于我国这样的发展中大国来说，在吸取各国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国情，走集约持续农业的模式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当前的重点是发展中国式的生态农业。

7.2.1 农业的现代化模式

最早的农业现代化模式是以现代工业装备农业，实行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水利化，采用现代的农业耕作方法和农产品品种，以开放式的商品经济替代封闭式的自给性传统经济，使农业生产力大幅提高、农产品商品化程度不断提高，从而使农业生产由传统农业发展到现代农业。20 世纪 50—60 年代后，西方发达国家先后通过该模式实现了农业的现代化。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该模式也越来越显示出严重的负面影响。由于工业性能源的投人不断增长，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同时，一是严重污染了环境，例如农药的大量使用及某些使用方法不当，使农药在土壤或水域中的残留越积越多，导致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超标；二是造成土壤肥力下降，土壤结构板结，有机质含量降低；三是农业生产成本提高，国家用

于农业的补贴大幅度增加，财政负担加重；四是水土流失严重，资源损失巨大。

被人贬称为“石油农业”的工业化模式的这些弊端，促使人们开始寻找新的农业现代化出路。之后出现了自然农业思潮，提出了“有机农业”、“自然农业”、“生态农业”等发展途径或模式，这股思潮在学术界非常时髦，但是由于其过分强调崇尚自然、反对人工合成化学品、否定人的能动作用、提倡返回古代式的传统技术而否定现代科学等原因对农业的生产实践影响并不大。在发达国家基本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同时，发展中国家开展了有声有色的“绿色革命”，主要内容是通过推广高产新品种（如矮秆小麦、矮秆水稻、杂交稻）带动农业的全面发展，在实际中形成了种子+化肥+灌溉的“三驾马车”局面，有人称之为“肥水农业”。绿色革命在亚洲、拉丁美洲取得了积极的效果。20世纪60年代以来，整个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速度快于发达国家，但在70年代转于沉寂，印度和中国是例外。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出现了可持续农业的思潮，既强调粮食安全与发展农村经济，又强调保护资源环境，实现生产、经济、生态三个持续性的统一。因此，可持续农业发展战略吸取了“石油农业”和自然农业的优点，避免了两者的缺点，一出现就受到了国际社会的重视，并很快成为农业发展的指导思想，成为一种新的农业发展模式。1991年4月，在荷兰召开的可持续农业与农村发展国际研讨会上，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对可持续农业下了定义：采取某种管理和保护自然资源基础的方式，以及实行技术变革和机制性变革，以确保当代人及其后代对农产品需求得到满足；这种可持续的发展（包括农业、林业和渔业），能维护土地、水、动植物遗传资源，并不造成环境退化；同时，这种发展在技术上是适当的，在经济上是能持续下去的，并能够为社会所接受。[①] 此外，绿色革命被重新提出，联合国粮农组织大力提倡“新的绿色革

① 陈耀邦：《可持续发展战略读本》，197页，北京，中国计划出版社，1998。

命”，重新肯定新品种、化肥、灌溉、农药在农业中的作用，但强调必须要与社会经济环境相适应，建立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重视对资源环境的保护。

7.2.2 中国农业现代化之路

对中国来说，由于人多地少、资源相对紧缺、自然环境复杂等国情，可持续发展农业对实现农业现代化就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也是中国国情的必然要求，只有这样，才能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人口和不断发展的经济对农业的需求。否则即使短期内满足了，也会给子孙后代留下巨大的隐患甚至灾难。对于我国现阶段来说，发展中国式的生态农业是重要任务。

生态农业一词由美国土壤学家威廉姆·阿尔伯旦奇于1970年提出，在中国始于20世纪80年代。近20年来，在总结广大农民三千年来积累的丰富生产经验基础上，学习和借鉴国外生态农业的经验并结合中国国情，中国的生态农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期间，中国的生态农业得到了与会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高度评价。实践证明，生态农业在中国大有作为，前景光明，是中国农业实现现代化的模式。在此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提倡的生态农业与西方的生态农业有本质区别。由于经济实力雄厚，西方发达国家在生态农业中追求生态效益，较少考虑经济效益，过分强调农业生态的生物学过程的自我维持，主张尽量减少农药化肥的投入。中国是发展中国家，在生态农业建设的过程中，把发展生产、发展经济放在首位，兼顾生态和环境效益，主张合理的化肥农药投入，强调有机无机结合，以及优化投入，以提高土地生产力和提高能量的产投比例。中国的生态农业，强调在系统层次上的综合，生态农业的内涵，早已超出替代农业的范畴，而是一种在区域层次上进行农业发展的综合建设体系。因此，中国的生态农业其基本思路与做法和“可持续农业”是一致的，在对可持续农业进行探索的过程中，它是我国农业走向现代化的重要途径。

就技术而言，以水稻专家袁隆平为代表，中国在世界上一向享

有与农业大国地位相当的荣誉。生态农业的基本原理要遵循著名生态学家马世骏概括的“整体、协调、循环、再生”四个方面。整体是指生态系统结构的整体性，必须从整体来考虑进行设计和发展，而不是进行孤立的、盲目的生态设计与调控；协调是指物种之间的协调共存、生物和环境之间的协调适应，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协调发展，不同生态过程的协调作用，这些均是高产高效系统的必备条件；循环，是指生态系统最本质的功能，是在有限资源空间条件下生命发展的必由之路；再生，指生命和资源的增殖与更新，是新陈代谢。周而复始的再生产过程，是生态设计的主要目标，使生态系统最终获得繁荣发展，系统生产力和资源环境持续保持，满足人类社会的长远需求。

7.2.3　生态农业四种模式

从目前的实践来看，生态农业有以下四种模式，各有千秋，需要因地制宜地发展与推广。

1. 平面结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此模式反映出某区域不同生物种群所占面积比例及分布状况，也就是把农林牧渔各业生产在土地平面上合理搭配和科学布局，并根据生物种群的配合产生相互增益的关系，使其各得其所，形成一个动态平衡农业生产体系。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以林为主，农林牧结合开发模式；另一个是以农田为中心，小流域水土流失综合治理农林牧渔全面开发模式。目前在全国这种模式的生态农业县（乡、村）比较多，最突出的当属被联合国评为“500佳”的安徽省颖上县小张庄、江苏省泰县沈高乡河横村等。

2. 立体结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这个模式是应用生态经济学原理，根据自然资源、生态条件和不同作物的生态规律和市场需求等情况，把处于不同生态位的多种生物种群在立体空间中进行合理搭配，构成多级利用生物复合群体，充分发挥生物种群互惠共生的关系，提高光、热、土、水等在空间的利用率，使系统的稳定性、高效性增加，可以获得更多的农产品种类和数量。具体也有两种开

发模式：一是大立体开发模式，二是小立体生态农业开发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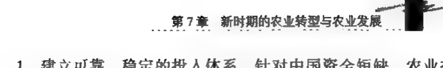
3. 时序结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该模式是按照各种资源的时间节律，巧用天时，以时间争空间，实行轮作复种多熟制，使生产活动与自然环境变化保持协调，资源转化率最高，增加系列产品，提高综合效益。适合时序结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的主要是南方各省区。如四川省可以莴芦连作玉米间作高粱等，也可利用塑料大棚、温室、地膜覆盖等人工季节调控技术，实行季节创建开发模式。

4. 链式结构生态农业开发模式。此模式是按照生态系统内能量流动和物质循环沿食物链进行的规律而设计的。其中，一个生产环节的产出是另一个生产环节的投入，在食物链上加入新的环节，从而使食物链复杂化，还可以同时加入农产品加工环节，使农产品增值，如，猪—蛆—鸡组合等养殖业链式循环开发模式；桑—蚕—猪—粮组合等种养业链式循环开发模式；稻麦秆—蘑菇—鸡鸭—沼气—农田组合等种、养、沼三结合链式循环开发模式等。

以上几种模式是我国在生态农业实践中的创造，从中可以看出，生态农业是涉及农业生态经济系统不同层次设计和管理方案的良性循环的农业体系，既有对农业系统资源利用和生态循环的整体规律安排，也有针对某个具体生态环境或系统的局部结构功能调控方法，从其基本组成要素上看，内容极其丰富，包括合理开发利用农村国土资源；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建设组装大农业，实行农、工、商、运（输）、建（筑）、服（务业）即一、二、三产业的综合经营；发展多种作物种植和畜禽饲养业；建立种植—养殖—加工配套成龙的生产链；环境控制工程和资源环境管理；农村能源开发建设等。

7.2.4 如何发展生态农业

需要指出的是，发展生态农业，关键是要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变粗放型方式为集约型方式，而实现这个转变的基础是以高新技术为手段，核心是遗传工程与技术，实现农科教相结合的农业发展方式。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建设生态农业是一个长远之计，非一蹴可就，需要坚持采取以下措施：



1. 建立可靠、稳定的投入体系。针对中国资金短缺、农业投入不足的现状，必须从工农协调和城乡结合的新高度来做出新部署，特别重视调整投入政策，建立有利于现代集约持续农业发展的可靠的、稳定的投入体系，其中，国家的投入仍然是主渠道，需要逐步明确稳定的投入比例。

2. 依靠科学技术，推进生态农业建设。生态农业是一种知识密集型产业。需要综合利用人力资源、自然资源，以达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统一。建设生态农业，实际上是用高新技术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它是以生物技术和信息技术为主导，结合农业的常规技术，在不破坏生态平衡的情况下，降低成本，提高产量，增加农民收入。这也是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的最佳途径。在此应当特别指出，对农民的教育投资以及农民对生态农业的教育投入，对生态农业的建设成功与否具有关键的意义。

3. 在建立稳定、完善的农业政策体系基础上，因地制宜，继续抓好、扩大、宣传生态农业试点示范建设，以带动广大农民积极参加，投入到生态农业中来。自1984年以来，我国有7个生态农业村、乡被联合国授予"全球500佳"称号。到1995年底，除了国家级的50个生态县以外，还有省级生态农业试点县近100个，全国有村、乡、县三级试点总数达2 000个，这些地方在经济效益、生态环境、农业可持续发展潜力、生态思想和管理建设体系方面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要加大宣传和加强技术指导，进一步推动生态农业的发展，在发展生态农业的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高新技术为基础，逐步使我国农业走上集约持续农业的道路，从而实现农业的现代化。

7.3 现代化的产业农业构造

如果说集约持续农业是从技术上、农业生产本身上探讨农业现代化的途径，那么在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农

业的产业化就是农业现代化的组织途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农业现代化必然选择的组织形式。可以说，集约持续农业是农业现代化所要追求的内容，农业产业化则是在这个过程中必不可少的形式，而且刻不容缓。

7.3.1 农业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

近几年来，农业的增产不增收问题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这种状况直接影响着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和农业的再投入，也制约着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那么，农业增产不增收的根源在哪里？目前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农产品和农资价格的扭曲，农业的经营规模小，农业生产结构与市场需求存在着突出矛盾等。其中，农业发展中组织支撑的严重不足是农业滞后的重大原因。在中国农产品价格已经接近国际市场价格、非农产业发展缓慢的情况下，根据我国农业经营分散、农产品商品化和社会化程度低、农民文化素质较差、竞争能力偏低、农民交易成本过高等问题，实行农业的产业化经营是必由之路，也是发展农业经济的客观需要。

所谓农业产业化是以市场为导向，以资源为基础，以科技为支撑，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围绕主导产业优化组合各种生产要素，按照供产销、种养加、贸工农、农科教一体化经营原则，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社会化服务、企业化管理的经济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世界上农业产业化最早产生于美国，接着很快传入西欧、北美和日本，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开始至 20 世纪 60—70 年代，西方发达国家基本实现了农业产业化经营，其主要特征是农工商一体化和农业生产的集中化、专业化、服务社会化。中国早在 20 世纪 70 年代末，一些工商企业就开始学习南斯拉夫农工综合体的做法，向农业的产前产后延伸，进行农工商一体化生产经营的尝试。80 年代，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开始崭露头角，到了 20 世纪 90 年代，山东的潍坊、烟台及广东一些地区如顺德，明确提出了“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口号，并在实践中进一步畅通了农工商产业链条，按照贸工农一体化经营的战略思想全面规划农村的改革和发展

工作，取得了很好的实际效果。至此，农业产业化经营，成了继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和乡镇企业之后又一个农村改革的浪潮。农业产业化经营，符合客观经济规律，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以及我国传统农业向现代化农业发展的客观要求。农业产业化是新时期在农村建立新的利益驱动机制的探索，是中国农村再改革的必然选择。实现农业的产业化经营，对我国农业发展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和作用。

首先，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业比较效益，加快改变我国农业弱质地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由于长期忽视市场需求，轻视产品质量和经济效益的提高，农业比较利益偏低，城乡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差异越来越大，影响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使我国农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能力不足。农业比较效益的高低，除了同农产品的价格水平及其与工业品比价相关外，还同农业生产经营规模、农业专业化分工状况和农业产、加、销等因素有直接关系，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将是提高农业比较利益的有效途径。农业产业化着眼于扩大农业生产环节的外延，尽量延长农业的链条，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从而实现农业的整体规模效益。同时，该思路强调提高农户经营的外部规模而非土地规模，更加符合我国大部分地区土地经营规模小的实际情况。以山东省为例，该省自1993年推行农业产业化战略以来，“龙头”企业已发展到1.3万个，连接农户700多万个，带动基地5 500多万亩，全省已确立18个主导产业，农村经济全面增长。1995年人均占有粮食已达480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过去农民只能得到生产环节的收益，而实行农业产业化经营后，还可以从农产品加工和销售环节中分得一部分收益，从总体上提高了农业经济效益。黑龙江省肇东市，以玉米为主导产业，对玉米粒、玉米秆进行加工，1995年全市玉米综合收入达到17.6亿元，比1993年全市农业总收入还高出26.7%，农民人均增收92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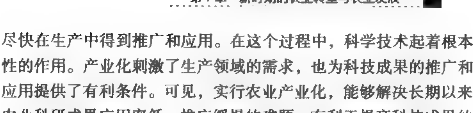
可见，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促进农产品加工业的发展，是提高农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可以从根本上解决农业比较利益偏低、

农民收入增长慢的问题，还可变废为宝、提高农产品的综合利用率，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农产品和加工品的多样化需求，从而增强了农业开发的深度和广度，改变农业的弱质地位。

其次，农业产业化有利于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解决分散农户与大市场衔接的矛盾。我国农村经济体制改革以来，随着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的转变，农产品的“卖难”、“买难”情况在不同地区、不同时间反复出现。究其原因，是由于农村亿万分散的小生产与千变万化的大市场之间的矛盾造成的。家庭联产承包这种单家独户、势单力薄的小生产既难以抗拒自然灾害，又难以抵御市场风险。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就可以把农户组织起来，以引导农民发展当地优势产业或产品为基础，有序地进入市场，从而实现农户与市场的有机衔接，加快农业商品化进程，解决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求得整体效应。

再次，农业产业化有利于城乡差距的缩小和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实施农业产业化的核心是发展依托地方资源的支柱产业和主导产品，而区域性支柱产业的开发，本身就是一个吸纳劳动力的过程。农副产品的大幅度增加，不仅为地方工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而且推动了以农副产品为主的加工业的发展，又带动了为其服务的商业、供销、运输等相关联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从而开辟了新的就业渠道，可以避免农村人口无序流入城市，并把农村“能人”的积极性调动起来。农业产业化使生产要素实现大跨度流动组合，城镇企业通过向基地、农户输送物资、技术、资金、信息，促进农村的资源和劳动力实现优势互补，从而打破工农界限，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缩小城乡差距。

最后，实现农业产业化还有利于加快农业科技的推广和应用，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农业科技的发展及其推广和应用，是提高农业投入效率的主要的和持久的因素，只有不断提高科技含量，才能获得农业的最大效益。这就促使龙头企业不断提高产品档次和水平，不断开发新产品，组织农民学习新的技术和栽培方法，努力提高农户应用新技术、新方法的能力和技巧，以求得新技术、新方法



尽快在生产中得到推广和应用。在这个过程中，科学技术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产业化刺激了生产领域的需求，也为科技成果的推广和应用提供了有利条件。可见，实行农业产业化，能够解决长期以来农业科研成果应用率低，推广缓慢的难题，有利于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率和贡献率，促进科研成果尽快转变为现实的生产力，从而推动我国农业增长方式的转变。

此外，农业产业化有利于中国农业调整产业结构，优化资源配置；有利于推动中国农业国际化，积极参与国际经济的大循环。

7.3.2 产业化经营的模式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产生了一些成功的经营模式，在西方国家综合起来主要有三种：即合作社模式、“事业协同组合”模式和“公司+农户”模式。在我国农业产业化实践中，也产生了一些典型的成功模式，主要有：

1. “公司+农户”型：指以公司或企业为主导，联系生产基地和农户，通过建立比较稳定的合同关系，形成比较紧密的产销一体化经营实体。这一组织形式尤其适合在市场风险大、技术水平高、专业分工细及资金密集的生产领域发展，比如种植业和养殖业。作为“龙头”的公司应有充足的资金作基础，有先进的技术为导向，并形成一套完备的管理体系，以实现产品的高附加值、高科技含量和适销对路。比如洛阳春都集团，建立在成千上万家养猪农户的基础上，公司派人从事良种、技术的服务，大大促进了养猪业的发展。

2. “专业市场+农户”型：指通过发育农产品市场，特别是专业批发市场，带动区域专业化生产和产销一体化经营。通过专业市场和生产基地或农户直接挂钩，以合同的形式或联合体的形式，将农民纳入市场体系。这样，农民可以迅速接受市场信息，灵敏地做出反应，从而达到一个专业市场带动一个支柱产业发展的目的。这方面尤为典型的实例是山东省寿光市，现已建成的寿光蔬菜批发市场，占地34公顷，年销售蔬菜10亿公斤，经营额突破8亿元，带动蔬菜基地31万公顷，产品销往2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190

多个大中城市，并在全国180个大中城市设立了销售网点。[①]

3. “中介组织+农户”型：指以中介组织为依托，在某一农产品产销各个环节上，实现跨区域联合经营，逐步建成经营规模大、生产要素大跨度组合的一体化企业集团。目前，这种类型依托的中介组织主要是行业协会，以山东省农产品生产加工销售联席会议（简称农产联）为典型代表。农产联的作用：一是沟通信息，避免在生产、销售中的盲目性和无序竞争，避免种子、技术设备和产品的重复引进，减少企业和农户的损失；二是合作开发，以期进一步提高企业素质、人才素质和产品质量，更好地开拓国际国内两个市场。

4. “合作经济组织+农户”型：指在农户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建立一系列跨户、跨村、跨乡镇的“农村经济合作组织”。这类组织中既包括原有社区性合作组织或以供销社为依托形成的合作经济组织，也包括以乡村经济技术服务实体为依托，或以农村专业技术人员、能工巧匠和“土专家”为骨干，与从事某一专业生产的农户自愿联合起来组成的经济技术协作团体，还包括农户或家庭企业自愿组成的各类股份合作经济组织或股份合作企业。这种类型中有代表性的如山东省潍坊市寒亭区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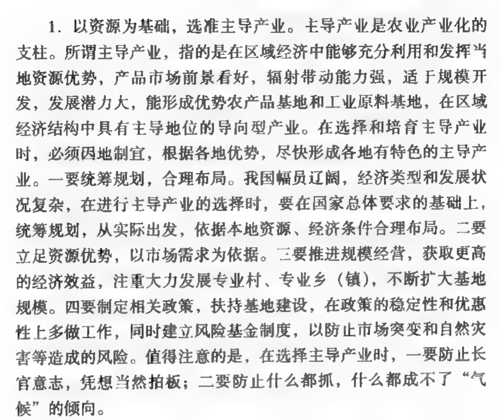
从以上这些类型看，客体多种多样，但主体只有一个，那就是农户。在农业产业化的过程中，龙头企业起着非常关键的作用，是产业化链条中的核心环节。这些龙头企业上连国内外市场，下连基地和农户，具有引导生产、开拓市场、深化加工、提供服务的综合功能。就龙头与农户关系的疏密程度看，大体可以归纳为紧密型、半紧密型和松散型三类。

7.3.3 农业产业化的对策

农业产业化是农业发展大势所趋，同时也是一个长期的系统工程，根据已有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必须周密安排，科学决策，有针对性地推进我国农业产业化的进程。

---

① 《中国农业发展报告（1995）》，161页，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



1．以资源为基础，选准主导产业。主导产业是农业产业化的支柱。所谓主导产业，指的是在区域经济中能够充分利用和发挥当地资源优势，产品市场前景看好，辐射带动能力强，适于规模开发，发展潜力大，能形成优势农产品基地和工业原料基地，在区域经济结构中具有主导地位的导向型产业。在选择和培育主导产业时，必须因地制宜，根据各地优势，尽快形成各地有特色的主导产业。一要统筹规划，合理布局。我国幅员辽阔，经济类型和发展状况复杂，在进行主导产业的选择时，要在国家总体要求的基础上，统筹规划，从实际出发，依据本地资源、经济条件合理布局。二要立足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依据。三要推进规模经营，获取更高的经济效益，注重大力发展专业村、专业乡（镇），不断扩大基地规模。四要制定相关政策，扶持基地建设，在政策的稳定性和优惠性上多做工作，同时建立风险基金制度，以防止市场突变和自然灾害等造成的风险。值得注意的是，在选择主导产业时，一要防止长官意志，凭想当然拍板；二要防止什么都抓，什么都成不了“气候”的倾向。

2．以项目为主体，搞好龙头企业。龙头企业的形成与发展，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举足轻重。作为农业产业化火车头的龙头企业，其牵动能力的大小决定着农业产业化的规模和成效。党的十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指出：“发展农业产业化经营，关键是培育具有市场开拓能力、能进行农产品深度加工、为农民提供服务和带动农户发展商品生产的‘龙头企业’。”实践表明，抓好一个规模大、技术水平高、产品新而又适销对路的龙头企业，可以带动一条产业、一个地区经济的新发展。江西省于都县天然食品保健总厂的红薯加工，以“公司+农户”的方式，辐射和带动周围14个乡镇，近4万户农民种红薯，仅此一项农民人均增收100元以上。要把建设龙头企业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的重点来抓，本着谁有能力谁牵头，谁是龙头扶植谁的原则，实行政策倾斜，重点发展，形成大型龙头。只有搞好龙头，才能理顺龙体，摆好龙尾。当前的重要任务包括：第一，大力扶持和发展龙头企业，突破地区、部门、所有制

界限，遵循市场经济规律，按照现代企业制度来建设龙头企业，同时提供政策和资金上的扶持。在此基础上，完善法规，规范行为，促进龙头企业的健康发展。第二，在龙头企业和农户之间建立有效的利益调节机制，把对外的市场法规和对内的合作原则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均沾，风险共担”的利益分配机制，使之成为真正的利益共同体。这种新的利益驱动机制的构造是办好龙头企业的关键，也是农业产业化成功的关键。同时，也是衡量一体化组织经营体制和运行机制是否完善的一个重要标志。规范利益分配的重要手段就是广泛推行合同（契约）约束机制。第三，要重点发展合作制龙头企业，特别是农民自己组织、自己管理的龙头企业，以服务为宗旨，成为农民信得过的“龙头”。在充分发挥现有合作经济组织（社区性合作社、专业合作社、各种专业协会和研究会等）在产供销、贸工农中的作用，积极鼓励农民建立股份合作制的龙头企业。就农业产业一体化经营来说，最佳的组织形式就是合作经济。

与此同时，增强龙头企业的服务意识，以服务农业为己任，自觉地把加工、流通环节的部分利润让给农民，或者通过预付定金、赊销种苗和饲料，保证化肥、农药等生产资料的供应等方式，扶持农民发展生产。有条件的地方要积极探索建立风险金制度、利润返还制度。

3. 以农户为依托，建好商品基地。农产品商品基地是农业产业化的基础，也是龙头企业的依托。从各地的实践来看，建设商品基地要坚持三个原则：一是区域化原则，根据本地资源特点和市场容量，围绕主导产业，统一进行规划和部署，突出地方特色，力创名牌产品，以增强市场竞争能力。二是合理经济规模原则，相对集中，连片发展，形成一批覆盖面大、单项成规模、总体成区域的商品基地。在实施过程中，要特别重视专业大户的培植，典型引路，滚动发展，走出一条一户连多户，多户带全村，一村带多村，多村成基地的路子。三是集约经营原则，围绕主导产业，加大投入，精心组织，合理配置生产要素，运用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基地，拓展专业化生产，进行集约化经营，形成具有市场竞争能力的拳头产品。

4. 以销售为中心，抓好市场建设。市场是发展商品经济的载体，又是农业产业化的媒介。从一定意义上说，抓市场就是抓生产，培育一个市场，可以带动一方生产，造就一批人员，富裕一方农民。要按照建一处市场，牵动一个产业，活跃一方经济的思路来指导市场建设，突出本地特色，合理进行布局，建立一批规模较大、机制健全、功能齐全、设施配套、辐射力强的专业批发市场和生产要素市场。就市场建设而言，农村市场体系的建设是刚刚起步，从全国市场体系的建设情况来看，农村市场体系的建立是健全全国市场体系的前提。目前在农村市场体系建设中，培育和完善要素市场是主攻方向，包括劳动力、土地、金融和农资市场，培育和完善农村商品市场是主体，包括市场体系和购销体制等的建设。

在采取上述对策的过程中，要清醒地认识到深化体制改革是实现农业产业化的保证，也是加速农业产业化进程的根本动力所在。只有建立和完善了农村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适应产业化的要求。尤其需要指出的是，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具有相当重要的地位。从粮食流通体制的改革来看，关键是要实行国家宏观调控下的市场调节政策，在1993年改革的基础上，进一步落实该政策，形成多种经济成分经营粮食的格局，增大市场调节份额，真正发挥国家粮食储备体系的调控和保障作用，推动国有粮食企业的改革，严格控制和消灭这部分企业的亏损，从而建立起一个适合于市场经济与国家需要的粮食流通体制。

在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过程中，农户是主体，企业是形式，要坚持以“龙头”企业为引导，积极调整农村的经济结构，建立完善和高效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在资金、技术、信息等方面为产业化经营提供配套服务，在一体化经营中实现农业产业化的目标。

7.4 农业劳动力的转型与农业现代化进程

目前，农业产值已经低于15%，农村人口仍然占64%，这样

的人口分布结构怎么去建立一个现代化的社会？全面小康又从何谈起？经济的发展和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必然伴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和农业生产效率的提高，非农产业的极大发展，农业劳动力的转型就在所难免，这与第一节的慎言“去掉农民”是相辅相成的，都是解决农村问题应该注意的。一方面，农业中需要的就业人口下降到相当的程度；另一方面，非农产业不断地吸收从农业中转移出来的劳动力。此时，农民的分化发生了。农民分化，就是在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工业社会转变过程中，一大批农民在职业、身份、居住地点、价值观念、消费方式，甚至在生产资料结合形式等一系列方面出现不同，许多人从原有队伍中分离出来。在这个分离过程中，一大批农民进入城镇，成为非农就业者，即使留在农村中的劳动者，其生产经营方式也不是同一个模式。

7.4.1 农民分化的意义

农民的分化同时也是收入差距拉大和消费层次分开的过程，这种由于工业化所带来的劳动力转型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经阶段，只有农民转型的完成，才能说明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到了相当的程度，从而又反过来促进农业现代化。农民分化的意义表现在：(1) 只有成功地实现对农民的分化，才能减少农民进而有效地保护农民。几乎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对农业实行保护性政策，并给农业以补贴，然而在人口众多、农业薄弱的中国却难以做到。要想保护农民必须要分化农民，减少农民。(2) 只有推动农民的分化，才能使需求市场上形成不同层次，从而与进一步工业化中供给急骤变革相适应。我国从现在起处于产业结构快速变化和升级的时期，工业生产的周期性特点决定了供给的多层次性，相应地要求需求方面有差别性和多样性，才能使供求在总量与结构两个方面上相互适应，进而才能保持经济的持续发展，完成产业结构高级化。目前9亿农民基本处在同一消费层次上（即人们常说的百元级商品消费阶段），而如果将来这么多农民同步进入新一轮的消费档次，供给无论如何是满足不了的。20世纪80年代两次供给紧张提供了实践的证明。

解决我国发展中的这一难题，就是要让9亿农民在消费上形成多个层次，分步进入新一轮消费，以与供给相互协调，只有这样，才能在宏观上保持供求的基本平衡。(3) 只有促进农民分化，才能使加快城市化成为现实可能。我国的城市化滞后已成为人们的共识。城市化水平分别要比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低50和10个百分点。城市不发达又使最能容纳劳动者的第三产业发展缓慢。更重要的是，今后农民的减少不仅不会降低反而会提高农业生产力。总之，在当前农民分化的加快是我国经济发展的客观必然，在农民有了自有财产和人身自由之后，这种分化是阻挡不住的。

7.4.2　农业劳动力转型的模式

正如前面所说的“去掉农民”，经济发展和农业现代化的进程必然伴随着农业劳动力的转型，在我国的表现就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过程。农业和农村经济不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剩余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能否妥善解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问题，是我国农业实现现代化面临的重大课题。我国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规模庞大，其流动规模也非常庞大（见表7—1）。从改革开放后的转移情况来看，与国外的工业化、城市化过程并不大相同，中国的转移模式由于乡镇企业的崛起而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表7—1　　全国农业劳动力流动规模情况

项 目	2001年	2000年	外出比例最高的五个省份	
外出的比重	23.3%	20.9%	省份	比例
男性	64.5%		江西	48%
女性	35.5%		四川	31.9%
中部	26%	22.6%	重庆	29.1%
西部	22.5%	18.1%	湖北	27.8%
东部	18.7%		安徽	24%
跨省区流动比例	45.8%		初次外出比例	17.9%

资料来源：根据社会蓝皮书：《2002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整理。

1. 就地转移模式。其特点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全面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这种模式就产生了。它充分利用当地各种资源，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和第三产业，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这种模式符合各地农村资源丰富、多种经营和第三产业发展潜力大、农村人口及劳动力数量多和城镇对农业剩余劳动力承受能力有限的客观情况，因而在80年代和90年代初被广泛采用。但近年来，这种模式的局限性逐渐暴露，由于乡镇企业技术进步快，资本密集程度提高，吸纳农业剩余劳动力的能力开始下降。

2. 异地型转移模式。特点是“离土又离乡，进厂又进城”。这种模式是农业剩余劳动力完全放弃土地，是一种与农业彻底分离，与农村城镇化、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联系在一起的带根本性的转移，是农业劳动力转移流动中比较理想、层次较高的转移。实现了异地型转移模式的农业剩余劳动力很难统计，有5 000万人和8 000万人两种说法。根据2000年人口普查的统计，外出农民工占总流动人口的73%，有8 840万人，扣除他们所需携带的家属子女，其总数也不下5 000万人。据抽样调查估算，目前农民跨省流动的约占农业流动总人口的45.8%，大约3 600万人。总的流向是“孔雀东南飞”、“一江春水向东流”，即由四川、河南、湖南、安徽、贵州、甘肃等农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经济欠发达地区，向东南沿海的大城市和率先改革开放的地区流动。

3. 兼业型转移模式。该模式的特点是农民不离开土地，农忙时务农，农闲时务工或经商，从事第二、第三产业，属于季节性转移。兼业型转移模式在中西部地区比较普遍，在我国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流动过程中占主体地位。此模式之所以被多数农户采纳，主要是可以提高生产要素，如劳动力和生产工具的利用效率，分享经济增长的利益，明显提高农民收入。但如果农户普遍兼业，将导致土地流转的停滞，阻碍农业技术改造的进程；以小规模经营为基础的兼业型转移，不利于提高农产品商品率，也影响土地的适度规模经营；农户的普遍兼业，容易产生对土地的粗放经营，甚至部分



抛荒。

4．回流型转移模式。特点是通过异地打工学习技术、积累资金，回乡进行二次创业，有人戏称这是“曲线为家乡”。

无论采取何种模式，农业劳动力的转型都是其核心，而加速转移进程的关键在于提高非农产业的增长速度。从我国当前的农村人口就业分布情况来看，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任务相当艰巨（见表7—2），以2001年计算，分布在农林牧渔业的劳动力高达3.245亿人，与耕地面积比较和按当时的劳动生产率，大约有1.3亿～1.5亿农村剩余劳动力。

表7—2 农村劳动力就业分布情况 单位：万人

行业	2001年人数	2000年人数
农林牧渔业	32 451.0	32 797.5
农村工业	4 296.0	4 108.6
建筑业	2 797.4	2 691.7
交通运输、仓储及邮电通讯业	1 205.4	1 170.6
批发零售贸易业及餐饮业	1 864.5	1 751.8
其他非农产业	5 614.6	5 441.9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

纵观近10多年来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况，总的来看，转移的步子小，转移途径单一；同时，分流层次低，即季节性、临时性转移多，农业内部转移多，外出谋生多；常年性转移少，向非农产业转移少，就地转移少。可以说，我国的农业劳动力转型总体上还处于起步阶段。在讨论如何加快农业劳动力转型的措施之前，有必要先来讨论一下农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关键而又容易被人忽视的问题：农民的教育问题。

7.4.3 农民的教育——一个根本性的问题

当全国上下都呼吁重视农业的时候，向农业的生产性投资如机械设备、水利工程等等经常被人们提及，但是，另外一个重要的方

面，农民本身的教育投资被忽视了。众所周知，现代化的本质是人的现代化，是最终由一批拥有高素质的民众来实现的，农业现代化也一样，需要一批现代化的农民来实现。简而言之，必须在农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不能仅仅制定提供农业机械、灌溉设施和更多肥料的计划，而忽略了制定向农民投资的计划，否则农民将无法获得有效的使用现代农业要素所必需的技能和知识。

有人或许会怀疑向农民进行投资的有效性，然而日本的成功例子表明在土地供给有限的情况下，农民所受的教育可以给农业生产的增长，包括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的推动带来非常有力的影响。日本农业实现现代化依赖于两种公共投资：(1) 发现和开发特别适于日本的生物和其他条件的农业要素方面的投资；(2) 教育投资，特别是针对农民本身的投资。我国人多地少，生产条件复杂，要实现农业的现代化势必要提高农业生产效率，采用许多新技术、新设备和新方法，这些措施的有效性均依赖于农民自身的能力，而我国的农民素质低下，科技力量极端缺乏。在农村人口中，文盲半文盲人口超过 2 亿，即使不属此列者文化程度也相当低下。在存在大量剩余劳动力的同时，农业生产发展中高素质的劳动力严重不足，影响了农业的发展。与此同时，农业生产技术推广中的重要承担者——农业科技人员极其缺乏。我国万名农业人口中仅拥有 6 名农业科技人员，而且乡一级的农技人员大部分仍只是初、高中毕业生，发达国家几乎是百分之百的大学生。国家对农业科研的投入在本已不足的情况下反而呈现逐年下降趋势；1990 年国家用于农业科技投入的费用是 3.1 亿元，1993 年为 3 亿元；农业科技投入占农业总产值的比重 1979 年为 0.088%，1993 年为 0.019%，而同期世界平均值为 1%，有些发达国家甚至超过 5%。这种情况多年未有转变，随着高素质的农村劳动力纷纷外出，农业人力资本存量积累的严重不足和农业科技投入的缺乏，同时还伴随着人才的流失。这严重妨碍了我国农业科研成果和农业技术的转化、推广、应用以及农业的科学管理与经营，妨碍农业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生产



比较效益的提高，从而延误农业现代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可以说，这是农业和农村问题中的深层根源所在。

因此，加大对农民的教育投资和农村科技投入是实现我国农业增长方式转变，农科教相结合的根本所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走向现代化的根本所在，也是我国整个经济实现现代化的根本所在。对这个问题的忽视不能再继续下去了，我们要牢记：发展以人为本。一个首要的前提就是要让务农有利可图，否则，一切均是空话。

就教育来说，长远来看的根本途径是扩大并改善农村中小学教育计划，这应该成为我国今后教育改革的一个重点所在。同时，加大对农科院校的投入，培养农科人员也很重要。对于那些正在工作的劳动力而言，农闲期间的短期训练班、传授新农业和家庭技术的示范以及对农民进行指导的不定期会议、各式各样的农业夜校都能起到相当重要的作用。当中国农村拥有一大批具备现代素质的劳动力，他们能够学习、掌握甚至开发农业技术，能够通过报刊、电视等媒介获取有关信息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说，中国的农村富强真正有了脊梁，农业的现代化进程和国家的经济腾飞也已经有了最为坚实的基础。

7.4.4 新时期劳动力转型的途径和对策

在新时期，农村劳动力的转型问题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困扰中国，对剩余劳动力的消化是一个从长计议的痛苦过程。目前我们应该采取以下的对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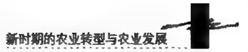
1. 乡镇企业：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要载体。把发展乡镇企业继续作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主渠道，并不意味着完全沿袭20世纪80年代的转移模式。这种模式的直接后果，是造成了乡镇企业的高度分散和城镇化进程的严重滞后。工业化进程中城镇化的同步发展，对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城市本身的集聚效益就有利于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更为重要的是，工业在城镇的集中，不仅有利于节省企业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更有利于促进第

三产业的发展。第三产业是工业集中和城市化发展的产物。引导乡镇企业与小城镇建设相结合，促进第三产业的发展，应是今后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就业问题的根本出路。小城镇接近农村，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就近转入小城镇就业，与土地的关系维持一段时间，即可降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成本和就业风险，又可以有效地避免在大中城市吸纳能力有限情况下，农民大量涌入城市所产生的种种问题。

发展乡镇企业，必须提高认识，加强领导，继续深化乡镇企业自身的改革，保持灵活的决策、用工、报酬和积累机制，同时调整和完善所有制结构，努力探索集体所有制的有效实现形式。在此基础上，以市场为导向，推动科技进步，调整乡镇企业的产业结构，与农业产业化相结合，在继续发展乡镇工业、建筑业、信息业、商业饮食业的同时，注重发展农副产品加工业和储藏、保鲜、运销业，扭转乡镇企业近几年滑坡的局面，使其走向发展的正常轨道。

提倡乡镇企业发展与小镇相结合，当然并不是把现有的乡镇企业大都集中到小城镇中去，或新办乡镇企业都办在小城镇上。鼓励乡镇企业向小城镇集中，也并不意味着可以选择“遍地开花建小城镇，就近消化劳动力”的非农化和城镇化道路。加速城市化进程，积极发展小城镇要指定规划，分期实施，采用动员各种力量，分级共建，包括实施有差别的税收政策和改革户籍、社会保障制度等方面来发展小城镇。具体地讲，应重点发展现有的3万人，特别是5万人以上的建制镇（包括县城镇），要严格防止遍地开花，否则将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

2. 跨地区流动：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近年来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入城市，虽然引发了一些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普遍严格限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的流动。除了像少数特大城市对农村劳动力的流入采取一定限制措施外，大多数城市应向农民打开城门，鼓励农民企业家进城投资办厂，吸引部分农村劳动力进城就业。近年来，在沿海一些大中城市，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化和经济的迅速发



展，不仅城市就业问题已迎刃而解，而且还吸引了大批外来劳动力。这说明，现有大、中城市在解除了旧体制的束缚之后，经济若能蓬勃发展，其吸纳农村劳动力的能力依然是不可忽视的。允许一部分农民进入大中城市就业，并努力使一部分具备条件的农民，由常年性外出劳工转变为稳定性移民，应当成为今后解决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一条重要途径。在实现农村劳动力跨地区有序流动的时候，要坚持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方向，在市场调节供求，农民自主就业的前提下，健全就业服务体系，加强政府宏观调控，逐步形成统一开放、公平竞争的劳动力市场。

3. 农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蓄水池”。在我国，由于剩余劳动力的庞大规模和非农产业消化能力的有限，应该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就业潜力，使农业有效地充当起过剩劳动力的“蓄水池”。今后增加农业内部就业容量的可能性仍然是存在的。开垦宜农荒地及其他资源，改造中低产田，优化农业资源利用结构，进行大型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和完善，搞好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等，这些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吸纳农业剩余动力的潜力。农业剩余劳动力跨区域在农业内部的流动也是增加农业就业容量的重要途径。我国各省区经济发展水平差异极大，东部沿海发达地区农村非农产业发展已具有较高水平，人均收入水平也达到较高的程度，许多地方形成了“青壮劳力进工厂，老弱妇孺种棉粮”的局面。而中西部地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转移速度远远跟不上劳动力增长的速度。东部地区突破地缘局限，完善土地制度，使土地同劳力、资金、技术等其他要素一样流转起来，公开招聘跨村、跨乡、跨市及跨省的客籍农民异地承包土地，这样就能使本地比较利益低的农业生产和异地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都产生新的生机和活力。

此外，农业的产业化也将使一部分农民从种植业中解放出来，在大农业的概念下积极发展林、牧、副、渔、微各业，特别是充分利用种植业的产品和副产品带动养殖业的发展，通过大力发展养殖业来弥补种植业的不足，实现种植业、养殖业互补及共同发展，最终使种养加三个环节紧密联结，形成良性循环，为吸纳剩余劳动力

开辟广阔的道路。同时，农业产业化也会要求一大批农民出来从事流通等第三产业，解决部分就业。总之，通过向农业生产的深度、广度进军，提高农业的比较效益，既为留住农业人才开辟道路，也为消化剩余劳动力提供渠道。

对我国而言，在非农产业对农业剩余劳动力吸收能力有限的情况下，开展农业对劳动力吸收问题的研究意义重大，我们要尽量运用“使用劳动—土地节约”型技术，如农田基本建设中的修筑梯田，农业生产中的利用地膜覆盖和暖棚生产等，慎重采用“节约劳动—节约土地”型技术，避免使用“节约劳动—使用土地”型技术，以充分利用丰富的劳动力资源，避开耕地稀缺的限制。[1]

新时期的农业建设酝酿着巨大的变革和机遇，只要我们切实加大对农业投人，培育一批高素质的农业劳动力，搞好农业的产业化经营，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竞争为动力，以优化产业结构和资源配置为举措，以宏观调控为保证，就可以实现农业的现代化，走上集约持续的农业发展之路。

---

① 关于农业技术的分类参见胡书东的《农业对劳动力的吸收：解决农村劳动力就业问题的另一种思路》一文，载上海《复旦学报》，1997（2）。

第8章　新时期中国新型工业化进程

工业化是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的必由之路，几乎是所有发展中国家梦寐以求的目标，当自己的发展目标被定位为：发达国家的今天便是我们的明天时，发达国家便成了它们仿效的榜样；与此同时它们看到了世界上发达国家强大的过程，强大的国家总伴有强大的工业，国家强大的过程就是工业强大的过程，它们也看到了发展中国家弱小的事实，而发展中国家的弱小总体现为工业的落后，于是人们得出结论：工业化是发展中国家从欠发达走向发达的惟一途径，工业的强大意味着经济的发展。因此，几乎全球所有的相对落后国家都把

工业化作为自己脱贫致富的根本战略目标来实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对于工业化给予了极其重要的地位。从经济理论上对工业化给出定义并不难，它是指机器大生产在国民经济中比重日益增加最终占绝对统治地位的过程。但是在不同的时代，工业化的经济含义有着不同的内涵，也有着不同的标志，18 世纪英国产业革命时期，它的含义是蒸汽机的普遍使用，以机械化为标志，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电气化成为实现工业化的标志，而目前则将自动化纳入了工业化的具体内容中，未来的信息时代，工业化的概念必然会发生巨大的变化，因为工业自身的内涵产生了变化，工业化的社会经济含义将会予以重新考虑和定义。当然，工业化的内容与程度，是在各个国家的比较中定位的，所以一个国家完成了工业化应该指它的工业生产和科学技术达到当时世界的先进水平才行。即工业化的含义是动态的，在今天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中，工业化过程也必然要和知识经济结合起来才行。

衡量工业化实现程度的标准，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提法，过去人们总是把工业生产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重要的衡量指标，斯大林就曾经将国民经济中工业生产总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 70%作为标准，超过 70% 即为工业化的完成，低于该指标就需要继续努力。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W.Hoffman）提出过霍夫曼比率来衡量一个国家的工业化程度，即将制造业中消费资料工业和生产资料工业之间的净产值比率作为衡量指标，认为一个国家的工业化过程可以分为四个阶段，以霍夫曼比率为 5、2.5、1 和小于 1 来划分。

中国在 1949 年革命胜利之后，把苏联老大哥的今天当成我们明天追求的榜样，苏联工业化的速度和它在 1929—1933 年大萧条经济中繁荣给予世界的震惊，以及苏联完整工业体系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作用，为新中国的发展显示了社会主义经济繁荣昌盛的前景，中国把建立完整的工业体系，迅速实现工业化作为国家经济政策的根本取向，在经济走完 1949—1953 年的恢复阶段，国家具有了能够对经济实行规划的基础后，便大规模地开始了自己的工业化

进程。但是，中国的领导人知道工业化是中国的另一次长征，必须加速进行，但又必须十分稳妥，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1956年曾经说过：我们对中国的建设并不着急，这是人类的一场试验。坦率地说，不搞上100年左右，分不清是成功还是失败。另外，从中国革命的经验看，中国共产党擅长以群众运动来进行各种工作（包括经济建设，如陕甘宁的大生产运动），中国的工业化便是在不断的群众运动中进行的。

8.1 中国工业化的独特历史轨迹

中国由于其独特的社会经济形态，大量农村人口的存在，以及相对薄弱的城市发展，因此无论是在1949年之前的时代，还是1949年之后的时代，工业化的进程都与其他国家有着很大的区别，甚至与东亚相邻国家的进程也有着巨大的差异。另外，由于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中国的工业化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又与中国的各种政治运动密不可分，甚至也采用了政治运动的方式来进行，这在世界经济史中留下了独特的一笔。

8.1.1 中国工业化艰难的发端

中国的现代工业发端于清朝的后期，当时一批集官、商于一身的人物，有感于中国的积弱，考察欧美的经济进步，认识到现代工业对于强国的作用，开始通过投资从国外引进第一次工业革命时代以蒸汽机为动力的机械和设备，将中国的工业从传统的手工基础，逐渐引向现代工业的轨道。当时在湖北武汉、安徽安庆成立了军械所，1872年由李鸿章成立了招商局，另外以政府监督民办民营的方式，1882年建立了如上海织造局的机构，1882年建立了中国第一家发电厂，1888年建立起中国第一家纺织厂，而1907年建立了第一家钢铁厂。1895年甲午中日战争后，《马关条约》允许外资在华投资建厂，外资当时主要集中投资于重工业、铁路和开矿等行

业，在清朝政府允许以及外资的刺激下，民族资本有所发展，主要在棉纺、丝织、火柴等行业出现了一批华资企业，阙容等工商界名人也被写进了中国近代史。但由于中国当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使得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从一开始就含有附属于外资，服务于国外资本和中国封建势力的浓重特点。

中国的工业化在20世纪20年代得到了较快的发展，这时欧洲国家正忙于恢复被战争毁坏的经济，无暇东顾，中国的工业在这段时间获得了较好的发展空间与时间。当时的纺织业的锭数几乎在大战中增加了一倍，华资棉纺厂从1919年底的44家增加到76家，各行各业的工人数也从100万人增加到了300万人。当时，中国有105个口岸开放，进出口增加很快，1913年中国的进出口为7.1亿美元，而1929年达到15亿美元，进口中机器、原料占了27%。但是，这一阶段外资控制中国工业化进程的特点并未得到改善，只是日资与英美资本的位置有所变化，例如在19世纪末，日本人在中国的航运业中的资本为零，但到20世纪20年代，却占到了中国总吨位的30%，英国则从70%降为36%，而且从1924年起一直到抗战结束，日本在中国进出口中的比重总是排在第一位。

1931年，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制定了第一个工业发展10年计划，力图推进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计划因抗战爆发执行得并不成功，但在执行过程中建立了长江等水力委员会，进行了长江大坝的勘址，完成了货币制度改革。1931年日本发动“9.18”事变，使当时的中国丧失了1/10的国土，1/3的对外贸易，30%的煤产量，71%的铁产量，99%的石油产量，23%的发电量和41%的铁路里程，中国的工业化受到了一次打击。尽管1936—1937年由于粮食的丰收，工业得到促进，现代工业的产值占到工业的58.6%，但在整个中国的产业中却只占10%左右，而在抗战期间，中国军民伤亡2 000万人～3 000万人，财产损失达1 000亿美元以上，对外贸易的80%，工业的一半为日本人控制，大量（600多家）工厂内迁，中国的工业化进程被极大地阻碍。事实上，就是1936年，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时候，人均国民收入也不过16.87美元（其时美

国为505.3美元，日本为60.8美元），基本不具备工业起飞所需要的条件，再加上连年战争，中国的工业化在1949年之前走的是条非常艰难的道路，人民生活十分困苦。根据巴内特（Barentt，1941）所作的调查，1936年上海一个普通烟草工人的生活：他每天工作9.5小时，工资为14.68元/月，只够全家生活开销的一半，妻子在一家巢丝厂工作，每日工作11小时，月薪10.9元，大女儿16岁，为了补贴家用，在一家棉纺厂工作，每天工作11.5小时，月薪10.05元，小女儿9岁，为妻子和大女儿送饭，全家住在一间屋子里，感觉尚好，人均收入为8.9元。在国民党政府行将灭亡的1947—1949年，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仍然非常低下，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当时中国号称为世界五大强国之一，但是钢产量只相当于美国钢产量的1/87、德国的1/22、苏联的1/19、英国的1/14、日本的1/6以及印度的一半。电力生产相当于美国的1/35、德国的1/4、苏联的1/8、英国和日本的1/6，是印度的1.6倍。煤炭生产则相当于美国的1/9、德国的1/7、苏联的1/2、英国的1/3，与日本相同，是印度的2.1倍。这就是旧中国工业化进展的一幅大致的画面，也是旧中国留给新中国的工业家底。

8.1.2 新中国工业化环境的建立

旧中国的现代工业只占整个经济的10%，整个工业生产在1949年只是抗战前的一半，重工业只是1937年的30%，财政收入只能维持国家开支的一半，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工业化进入重整时期。新政权首先没收了占中国工业资本2/3的国民党官僚资本，接管了包括中国银行在内的四大银行以及2 858家工厂和120多万工人，中国的铁路、公路，邮电通讯事业等，获得了90%的钢铁生产能力，2/3的电力生产能力，100%的石油生产，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又没收了外国在华资本，建立起国民经济的基础——国有经济。其次，治理整顿了中国工业化的宏观经济环境，如果以1948年的平均物价为100的话，1949年11月则是5 376，而1950年2月更达到了8 602，各种物价飞涨，如果听任经济环境恶化，

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将遭到重创。人民政府于1949年4月、6月和8月分别在华北、武汉、广州和上海查封了股票交易所、钱庄，抓捕了一批金银、外汇的投机者，例如在上海逮捕了238个严重扰乱金融秩序的投机者，在广州查封了87家钱庄，同时由人民银行统一了货币发行权。在各大城市，人民政府于1949年10—11月开始大量聚集货物，然后在1949年11月20日将若干物资同时提价，使之与黑市价格持平，仅4天时间价格与7月底相比，狂涨370%，造成通货膨胀心理，投机者大量贷款吸货，11月25日起，政府大量投放抛售物资，令物价暴跌，1949年11月25日—12月5日，价格下跌了1/3，在压低价格的同时政府催缴税收，投机者被迫低价出货缴税还贷，政府用低价回购物资，再次入市压低物价，一举打垮了囤积居奇的投机者，稳定了大中城市的经济生活。最后，1950年3月，中央政府统一财政收支、统一分配物资、实行严格的金融管理，稳定了经济运作，初步理顺了工业化的环境。

在新中国成立时期，中国的工业化主要力量是私营企业，1949年中国有私营企业12.3万户，164万工人，占工人总数的55%，工业产值占全国63.2%，私营商业在1950年有402万户，占全国总户数的98.4%，批发额的76.1%，零售额的83.5%，当时私营工商业在经济中的力量十分强大，国有经济尽管在经济命脉方面取得了绝对控制地位，但在整个经济中仍然处于相对较弱的地位。

1951年底，因为抗美援朝战争和经济建设中出现的情况，中国开展了一次“三反五反”运动，前者针对共产党内部的贪污、浪费和官僚主义问题，后者针对资本家阶级的行贿、偷税漏税、盗骗国家财产、偷工减料和盗窃经济情报，因为根据薄一波的报告，在27个政府系统单位，发现了1 670人的贪污行为，在天津张青山、刘子善案件（贪污171亿元旧人民币，合今天171万人民币）受到枪毙处理，以及对于“五毒”严肃审理后，最后的结果是，全国查出有1 000万旧人民币贪污的人员10.5万人，判处有期徒刑9 942人，无期徒刑67人，死缓9人和死刑42人，极大程度地控制住了贪污受贿和腐败之风的蔓延，中国的工业化环境得到了很好的



净化。

在苏联的工业化过程中，20世纪20年代曾经有过一次大争论，主角是布哈林与普列奥布拉赞斯基。布哈林主张工业化的发展不能以剥夺农业为代价，二者必须均衡发展，离开了农业的发展，工业化是不可能实现的。而后者则认为，农业是非社会主义部门，在当时列强干涉、诸多非社会主义部门的挤压下，只能靠剥夺农业来实现社会主义的工业化。争论以斯大林采用后者的意见为结果。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由于在中国社会农民占绝大多数，中国革命以农村包围城市为基础的特殊性质，因此领导者在思想中从未认可以破坏农业为代价实现工业化，但在后来的实践中虽然讲：以粮为纲，以钢为纲，却很大程度上将农业仅仅作为工业化的支撑性、辅助性和贡献性的部门，利用农业的产品贡献、市场贡献、要素贡献和外汇贡献来全力发展工业，一度忽视了农业国民经济基础的作用，使中国的工业化走了弯路，遭受了损失。中国工业化的农业基础是从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开始的。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农业合作运动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央苏区就已经存在，当时的形式是劳动互助组、耕田队、犁牛合作社等，1943年河北饶阳县建立的个体经济基础上的劳动互助组织——耿长锁合作社是当时的典范。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巩固工农联盟，在公有制基础上彻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从1951年秋天起开始了农业合作化运动。1952年组织起来的农户已经占全国的40%，集中在800万个农业互助组中，还试办了近4 000个“土地入股，统一经营”为特点的农业初级生产合作社。1954年秋天，初级社发展到了10万多个，第二年春天，数目增加到48万个，秋天达到了65万个，而年底发展到109.5万个，并出现了1.7万个以土地公有制为特点的高级社。1956年中国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入高潮，年底已经有了54万个高级社，农户的87.8%参加了高级社（1.07亿户），基本完成了农业合作化运动，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基础。

中国工业化的更深层次的环境建设是1955—1956年的资本主

义工商业改造。1955年10月27日和29日，毛泽东邀请民主建国会、全国工商联的知名人士陈叔通、李烛尘、胡子昂、胡厥文和荣毅仁等在中南海的颐年堂、怀仁堂座谈，讲明了共产党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的和平与赎买政策，以及反对“恶转”坚持“善转”的原则，开始了中国工业化中具有历史意义的社会主义公有化运动。事实上，农村社会主义合作化运动和全国经济统购统销的进行，使得中国私人资本主义活动的空间被大大限制。1955年，在工业中国营、合作经营和公私合营经济的产值已经占到工业总产值的83.6%，国营与合作商业已经占商业批发额的94.8%，零售额的67.6%，当时全国163户工人人数在500人以上的大工厂中，只剩下30户私营企业，这与新中国成立时相比，已经有了极大的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绝对优势地位，使得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改造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后盾，1956年初，公私合营的运动从北京开始，1月4日，同仁堂的经理乐松生（后北京市副市长），带头申请公私合营，1月8日20个行业、300多家商店被批准实行公私合营，1月9—10日，全市5万多职工，2万多私方人员上街游行庆祝公私合营成功。1月10日，北京召开资本主义工商业公私合营大会，宣布35个行业的3 990家工厂和42个商业行业的13 973家商店全部批准公私合营，1月15日，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社会主义改造胜利庆祝联欢会，毛泽东、刘少奇和周恩来等出席。此后，上海、天津、武汉、广州等7大城市和50多个中型城市进行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到1956年底，99%的工业单位和98.9%的职工以及99.6%的总产值实现了公有制改造，商业中82.2%的商户、85.1%的从业人员和99.3%的资本额完成了公有制的改造，即以和平的方式完成了变革资本主义所有制的任务，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了所有制的基础。同时，与苏联相比，中国的所有制变革是在生产得到发展的情况下完成的，1956年与1955年相比，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7.8%，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1.4%，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5%。

在进行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1956年中国还

进行了手工业的合作化运动，将500多万手工业从业人员（占全部从业人员的92%）纳入合作社体系，完成了手工业个体经济向社会主义集体经济的转变。此后，这种手工业合作社又大多转轨成为地方国营工厂、集体所有制工厂和人民公社工厂，进一步向全民所有制转化。

可以讲，到1956年，中国实行工业化的一切软、硬环境，都已经从原有的所有制基础上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具备了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本条件，应该承认，此时中国共产党制定的以工业化为主体，以三大改造（一化三改）为两翼的过渡时期总路线不仅符合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而且完成得非常好。然而此后的中国工业化的过程却一直是在政治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其中大跃进和大三线建设给中国工业化留下了值得思考的经验和教训。

8.2　中国工业化早期历史事件研究

研究中国工业化最初的过程，可以发现有三大事件对于这一过程产生着巨大的影响：所谓的苏联援建的156项重工业项目、大跃进和大三线建设。156项奠定了中国工业化的基础，大跃进意在迅速实现工业结构的转换（提高重工业的比重），大三线建设则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基础上力图改变中国工业分布的地区格局。三项大事件对于新中国建国初期工业化的方向和进程有着根本性的决定意义，应该予以回顾、比较。

1952年，尽管中国的工农业生产的总产值已经超过新中国建立之前最好的1936年（增长20%），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49年的30%上升为41.5%，其中现代工业的比重从17%上升为26.6%，重工业总产值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26.4%上升为35.5%，但是中国的工业化水平以人均计算仍然非常低下，甚至比当时的印度还要落后。如人均钢产量，中国为2.37公斤，印度为4公斤，美国为538.3公斤，苏联为164.1公斤，日本为

81.7公斤；再如发电量，中国为2.76度，印度为10.9度，美国为2 949度，苏联为553.5度，日本则为604.1度。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共产党认识到，中国需要有一个符合国情的发展计划，否则工业化的进程无法得到保障。

早在1951年2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召开过扩大会议，讨论制定经济建设计划的问题和指导思想，1952年根据周恩来的建议，中央决定成立由周恩来、陈云、薄一波、李富春、聂荣臻等组成的领导小组，组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8月试编出了《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以下简称《草案》)，中国派出了以周恩来为团长，陈云、李富春为副团长的代表团赴苏联征询意见，代表团在苏期间曾经两次拜会斯大林，并就《草案》进行了专门的讨论。1953年4月，苏联方面向中国领导通报了对于《草案》的意见，提出了递增速度、重工业为主、培养专家、加强地质勘探、注意农业和工业关系的建议，这些意见后来在计划的编制过程中得到了充分的重视和体现。1954年4月，中央调整了“一五”计划编制领导小组，成立了以陈云为组长，李富春、邓小平、邓子恢、习仲勋、贾拓夫和陈伯达为成员的班子。同年8月，8人小组审议由国家计委编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审议连续举行了17次会议，10月，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在广州用了一个月审议草案，11月陈云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对计划再次审议，提出了修改的意见和建议。1955年3月，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通过计划，6月中央根据党代会的意见再次对计划进行修订，1955年7月，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讨论审议并通过了计划，至此，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得以圆满完成，其核心内容是上面提到过的“一化三改”。由于“一五”计划的实施，中国工业化在50年代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援助的156项建设单位为中心，由限额以上的694个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工业化的初步基础。计划投资为766.4亿元人民币，按照当时的价格折合黄金达7亿多两，这样的投资规模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优先发展轻工业还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问题上，当时国内有一种意见认为，中国历经多年战乱，宜发展轻工业以休养生息，改善人民生活以稳定社会；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家应该主要从事重工业建设；工商业者大多专注发展轻工业，但毛泽东认为应该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以提高国力，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大仁政”，而优先发展轻工业则是“小仁政”——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抗美援朝，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者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该放在大仁政上。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差。这样，由于中国国情的需要，人民的意愿，中国领导层的一致意见，苏联的建议和国际形势使然，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新的工业化过程起步时，选择了优先发展重工业的道路，毋庸讳言的是苏联的援助在新中国建国初期的工业化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8.2.1 “156项”

“156项”在今天已经成为“一五”期间中国以重工业为中心工业化的代名词，它是苏联当时援助中国工业化的重点工程的数目，许多当时援建的工业项目至今仍然在中国的国民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中国通过这156项重工业项目的建设，意图为中国的工业化奠定一个坚实的基础，为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手段。

“156项”中的首批工业项目是毛泽东1949年12月访问苏联时确定下来的。在那次并不轻松的访问中，除了商定《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次年2月签订)、探讨移交东北的中长铁路和大连军港等事宜之外，还商定了由苏联援助和贷款进行修复、改建和新建50个大型工业项目的协议，开始启动了所谓“156项”工程。1952年周恩来率代表团赴莫斯科，与苏方探讨中国“一五”计划草案，同时提出苏联对华援助问题，在有关基本原则确定后，周恩来、陈云回国，李富春留下继续谈判、学习和研究，历经9个月，次年5月，李富春与米高扬签署了苏联政府对于91个大型工业项目给予

经济技术援助的协议。1954年双方协商再次增加15个项目，最后总共达到了156项。此后，虽然通过探讨苏方同意再增加18项，但其他项目经过合并、调整，有的取消和推迟，最后真正落实的共有154项，实际进行施工的有150项，但是由于计划公布的156项在先，所以在新中国的经济史上，大多仍然沿用“156项工程”来说明当时苏联对于中国工业化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进行施工的150项工业项目中，44项属于军工，20项属于冶金工业，7个属于化工，24个属于机械加工，52个属于能源，3个属于轻工业和医药行业；在106个民用工业项目中，50个部署在东北地区，32个在中国的中部地区；而44个军工项目，有35个部署在中国的中部与西部。尽管中国为这些项目的实施向苏联提供了诸如钨砂、铜、锑、橡胶等作为补偿，当时苏联还是派出了3 000多名专家，并为项目的实行制定方案、培养人才、供应物资设备，在苏联援助中国的同时，原民主德国、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等对中国也给予了极大的援助（共58项工矿业建设工程），体现出了当时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团结和彼此大力援助的国际主义精神。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五年内，中国如同一个硕大的工地，全国有1万多个项目同时上马建设，不仅速度快，而且投产快、效益好，是中国过去的历史上绝无仅有的。通过执行这一计划，中国的工业化进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结构也大为改善，中国有了自己的工业布局。东北建成抚顺、鹤岗、鸡西、阜新等大煤矿，西北建设了玉门油矿、玉石煤矿，全国在抚顺、富拉尔基、吉林、大连、佳木斯、石家庄、太原、包头、武汉、郑州、洛阳、西安、重庆、乌鲁木齐等城市建设了大型电站，充实扩建了鞍钢、本钢、包钢、武钢以及北满钢厂，同时修建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1956年7月试装出第一批“解放”车）、沈阳第一机床厂、哈尔滨锅炉厂、哈尔滨量具刃具厂、北京电子管厂、洛阳拖拉机厂、武汉重型机床厂、沈阳电缆厂等大型骨干工业厂矿。另外，有色金属、化工、建材、森林等工业也都有一批重大工程建设并完成。在1953—1957年的5年中，中国的工业化令世人瞩目：工业每年增长18%，比1952



年增长了128.3%，现代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从1952年的26.6%上升为43.8%，重工业在工业产值中的比重从35.5%上升为45%。与同时期其他国家相比较，中国的工业化成果也是非常惊人的：1953—1957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2.8%，英国为4.1%，中国为18%；钢产量美国年增长率为3.9%，英国为5.7%，中国为31.7%；发电量年增长率美国为9.1%，英国为7.8%，中国为21.6%，实现了高速发展。在这5年当中，中国生产出来第一辆汽车，第一架飞机，第一台拖拉机，钢产量达到535万吨，是新中国建立前最高产量年份的5.8倍，原煤产量达到1.3亿吨，为新中国成立之前最高产量年份的2.1倍，发电量达到193.4亿度，是新中国建立之前最高发电量年份的3.2倍，中国在1957年可以说初步具有了自己比较像样的工业化体系。从经济效益来说，1957年也是新中国建立以来最好的，以百元资金实现利税作为指标，1957年为34.85元，1984年为24.76元，1988年则为20.063元。

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中国的工农业发展迅速，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家呈现出百业兴旺、蓬勃发展的势头，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领导层信心十足，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似乎充满了活力，到处生机盎然，在当时的发展中国家和社会主义阵营中，尽管工业化水平并不算很高，但其发展的趋势却没有人怀疑。在中国经济发展十分顺利的时候，1957年11月毛泽东访问苏联，在那里他第一次提出“超英赶美”的口号，伟大诗人的浪漫，使得中国的工业化出现了一次曲折。毛泽东提出的口号鼓舞人心，刘少奇在中国工会八大代表党中央又再次确认，并宣布为目标。1958年《人民日报》元旦社论《乘风破浪》一文，则将其变为全党和全国的任务，大跃进运动被口号催生，中国的经济陷入了巨大的失衡的状态。

8.2.2 “大跃进”

20世纪50年代生活过来的人，对于中国工业化进程中“大跃进”一词并不陌生，但探本求源，大跃进却是毛泽东为了使中国的

工业化更加符合中国国情而进行的一次实验和探索，据统计，在50年代如果增加1吨钢的生产，就需要有4吨铁矿石和2吨煤的增量生产，需要大量的投资，毛泽东的看法是中国不具备走苏联资本密集式的工业化道路，因此需要探索一条新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的路，大跃进就是这种思维的尝试，口号是“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并将它作为总路线，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一起作为当时需要高举的三面红旗，当时的意图是通过大跃进发展中国的重工业，改变中国工业中的部门结构，建立符合中国经济长远发展的工业部门结构。但是试验遭到了严重的挫折。

“大跃进”这三个字最早出现在1957年11月13日的《人民日报》上，它的意思是超常的高速度，当时人们的认识，工业年增长在20%以上即为跃进，25%以上是大跃进，30%以上是特大跃进，毛泽东对于大跃进的提法极为赞赏，具体目标就是15年赶上英国。为了发动大跃进运动，中国共产党在1957—1958年召开的各种会议，如八届三中全会、杭州中央工作会议、南宁中央工作会议、北京和成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北戴河会议上，一次次发动，一次次批判右倾，终于在1958年5月发动了大跃进。大跃进首先体现在高指标上，将原定的1958年生产计划全部加码，钢从624万吨提高到700万吨，最后确定为1 070万吨，粮从1.96亿吨提高到2.16亿吨。1959年的计划更是惊人，钢要求达到2 700万吨，粮要求达到4亿吨～5亿吨，棉花达到1亿担。应该说大跃进是以增加钢铁生产为核心的一次运动。

1958年6月毛泽东提出钢铁产量翻番，但到了8月底，钢产量只有450万吨，还差620万吨才能完成计划指标，于是在9月1日发表北戴河会议公报，《人民日报》连续刊登社论，让钢铁元帅升帐，号召全民大炼钢铁。9月25日，中央电话会议要求日产钢6万吨，铁10万吨，结果，7月底全国用于钢铁生产的劳动力才几十万人，9月底达到5 000万人，年底更是达到了9 000万人，炼铁的土高炉达到几百万座。1958年12月19日，中国宣布1 070万吨钢的生产任务胜利完成，但其中300万吨土钢根本不能使用。笔

者曾经居住过机关附近，1958年大跃进炼钢的高炉、堆起来的土钢坯到60年代还是我们这些小孩子们游戏的好场所。1959年，本来已经对国民经济的发展进行了一定的调整，但是7月到8月底的庐山会议，通过反右倾，批判彭德怀等人对于大跃进的合理批评，提出继续鼓足干劲的口号并将1960年的钢产量定为1 840万吨，《人民日报》元旦社论要求开门红、满堂红、红到底。当时中国的领导人认为，工业化问题的核心是钢、铁、煤，解决的办法是“小洋群”和“小土群”（即小钢厂、小铁厂、小煤矿、小电厂、小水泥等），在这种工业化思想的指导下，造成了21个省市于“小洋群”、“小土群”的职工占到了全国职工人数的55.2%。

在工业生产“放卫星”的同时，中国工业化的农业基础也产生了巨大的变化，人民公社运动在毛泽东“还是人民公社好”的号召下，在全国铺开，一曰大二曰公是其特点，一平二调则是其实质。到1958年9月底，全国一下子办起了23 384个人民公社，有农户1亿多，占农户的90.4%，社均4 797户，有的县（94个）成立了县联社，以县为单位成立人民公社（人民公社制度一直到1982年的五届人大二次会议修改宪法才使之逐步走向结束）。当时的宣传媒体对于人民公社的报道，出现了许多失实的地方，也有许多左的东西。1958年6月8日，《人民日报》刊登河南遂平县5亩小麦达到亩产2 105斤（这在今天可信）；8月13日报道湖北麻城麻溪园一社水稻亩产36 900斤；9月5日报道广东连县田北社1.7亩中稻亩产60 437斤，并配发了照片，而报道中的广西环江县中稻亩产竟然达到了13万斤，终于《人民日报》刊登（8月27日）了那句“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名言。当时，中央领导一直在进行视察，毛泽东1958年9月中旬视察安徽时，听说舒查人民公社实行了食堂吃饭不要钱，指出吃饭不要钱，既然一个社能办到，其他有条件的公社也能办到。既然吃饭可以不要钱，将来穿衣服也就可以不要钱了。当时的典型河北徐水县通过实行供给制，全县进行了共产主义试点。要求1959年基本完成社会主义建设，1963年进入伟大的共产主义。1958年9月20日徐水县公布试行供给制的草案，

干部改工薪为供给，县级每人每月8元，科局级5元，一般干部3元，勤杂人员2元，对全县人员实行“15包”，即包吃饭、住房、穿衣、鞋、袜、毛巾、肥皂、灯油、火柴、烤火费、洗澡、理发、看电影、医疗和殡葬。这一试点县的做法，在全国乃至世界都引起了关注，国内3 000多个单位派人取经学习，有40多个国家的900多名参观者前来观光，苏联《真理报》记者参观后向当时的苏共总书记赫鲁晓夫进行了汇报，赫氏曾经专程派人来考察。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财力匮乏，很快这个试点便以失败结束。山东范县宣布了两年过渡到共产主义的规划，当时的县委书记编了一首顺口溜来阐释共产主义生活：人人进入新乐园，吃喝穿用不要钱；鸡鸭鱼肉味道鲜，顿顿可吃四大盘；天天可以吃水果，各样衣服穿不完；人人都说天堂好，天堂不如新乐园。对于这种提法，毛泽东认为：似乎是可行的。

1958—1959年的三年大跃进，尽管有着北京十大建筑的辉煌，原子技术的重大突破，重工业的巨大发展以及大庆石油的开发，但它却给国民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加上自然灾害，另外当时与苏联产生了意识形态的争论，伤及国家之间的关系，苏方终止援助合同，撤回专家，停止设备供应，使得中国的经济建设陷入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困境，经济状况不断告急。1960年5月，粮食出现问题，北京存粮仅能维持7天销售，天津10天，而上海则天天告急，没有了库存，此后由于粮食的缺乏，不仅耕畜饲养出现困难，在新中国还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人民中浮肿普遍，生活水平下降(城市居民每个月大约可以凭票证购买香烟4盒、粮20斤～34斤、油半斤、糖2两、肉2两至半斤)，极大地影响了经济建设。这种大跃进式（发展经济学称之为大推进式的工业化）的工业化试验，结果是农、轻、重失衡，三年大跃进重工业增长了2.3倍，轻工业增长了47%，而农业却下降了23%，粮食生产从1958年的2亿吨降为1960年的1.43亿吨，农业和轻工业已经无法支撑有5 000万人的职工队伍来进行建设；消费积累失衡，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中国的积累率在24.2%，而三年大跃进时期的积累率达到39.1%，

同时财政有160多亿元的赤字，更为重要的是，在大跃进中那些行之有效的经济规章制度被破坏，不遵循经济规律办事，造成经济效益下降，质量下降，于是在1960年秋天，尽管中国通过大跃进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却因为结构性的严重失衡无法继续沿着大跃进安排的路线前进，被迫进入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大变换时期，基本退回到了原有的出发点。1965年中国经济的调整工作取得了基本的成功，但是等待工业化的却是血雨腥风的文化大革命。

8.2.3 “大三线”

三线建设是中国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期，为了备战、备荒、为人民而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内地进行的一次大规模的工业建设，总体思想是建立在打大仗、打核战，大打和早打的基础之上的，三线建设就是为了给可能爆发的大战作好后勤的支撑与保障，同时改变中国工业化的根本布局。因此，三线建设就中国工业化进程的意义而言主要在于重塑中国工业的布局，使之符合经济的长远发展需要。

1964年5—6月，在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毛泽东从中国周边帝国主义和苏联对我国的态度，以及战争的危险性出发，提出了将中国划为一、二、三线的格局，以及必须进行三线建设的思想。当时，中国的周边多是对我充满敌意的国家和地区：由于麦克马洪线的划分，与印度存在领土争端，发生过自卫反击战；印支半岛上美国在越南南方从事战争，甚至轰炸北越以及与我空军发生冲突；美国支持台湾，用武力阻挠中国的统一；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和美国针对中国的军事基地的存在；美国在韩国的军事基地对于朝鲜的监视；在中国的北部，由于中苏交恶，苏联在边境陈兵54个师近百万部队，不仅在新疆进行居民策反越境，而且将战略导弹指向中国的重要战略目标。毛泽东认为面对这样的危险形势，70%的工业布局在东南沿海是危险的，内陆地区必须建立起能够支撑战争的工业，避免当年反法西斯战争初期苏联乌拉尔山

脉以东工业基地没有建成，苏联欧洲部分工业被纳粹德国严重破坏的历史局面重演。

1965—1980 年，中国在内地 13 个省和自治区进行了规模巨大的大三线建设，直到中国经济的基本架构从计划转换成为市场导向后，这一过程才算基本结束。三线建设的重要构思是：把国防放在第一位，集中力量尽快将三线（西南、西北）地区的基础工业、交通运输业发展起来，逐步改善工业布局，相应发展农业和轻工业，改善人民生活。从阶段布局上，中央确定了将三线建设分为两步走的规划：1965 年和整个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投入 560 亿元人民币，重点用于成昆、滇黔和川黔铁路的建设，以及攀枝花、酒泉钢铁厂，另外还有重庆工业基地；第四和第五个五年计划期间，投入资金 1 492 亿元人民币（占全国基建总投资的 36.4%），安排基建项目 1 100 多个，应该讲今天三线地区形成的工业生产力，基本是第二阶段的产物。而且这一阶段正好处于中国文化大革命期间，全国各个地区调集数百万军队、工人和工程技术人员，会战大三线，在动乱中完成这样宏伟的大规模工业建设是非常不容易的。邓小平 20 世纪 70 年代中前期进行的整顿，抵制住了文化革命对于三线建设和全国经济建设的冲击，对于三线和全国经济的建设发展起到了极大的促进作用，使得工业发展回到了正常的轨道上。

大三线的建设，对于内地 13 个省区交通、基础工业和资源开发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在三线建设的 17 年间，内地新修通车的铁路、公路里程占全国新增里程的 55%，达到 8 046 公里和 22.78 万公里。形成了川黔、湘黔、成昆、贵昆、襄渝、焦枝、阳安、太焦以及青藏铁路西宁至格尔木等 10 条铁路干线，内河港口新增吞吐能力 3 043 万吨；建成河南平顶山、陕西韩城、铜川、四川宝鼎、贵州六盘水等 50 多座统配煤矿，新增原煤开采能力 1.12 亿吨，葛洲坝、龙羊峡等大中型火力、水利发电站 68 座，新增装机能力 1 872.4 万千瓦，开发了 8 个油、气田，形成 556 万吨的原油生产能力和 1 442 万吨的原油加工能力，以及 54 亿立方米的天然气开采能力。建成攀枝花、水城、舞阳、长城等 984 个钢铁企业，

新增炼铁1 248万吨，炼钢1 161万吨的生产能力，建成有色金属工业企业945个，生产占全国的50.2%，由于建设了第二汽车制造厂、陕西汽车制造厂、四川汽车制造厂等企业，三线厂的汽车生产能力占到了中国的1/3，另外，航空、核研究的125个项目使三线在这方面的生产能力占全国的2/3，航天、导弹、兵工项目的建设使三线在研究、制造、发射方面处于领先地位，新建设的重型机器、机床、内燃机、拖拉机、仪表、光学等工业基地，形成了中国新的工业生产力，建成了一批新型的现代城市，如攀枝花、金昌、十堰等，因此，大三线的建设不仅从交通、基础工业上扭转了中国工业化布局的畸轻畸重格局，而且对于中国的经济社会生活给予了极大的改观，繁荣了中国西南、西北原落后地区，也带动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进步，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在三线建设中，由于指导思想的核心是准备打仗，因而除了要求速度外，在建设选址上存在着一些不科学的地方，不仅企业之间距离远，车间之间甚至都有相当的距离，割裂了工业生产中的上下游关系，没能形成良好的协作，造成巨大浪费，以致从经济角度看相当不合理，而且由于企业孤立，就必须建立相应的社会后勤保障体系，如幼儿园、中小学、医院等，与当地经济结合较差。改革开放后，在市场导向的经济下，这些企业进行了艰难的“军转民”过程，有的转化的相当成功，如四川长虹电视机厂、四川嘉陵摩托车厂等，但大部分三线工厂目前的境况亟须得到改变，以适应新形势下的军工需要和经济发展的需要。

8.3 中国工业化的新长征

在经历了156项建设、大跃进和大三线的历程之后，中国的工业化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这一阶段是随着中国的改革开放的深化而不断发展的。笔者曾经给一些港澳台的朋友解释中国改革开放的立意和目的，笔者在白板上写了一个简写的“国”字，告诉听

众：国为我们居住之地，开放是将国字外边围着的大口撤掉，也就是拆掉隔离中国与世界的一堵墙（甚至是长城），使中国人走向世界，于是世界上可以认识到中国是“玉”，值得打交道，玉也会给这个世界添加光彩。而玉字有一个小点夹在字中间，这个小点意味着玉存在的缺点和瑕点，应该予以去除，这便是改革，当这个缺点去除之后，剩下的便是一个“王”，它的含义是中国将通过改革开放而成为世界经济之王者，能够自立于民族之林。改革开放给予中国工业化的意义也就在这里，改革开放下的中国工业化是过去所无法比拟的。

8.3.1 “洋跃进”与再调整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放弃了坚持了20多年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口号，开始了工业化的新长征。事实上中国自1955年起就一直在探索符合新中国需要、符合新中国国情的工业化道路与政策，例如在毛泽东1956年4月25日《论十大关系》的著名讲话中便阐述了许多有益的原则。即便在文化革命的动乱中，中国的工业化也在探索中前进，1969—1970年将部分国营企业下放给地方管理，1972—1973年经毛泽东的批准，动用43亿美元从西欧、日本引进了一批先进的成套设备，1975年邓小平同意用中国的石油、煤炭换取国外的技术设备，对能源开发进行装备，但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由于有“四人帮”的破坏、干扰，如“玻璃蜗牛事件”、“风庆轮事件”，批判“崇洋媚外”等，引进先进技术设备的工作一直受到阻碍，这种情况一直到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之后才得到根本的纠正。1978年3月，邓小平在全国科学大会上指出，独立自主不是闭关自守，自力更生不是盲目排外，在这种思想的引导下，从发达国家引进技术设备和管理经验同时进行改造为基础的新的工业化战略得到了贯彻，并取得了很好的结果。

1978年，中国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大手笔地动用78亿美元，

与发达国家签订合同，引进了22套成套设备和机组，包括宝山钢铁厂，5套30万吨乙烯生产装置，1套11万吨乙烯关键设备，4套30万吨合成氨装置及彩色电视机生产线等，利用各种外汇资金、引进外资和补偿贸易等方式对引进予以支付，使得中国的工业引进了具有一定世界先进水平的机器和设备。但是与此同时，当时的主要领导人提出"要搞十来个鞍钢、十来个大庆"，以石油和钢铁为工业化的主攻目标，极力加大投资，暂缓轻工业的发展，《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和评论员文章，提出速度问题是一个政治问题，在国民经济10年规划中提出建立10个钢铁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30个大电站、6条新铁路干线、5个大港口，等等，形成了中国工业化史中的"洋跃进"过程。由于它对于经济发展的极大的负面影响，1978年的积累高达36.6%，仅次于1959年，和与1960年持平，轻重工业比例再次失调，1979年中国的国民经济不得不开始了第二次全面调整，当年停建、缓建大、中型项目295个，到1980年底在建的大、中型项目从1 187个减少为904个，在重工业"关、停、并、转"的同时，工业化的重点转向了与人民生活关系密切的轻工业和纺织业。在这次经济调整中，中国的工业化第一次跳出了一系列的教条说法，如"先生产后生活"，"重工业优先发展"，"生产资料优先发展"，以及"高积累，高速度"等，加强了工农业之间的联系，并看到了价格适度放开所带来的巨大推动力，这次国民经济的调整，真正摆脱了苏联旧模式，以及该模式指导理论的羁绊，为今后中国的工业化探讨了一种新的思维，在具有中国特色上迈出了非常宝贵的一步。

8.3.2 中国工业化中的乡镇企业

中国的乡镇企业的前身是1958年大跃进时期为了服从大炼钢铁而诞生的各种社队企业。三年困难时期被大幅度收减，1962年中央明确公社和生产大队一般不办社队企业。1970年后由于建立地方"五小"工业，社队陆续建立了一些小化肥、小水泥和修配厂，这样，在1978年乡镇总产值仅为493.13亿元，有企业152万

多家，职工2 826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9.2%。在国民经济中地位并不重要。从1970—1983年，乡镇企业的发展也经历了调整，其方向是增加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比重，减少第一产业的比重，到1983年，与1978年相比，乡镇企业的总户数有所下降（下降近18万家），但从业人员增加了408万人，企业总产值达到近1 008亿元人民币，产品质量有了一定程度的提高。但由于当时国家的政策方面并不十分明朗，这时的乡镇企业即便是在农村经济中，也仅仅是刚刚被人们"重视"。

1984—1988年是中国乡镇企业发展的起飞阶段，1984年的中央一号文件、四号文件对于乡镇企业的发展给予了大力支持，对它们在经济中的作用给予了充分的肯定。四号文件还正式将"社队企业"改称为"乡镇企业"，规定了它们应该是乡办、村办、联户办和户办，而1984年中共中央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为中国的改革开放制定了大政方针，乡镇企业也因之有了经营的良好的外部环境，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对于中国的工业化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重要。到1988年全国的乡镇企业已经发展到1 888万户，企业的从业者有9 545万人，其中户办、联办的企业要多于乡办和村办，户数占90%，从业人员占一半多，产值在近一半的省市中也超过了乡办和村办的乡镇企业。在中国乡镇企业从事的生产活动中，到1988年从事工农业的乡镇企业的比重已经降到50%以下，为47.3%，其中农业仅为1.2%，乡镇企业主要从事的是第三产业的各种生产和服务活动。在产值中也占到了15%。那一时期乡镇企业的大发展，对于吸纳农业富余人员，提高农民的收入有着突出的贡献。

1989—1991年，由于中国经济进入3年的治理整顿阶段，乡镇企业的发展也因而受到了很大的影响，而乡镇企业因为产品质量、环境污染、原料浪费、生产效率低下、假冒伪劣等问题，开始进行整顿。在邓小平南巡之后，乡镇企业才再次得到迅速发展，今天在经济中已经是三分天下居其一，其在中国工业化中的作用得到了人们的肯定。对于乡镇企业，邓小平用"异军突起"来形容，这

是因为乡镇企业不仅提高了农村经济的收入，更重要的在于它对于经济体制、社会生活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的巨大冲击，它将传统的农村、农业转变成为具有现代意识的村镇和多种经营，因此乡镇企业的重大意义在于中国社会的进步。乡镇企业在中国一诞生，就是在传统的计划经济的夹缝中讨生活的，生活必需的各种原料、燃料、运输、用工和技术均没有列入国家计划，也没有政策的优惠待遇，生产资金、原料需要自筹，产品要自找销路，这些都常常与传统计划经济发生矛盾，实际是市场机制与计划经济之间的冲突，解决的过程给人们指明了经济体制改革和中国工业化的方向。乡镇企业的运行与管理机制与市场机制紧密结合，自主经营，灵活反应，人员流动自由，注重效益，比较符合市场经济中企业内部运行机制。工业化除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外，更重要的是对于整个社会变革的作用，中国的乡镇企业不仅造成乡村经济结构的变化、国家的经济结构的变化，而且冲击了传统的城乡概念，建设了城镇，缩小了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离土不离乡的工业使得农民成为工业生产者，为了采购原料和推销产品，为了更好地获得资金和技术，农民进入市场，离开土地，转战全国，活跃了经济，创造了“苏南模式”、“温州模式”、“珠江三角洲模式”，通过生产结构升级，发展外向经济，乡镇企业为中国的工业化提供了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经验，通过中国特有的多层次、多方位的工业化进程，采用乡镇企业化来平稳完成国家城市化和人口素质提高的过程，达到社会生活的高质量。

8.4 中国新型工业化中的对外经济因素

三资企业是指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以及外商独资企业。这些企业在中国工业化的经历中正在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它们在中国的土地上生产，它们的进出口算作中国的对外贸易，它们的对外债务记录算在中国的对外债务上，总之，除了一部分利润要汇回投资

者所在国之外，它们与中国的企业并没有什么根本上的区别，但是在中国的工业化过程中，对于外资的作用，以及中国进一步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人们却有许多疑问。笔者认为，在今天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中国的工业化离不开世界，而由于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在不断提高，中国的工业化也必然会对世界经济的发展做出自己的贡献。

8.4.1 中国的各个产业经过改革开放 20 多年的发展，已经初步具备了在国际市场上进行竞争的基础，进一步的开放是在竞争的刺激下使中国工业化得到应有的发展

“先挖沟，后放水”是中国在工业化过程中开放市场的一种形容，中国经过 20 年的改革开放，生产能力已经今非昔比，生产总量在世界上令人瞩目。自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来，经过市场竞争、兼并与整合，中国市场上优胜劣汰的形势明显，出现了一大批名牌企业，它们的产品具有竞争力，已经占有了很大的市场份额，成为各个行业的领导者。目前中国在电视机、洗衣机、电冰箱、录音机等耐用家电行业，占有了世界 1/3 的生产能力，长虹、康佳、TCL 王牌基本控制了国内的电视机市场，小天鹅、海尔、荣事达洗衣机，海尔、美菱、新飞、科龙容声电冰箱，不仅淘汰了国内中小型企业的杂牌产品，而且一向得到国人青睐的日本、韩国进口产品在国货的竞争下也失去了往日的光环，在东南亚国家生产的日本品牌的家用电器如索尼、松下在中国市场几乎无人问津，其他产品也大多如此，尤其与人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产品更是如此。民族工业与三资企业共同构成了中国强大的生产力，虽然外国厂家看中了中国的巨大市场，但是就连美国这样的先进国家，也都对中国与劳动力密集有关的产品的竞争力感到害怕，事实上各个发达国家屡屡对中国产品进行反倾销起诉是中国产品具有市场竞争力的一个佐证。应该说，经过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之后，外国商品并不是洪水猛



兽，在正常的国内外市场竞争中，中国的企业照样可以在技术含量一般，尤其是劳动密集型产品上获得胜利。而外国产品的竞争恰恰却是促进中国产业进步的动力。

8.4.2 中国工业化进一步开放的条件是“低谷切入”

中国入世，绝大多数工业并没有遭到“灭顶之灾”，这是有原因的。假设中国经济处于高峰，各个产业都有大量的利润存在，任何的厂家都可以在市场上出售自己生产的任何产品（如1988年时的情况），如果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加大开放力度，甚至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国厂商因为进入中国的“门槛”降低而大量涌入，它们面临的是利润的“蛋糕”，进入中国后所作的事情就是切分市场已有的份额并获取已有的利润。但是，如同一些专家分析的那样，在面临21世纪时，中国经济处于“低谷”，各个产业的生产大多处于相对过剩状态，利润很薄，甚至整个行业亏损，经营难度明显大于过去，这时中国进一步开放，积极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外资如果进入，所能够作的，一方面是陪伴中国企业的困难，共同渡过低谷时期，即外国厂家进入中国后也将停留在低谷，积极地讲，外国资本为占据一定市场份额进行的努力，将有助于中国经济走出低谷。另一方面，如果外国商品进入市场，无非是使原来已经饱和的市场再增加一些过剩，舶来品也难以获得格外的垂青。事实上，中国的企业已经在行动中，长虹电视在降价占领市场时推出的口号就是与进口品牌进行竞争。20世纪末21世纪初，中国电视机行业再掀降价风潮，尽管人们对始作俑者——长虹电视屡屡降价的做法毁誉参半，但笔者理解厂家的苦衷，认为这是不得已而为之，厂家更愿意维持高价，但过剩的市场靠行政命令维持高价位是行不通的，今天人人都在讲中国农村是家用电器的广阔市场，但高价位与这一广阔市场的实际购买力之间有着较大的差距，不积极设法降低价格，这一市场仍然只能是“潜在”而非“现实”，另外，在“狼来”（入世）之前，中国厂商积极把市场份额作大，这可能是抵消进一步扩大开放、加入世界贸易组织负面影响的最有效的行为了。

换一个角度讲，如果进一步扩大开放，中国“入世”后，尽管中外厂商进入中国市场面临的条件一样，都是饱和、过剩，但外资产品、进口产品却能够大行其道，格外畅销，这就说明我们的确有不如人之处，或是产品不合时宜，或是推销乏术，或是外字号产品、企业具有值得我们研究的“秘密武器”，如果真是这样，正好给了中国的企业一个机会，向“打”上门来的对手学习，而且是带着压力学习，效果将好于平日，这也是中国扩大开放、积极争取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促进中国工业化的目的之一，中国的零售业目前就处于这样的状况。

总之，中国在自己工业化的进程中不断扩大对外开放，而且成功加入了世界贸易组织，这是在经济低谷时切入，是在具有准备、具有相应的调控能力、同时具有相应的客观条件下做出的决策，应该讲并非盲目的短视行为。

人们在谈到扩大对外开放或者“复关”或“入世”时，有意无意地总是将中国经济中的一些不尽如人意的东西与它们联系起来，甚至归罪于它们。这些看法，很大程度上是从关心中国经济发展的意愿出发的，其中很多分析具有相当的道理，值得引起重视。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从宏观经济的运行，以及宏观经济的微观基础进行探讨，从中国经济处于转轨的事实出发，从对外开放对于中国工业化的正面、负面影响的可能来讨论，就会得到不同的结论。本节以下将对工业化中的扩大开放，以及积极“入世”带来的负面影响（外国产品和外资的大量涌入占领国内市场）进行分析，同时试着探讨这种负面影响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实质关系。

首先，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的今天，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对本国产业的作用到底如何，是促进了工业化的发展还是滞后了工业化的发展，是削弱了国家的实力还是增强了实力，是加强了对经济的保护能力还是削弱了这种保护。

经济全球化、地区经济一体化、生产国际化是世纪之交世界经济的特点，世界生产在全球的分工与部署，逐步在静态比较利益的基础上，向动态资源有效配置过渡。不同国家的生产在全球生产的



各个环节、上游与下游中有着各自的位置，合作生产成为世界的倾向，品牌的国际化也正在悄然潜行，过去有一句非常流行的说法“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而今天却有另一种倾向则是“世界的才将是民族的”。开放才真正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途径。今天人们在更多地谈论应该是主动保护国内市场还是应该被动地去保护它，改革开放后一个十分有趣的事实告诉我们，在改革开放初期产品进口量越大的产业部门（指制造业），今天却成了中国生产能力极强，产品具有进口竞争力的生产部门，开放真正促进了中国工业化的大发展。

根据德国经济学家李斯特的看法，一个国家生产财富的能力要比财富本身更为重要，在经济发展的特定阶段，如在“起飞”的初期，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的收益要远大于闭关锁国，因为这时的国内产品与进口产品之间并未形成竞争，进口竞争态势没有出现，开放可以引进必要的商品和先进的生产力。当一国经济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国内进口竞争行业具有了一定的基础时，便要对国内市场进行分阶段、有重点和有时间限制的保护。最后，当一国经济有了长足发展后，又需要实行全面的开放政策，一方面可以有利于该国进入国际市场；另一方面也会有利于该国利用竞争促进本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中国的工业化过程，尤其是某些重要产业的发展印证了李斯特的看法。

中国目前一些重要的制造业部门，如电视机、洗衣机、录音机、电冰箱等，在今天已经成为了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并带动着相关部门的发展。但是，在改革开放的初期，在这些部门产品的市场上，日本进口产品却占据着主导地位，垄断着中国的市场。日本厂家将其成熟、行将淘汰的产品大量向中国市场倾销，而中国市场被改革开放扩大的容量，无声无息地容纳、消化了几乎所有这些进口产品，在买方出现了购买竞争，而这时同档次的国产产品在市场上几乎不存在。国内市场超乎寻常的需求和人们手中的货币购买力，在那一阶段给日本的厂商带来了巨大的利润空间，同时也给国内的厂家提供了导向。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对这类产品的进口

关税并不低（有时高达100%），但相对于巨大的有购买力的需求，这样的税率对于市场起到的保护作用非常有限，因此，同等水平的保护在不同的情况下是相对的，即保护的效用是不同的，因为有高达100%的关税就断定中国的上述行业是在保护下发展起来的，是不符合实际情况的。

从目前的观点来看，中国家用电器生产规模的急速扩大，确实是中国工业化和整个经济中最先出现的具有实际意义和市场导向性的：利润驱动使各部门、各个地区争相上马家用电器项目，引进国外的生产线，一时间全国处处有生产。随后市场的变化，在这些生产者之中以看不见的手进行了淘汰，虽然存在着资源的浪费，但最终形成了目前中国家用电器的生产格局。中国现在以几乎占世界1/3的普及型家用电器的生产能力和具有相当开发能力的厂商队伍，不仅基本满足了国内的大部分需求，而且在国际市场中也开始崭露头角。1996年开始的中国彩色电视机工业的价格调整，与国外产品进行经济而非行政命令的角逐，完全说明了中国的彩色电视机工业已经具备了在一定层次上、一定范围内与国外同类产品进行竞争的能力，已经摆脱了幼稚行业的怯弱，可以准备进入国际市场进行搏击了。

此外，可能不那么恰当的案例是中国的汽车工业。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便有了自己的汽车工业，至少比韩国提前20年。改革开放之后，曾经有过一段时间外国（日本）车大量涌入，随之而来的是有组织、无组织的大讨论，题目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中国的民族汽车工业向何处去？开始了坐而论道。过了5年～7年之后，人们发现空谈谈不出国产车，于是在重新认识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引进国外技术和生产设备，购进国外零部件，重走组装、合资办厂、国产化、自行设计和制造的道路，这样才又出现了几大几小的生产格局，有了尽管在世界上不很先进，但在国内却很不错的国产车，中国今天也成为世界4大汽车生产国之一。但是，事情过去之后，却很少有人从经济上探讨过浪费掉的时间价值几何，探讨应该如何在新的世界经济环境下，从较高层次上更深地去理解自力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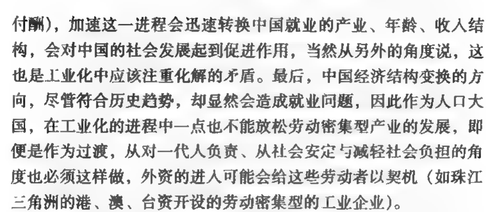
生的含义——国力强盛的发达国家在工业领域尚且要利用各自的比较优势进行合作生产，产品日渐国际化，这并未被说成是放弃自力，为什么中国人反而要自缚手脚，在错误理解的基础上，片面地强调自我生产呢？将自我生产等同于民族工业，这是放大了的大而全、小而全，是计划经济下实行工业化的痕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在经济全球化之下的自力更生的工业化过程。总之，从改革开放的事实和现象出发，我国发展快，为国际同行所瞩目的产业，基本是那些进口产品多，开发早的行业，进口刺激了国内厂家的生产欲望，以进口替代为动力大量引进先进技术，最终形成了世人不敢小视的生产能力，真正形成了对于中国产业的主动保护，而且也为中国的工业化赋予了新的内容。

其次，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对于本国市场机制的形成与完善，是推进还是滞后——答案是明确的。在20世纪50年代后由于各种原因，尤其是计划经济的建立，中国的市场在很大程度上失去应有的功能，使得我们的研究失去了基础，但中国的完全计划经济大约只持续了30年，市场比较易于恢复，市场化比较容易进行，这给中国对外开放的自由度和在地域、时间上的快速发展提供了有益的空间，只有国内市场得到较高程度的发展，各种产品的价格由市场机制决定，才会有益于国内、国际两个市场的接轨，贸易也才具备了自由化的基础和迅速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这里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尽管中国目前市场的组织架构已经初步形成，市场的游戏规则也在完善，但是，市场的灵魂，即信用却仍然没有树立起来。计划经济因为是“看得见的手”在进行运作，市场的基础不是契约，而市场经济是“看不见的手”在操作，市场的基础是契约，因而信用这一契约的基础便成为市场是否能有序运转的关键，中国国内市场目前缺乏信用，尔虞我诈充斥，势必会影响到中国的对外开放和发展。因此，建立市场的灵魂即法则与法规，使市场具有信用基础是深化改革的重要课题。外国资本、产品的进入，世界贸易组织规则的执行，必然会有益于中国市场规则的建立与健全，促进市场架构的进步，只有市场架构、市场规则、市场惯例建立、健全起

来，才可能使得市场具有力量，在开放的基础上、竞争的基础上形成真正的自我良性循环，而中国的工业化也才会有一个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发展的空间。

再次，对外开放的扩大，外国产品、资本的涌入，是造成中国在面临21世纪出现人员较大规模下岗分流的主要原因么？笔者认为答案应该是否定，结构性下岗的出现是中国经济结构转型的结果，在社会保障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我们需要做更多的工作。

根据中国改革开放20年成果的公布，在华运作的外国直接投资，包括独资、合资、合作等各种形式，共吸纳了1 800万人（也有报道说包括间接创造的岗位，共吸纳了2 500万人）的就业。这在沿海地区是非常明显的。应该讲，从总的情况来分析，外资的涌入、在华经营，创造的工作岗位要比影响到的工作岗位多，这是大家都会承认的事实。如果我们作进一步的分析，会发现中国就业的问题远不是一些人想像的那样简单，解决起来也并不容易。首先，中国的就业压力在相当程度上是工业化过程中产业结构转换造成的，经济结构的转换是任何经济都需要的，也是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与转换之前相比较，新兴的产业在资本—劳动比方面，一般都会有较大的进步，即同量的劳动要使用更多的资本，但反过来也可以讲同量资本将使用更少的劳动，如果这种转换主要体现在用更新的资本—劳动比替代原有资本—劳动比来生产原有产品的话，新结构对劳动的排斥是十分明显的，除非对原产品的需求产生突破性增加；另一方面提高效率则是任何工业化过程所追逐的目标。其次，如果我们考察20世纪末下岗人员的年龄结构，就会发现问题特有的复杂性，目前失去工作机会的人员，大多工作于所谓“夕阳”型产业，年龄在40多岁或50多岁，由于“文化大革命”，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所具备的知识结构与工作经历，基本已经难以适应经济结构的转换，年龄又使得他们较难接受新的转岗培训，几乎不为结构转换所吸纳，基本成为结构进步的牺牲者，而年龄较轻者则存在接受再培训适应社会的可能，这是一次淘汰式的痛苦的就业调整，也是对不合理的收入结构的调整（按贡献、相对于生产率而非按工龄



付酬），加速这一进程会迅速转换中国就业的产业、年龄、收入结构，会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到促进作用，当然从另外的角度说，这也是工业化中应该注重化解的矛盾。最后，中国经济结构变换的方向，尽管符合历史趋势，却显然会造成就业问题，因此作为人口大国，在工业化的进程中一点也不能放松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即便是作为过渡，从对一代人负责、从社会安定与减轻社会负担的角度也必须这样做，外资的进入可能会给这些劳动者以契机（如珠江三角洲的港、澳、台资开设的劳动密集型的工业企业）。

中国经济在经过农业时代进入了工业化时代，今天人们更多地在谈论知识经济，从知识与工业化的关系来探讨，“工业”一词正在更多地被“产业”所替代（英文的 industry，既有工业的含义，也被译为产业），产业则与传统的工业（更多地体现为大烟囱、大厂房、大机器、大工地、大兵团的原有意义的工业），有着非常明确的区别，它体现着工业从有形向无形的发展，从硬产品向软产品的发展，还体现着不断的创新。在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银行认为只有中国和美国是赢家，当产品生产流程规范化后，中国在成本和规模基础上的优势便会显现出来，中国由于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它具有的双元结构，一方面使得中国能够较好地适应高科技的出现；另一方面能够很好地适应“雁行结构”传导的适宜产业，它的工业化路径显然和其他的国家会有所区别，具有自己的特色，在研究、介入世界新兴的知识经济时，又要大力地发展适宜的“硬”工业（“硬”农业），建立自己经济发展的基础，在教育中要注重社会科学的发展，但更要注重工科和商科的建设，培养新兴工业化需要的实干家，人、物、技术与制度因素的有机结合，才会奠定中国新型工业化的坚实基础，为下个世纪中国经济的进一步腾飞做好准备。

第9章 新时期中国经济运行的外部生产力因素

——信息高速公路构筑了新国际经济环境

科学技术是人类生产活动的结晶。科学共产主义的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不朽的巨著《共产党宣言》中曾经告诉我们："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自然力的征服，机器的采用，化学在工业和农业中的应用，轮船的行驶，铁路的通行，电报的使用，整个整个大陆的开垦，河川的通航，仿佛用法术从地下呼唤出来的大量人口，——过去哪一个世纪料想到在社会劳动里蕴藏有这样的生产力呢？"① 科学技术对于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共产党宣言》，3版，32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



社会经济的巨大推动作用，不仅使人们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更重要的是将人类实实在在地带进了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时代。同时，知识经济，尤其是信息技术的大发展，使得世界的工业巨子的结构与位置发生了根本的变化，1879年5月26日创造的道-琼斯工业股票指数中，从初创时延续至今的仅剩下了通用电气一家，其余的均已落马，钢铁工业甚至已经从该指数的成分中剔除，产业的兴衰可见一斑。

我们知道，信息与材料和能源一起被列为社会经济发展的三种基本资源之一，历史上人们在开发材料与能源的过程中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在现代社会中，一个国家或国家集团对于有效信息的占有程度，以及对于信息资源的有效开发和利用，则是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竞争力的主要来源，近年来世界范围内兴起的信息基础设施热，充分地反映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中国要想加速发展经济，从而控制资源的流向，没有这种意识，没有相应的手段进行建设和开发是不行的。从理论方面分析，信息资源的无限性，对于西方经济学的资源稀缺前提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人类物质产品极大涌现，达到人类大同提供了更坚实的物质基础。

1998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主题是“知识与经济”，报告提出由于创造知识的成本往往很高，这种创造大都发生在富国，于是穷国和穷人不同于富国和富人，不仅因为他们缺少资本，而且也因为他们缺少知识，更缺少知识沟通的信息渠道。知识有千千万万，传播的渠道也各具千秋，在今天人们往往把知识看成不同信息的组合，即它的主要形式体现为信息，它的现代化传播渠道有声、光、电，但新兴的信息高速公路则是信息传递的全新媒体，它也是各个国家经济发展所必然要加快兴建的。尽管知识经济的定义中含有生物工程、金融工程等多个方面，但信息工程给中国人的影响却是最实在的，“你上网了么”是中国大城市今天最时髦的打招呼用语，上网率也是一个国家信息化的重要指标，尽管今天在中国上网的人们尚局限于一定的圈子，相信明天英特网在中国会和电视一样，成为大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之一。这样，中国经济史经历



了从烽火台、报马驿站、鸡毛信件、电报电话到英特网多媒体的一个完整的信息传导分册。本章将探讨知识经济中的信息高速公路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

9.1 国际信息技术基础设施的建设

知识经济改变了原有的生产函数，人们在长期的生产活动中认识到，生产财富的能力比起财富本身更为重要，要追求财富的生产能力，创新必不可少。按照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约·阿·熊彼得的说法，创新可以归结为：引进新产品或提供产品的新质量；采用新技术、新的生产方法；获得新材料来源；开辟新市场以及实现企业的新组织形式。从事创新活动必须有两个前提：全新的技术知识、支配资源的能力。信息化在世界和中国符合上述定义，也具备相应的条件。信息化是全社会参与利用信息技术，有效开发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社会经济全面发展的过程。由于世界上天然材料与能源的有限性，开发具有无限性特点的信息资源便被认为是经济产生新飞跃的必然途径，人们希望通过无限资源的开发能够突破极限，取得可持续发展，而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则被看成是控制经济飞跃的“制高点”，于是世界各个国家和国家集团，地无分南北，国不论制度、大小强弱，纷纷投入了制高点的抢夺——信息基础设施(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的建设热潮，环顾今日寰球，确有同此凉热的感觉。这里可以归结出简单的清单：

9.1.1 国际信息技术基础的建设

美国。1993年3月，克林顿首次入主白宫后不久就发表了题为“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行动计划”的演说（The NII Agenda for Action)，并据此专门成立了“信息基础设施工程任务组”（IITF）拟定美国在这方面的15年规划，成立戈尔副总统领导的包括美国电报电话、微软、苹果、MCI等公司负责人组成的高级顾问委员

会进行咨询建议，1993年9月，戈尔和当时的美国商务部长布朗正式宣布美国开始实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 NII）计划，即人们常说的“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 Highway）计划。以美国当时65%的有线电视普及率、37%以上的个人计算机普及率、遍及全国的由光纤缆、同轴电缆、卫星和电话线路构成的通讯网络，已经存在了25年的计算机互联网络（Internet），以及美国在相关研究和产业领域中居于绝对领先的地位，据有关专家估计，建成这一信息高速公路至少需要20年的时间和4 000亿美元的投资。计划完成后，在全美将实现数字化多媒体（诸如数据、文本、图形、声音以及视频图像等）的双向、交互传输和处理，据说可以使生产率提高20%以上，现存交通流量减少30%～40%，企业存货平均下降20%，银行单据托收减少20%，企业管理费用下降12%，据报道，截至1998年，美国10%的产品销售是通过电子商务完成的，生产和流通领域的革命将给美国带来35 000亿美元的经济效益。近年实施的结果表明，信息高速公路已经使得，而且正在使美国的教育、商业、日常生活、家庭娱乐乃至全部社会经济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变革。也使美国经济保持了近10年特有的活力，其他国家似乎一时较难与之匹敌，而1998年美国再次兴起了所谓“第二代互联网”（NII）计划，并在宽带传输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1970年人们将大英百科全书从美国东海岸传到西海岸需要178美元，而今天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全部内容进行同样的传输仅需要40美元。美国，这个曾经被人们称为“汽车轮子上的国家”，现在正被更多的人称为“网络上的国家”、“数字化的国家”，这似乎更能说明美国的今天。1998年的情况表明，美国的儿童中，70%掌握了计算机的基本操作技能，40%会从网络上获取信息，而这些孩子正是美国未来20年中科技发展的主力军，1999年美国网上购物的金额达到310亿美元（中国为5 500万元人民币，见2000年5月15日《解放日报》），约为总销售额的1.4%，人们对于2002年的估计，电子网络交易将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6.1%（见《计算机世界报》，1999年3月各期）。

今天在美国，人们普遍认为，到21世纪，英特网能比世界超级航运网运载具有更多价值的货物，它作为财富载体的能力超过了一般物质的极限，是未来美国经济强大的基础。

欧洲。欧洲联盟于1994年6月决定投入1 500亿欧洲货币单位（埃居）的巨额资金，建造信息网络（IT网），以“欧洲信息空间”（EIS）计划发挥欧盟各成员国的优势，追赶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计划。在欧洲网络的架构下，英国1994年制定了自己的信息公路规划，准备投入380亿英镑资金，实施光纤入户，使教育、保健、购物以及金融、视听娱乐等信息服务进入家庭。法国准备投巨资建设3万公里的光纤通信网，德国、意大利也相应提出了各自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除发展光纤通信和多媒体产业外，还修改了与之相关的法律条文。欧洲所作的努力反映了它们害怕在这方面落后于美国和日本而成为信息产业二等国家的心态。通过近5年的努力，欧洲的信息高速公路粗具规模，不仅高等院校、研究机构、政府部门已经普及，它也连接到了欧洲的几乎每一个角落，最直接的作用就是在经济一体化中做出了贡献。近来，欧洲有关电子商务的研究与呼声正在不断高涨，但与美国相比不仅在技术和使用上，就是在观念上也存在着较大的差距。

日本。日本在1994年提出建立信息研究与流通新干线的计划(Mandara计划)，以开发超高速信息网络和发展多媒体技术为主体，着眼于提高行政效率和方便民众生活，首先将全国的十个巨型计算机中心连接起来，争取1999年在全国普及卫星通信和数据传输，并实现通信传输的数字化，争取到2000年县一级光纤网普及，使多媒体通信覆盖率能够达到20%，2005年所有城市建成光纤网络，多媒体通信覆盖率为60%，2010年普及到农村，2010年全国每个家庭都可以实行声、像和数据的交互式通信。日本这一目标的计划完成时间表，比美国还要快5年。为此，日本制定了以民间投资为主，政府提供财政援助并给予优惠政策的方针，据估计，完成这一计划需要投资8 000亿美元，可以为日本带来120万亿日元的市场机会。但由于90年代对于日本是“失去的10年”，计划不如

变化快，应付眼下金融困境和经济发展乏力占据了日本人生活中的重心，1998年底日本24万亿日元的刺激经济计划对发展信息技术的作用也很有限，2002年才真正有所动作，其科研投入金额目前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

加拿大。加拿大于1994年4月成立了加拿大信息高速公路顾问委员会，计划在10年内投资200亿美元，开发高速信息网络以及多媒体技术，将高质量的、数字化的文本、数据、声、像信号传输给政府、企业、学校、医院和家庭。由加拿大国家银行、加拿大国家邮政及魁北克一些机构组成的通用双向交互式（UBI）网络联盟，1995年秋季进行国家数据通信基础设施与居民连接的实验，美国的IBM公司是其技术合作伙伴。由于地理位置靠近美国这一新技术的源泉，加拿大的计划进展得较为顺利，在21世纪初期，其全国信息化水平列世界前列。

其他地区。新加坡一直注重发展信息技术，1992年国家电脑局向世界宣布了被称为“智能岛”的计划，即IT—2000计划。新加坡准备在10年内投资20亿新元，修建1.6万公里的光缆，争取15年后成为世界上具有先进信息基础设施的国家之一，将企业、公司、学校、政府部门、家用网络连接起来，提供广域的通信和存储服务，实行信息资源的交换和共享，并确定了使新加坡成为全球信息与商业营运中心等5个方向和教育、商业、金融、医疗保健、运输等11个部门为重点规划领域。台湾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是由“行政院”成立的信息通信基本建设专案推动小组主持的，侧重“官、产、学”相结合，重视民间咨询委员会的作用，并坚持循序渐进的方针。目前，作为计划中最主要的项目，信息高速公路的实验网络已经于1995年7月14日在岛内正式启用，为教育、卫生、图书以及娱乐提供服务。韩国1994年2月提出了自己的信息高速公路计划，准备在20年内投资550亿美元，分三个阶段建立起高速、宽频的信息网络，先接通行政部门、社会团体和国家机构，最后使网络连接到家庭用户。俄罗斯也成立了联邦信息化政策委员会，根据叶利钦总统的140号命令，制定各方面的政策，推动国家

信息化的建设。最值得一提的是香港，香港从来都把娱乐作为重要的产业来发展，它是世界上真正将信息高速公路中“互动电视”引入百姓家庭的地区，人们可以在家中任意选择所喜欢的电视发送的电影节目中的任意的影片，完全实现了“随心所欲”的目的。然而，1997—1999 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却使得这些地区的信息高速公路和数字化的发展速度大大放缓，与美国的差距进一步拉大。

9.1.2 信息基础设施的全球化与中国

以高新技术为基础的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国际化已经使今天的世界成为“地球村”，信息高速公路在今天已非一国或国家集团的事情，只有在全世界进行协调，信息高速公路的作用才能得到充分发挥，对世界经济产生更加巨大的影响。1994 年 3 月，美国副总统戈尔根据世界出现的信息高速公路热，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召开的“第一届世界通讯发展会议”上提出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GII) 构想，美国的信息基础设施工程任务组（IITF）起草了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合作议程，该国的计算机和办公设备制造商联合会（CBEMA）进行了各方面的游说，鼓吹世界应联合建立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行业标准、政策及准入原则。同年 7 月，在意大利那不勒斯举行的西方七国集团（G—7）首脑会议上，强调了鼓励全球信息社会发展的必要性。1995 年 1 月 31 日，美国副总统戈尔和商务部长布朗提出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协作议程，1995 年 2 月 25—26 日，在比利时布鲁塞尔召开了西方七国集团部长会议，讨论了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提出了在全球建立信息社会和推动新的工业革命，确定了 8 项设置全球信息基础设施的共同指导原则：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私人投资、规定一个适应性强的规章制度、保证信息社会网络的开放性、保障服务的普遍性、促进公民机会平等、推进内容的多样性、承认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同时考虑到了全球信息市场的开发、隐私权、数据的安全性以及保护知识产权等问题，并且决定着手实施诸如信息教育和培训、电子图书馆、电子博物馆及艺术画廊、环境与自然资源管理、信息总目录、全球应急、

海洋信息体系、宽频互交网络等11项全球示范计划（1995年3月西方七国集团已经开始着手实施政府间的联网计划）。1997年和1998年，均召开了世界信息大会，研讨信息技术的发展，同时也探讨信息如何更好地为人类服务。截至1998年末，全球互联网的用户已经超过了6 000万户，1999年第一季度末则达到了1.5亿户，仅美国在线公司一家用户就有1 400万户，据估计，2002年，全球互联网的业务量可以达到4 000亿美元之巨，与巨大的互联网经营量相比，PC硬件的价值已经大大降低，1999年第一季度，终于在美国出现了只要上网，免费赠送个人电脑的事实。在信息业“软服务”的地位，超过了硬件供给的地位，任何PC的生产如果不与网络结合起来，基本市场就会丧失，生产将陷于亏损状态。今天，人们在思考：信息的无限性对于人类生活方式的影响如何呢？如同茅草房只能放入简陋的家具，高楼大厦可以放入豪华家具一样，信息高速公路的网络可以放人怎样的增值业务，至今仍然是个谜，非常值得探讨。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来，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在人们常说的信息产业发展的三个阶段（即大型计算机及设备、微机及局域网络、信息高速公路阶段）中，已经进入了第二阶段和第三阶段的交界处，由国家经济信息化联席会议研究的中国应该如何在全球信息高速公路的框架内，自主开发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国家信息基础设施”（CNII），可以被看成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计划的组成部分。世界的信息业巨子也均看好中国这一巨大的市场，纷纷在华抢滩，比尔·盖茨、路易斯·郭士纳、克瑞格·贝瑞特这些微软、IBM及英特尔公司的首脑，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不断东渡来华，希望在中国信息产业的建设上有所作为。尽管1998年13亿中国人中上网的只有210万人，但1999年却达到了890万人，2000年9月达到了1 600万人，2002年达到了近6 000万人，这已经比许多国家的人口还要多了。因此国际信息业巨头的到来、一些业内龙头宣布在华举行全新的信息业务（如微软公司结合VCD、电视和上网的“维纳斯计划”、它的.net计划、IBM计算机生产的全本地化）不仅显示了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潜

力，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世界信息产业的执牛耳者们对中国经济的信心，作为中国人当然对自己信息产业的未来更应该充满信心。在世纪之交中国政府制定了政府部门上网的巨大规划，1999 年被称为政府上网年，到 2002 年在地级市一级基本建成了政府的网络，从而世界中文网络之中又增加了巨大的、可信程度极高的资源，而中国香港则是世界上最早将互动电视节目商业化的地区，节目丰富多彩，令人目不暇接。国内外联手开发具有极大规模的中国市场无疑将促进中国信息产业的进一步发展。

9.2 信息基础设施与互联网络

如同道路从乡间小路发展成为公路、高速公路、飞机航线对于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促进作用一样，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与投入使用，将会整合人类活动的领域及环境，使信息社会实现。从已有的迹象来看，它对于世界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巨大影响，将远大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变，远大于交通从步行、马车到火车、汽车、飞机甚至航天飞机这样的发展进程，为了进一步分析这种影响，就需要对信息高速公路及其发展予以介绍。

9.2.1 信息基础与互联网

通常被人们称为信息高速公路的信息基础设施，很难给予严格的定义，但从各种文献和美国的实践来看，可以大致被描述为：用于某一个国家、地区或全球的高速、双向交互的多媒体信息网络以及使之有效运作的设施和环境。在这样一个网络中，传送的内容有文本、声、像、数据和动态视频图像(如电影、电视)，但它与已经存在的有线电视、电视电话、计算机网络等不同的是：已有的电视(有线或无线)是单向发送的，而非双向交互的，不能实现用户从几百上千套节目中主动选择所需节目的视频点播(VOD)。已有电话的传送，每秒大约 64K 比特传输量(速率)就够用了，电视会议的传送即便经过压缩也

需要兆级的速率，而高分辨率电视(HDTV)节目的传送如果不经过压缩则需要几百兆甚至上千兆级的速率，这是现有的计算机网络、电话网络根本无法达到的。因此，仅仅从网络的角度看，以美国为例，也存在着如何大大提高现有网络的传送速率，实现多媒体信息双向交互传递，并将其连接到所有政府、团体、企业、学校以及全国9 000万家庭用户中去的问题。同时也需要有与网络匹配的软、硬件环境，各项相关的标准、法规(如个人隐私、知识产权的保护)的建立、健全，交互传送的多媒体信息，等等。从以上的叙述中，我们可以概略地将信息基础设施的构成归结为：

1. 一个连接社会各个办公室、家庭的高速网络，它具有双向交互、用户驱动、安全可靠、相互兼容、相互操作、开放的特点。

2. 高性能计算机和其他信息化设备，包括巨型计算机、多功能桌面机和便携机、多媒体信息服务器、智能化交换设备、多媒体终端设备、交互式电视（ITV）、高分辨电视（HDTV）以及现代化的通讯设备等。

3. 信息资源与高质量的服务，这就需要开发多媒体的文本、声、图形、动态视频图像等信息资源，如各种科技、教育、文化、商业、社区、图书馆、公共服务、影视音乐、政府文档、国际组织信息等全方位的数据资料库，并为用户提供一个友好、易操作的界面，保证高品质的信息服务。

4. 好的信息化环境，包括各种标准的制定与执行，如采用的网络协议是开放系统互联标准（OIS）或是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络协议（TCP/IP），保证信息高速公路安全可靠、保护知识产权、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权、保障服务普遍性、协调各国网络等的法律、法规及约规。

5. 信息化人才群体，即开发信息技术和信息资源、建造和运营信息高速公路的人才群体，以及各种信息的用户群体。

9.2.2　互联网的作用与功能

美国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的产生，既有需求拉动的一面，也有技

术推进的原因，但现有信息网络已经取得的成就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这一网络便是著名的国际“互联网络”(Internet)。

互联网络的前身是1969年建于美国的世界上的第一个计算机网络，即美国国防部高级计划研究署网络（ARPA net)，它的最初目的是用于军事通讯和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的计算机网络开始应用于教育、科研、商业和一般的公共服务，因而得到了普及和迅速发展。1983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采用传输控制协议/互联网络协议（TCP/IP）将全国各地的巨型计算机中心并联成网，形成了全美范围的计算机电子信息网络，并命名为“互联网络”(Internet)，1989年起，又将互联网络与其他独立的计算机网络，如比特网（Bitnet)、用户网（Usenet)、计算机服务网(CompuServ) 以及 FIDONet、UUCP、MCIMail 等并在一起，初步构成了现在的跨网络体系。另外，今天世界其他各国的信息网络都是直接、间接通过与美国的互联网络的联接而进入环球网络的，从这点出发，可以说美国的互联网络也是世界联网国家间自由交流电子信息的基础。1994年，美国互联网络的规模迅速扩大，已经有了1万多个联机数据库，接入了400多万台主机，联结了近3万个网络4 500万台个人计算机，其电子邮件（E-mail）已经进入了154个国家，并纳入了6 000个图书馆的资料，1998年这种情况几乎翻番，2000年9月，美国已有50%的家庭上网，到2000年末，网络的用户将超过2个亿，而到2005年美国将有75%的家庭上网。互联网络的主干是分布在全美的巨型计算机中心，每一个中心往往负责某一个领域的信息交流，沿着主干分支出几十上百个中层网络，如联邦网络、地区网络、高校网络以及外国的网络，它们覆盖着政府部门、几个州、几个高校或外国一个国家，中层网络之下则是机构网络，如公司、学校、研究所，有时机构网络下还会有部门网络，用户通过终端设备与网络接通，个人计算机则大多用电话线路拨号或光缆入户进入网络，得到服务。

互联网络的功能和用途很多，而且还在不断地增长，一个用户只要每个月支付十几美元（不到美国人平均月收入的1%）便可以



使用网络获得全面的基本服务。

1. 电子邮件（E-mail）。电子邮件是在互联网络上进行信件的传输，现在每天有数千万人次发送电子信函。这种通信方式的特点是速度快，美国国内东西海岸间的电子信件大约需要十分钟，欧美之间也只需要半个小时便可到达对方的电子信箱内，由于每个用户都有自己的专用账号，即所谓 Account，信件的保密性相当好。

2. 文件存取（FTP）。文件存取是利用互联网络在不同计算机之间存取各种各样的文件，如文本、音乐、图像、应用软件等，用户既可以从另一台远程计算机中将自己所需要的文件复制到自己的计算机上，也可以将文件从一台计算机存放到另一台机器上，目前互联网络上有数以万计存放文件的服务器，有大量的信息资源供用户选用，本书使用的资料有很多便取自互联网络。

3. 远程登录（Telnet）。远程登录可以使自己的计算机成为互联网络中任意一台主机的终端，而使用该主机的软件和各种信息资源。

4. “地鼠”（Gopher）。“地鼠”事实上是远程登录、文件存取等工具的集成，使用它可以很容易地进行信息查询和直接的文件拷取。

5. 万维网（World Wide Web，WWW）。这是1993年兴起的新一代跨区域超媒体（hypermedia）信息获取系统，它将网络中的所有数据资料作为超文本（文本、声、图像等）处理，提供了搜索、浏览、选取远程文件的方便手段，近两年来万维网发展得非常迅速，1994年底仅为10万用户，1995年翻番，1998年则以千万计。笔者在美国斯坦福大学作富氏访问学者时，正值1994年世界杯足球赛，工余休息时便用万维网将每日精彩进球的镜头挑选、打印出来欣赏，1998年世界杯时，笔者的学生在中国也这样做了，时隔4年，中国的信息产业已今非昔比，甚至中国的中央电视台的第四套节目在美国也可以上网浏览，春节联欢晚会在网上可即时播出，网络发展之快出乎人们的预料。从某种意义上讲，需求（商

业、教育等）推动了网络的飞速发展，由于万维网（WWW）所具有的全多媒体性质，是最有发展前途的一种信息服务。笔者1999年春天访美，在加利福尼亚州的电脑连锁商店FRY看到网上介绍奥斯卡提名电影，影片的光、声、色质量与录像几乎无异，应用网上电话与中国通话，除了声音略有时滞外，音质也与长途电话几乎无异，网络的万能已经引起了人们极大的重视。

6. 联机交谈（Talk IRC)。联机交谈是即时的，通过它，使用者既可以与遥远的另一位用户“键谈”，也可以和一群用户交谈，通过屏幕交流信息、成果或研究心得，甚至召开“网上”会议进行讨论。1993年中国留美学生在春节时第一次组织了网络“键谈”联欢会，大家通过网络彼此结识、恳谈，畅谈思乡之情。而到今日，谈已离“键”，干脆通过软件进行网络长途电话的交谈，用本埠的话费，享有长途电话的服务。这一技术已经在美国形成了商业基础，在中国使用者也大有人在，这一业务向电话商的垄断提出了真正的挑战。也把通讯技术提高到了新的层次。

7. 专题论坛（Usenet)。专题论坛又称“新闻组”（news group)，对全体联网用户开放，很像墙报，进入论坛便可以自由阅读所有新闻消息，也可以向新闻组提供消息或提出问题、回答问题。目前用户论坛约有几千个新闻组，是一个巨大的信息库，内容丰富，从哲学、经济学到雕塑、美术，从钓鱼、旅游到汽车保养、装饰房屋，几乎无所不包，是一个汲取各类知识的绝好的场所。

8. IP电话，即通过国际互联网进行的国际长途电讯通话，IP电话的使用者只支付本地电话费用。

9. 多媒体传送，即音、像、影视等即时在线传输。

通过互联网络的上述功能，用户可以从网络中获得上千种各式各样的服务，它们包括：时事新闻（世界各大通讯社的文稿）、报纸（如《纽约时报》）、杂志（如《华夏文摘》——全球性的中文网络杂志）、全球气象图书馆查询、联机购物、金融信息、音乐、游戏、电子信函、世界名画、科研信息、政府文档、会议消息、雇员

招聘、计算机软件、电子书籍、商业广告、电子商务、电视节目介绍及评论、远程教学，等等。由于互联网络提供的服务面向大众，与人们的日常工作、学习、生活紧密相关，对整个经济的发展提供着无法预料的影响。例如今天美国人加入网络已成时尚，据统计1999年美国人每周在个人计算机上花费的时间已经达到了13个小时以上，可以说互联网络已经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生活方式。它给予中国经济的影响也正在显示出来，它既是供给，也是需求，势必会在未来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2003年春夏交接之时，由于非典的肆虐，北京市中小学暂时放假，师生就是通过各种网络进行教学，在抗击非典的同时，坚持着学习、工作。

9.3 信息基础设施与经济发展

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过程，必然加速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信息化，而信息基础设施本身，又是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信息化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管是美国的国家信息基础设施，还是全球信息基础设施，都是跨世纪的宏伟工程，它对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如产业、企业、国际经济运作、大众生活、社会安全，都产生着极大的影响（见图9—1），并将给人们的生产方式尤其是生活方式（而这又是人们生存的基本环境）以革命性，甚至是不可逆的变革。

上述经济方面种种过程的有机结合创造出了今天人们议论不休的电子商务。狭义的电子商务，指的是通过互联网络商店所从事的在线产品和劳务的买卖活动。从广义上看，则应该将“电子商务”(e-business) 定义为通过电子信息技术、网络互联技术和现代通讯技术，使交易涉及的各方当事人借助电子方式进行联系，而无须依靠书面文件、单据的传输，实现整个交易过程的电子化。因此它不仅包含互联网上在线销售式的电子商务，还包括以整个市场为基础的电子商务。

产业方面：
★ 信息产业化，产业信息化
★ 高效、高附加值、节约资源
★ 新技术结构、新产业结构、新企业结构、新结构综合、电子商务（EDI）等
…………

大众生活方面：
★ 信息娱乐、休闲系统
★ 电子远程通勤
★ 电子远程学习、远程陪同、远程医疗保健、网络报刊、网络购物、远程博览等
…………

信息高速公路
★ 交互、高速、广域网络
★ 多媒体信息
★ 设备、标准、法规
★ 综合化、智能化

国际经济方面：
★ 自由贸易的扩大、24小时环球贸易、新贸易方式
★ 国际信息的交流、协作
★ 文化、学术交流，相互理解
…………

安全可靠方面：
★ 环境监视与保护、自然界的监测、物种保护
★ 社会安全服务（防火、防灾）
★ 信息的可靠、网络的安全性
…………

图 9—1　信息基础设施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影响

从更大的范围看，电子商务除了对有形或无形的产品和劳务进行在线（而非在店）买卖以外，还包括通过对网页访问资料的分析，收集和跟踪信息，进行企业之间的电子数据交换，通过计算机网络连接企业和客户、企业和企业、企业与政府部门的交易等众多方面。具体说来它不仅可以帮助企业找到客户、进行产品分析与市场行情预测，还可以从网络上获得专家的建议与帮助，招聘新的职员、迅速获得并大规模传播信息，进行低成本的文件传输、进行同业间的联系，创造商机等等（Rawn Shah, *The Business of the*



Internet, 1994)。因此，电子商务是整个商务活动，即从产品生产、产品促销、交易磋商、合同订立、产品分批、贷款结算到售后服务等全过程划时代意义的变化，是一种新的生产和交换形态。在电子商务的应用中，人们实际做到了零库存的愿望。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过程中，生产所需要的时间只占整体时间消耗的10%，而在流通领域中所需要的时间占90%，电子商务针对的主要是节约这90%的时间，因此效率提高十分明显。另外，电子商务可以使得交易过程透明化，这更减少了库存的需要。

以下将从几个方面对信息高速公路与经济之间的互动影响进行讨论，它将是电子商务的不可分割的方方面面。

9.3.1 信息产业化

20世纪90年代是网络大行其道的年代，信息产业化在技术、硬件和软件三个方面围绕着网络系统而展开，以适应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1994年，仅美国在线等3家接驳公司才使几百万用户上网，收入接驳费5.7亿美元，比上年增长44%，网络的联机服务收入超过了103亿美元。1998年世界的上网人数达到了6 000万户，2000年中期超过了3亿人，到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人们估计的4 000亿美元的收入可能实现。计算机硬件在已有的发展中，经历了大型计算机、巨型机的第一阶段，大力普及终端机的第二阶段，以及个人多功能计算机的第三阶段，在这方面紧跟需求和技术进步、提高市场意识是极为重要的。今天的计算机，中央处理器（CPU）从486发展到了586（Pentium-奔腾）、PII、PIII以及PIV（2003年又出现了基于无线上网的迅驰芯片），速度越来越快，功能越来越好，内存、硬盘和总线已今非昔比，搭载光盘驱动器(CD-ROM)、刻录设置、网络卡和作为便携终端成为时尚，用于网络的服务器也得到了极大发展，同时，机顶机（set top box）的开发，以及计算机娱乐应用的开发可以使家庭中的电话、电视、计算机、传真机等有机地联结在一起，并进入信息高速公路。为使网络适应高速、大容量、交互驱动的需要，不仅要架设光纤、金属绞线

网，普及卫星通讯，而且也要从技术上解决信息的传输，开发信息（如动态视频图像）的压缩还原、光纤传输的光中继、异步传输方式（ATM）等。另外，支持网络和硬件设备运作的软件开发，更是建设信息高速公路所必需的。以上的方方面面，推动着信息产业中网络、计算机、打印、移动计算、信息存储、CAD、扫描等几大技术的发展，人们的智慧和潜能在不断被发掘，也使从事这一产业的生产、科研企业不断地调整自己以适应信息产业日新月异的变化。在这些技术的发展过程中，显示出了中国人的智慧，物美价廉的大众娱乐电子消费品——VCD，超级 VCD 在中国的诞生，给中国的电子消费带来了一场真正的消费革命，它几乎淘汰了国外向中国倾销的录像机，创造了一个产业，带动了若干行业（当然也包括我们不愿意看到的 VCD 影碟的盗版、翻印和销售）的发展，重要的是它影响着人们尤其是农村的生活内容，同时 VCD 是中国在信息产业中可以自己制定行业标准的一个大产业。相信有一天它将以其价格的优势走出中国，至少在发展中国家流行起来。今天在生产 VCD 基础上，中国又成为世界上 DVD 的第一生产大国。

近年来由于网络的不断发展，全球信息产业化的步伐是非常快的。据台湾资策会（MIC）和美国 IDC 的统计，20 世纪 90 年代的中叶是信息产业发展的转折点。1993 年美国信息市场（包括系统、计算机、多媒体、软件、数据通讯、半导体、局域网、服务等）营业额便已达到了 4 212.5 亿美元，2000 年仅电子商务收入便达到 8 500亿美元。信息产业的迅速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1975 年创建的美国软件巨子微软公司（Microsoft），据美国《信息周刊》排序，1994 年营业额为 53 亿美元，但据美国《金融世界》周刊的评比，微软公司的商标价值高达 102.7 亿美元，雄踞世界之首，居第二位的是 IBM 公司（37.5 亿美元），第三、四位的也是美国的两家软件信息公司，1997—2000 年及 2002 年连续成为世界首富是微软的首席执行官比尔·盖茨，这充分说明了信息产业在全球经济中日益上升的地位。在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尽管经济欠发达，但信息产业的地位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台湾地区的信息产业仅仅经过

了10多年的努力，1994年产值已从1992年世界第七位上升为第五位，硬件已为第四位，1996年又跃居第二，其中显示器占世界产量的56%、主机板80%、鼠标80%、图像扫描仪61%、键盘52%、网络卡34%、绘图卡31%、笔记本电脑为世界第二，这些行业正在成长为台湾新的主干行业，也是股票市场的热门抢手货，支撑着台湾经济的发展。从地位上看，这些行业的重要性可以从下面的几个数字中得出：作为出口型经济，1969年台湾地区“国际贸易局”所表彰的10大进出口公司中，农产品加工占2家，纺织占3家，胶合板占3家，石化、机电各1家，在1995年的表彰中，除石化2家、航空1家外，其余7家均为信息业巨子，宏碁以1994年出口10.13亿美元、进口7.39亿美元居榜首。在20世纪90年代末，台湾的芯片业也获得了长足的发展，英特尔将CPU生产移师台湾，台湾也在试图发展以中文为平台的CPU，这无疑会给台湾的信息产业发展提供契机。

9.3.2 信息产业化与资本运营

为了适应信息产业的发展变化，近年来该行业不仅技术不断突破，而且在资本运营方面创造了新的局面，企业的并购、重组不断出现，相互控股、联合开发成为时尚，甚至出现了共同拥有资源共同承担风险的所谓“虚拟公司”，以硬件生产见长的涉足软件开发、设备公司插手网络、行业外的投资参股、各据优势的合并，都在为将来能够以人才、新技术、经济规模在信息高速公路占有一席之地而努力，这使该行业的格局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以信息技术为支柱之一的美国新经济终于“破土而出”。1994年，信息业的兼并、合并事件有几百次之多，金额近600亿美元，据美国广览联合公司（BA）的研究，非行业资金投入和发展有互补的公司的联盟是近期信息业企业的走势。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包含了教育、娱乐、科研和家庭日常生活方面的内容，涉及的是上千亿美元的市场，因此非行业公司（如娱乐、出版、教育、购物、通讯等公司）投资信息业十分积极，1994年，英国的出版公司Reed Elsevier PLC向美国的麦

德数据中心（Mead Data Center）投入了15亿美元，皮尔森出版公司（Pearson PLC）投资4.62亿美元买下了美国加利福尼亚的教育和娱乐软件公司Software Toolword，世界通讯巨子AT&T并吞了系统供应大户NCR。同业公司为了不同的目的（垄断、扩展、优势互补或其他），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兼并。1994年之前，信息业同业兼并的最高金额是1991年博兰国际公司（Borland International Co.）以4.4亿美元买下阿斯通——泰特公司（Ashton-Tate Co.）的案例，1994年，微软购买Intuit公司（15亿美元，但因美国政府以垄断干预而未果）、Novell公司以14亿美元买下WordPerfect公司、Wellfleet公司斥资12.7亿美元兼并了SynOptics公司建立了Bay Network公司、Sybase公司则用了9.44亿美元购得了Powersoft公司，金额均远高于过去。1995年微软向王安公司参股（购入了10%的股权），IBM买下Footprint Software公司，International公司与Bantec合并（合并后员工达4 000人），英国的Madge公司（总部在荷兰）以3亿美元与以色列的Lannet公司合并，成为美国之外最大的网络厂商，美国的Computer Associate公司（世界软件业第二，仅次于微软）斥资17.8亿美元收购Legent公司（全球第11大的软件商），1995年6月5日IBM宣布强行并购软件业排名第六位的莲花（Lotus）公司以加强自己在软件开发领域的竞争地位，1995年6月12日以每股64美元总计35亿美元成交，这是当时信息业最大的兼并事件，令世界工商业界震惊。

但是这种并购正未有穷期，1995年7月28日世界网络业巨子3Com买下了去年经营额为5亿美元的另一网络生产大户Chipcom公司。据统计，1995年上半年，信息业购并达649起，金额393亿美元，比上年同期的257亿美元增长了53%。1998年11月24日，全球最大的互联网服务商——美国在线（American online）以42亿美元收购美国的网景（Netscape）公司，以1 400万用户和每月2 000万的点击率访问量，使得它真正成为互联网业的霸主，2000年它又与时代华纳结合，创造了并购的空前规模。2002年惠普与康柏的合并，使得信息业大公司的重组体现了技术与规模经济



互补的优势，将使该行业的硬、软件以及网络系统的研究、开发、生产走势更加清晰，格局更加合理，也将使信息产业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成为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主导产业，它的发展将对社会生产与生活产生更为重大的影响，创造出全新的生活方式与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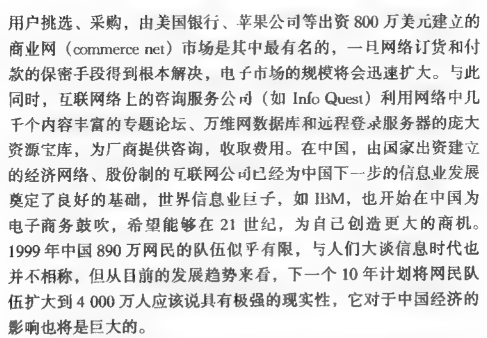
9.3.3　产业信息化

产业信息化是指在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中，通过信息资源的开发、获取、处理、传输、存储、利用等技术，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过程。信息资源在社会生产各个领域中的有效开发和利用，会使研究、开发、设计、生产、销售、管理发生前所未有的变化。信息基础设施的建设，据说可以使美国的劳动生产率 10 年内提高 20%，创造 400 万个就业机会，本世纪投入 2 000 亿美元资金，可以获得 30 000 亿美元的回报。产业信息化使企业结构已经出现了从金字塔形向平面形的转变，各级管理人员不仅可以全面地掌握开发、生产、市场、财务等数据，而且开始实现对全体员工的管理，IBM 反对政府改革福利计划和兼并莲花公司等重大行动，都通过互联网络上的网页（Home Page）与员工进行了交流，据说以网络相交流进行管理的专家集团式的企业形态在不久的将来也会产生。在个人工作方面，计算机网络合作办公（CSCW）、电子办公（Telework）、异地异时协同办公、卫星办公室等正在逐步成为现实。电子数据内部交换（EDI）的实行与发展，已经在传统产业中开始了一个新的结构性革命，它把商业文件按照协议和标准，转化成具有商业伙伴间相确认的数据格式，通过网络传输给对方，并在对方的系统中得到自动处理（如自动启动进料、生产、供货等程序），形成将双方或多方供求、生产、银行、税务、运输、保险、单据、申报联成一体的有机自动体系。随着网络和数据处理技术的迅速发展，目前全球已经有几十万、上百万户企业、机构采用了这种产生于 20 世纪 70 年代的系统。电子数据内部交换可以实现无纸贸易、削减冗员、将库存减至最低、加速资金周转、提高决策水平、简化程序、加快经营反应、直接联系并服务客户、大大降低资



源使用等，它不是一厂一商的自动化，而是全社会生产的整体自动化，因此经济效益非常显著。美国通用汽车公司采用电子数据内部交换系统，每生产一辆车可以节约250美元，一年便得到十几亿美元的效益，通用电气公司的平均交易结汇时间从20天减为3天，福特公司在试验轿车碰撞安全，过去一次试验需要6万美元，而运用网络技术只需要100美元。日本东芝公司每笔交易费用因之而减少了3/4，新加坡贸易的通关手续则从3天～4天降为10分钟～15分钟，香港更认为采用这一系统，可以使香港企业的竞争力提高34%，银行业务如果采用面对面的交易，平均每笔业务费用要1.07美元，而采用网络技术仅1美分。在今天，人们认识到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关乎本国21世纪在世界经济中的竞争地位，国民经济的高度信息化将在深层次上支撑未来国力的发展，与R&D及教育一起构造出本国下个世纪国力竞争的基础。

在经营方面，电子商务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由于互联网络有着众多的用户、世界性的覆盖范围、较低的成本、多媒体的丰富表现手段以及高科技的良好形象，作广告可以收到传统方式（广播、报刊、影视、样品、访问等）难以获得的效果，在其他业务方面也具有人们无法预料的效果。1994年，美国的世界存取网络公司（World Access Network）组建，它是一家利用多媒体进行展销的网络广告公司，企业可以在这家公司向互联网络用户以声、像、文字、影视来推销商品，并可直接与用户进行交流、订货，网络广告公司的服务器能向用户提供所有查询过广告的厂商的资料，以利客户扩大商业机会。现在，网络广告公司如雨后春笋，纷纷出现，如Vibe、World Source Network、Net Center等，厂商能够在互联网络的信息中心InterNIC上查找网络广告商的消息。美国的书商（如亚马逊网上书店）、金融服务公司、信用卡公司、计算机软件公司、一般生产厂家乃至三大电视网（CBS、ABC、NBC）都在利用互联网络来介绍产品、畅销书和节目，已成时尚。中小企业更多的是利用专题论坛、邮件目录作免费广告。另外，类似电子广告的电子市场在美国也出现了，零售商租用市场空间展示自己的商品，供



用户挑选、采购，由美国银行、苹果公司等出资800万美元建立的商业网（commerce net）市场是其中最有名的，一旦网络订货和付款的保密手段得到根本解决，电子市场的规模将会迅速扩大。与此同时，互联网络上的咨询服务公司（如 Info Quest）利用网络中几千个内容丰富的专题论坛、万维网数据库和远程登录服务器的庞大资源宝库，为厂商提供咨询，收取费用。在中国，由国家出资建立的经济网络、股份制的互联网公司已经为中国下一步的信息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世界信息业巨子，如 IBM，也开始在中国为电子商务鼓吹，希望能够在21世纪，为自己创造更大的商机。1999年中国890万网民的队伍似乎有限，与人们大谈信息时代也并不相称，但从目前的发展趋势来看，下一个10年计划将网民队伍扩大到4 000万人应该说具有极强的现实性，它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也将是巨大的。

出版业原本就是信息含量很高的产业，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以及目前互联网络的发展，使这个产业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新的商业机会。与传统出版业相比，电子出版具有时效性好、节约纸张、发行简单、方便快捷、容量大、效率高、编辑可以在异地异时共同处理稿件并且有利于环境保护的优点。1989年 Clari Net 创建，它与各大通讯社签订协议，获得新闻稿的电子发布权，用户在付费之后，可以读到全球24小时各国、各类的动态新闻。1990年海湾战争期间，由于电子新闻稿件发布及时，又能得到各种综合消息和评论，使得这一电子新闻网的用户大增。目前已经有几百种平面媒体进入了网络，如《纽约时报》、《今日美国》、《经济学家》、《高教纪事》等大报的电子版，《韦氏大词典》、《大不列颠百科全书》、《世界实况手册》等重要参考书，《美国独立宣言》、《人权宣言》、《黑奴解放宣言》等历史文献，《红字》、《伊索寓言》、《1001夜》、《星球大战》等小说，《圣经》、《古兰经》等宗教读物，《维纳斯的微笑》、《草堆》、《创世纪》等名画都可以在网络中阅读、欣赏。网络电子读物的迅速增长，促使电子出版社应运而生，它们既出版电子光盘读物，又向网络提供视听产品，笔者曾经考察过位于美国北加州硅

谷的激光出版集团（Laser Publishing Group），它是一家由华人领导的、有影响的公司，它的出版物包括教育、知识、娱乐、生活各个方面，光盘内容品位很高，如中国国画书法、世界名画、世界名菜谱、各学科手册等，该公司科技力量雄厚，同时有几个小组进行平行研究，平均每两周生产一本新的电子读物。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报业便认为，与信息高速公路的整合及多元化是未来的方向，美国四大报纸（《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联机上线，已使出版业与报业徘徊于信息高速公路的十字路口上。中国的电子出版业是与宣传紧密相连的，最初是中网公司（Netchina）上的《人民日报》、《市场报》，之后传媒竞相自办网站，然后是政府上网工程，除了内地外，香港特区的《大公报》、《星岛日报》等也均在网上，英特网上的各种中文网站，如四通利方与 SINANET 网的联姻，意在创建世界最大的中文网站，中文的各种内容十分丰富，与世界最先进的技术紧密结合，具有高知识含量。网上动态中文新闻非常及时，1998 年 8 月，当香港特区政府与国际炒家在股市大决斗的时候，笔者就是通过互联网即时地观察动态，直至收市港府取得胜利。自 1999 年起，香港的凤凰卫视在早晨的新闻中也增加了网上新闻的内容，为观众提供了全球更为丰富的信息。

娱乐业无论在过去还是在今天，都是靠新技术来不断提高和推进以吸引大众进行消费的。美国电影《终结者》、《真实的谎言》主角施瓦辛格的惊人表演，靠计算机来合成，比《警察故事》中成龙靠真功夫打天下的动作更惊心动魄，《侏罗纪公园》如果离开了计算机的高科技，则根本无法取得现有的效果。信息高速公路给予娱乐业机会，向娱乐业发出挑战，正在使娱乐业的发展进入一个全新的世界。从已有的迹象看，人们将迈进信息与娱乐、休闲相结合的时代，信息高速公路使得信息娱乐系统（Infotainment）进入家庭，通过有线或无线手段，将个人计算机、电视机、音响、影碟机、摄（录放）像机、电话等联结在一起，指定收看影视节目、收听音乐、玩网络电子游戏、进行远程博览，或者接受自己选择的业余教育，



丰富生活，提高自身素质。信息高速公路使得电子远程医疗保健、疑难病症的诊断、环境监控保护、社会安全服务（防火、防灾）成为现实，并因而产生了一系列新的服务于人们生活的产业。从某种意义上讲，信息高速公路不仅提高了生活水平，更重要的是它使得人们常说的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找到了自己存在的物质基础和可能，电子商务包含了 B2B、B2C、C2B、B2A 以及 C2A 等各种商品、金融、信息的交换，从而将社会推向新的进步。

9.4 新经济大潮中值得思考的几个问题

21 世纪的国际竞争，集中体现在知识的竞争，体现在人才的竞争，发展中国家由于各种客观原因，在生化产业、金融工程上很难崭露头角，因此，在这场知识经济的竞争中，一个国家的信息技术水平，尤其是信息能力，即对信息资源的有效创造、开发和利用，是竞争优势的新的源泉，也是发展中国家产生国际经济往来中新的比较优势的重要基础。结合发展中国家的具体情况，像中国这样的国家的信息能力的大小，除了信息设备开发水平的制约外，更多地体现在社会各个领域对于世界已有的信息技术的传播、普及、消化应用和信息资源的利用，以及国家对于经济信息化的宏观调控能力。基于此，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它对于国际经济关系的影响和作用，牵涉到方方面面的情况。在这样一个充满进步与挑战的世界中，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怎么办？中国是否可以跟上世界发展的步伐，从而在知识经济的大潮中自立于民族之林？世界银行认为，世界各个国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潮中，真正得益的只是美国和中国，原因何在？

9.4.1 信息革命与发展中国家

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发是典型的资金智力双密集过程，它的完成将使发展中国家更加难以改变边缘地位的状况，但也给了像中国这

样的发展中国家在知识经济大潮中以发展的新机遇。西方发达国家在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方面的投资计划多在千亿美元之上，发展尚不平衡（即便是美国，2000 年 9 月的统计表明，富裕家庭的上网率为 53%而贫穷家庭的上网率则为 35%），发展中国家绝无可能与之匹敌，更遑论赶超。从经济发展的过程看，在一定的阶段，劳动与资金有着相互替代的可能，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尚有发挥作用的巨大空间，但随着资金与技术高度结合的经济发展时代的来临，经济规律显示出，劳动对资金的替代程度已极大降低，其结果便是发展中国家固有优势的丧失，身处边缘地位的状况难以很快地改变，南北差距将不仅体现在数量上，更重要地将体现在质量和结构上。然而，发展中国家如果能抓住机遇，利用后发优势，充分吸收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结合本国国情，量力而行，适当部署，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也将给发展中国家带来机遇，在发展与发达之间建立起“金桥”。在这一方面，台湾地区积极发展信息产业的案例实际上给了人们一定的启示，而韩国尽管出现了 20 世纪 90 年代末的金融危机，但它在半导体方面的做法也在一定方面给人们以借鉴和启示。据笔者估计，根据几十年来的经验，以及信息工业中基础原料——芯片生产的转移，加之以亚太地区的所谓“雁行结构”的过程，中国在 21 世纪 20—30 年代作为世界的加工基地，将是下一个在半导体方面异军突起的国家，它将继美国、日本、韩国、中国台湾，成为世界举足轻重的半导体生产大国和使用大国。提前大量的人才创造、合理配置，将对中国这一产业的发展给予有力的推动。

9.4.2 发展中国家“阶段性”参与的机会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是资金与智力的结合，发展中国家（尤其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缺乏，但具有一定数量高资质的人才。信息基础设施总体结构中，有的部分并不完全基于自然资源或大规模的投资，甚至可以找出完全不依赖于自然资源的部分，但这些部分却往往与高质量人才的创造性工作分不开，例如在软件开发



方面。才智面前人人平等，发展中国家的高科技人才在发达国家已经取得的研究成就，给我们以启示：发展中国家可以凭借自己已有高科技人才存量，在信息高速公路的某些“路段”参与国际分工，从一定的侧面跟上经济发展的新脉络，为将来打下坚实的基础。事实上，中国在国外的学者的研究是卓有成效的。笔者 1998 年 4 月曾经两次访问微软总部，其中一次深入到其较为核心的研究部门，从计算机上调出来的华人专家的姓名何止几百，这些人如果短期回来讲学、工作，对中国的信息产业追赶世界先进水平具有重要作用。

信息化对于产业发展的作用本章已经有所涉及，除了作为一种新产业之外，信息业必须与其他产业紧密结合才能创造出经济的新发展。发达国家原有产业基础好，新的信息技术将从广度与深度上促使原有产业更上一层楼，产生脱胎换骨的变化。信息高速公路的提出与建设，使得美国能够继续保持自己在高科技领域中的领先地位，实事求是地讲，美国连续四年被评为最具有竞争力的国家，与这点是分不开的。西欧、日本大力发展信息基础设施，目的在于保持先进，不沦为发达世界的“二等公民”。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将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看成是迈进发达世界门槛的桥梁，但如果信息技术不能与应有水平的产业相结合，则信息高速公路将加重已有的二元结构，并且将使发展中世界中的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与其他伙伴的差距加大，如 1998 年，中国东部的新问候语是“你上网了么”，而西部地区仍然是“你吃了么”。

信息产业属于高新技术，对很多人而言，高新技术等同于“可望而不可即”，这就需要人们调整心态，搞清楚高技术与适用技术之间的关系。适用技术就其本身来说，并不等同于落后技术或中间技术，发展经济学对于适用技术的定义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并不含有技术水平的取向性的判断。适用技术强调的是技术的环境目标性、经济目标性、社会目标性、技术的民众性、技术的区域性、技术的未来性以及技术的价值判断性。简言之，适用技术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使得技术的创新、引进，符合一个国家的要素禀赋、市

场状况、社会文化背景、吸收创新技术的能力，从而能够获得技术创新和引进的最佳成本—效益，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适用技术实际包含着先进技术、中间技术甚至是原始的技术，是一个多目标、多层次的技术评价架构，关键在于知识技术运用中的成本—效益最佳化，同时留有最大的技术发展空间。作为中国，由于劳动力、工业体系、消费结构以及区位等方面的优势，高科技产业诞生之后，只要生产流程规范化，支撑该产业发展的比较优势就会发生变化，从高科技水平转化为成本和规模，而这点中国是具有特殊优势的，因此，在产业寻找最适宜自己生存的比较优势的今天，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几乎是无法替代的。

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对于跨国公司将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真正意义的全球经营，从信息获取、战略决策、指挥调度、设计生产、市场营销到财务核算便会出现。环球网络已经使跨国公司的组织结构、经济利益越出了国家的限制，成了地球村的生产单位，母公司与子公司的权力及职能的分配，利益的分享，不仅将极大地有利于跨国公司更有效地在全球范围内使人才、资金、信息、技术、自然资源结合起来，而且将有利于跨国公司结成广泛的国际联盟，实行分工合作，优势互补，使生产经营最优化，经济利益最大化。跨国公司“无国籍”，超越国界的追逐利益，使得国民经济的民族性、主权性被削弱（这点中国在引进外资时需要注意），从而在根本上超越了政府行为而推动了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进程。以上各个方面都存在着发展中国家在一定阶段参与国际信息革命的过程并从中受益。

9.4.3 信息革命与“智力”外流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与应用离不开高质量的科技人才。由于全球网络系统的出现，今天各国科技人员的工作完全可以进行远距离的合作，从而降低科技人员流动的机会成本，也将各国的智力库结合成为世界智力库。因此而产生的智力外流的形式对于流出和流入国来说，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本国科技人员为合资经营企

业工作，至少就有相当的成分是在为外国资本服务，而通过网络的合作则使本国科技人员完全脱离控制而为外国工作，且这种“智力”外流是完全无形的，后果也无法测度。当然，这种情况一方面能够使本国科技人员更好地在世界经济中发挥作用，但另一方面也使得发达国家对于发展中国家高级人才的争夺更隐蔽、成本更低，这将加重发展中国家人才匮乏的状况。21世纪的经济竞争基础是人才与教育，相对于劳动生产率而言，不少发展中国家的一般劳动成本并不低，已有人才存量的无形损失，无疑将进一步降低发展中国家的人力优势。

9.4.4　信息革命的“示范效应”与“从属效应”

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与使用，需要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因此发达国家在它的兴建和应用中占据着绝对的垄断地位。伴随这一现象而来的是，信息高速公路所需要的规则、标准、协议完全由发达国家制定，发展中国家只能是这些规则、标准、协议的接受者，而非制定者，在高科技领域中的从属地位极其明显，信息技术的层次愈高，这种从属性就愈强，从属的持续时间就愈长，因之丧失的利益就愈多，这种“中心—外围”结构的后果，对于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是非常值得研究的。另外，信息高速公路的建成，将使全球成为“信息地球村”，而无国界可言，从网络而来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很难避免，因噎废食又将使一国被排除于社会进步的行列。比意识形态影响更为需要注意的是，信息高速公路所带来的其他生活方式的影响。西方生活方式以人为中心，以资源大量占有为基础，以舒适为目标，发展中国家大众若追随此种以浪费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政府则完全无法引导。生活方式对于社会潜移默化的影响，是深远且超过意识形态宣传的，意识形态是灌输的，而生活方式则是自发追求的，二者完全不同，生活方式本身极强的不可逆性很可能给一国的社会经济发展进程带来出乎人们意料的、戏剧性的影响，在谈信息高速公路的作用时，这点是需要注意的，至少在这方面，发达国家的今天，不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明天。

信息高速公路的开发建设，需要极大地投入。发达国家目前大多由国家出面，进行政策制定和协调，并且投入大量资金作为启动和完成雏形之用，如美国最早的网络不仅由国家建设，而且由国家科学基金支持运转，当网络粗具规模之后，民营便被提到了议事日程之上，各种接驳商、提供服务的商家应运而生，人们便需付费使用了。发展中国家在开发建设信息基础设施时，国家的参与和民间的投入必须结合，只有当时机成熟之后，才可以逐步过渡到民营发挥更大作用的阶段。民营化的另一个重要的意义在于企业家可以根据对未来的预测，将所需要的人才提前培养，提前合理配置，这对产业与教育结合，教育为知识经济服务，有着重要的作用。发展中国家模仿发达国家的这些做法，这样，在科技领域发展中国家再次对发达国家跟进，从属地位再次显现。

9.4.5 新经济对于教育的新挑战

本节对于教育提供了一定的看法，从各方面论述了教育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与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笔者们的分析和看法。在传统产业下，教育的功能是教人如何遵循各种游戏规则，包括法律、条规、标准等方方面面，中国在这样的教育中颇有自己成功的经验。但在知识经济大潮的冲击下，教育的功能与作用，发生了巨大的甚至是根本的变化，专家的概念与内涵和经院式教育的结果大相径庭，创造性思维、富于迎接挑战、积极主动、善于合作、具有经营素质成了对于教育的基本要求，传统经院式教育存在的必要性受到了挑战，或至少地位在下降，边缘性学科、交叉性学科在兴起，笔者在美国发现，一些并不成熟的课程具有出乎人们预料的生命力，如电子商务、英特网经济学，教学手段的改进更是令人目不暇接，网上教学已经蔚然成风，在美国的马里兰大学，全校有500多个服务站点、45个计算机实验室共4万多台机器，24小时开放，学校的教学介绍、师资状况、教学大纲、阅读材料、作业解答、成绩管理等均在网上进行，据统计，仅1998年9月，便有600万人次上网阅读、学习，一天平均20万人次。自从1999年的学习年度

开始，美国已经有20个大学开始试点为新生配备便携电脑，在课堂教学中安装使用便携电脑从事教学的全套设施。进入21世纪，全世界的网络教育蓬勃开展，各种教育资源在网络中均可以找到，人们可以在任何边远地区得到最优秀的教师的教诲，同时可以进行互动式的学习，这对传统的教学方式形成的冲击绝对不是用一个“大”字可以形容的。

9.4.6 关于新经济的探索性思考

1. 新经济的含义。美国新经济在全世界引起了人们的关注。新经济的运转与人们常谈的风险投资（或创业投资）密切相关。美国新经济中的风险投资，最初是由具有企业家冒险精神的富有投资者单打独斗，因此出现了一些脍炙人口的发财故事；但是仔细探究，美国的风险资本目前经历了证券化的过程（如NASDAQ市场），风险投资从富有者的专利变为大众的行为，不仅中小投资者可以介人风险投资，使得资金集中、数量急剧扩大，同时投资风险也分摊到大众投资者身上，使得高科技创新的风险极大分散化，从而使美国的高科技发展有了坚实的金融平台。新近的趋势则更让人感觉到：美国正在使得高科技发展的风险进一步由世界各个经济体来承担——NASDAQ不断国际化，最好的项目在美国上市、最好的美国高科技公司在世界上市，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美国新经济的风险正在由世界承担，这样，世界经济本身就不会容许高科技发展失败，也不会轻易使美国经济的泡沫崩溃。同时，知识使得经济更新换代速度出现倍加的提高，但每一代科技的投人与报酬返还时间却比换代要长，这造成了高科技领域中的技术越高反而亏损但股票市值越高的现象。信息产业的特点是技术更新换代速度不断提高，这点从PC的286、386、486、586、PII、PIII、PIV的更新速度，视窗软件的开发速度可以得到完全的佐证。历史的经验表明，一种全新的技术问世，并不意味着即刻的利润，蒸汽机的发明、电力的发明都是这样，计算机20世纪40年代出现，PC自70年代发明，直到90年代才真正显示出了对于经济的巨大作用，网络90年

代开始发展起来之后，一直处于亏损、赔本的状况，但是在股票市场上，网络产业的市值总趋势与其刚问世相比，却在不断上升，这说明投资者对这一产业前景看好，随着网络功能的不断拓展，目前它对于经济的作用正如冰山的一角正在显露，看来它的商业前途实在是无可限量的。网络的这一特点值得我们思索。我们应尽全力去处理好技术更新换代的速度与该种技术报酬返还期间之间的关系。其次，生化科学的信息化给了美国更多的机会，事实上美国与欧洲在生物技术上的差距明显比信息技术要小，近来美国的科学研究将生命科学看成人体信息（如 DNA 信息），并将这种信息通过它所擅长的 IT 技术模拟，建立模型，进行重组，在分子的规模上进行生物技术与 IT 技术的整合，扬长避短，将生命科学数字化，利用美国强大的计算能力（今天一台福特金牛座轿车中计算处理能力相当于当年阿波罗登月计划使用的计算机的计算能力），不仅将欧、日甩到了后面，而且为下一轮经济的增长进行了科技储备，使得新经济具有相应的后劲，这方面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最后，产业经营与治理结构的虚拟化是新经济运营的又一个特点，网络的兴起，人们可以结合成为虚拟的社会，营运可以采用虚拟的管理结构，通过游戏规则使员工在网络上形成新的组织结构，真正实现自由人的联合，各自完成经营全过程的一个片段，在虚拟的框架下，结成真实的经营治理，达到共同的经营目标。美国的电话多语言服务就是这种虚拟经营的成功范例，使用者提出语言服务要求，15 秒后便可以通过高质量的翻译与对方交谈，而翻译人员则在电话网络中，通过挂牌报到（available），按照虚拟的治理结构进行管理，向用户提供服务，真正做到了管理组织上虚拟的网络矩阵化，管理程序上的 EDI（无纸）化，体现了一种革命。

2. 温特主义的思考。温特主义与跨国生产网络（CPNs）的形成是 20 世纪后半叶在世界经济尤其是国际生产领域中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事物。温特主义是在与传统的福特主义、丰田模式的扬弃、交叉、磨合中诞生的，是一种全新的生产方式。传统生产方式是以最终产品生产者在市场中垂直控制为主要特征的。温特主义则与之



截然相反。它的特征是：围绕着产品标准在全球有效配置资源，形成标准控制下的产品模块生产与组合，标准制定者在完成产品价值链的全过程中，在与模块生产者的分工中，最终完成以双赢为基础的控制。这一双赢和控制在生产的总架构和全过程中，在产品的零部件模块生产及控制产品的“软件”的制定过程中贯彻始终。因此，温特主义不仅仅是高新科技条件下的产物，它更是一种适应经济全球化竞争的模式（方式），对世界经济有着深刻的影响。

温特主义以高新科技为基础，利用自己掌握的强大信息网络，以产品标准和全新的商业游戏规则为核心，控制、整合了全球的资源，使得产品在其最能被有效生产出来的地方，以模块方式进行组合，最终创造出 20 世纪 90 年代美国经济持续 120 个月繁荣的奇迹。这一生产架构中，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掌握在极少数国家手中，而大多数生产者则以模块生产的形式，实现和落实着这些标准。在这个架构中，标准和有心规则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能够确保制定者的根本利益，但与此同时，标准的使用和落实者，也可以通过产品模块的生产与组合获益，形成双赢，这在过去是没有的。在实践中，温特主义的创始国利用自己的金融实力和物流能力，将标准使用者生产的模块式的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以最短的时间实现，终结价值链，并从中获利。

从理论上讲，传统的福特主义以分工和效率为基础，强调生产的内部化过程，形成了大而全，强而有力的单一生产体系。日本的丰田模式重视了生产的社会化，在社会中形成自己零部件生产体系，以高效廉价创建了丰田王国。与福特主义内部化生产体系不同，丰田模式注重的是在社会化、产业化过程中获取自己的最大利益。丰田公司与其合作者的关系是单赢式的垂直控制，温特主义强调以建立和发展产品的标准为主线，在经济全球化中将产品分解为不同的模块，在资源能够最佳组合的地方从事生产和组合，这一过程体现了标准和模块生产者之间的双赢关系，同时也体现了标准对于模块生产者的全方位控制。从生产的角度讲，福特是自己开发形成产品的模块，丰田是使模块围绕着产品诞生，而温特主义则是用

标准控制模块的区位生产与组合。因此，我们说福特主义是内部化的产物，丰田模式是产业化的产物，温特主义则是经济全球化的必然结果。

在经济结构转换的分析中，经济结构的差异决定着不同国家和地区在世界经济中的位置，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几乎可以完全控制低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这就如同 19 世纪资本主义的大英帝国可以打败封建主义的中华帝国，20 世纪帝国主义的英国可以打败民族主义的阿根廷（两次都是为数有限的远征军打败坐守本土的国家）一样。在现实的经济运行中，低一个层次结构中的设备机械，在高一个层次的产业结构的眼中，大抵只能属于废铁和原料。人们一直都在讲，美国发明了半导体的生产，但却在规模生产上败给了日本人甚至韩国人，市场也让给了日本人，或者韩国人，并认定这是美国在产业上的失败与悲剧。但却很少有人换一个角度来分析：在高技术时代，在温特主义的模式中，半导体仅仅是一种原料和中间产品，完全受到高技术发展趋势的左右，美国人有什么理由不去让日本人、韩国人生产这种投资大、产品率低的“原料”，而自己集中全力去发展 IT 产业，以向芯片中凝结智力产品为武器，同时可以居高临下地控制后者的产成品在市场中的实现呢?

在温特主义时代，产品标准不断提升和推陈出新，产品生命周期在缩短，产品的无形损耗日益加大，加工出来的产品很可能在短时间内就已经成为过时的压库负担了，计算机从 386、486、586 到奔 3、奔 4、迅驰的发展非常有力地说明了这一进程，由模块生产者生产这些硬件产品，无形损耗由它们承担，美国则脱身去作其他的更有“意义”的生产。人们知道，头脑的思维远快于生产过程的改进，模块生产者必然面临承担已有产品被迅速淘汰的风险（当中国取代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成为世界产品模块的主要生产中心时，上述风险便会实际地呈现在中国的面前），这样的过程加大了后来者学习的成本。今天，美国正在讨论个人电脑的生产已经可以归到“传统产业”的范畴中去的问题，而无形的软件产业、网络产业，一切带有 e-（电子）的行业——电子贸易（e-trade）、电子商务（e-



business)、电子商业（e-commerce)、电子管理（e-management)、电子服务（e-service)、电子学校（e-school）等等，却在逐渐居于重要地位，因为它是以创新来增提附加值的，价值的载体是无形产品，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又可以很好地适应快速更新换代，不怕已有库存的贬值，温特主义的生产经营模式给了我们以很好地启示。是否可以认为这是一种趋势：高技术的无形产业最终将控制有形的标准化的制造业产业，标准和游戏规则的制定、贯彻将左右全世界产业的运行，在经济全球化参与者的双赢过程中实现自己对于世界经济的控制。

从另外的角度讲，温特主义给了标准制定者以左右他国的力量，当新标准提升后，标准的制定者在选择模块生产区位上具有绝对的主动权，他的喜好则会造成某些国家或地区按照传统标准建立的产业的衰退（如今天的日本、台湾地区），和另一些国家按照新标准建立的产业的兴起，从而在全球范围按照自己的利益形成新的国际生产格局，完成控制，而某些国家将成为这种控制的牺牲品。人们认为，在温特主义时代和经济全球化的条件下，世界中只有美国和中国是最大的获益者，因为前者具有制定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力量，后者则具有生产、组合各类模块产品的比较优势。

温特主义使得美国成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导，它以高新技术创新为基础，以控制世界资源（人才、资金、稀缺的自然资源）的流向和经济产出（进口、出口）的流向为手段，以产品标准和商业游戏规则的制定来保证自己在世界经济中的根本利益，因而在经济全球化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

以上是笔者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的认识。在今天，对于以知识为基础的新经济应该如何理解？这一经济的基础是什么？甚至知识的内涵应该怎样概括都已经成为值得探讨、值得重新定义的东西。在新经济的大潮中，绝对没有争议的是：信息基础设施是当今高科技的前沿和结晶，世界各个国家之所以用高投入、下大气力来建设它，就在于它对 21 世纪的经济发展起着支撑的作用，占领了这一前沿，就可以在 21 世纪的世界经济竞争中独领风骚。发展

中国家如果要在经济上赶超发达国家，抓住时机适宜地参与世界网络系统、开发本国的信息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生产力环境，是在高科技条件下出现的各种产业的发展，中国在这种生产力环境中发展自身，既可以获得机会，但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更需要有相应的制度作保障。技术的学习具有“后发优势”，可以较容易地复制，但如果没有制度保障，高新科技对于经济的促进作用便可能无法发挥。本章想以美国的一个成功案例作为结束：国家的繁荣与强大是创造出来而非继承下来的，国家的成功在于创新和产业提升的能力，它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真实指标，欧洲与美国的财富相差无几，但产业的区别造成了经济活力的差异，其中人们对于知识密集技术的态度、对于创新的态度、对于创新的制度保障，有着决定的作用，1876 年电话由美国的亚·贝尔发明出来，当这一技术尚未成熟之时，1925 年美国国会便通过了法律，要求在全国建立可以通向每个家庭的电话网络。事实证明，美国的这一决策是非常英明的，它不仅使美国在当时有了最为先进的信息基础设施，促进了经济的发展，至今美国的近 1.5 亿部电话和过亿部的手机对于社会经济生活所起的作用也是有目共睹的。问题的另一个方面是，在 20 世纪 20 年代美国立法者们的超前意识能够给 21 世纪的人们一些什么样的启发和帮助，尤其是站在 21 世纪的中国能够从中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第10章 中国的金融与社会保障体制改革的深化

初看起来，本书将中国的金融与社会保障放到一起似乎有些困惑。但当您想起一句俗不可耐但又确实反映真理的话——有什么别有病，没什么别没钱，就可以将二者联系起来了，更何况当您清楚社会保障的一个重要环节，是使收到的社会保障经费能够更好地保值增值，以备将来之需，就会认为二者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而且也会认为二者都与自己息息相关，需要进一步将情况搞明白了。

对于一个国家和一户人家来讲，道理总是一样的：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的。从宏观的角度

来说，一个国家的金融资源大致来自几个方面：个人储蓄、企业储蓄、国家储蓄以及引进外国资金。资金的流向大致用于两个方面：消费与投资。当一个国家在储蓄、消费和投资之间，形成了一个良好的关系，该国的经济发展大多会处于良性循环，如果关系紊乱，则该国大多要出现经济方面的混乱，严重时会发生经济危机，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发生似乎使更多的人在一夜间变得格外关心金融的变化，金融的运作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得到了更多人的关注。同时，也有更多的人开始真正理解中国政府在金融领域开放中贯彻的积极、审慎、有序的做法。

应该强调的是，一个国家在经济起飞时，往往要克服四个“瓶颈”——技术、储蓄、外汇和财政规模，在经济发展的初期，资金的多少往往并不是资本形成的主要困难，与社会的投资意愿和吸收资本的能力相比较，储蓄、外部资金的供给大多是充裕的，即钱并不成问题，可供使用的国内储蓄与国外资源的流入，较为充裕。相反，这时资本形成的困难却在于意愿与能力，即人们习惯于贫困与闲暇，且囿于不同的文化传统、制度因素和对于外部先进技术的吸收能力，或者由于投资的种种风险（商业加制度因素）使人却步，民众投资、吸收外部资金成为难事。然而，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金融动员便成为经济发展中第一重要的事情，金融信贷机构将储蓄集中在手中，然后贷给使用者，或者使用者直接通过市场向大众募集资金，这时人们对于金融的关注与日俱增，金融的些微动作甚至能够引发相应的社会震动。

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如果从历史上讲，20世纪50年代建立起来的社会统筹的公费医疗、工伤、养老制度，乃至妇女生育保障体系都是人们所熟悉的，但是随着市场取向体制改革的深化，就业面的不断扩大、保障成本的上涨，以及传统社会保障范围仅仅覆盖城市居民的事实，使得这种保障体系面临着改革的巨大需求。作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日益深化的方方面面改革面前，社会保障体制的改革，一方面严重滞后，不符合人们日益提高的需要；另一方面，也日益显现出作为其他方面改革的基础的作



用，制约着整个改革的进程，面临 21 世纪改革大潮时，“钱从哪来，人往哪去”，已经成为人人关心的话题，从而金融和社会保障的话题也就日益深入人心了。

10.1　中国储蓄的怪圈：负收益与高储蓄

储蓄是一个国家金融资源的根本来源，从总体讲，人们的收入，除了花钱消费之外，剩下的便属于广义的储蓄了，一个经济的发展，需要在储蓄与投资之间建立起良性的循环，即总量储蓄应该合理地全部转化为各种投资，经济才能正常运转，经济才处于均衡的状态。这种关系在经济学叙述哈罗德-多马模型时，已经讲得十分清楚了。因此，在金融的宏观问题上，需要探讨两个情况：一是储蓄规模如何扩大（或者如何获得合理的储蓄规模，因为储蓄率过高，意味着当期消费的减少，不利于商品的实现，但消费过于旺盛，又意味着储蓄的削减，不利于下期生产的发展），一是这些储蓄如何转化成为结构适宜的投资。

近年来，中国国内不仅储蓄率很高，而且金融投资渠道已经日显多样化，股票、证券、期货、外汇以及高价值实物投资市场有了一定的规模，上海、深圳交易所挂牌上市的股票超过了 1 000 多种，各类证券公司、信托投资公司及其他非银行金融机构发展到了 600 多家，每日成交量最多能够达到 800 亿元人民币。1995 年上半年，黄金等高价值商品的销售量达到了 8 455 亿元人民币的高峰，比上年同期增长近 25%。1998 年中国消费了世界黄金的 10%，达 224 吨之多，个人外汇交易中，单笔金额在 2 000 美元的占到了 80%左右。然而，据中国人民银行的第 13 次城乡问卷调查显示，58.3%受调查者仍然选择银行储蓄作为他们的首选投资方式。人们很高的银行储蓄意愿，使得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迅速增长，从“七五”末期的 7 034 亿元人民币增加到了 1999 年中期的近 6 万亿元人民币和 2002 年年底的 9 万亿人民币。麻烦在于：9

万亿的存款与3万亿～4万亿的库存货物并存，人们并不愿意用存款去消费，使得商品无法实现，生产不仅无法扩大，甚至威胁到了正常的进行。更有趣的现象是：随着银行储蓄实收益率的降低（或者通货膨胀率提高，或者银行存款利息率下降），人们的存款热情不减，银行储蓄节节上升，甚至在工人下岗比较严重的老工业区也是这样。这种特殊的金融现象很值得我们探讨。

在分析我国城乡居民人民币储蓄存款连年大幅度增长的原因时，人们给出了种种答案。首先，居民这几年货币收入有较快的增长，这是储蓄增加的根本来源。其次，人们的购买心理日趋稳定，不急于将多余的货币投向自己并不十分需要的商品。另外，多数人选择银行储蓄作为未来购买大件积攒钱财的方式，等等。这些答案从各自的方面讨论了储蓄增长的原因，但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我国目前的经济情况下，为什么已经有了诸多的投资渠道，而人们对于银行储蓄存款这一方式仍然情有独钟。

从理论上和人们一般行为反应上来看，居民储蓄热情是与银行储蓄的利息收入成正向运动，却与通货膨胀严重程度成反方向运动的，即银行储蓄的利息收入越高，人们的储蓄热情越高，但通货膨胀愈严重，居民进行储蓄的意愿越低（各种投机活动则愈活跃），中国近几年出现的经济现象，恰恰与一般货币理论叙述正好相反：似乎通货膨胀率的高涨、通货紧缩的出现、银行储蓄收益的降低，甚至工人下岗、机关干部分流对于银行储蓄的增长全无负面影响，有时反而逆向行进，成为中国经济发展中的“金融之谜”，需要给予解释与说明。

先从历史的角度进行观察。货币理论告诉我们，储蓄的实际利率是名义利率与通货膨胀率之差（实际利率＝名义利率－通货膨胀率），1993—1995年中国的通货膨胀率高达两位数甚至超过了20%，即使考虑了当时的保值补贴的因素，中国的居民储蓄也只是维持在零收益（三年期以上储蓄），甚至是负收益（三年期以下及活期储蓄），然而中国的城乡居民储蓄额却有悖常理地不断增长。当将经济的治理整顿、控制通货膨胀放到第一位后，通货膨胀率快速下降，

从 1996 年中期开始，中国经济告别短缺，出现了较大面积的结构性过剩，“买方市场”和“过剩”开始成为人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词汇，“下岗分流”也成为报章常见的术语，同时，物价节节下跌，通货紧缩现象浮现，经济进入相对特殊的时期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但与此同时，银行的城乡储蓄仍然在高速增长，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笔者认为个中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讨。

首先，在今天各种投资渠道中，银行储蓄属于人们熟悉的服务方式，安全保险系数较高、流动性能良好、网点密集、收益不高却没有波动性的投资方式。在中国其他的投资渠道，或者因为诞生时间短，人们不熟悉，或者人们在经历、领教了其所具有的高收人、高损失，一夜巨富、一夜破产的风险滋味之后，需要回头再次追求稳妥时，传统的银行储蓄服务便成了受人青睐的投资渠道，尤其是那些厌恶风险、年纪较大的人们以求未来保障和生活平安为目的的投资，银行储蓄成为首选的投资方式就没有什么奇怪的了。

其次，中国经济生活中的货币在没有找到新的消费热点、巨额游资在未找到下一步的投机热点时，大多“蛰伏”在银行等待时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人们在购买了以百元为单位的消费品，如手表、自行车、家具之后，又经历了以千元为单位的消费品的购买，如彩色电视机、冰箱、洗衣机等，但从社会消费角度看，千元级的消费品之后，却没有出现万元级的商品供大众消费，反而是住房、轿车等以十万元计的商品，人们在不具备相应购买力的情况下，只有将钱存在银行，等待十万元存款的筹集。与此同时，社会上巨大的游资在经历了利用“价格双轨”机制获取高利，继而游动于证券、房地产、期货领域。在中央政府加强了金融宏观调控后，-时尚未找到适宜的出路，而发端自招商银行的大额存单贷款形式却给它们以出路，这使银行储蓄存款也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增长。

再次，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公款私存现象，尽管中央三令五申禁止，但是这一情况的严重程度有增无减，也使得城乡居民储蓄额得到了增长。1995 年 7 月 11 日发生在深圳机场的“7.11”巨款被窃

案中，深圳承和油料公司176万元人民币，就是因为公款私存，被该公司出纳从招商银行以个人名义轻易提出后携款外逃，幸而公安机构破案及时才未造成更大的损失。

最后，也最为重要的是，人们预期心理作用是我国居民储蓄存款增长较快的根本原因。在经济生活中，人们储蓄的动机分为几类：购买动机，上面已经有所分析；谨慎动机与投机动机。据笔者看中国居民储蓄的快速增长，与谨慎动机密切相关。我们知道，经济中的确定性与不确定性是一对矛盾，它们给予经济活动的影响是不同的，对于居民的储蓄行为的影响也是不同的。一般认为，当人们的生活具有完全的确定性时（即不确定性为零），居民因为生活的一切现实、未来需要都已经明白无误地被他人安排妥当，个人努力在这种环境下没有很大意义，造成储蓄的各种动机被完全的确定性限制住，人们的储蓄意愿会相当低，极而言之可以趋于零。在现实生活中，中国在20世纪50—60年代，以至文化大革命中，由于个人自出生至最终去世，几乎一切全部由国家（它的化身是大大小小的各种单位）安排并包下来，因而居民的个人储蓄意愿不高，加上各种正面宣传，人们甚至会将已有的储蓄无偿地捐献给国家。但随着不确定性加大，人们对于未来的预期会发生变化，不安定的预期使储蓄意愿提高，但当不确定性趋于无穷大时，人们的储蓄受到化为乌有的威胁时，储蓄意愿空前低落，将会趋于零。旧中国1949年秋季，国民党政权在大陆风雨飘摇之时，同等重量的纸币难以买回同等重量的大米，货币几近废纸，该政权的不确定性已经达到无限大，人们的储蓄意愿当时不仅为零，甚至为负。中国自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人们生活中的不确定因素愈来愈多。随着改革的日益深入，涉及的领域日益宽广，需要人们牺牲当前消费以保证未来消费的情况愈来愈多：住房、子女上学、医疗保健、退休养老，等等，个人将比重愈来愈大地承担起过去由国家无偿提供的消费。然而，面对日益增大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我国未来前途充满信心，对于改革开放取得胜利绝无疑义，对公有制的银行体系的稳定性非常信任。于是便出现了虽



然一方面通货膨胀问题严重，人们已有的储蓄事实上在贬值，或者只能得到（加保值补贴后）零收入，但居民储蓄却不断增加的情况，它反映出人们对于中国前途的信心和对未来不确定性提高的认识。已有的事实告诉我们，只要人们对于中国未来的前景看好，在一定程度内，不确定性的日益增大，通货膨胀率的日益提高，反而会促使居民储蓄进一步上升，这与一般西方国家市场经济的“游戏规则”是相当不同的，体现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某些特殊规律。

作为银行体系，传统上它一方面从居民大众那里集中人们消费之后手中富余的金钱；另一方面则将这些资金贷放给工业、商业或其他的投资者，银行在这个过程中，向储户支付利息，同时向接受贷款者收取利息，利息差是其收益。今天银行业务在不断扩大，除了仍然进行存贷业务之外，银行自己也对外承担风险进行各种投资，以获取更高的回报。但是，由于银行自身的资本极少（相对于储蓄），它对外投资的钱绝大部分来自储户。于是，作为银行，面临着相应的风险：银行有可能吸收了存款之后贷放不出去，形成所谓的“存差”（如同 20 世纪末 21 世纪初中国的情况）；也有可能贷放出去后，由于工商业的问题而血本无归，形成所谓的“坏账”（如同 1997—1998 年东亚金融危机中的韩国）；更可能银行自行投资而造成赔本（如同 1996 年新加坡的巴林银行事件，一个普通的交易员进行的金融衍生工具投机，竟然使这家百年老行倒闭），等等。尽管从表面上看，上述风险是由银行承担的，但归根结底这些风险却是由广大的储户来承担的，于是银行体系的好与坏便直接影响到了储户的利益，同时也影响到整个经济的正常运转。

金融深化，意味着改革，意味着由市场来主导金融资源的配置。在中国进行的改革开放中，银行体制的改革总的方向可以大致归为，银行贷款数量根据自己吸收的存款和支付保障能力来确定，即在存贷之间建立一个适宜的比率；银行的贷款和存款利息率，由银行根据市场的变化来确定，即利率市场化；外汇汇率（本币汇率）由市场力量来决定，同时对于人民币与其他货币的兑换逐步实行自由化，

等等。当然，金融领域的改革并不意味着放弃应有的管理和国门洞开让国外金融大鳄来操纵我们的金融体系。相反，而是逐步过渡，在条件成熟时不断将改革推向前进。1997 年爆发的东亚金融风暴，让中国的老百姓看得更清楚了，盲目的金融改革将带来无穷的灾难，试想尽管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在当时不断痛斥国际的金融投机家，如索罗斯之流的金融投机炒作，但当银行的储户发现自己的银行倒闭，同时一生积蓄以外币计算大打折扣时，心情会怎样呢？与此同时中国的储户却在庆幸，由于实行了谨慎的改革开放措施，中国的金融基本没有受到来自外部的冲击，人民币在东亚金融风潮中成为十分坚挺的货币，中国在稳定风潮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本节结束时所能够提出的政策性考虑是：在人们对于中国未来前途具有很强的信心，对于国有金融机构具有很好的信任的情况下，应该充分利用伴随改革开放出现的不确定性，维持中国较高的储蓄率，并利用人们的货币幻觉减少国家的金融负担，同时注重将不确定性通过宏观调控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以促进储蓄进一步增长。只要已有的条件不变，可以预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城乡居民的储蓄额仍然会不断上升，并保持一个发展经济所需要的、较高的储蓄率水平。中国的金融改革开放必须稳妥地进行，市场化要根据中国经济改革的需要来逐步进行，开放更要在我们自己能够控制的范围中进行。对于广大读者的建议则是，如果中国通货膨胀不严重，钱放在银行中是稳妥的，如果出现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就需要使自己的资产多元化，尤其是合法地购进一些经济比较稳定国家的外币资产是规避风险最好的办法。

10.2　全面小康社会的重要标志：人均预期寿命的延长

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在 1999 年召开的社会保障体制改革会议上，对于中国一定要建立全新的社会保障做了很好的诠释：“社会保障



制度是社会稳定的安全网。有了健全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才能实现老有所养，病有所医，工伤有保险，灾害有赔偿，失业有救济，残疾有安置，贫困有支援。社会保障制度就是通过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解除了社会成员的后顾之忧，从而也就有效地化解了可能发生的各种社会矛盾，实现国家的安定和社会的稳定。社会保障制度为经济的发展创造着稳定的社会环境，这本身就是对经济发展最有力的支持和促进。不仅如此，社会保障制度还直接成为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和稳定器。就宏观经济而言，雄厚的社会保障基金能够有力地支撑着经济发展，并将对经济发展的格局发挥宏观调控的重要作用；从微观经济来看，通过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还可以规范和均衡企业的社会负担，有助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形成和完善，并由此克服不顾经济质量、经济效益的粗放增长方式，以及与之相关联的由人为因素所导致的经济大起大落现象，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社会保障制度作为一种再分配手段，还是社会不同群体收人分配的'调节器'，通过保障人们的基本生活需要，兼顾效率与公平，从而有助于实现先富帮后富、先富促后富，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目的。"简言之，社会保障制度建立的目的非常清楚，就是要实现社会的安定、文明与富裕。

老有所终，鳏寡孤独皆有所养。这是中国人长期盼望的大同世界的理想，也是从古到今，中国的智士仁人对于中国社会所企盼的事情。改革开放的今天，人们感觉越活越有意义，即在世上活着的意义越来越大，生活一天比一天更具有内容，先辈们想不到的事情，在今天成为了一个又一个的事实，今天的中年人觉得自己日益年轻，工作生活的劲头十足，浑不知老之将至，更不知人活着便有风险存在，应该未雨绸缪。但一个严峻的事实却是，中国正在迅速地向老年化迈进，养老的话题出现的日益频繁，而且叫人听起来有些沉重。中国的社会保障事业怎么了？这一代人的老将由谁来养？

10.2.1　中国的老龄化和人口的长寿

人类社会在不断进展，寿命在不断延长。在中世纪，由于疾病

横行、营养不良，世界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不过十几岁，长寿几乎成为人们的一种幻想，与天同寿的彭祖的故事反映了中国古代人们的追求，练气炼丹祈求长寿，为皇家贵族所热衷，道家、佛家的长寿秘方，不胫而走，传说中有陈博华山睡中得道，静中取寿，也有华佗的五禽戏的锻炼，动中取寿，说法上洋洋洒洒，不一而足。但对芸芸大众来讲，还是“人活七十古来稀”，露出真诚的企盼也含有几分无奈。人的长寿且无疾而终，便成为另一方面的追求，被达观地称为“白喜事”，并且希望今生生命已经了结，自己的灵魂可以与天地同存。总之，健康长寿，遑论古今中外，事实上与爱情一样，都是永恒的话题。

人口的老龄化是指老年人在总人口中日益占有更大的比重的动态过程。按照国际上通行的标准，一个社会是老龄化还是年轻型的，主要看人口中60岁或65岁的老年人究竟占多大比重。一般认为，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4%以下，这样的社会便被称为年轻型的社会；当该比重为4%～7%时，社会属于成年型的社会；占7%以上的社会则为老年型。在人口统计中人们发现，由于在一定的年龄阶段，60岁及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10%，与65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7%大体相当，于是目前国际上就把60岁以上老年人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10%，与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达到7%，作为判断一个社会是否进入老龄化的基本标准。据北京市专家顾问团的研究报告，中国在2000年中期，65岁以上老年人在总人口中的比率达到7.2%，在人们迎来千禧年的时候，中国社会也进入了老龄化的时代，成为世界上第60个老年化国家。因此，仅仅从人口老龄化来看，新世纪的来临对中国也是喜忧参半的。

中国的许多城市已经明显属于老年化的类型，在我们身边，随着岁月的流过，老年人随处可见，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老年人有了自己的节日——老年节，改革开放后离开工作岗位的老年人，正在以完全不同于过去的方式，在老年大学的学习中，在老年交谊舞的音乐中，在大秧歌的锣鼓点中颐养天年。根据统计，上海在

1979 年就已经进入了老年化时代，北京在 1990 年也步入了老龄化，60 岁以上的人口占整个常住人口的 10.1%，接着天津、浙江和江苏都成了老年化的城市或省份，最初人们担心的只是老年人需要有与青年人不同的生活，但是随着改革的深入进行，对于老年人需要支付的养老金的巨额数量浮上水面，独生子女与老年人的分居也成为人们关注的现象，中国走向老年社会成了我们不得不进行研究的问题。

中国的老年问题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较，确实具有“中国特色”，这些情况可以大致归纳如下：

1. 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不仅来得快，而且老年人口数量极大，占世界老年人口的比重大，因而不仅我国对此关心，世界对于中国的人口老龄化也给予了极大的关注。根据统计，世界其他国家老龄化的速度，似乎都比中国来得慢一些，在发达国家中，65 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 5% 上升到 7% 大约需要 50 年～80 年的时间，而中国该比率的变化大大快于其他国家，1982 年中国 65 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率仅为 4.9%，属于比较年轻型的国家，而这一指标到 2000 年上升为 10.1%，只经历了 18 年，社会老龄化的速度非常快，出乎人们的预料。另外，根据联合国的统计和预测，1990 年世界上的全部 60 岁以上的老年人共有 4.8 亿人，而中国在 1990 年 60 岁以上的人口 9 700 万，占世界老年人口的 20.21%，但是到 2000 年，世界上 60 岁以上的人口有 6 亿人左右，而中国则有 1.3 亿，到 2025 年，全世界 60 岁以上的人口将有 11.7 亿，中国将为 2.8 亿，将占世界高龄人口的 25.41%，如果考虑到 2025 年中国的人口增长放慢，人口数量趋于平稳，1/4 左右的人口都是老年人的话，问题的突出性可见一斑，这样在考虑中国经济发展的长远规划时，在进行社会生活的规划时，老龄化社会是必须照顾到的因素。

2. 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明显的阶段加速性质。中国在 20 世纪 40 年代一直处于战乱，人口出生很慢，但在 1949 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随着生活的安定，经济的恢复，如果应该提一下的

话，还应该包括对于马寅初先生新人口论的批判，使得中国人口的出生率极大地提高，产生了1954—1957年的第一次人口出生高潮，由于大跃进产生的后果，出现了饿死人的现象，全国经济进入困难的调整时期，人口出生率大幅度下降，有些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口的负增长。在1962年中国经济的“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得到贯彻，并在毛泽东、周恩来的领导下取得了阶段性的胜利，人民的生活水平开始恢复，中国的人口出生也开始再次提高，形成了1962—1973年的第二次生育高潮。每一次生育高峰期间产生了大量的人口，当这些人口进入什么年龄段的时候，那个年龄段的人口就特别的多：例如，当他们进入生育期时，出生的新婴儿就会多；而他们进入老年时，老年人的比例就会大幅度提高，人口老龄化就要来到。因此，21世纪的前25年，中国的老年人口增长得非常快，根据预测将从2000年的1.32亿元增加到2.48亿元，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将从10.6%上升为19.3%，而从2025年到2040年，将会达到中国人口老龄化的高峰时期，老年人口将增加到3.8亿，占人口的比重将达到25.3%。因而，两次生育高峰出生的人们将会遇到比今天父辈更为困难的局面：因为这时出生的人们大都只有一个子女，故而需要未雨绸缪的事情更多，面临的压力也会更大。

3．中国人口老龄化具有性别、地区分布以及其他方面的特点。与其他事情一样，中国的老龄化问题具有多样性和复杂性。首先，今天人们在街上看到更多的是上了年纪的妇女，广场上练习大秧歌、公园里练习各种各样功法的大多是老大妈，老大爷确实比较少，人们的感觉女性的寿命明显长于男性，大约是69:70，而且男女性的寿命差别还有扩大的趋势，阴盛阳衰的规律在长寿方面居然也有很好的体现；其次，人们的预期寿命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尽管人们在抱怨生活环境在逐步恶化），医疗水平的提高，在迅速上升，2002年达到了72岁，现在基本赶上了中等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居于前列，而且发展的势头很好；另外，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具有地区之间的巨大差异，由于中国各地的风俗习惯不同，文化水平参差不齐，价值观念有着区别，计划生育政策落实很不一致，各



地区的人口老龄化的进程也大相径庭，如上所述，上海市在 1979 年改革开放的初期便已经进入了老龄化时代，北京市在 1990 年也成为了老龄化城市，而且在 2025 年老龄化人口将占总人口的 30%，但其他许多地区如青海省，海南省的人口构成却还相当年轻，显现出人口老龄化不平衡的特性。

每个人都有过自己年轻的时代，身强力壮，不仅可以自食其力，而且有能力去养活老人、抚育子女，但每个人由于自然规律，又会有老之将至，两鬓苍苍，需要别人的赡养，这就是社会的规律，社会的问题，需要社会给予一个满意的答案：当人们为社会贡献出自己的青春与壮年后，谁来给他们一个富裕与无忧的晚年?

10.2.2 沉重的翅膀

中国的养老制度过去一直主要是为城市居民服务的，它出现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初期，实行的是社会统筹制度，后来曾经一度改为各自为政的企业保险和行业自行决定，1984 年再次改为社会统筹，但不管形式如何变化，中国的养老制度的基本核心却是，每个职工在职时并没有积累起相应明确属于自己的养老资金，而是将来由在职职工出钱来养活退休的职工，新一代养老一代，即所谓的代际转嫁的养老办法。这种做法的合理性在于，社会上永远会有新的一代年轻职工，他们愿意并且有能力为老一代提供相应的退休金。如果上述假设条件发生了变化，年轻一代愿意抚养老年人，但是却发现已经不具备这样的能力，失业、下岗使自己尚无法解决温饱，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年轻人占人口的比重已经不足以支撑老年人养老的负担，等等，这时情况又将是怎样的呢？在养老的问题上，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面临着一些与其他国家不一样的困难。

首先，中国的人口老龄化是在经济并不发达的时候到来的，它加重了中国在处理人口老龄化时的困难。一般而言，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进程是与国家的工业化、现代化和城市化同步出现的，而且这些国家的人口出生率也是随着经济发展、生活水平提高、生活方式转变、文化水准提高和思想观念变化逐步下降的。世界发达国

家在人口走向老龄化时，经济已经具备了承受它的基本能力，因而在既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下，能够较好地处理人口的老龄化引起的经济问题，但仍然存在许多的社会问题，如孤独、无奈、缺少亲情等。然而，中国在面临人口老龄化的时候，经济仍然处在起飞阶段，经济体制改革又处于治理国有企业、提高国有企业经济效益的关键时期，国有企业步履维艰，亏损面大，亏损额高，尽管有所好转，但由于经济发展需要大力转换结构，虽然国家一再保证职工的利益，但较差的效益还是造成了原有老企业中退休人员的经济待遇的困难，而且在短期内很难有根本性的转变。

其次，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一大批企业由于经营不善而进入兼并、破产的过程，这些生产单位中的工作人员的下岗加重了社会的养老问题。1990 年全国出现了 32 起破产事件，1995 年为 2 200 件，到了 21 世纪初期破产事件已经极为平常，问题更为严重的是中国生产企业的开工不足，进而造成了许多工人的所谓“内退”或提前退休，直接使得养老经费捉襟见肘，尽管有关部门一再强调不许提前退休，但从工人的角度希望在原有养老制度还起作用时办理退休手续，以避免将来更大的不确定性，从企业的角度讲，也希望工人能够提早退休，从而将不断加大的开支成本固定下来，摆脱困扰，正是企业中双方都有这样的要求，才出现了大批提前退休的情况，这种情况实际是人们对于国有企业改革有一定程度的不理解造成的。企业在各个方面都不很有利的局面下维持生产都很难，再加上养老的经费、服务的贡献，而且必须按照国家统一标准来办，实际是很难办到的。

再次，中国的养老模式是“反哺”式的，即新一代的在职者支付退休人员的开支，但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运动，给这种传统的养老模式敲响了警钟。由于计划生育，中国原有的四世同堂的大家庭模式基本消失，养儿防老的传统思维也逐渐淡化，反而新的家庭模式，即 1—2—4 的倒金字塔模式，一个小孩，两个父母，四个祖父母和外祖父母，会使得一个小两口的家庭，除了一个子女之外，还有四个老人，甚至更多的老人需要赡养。人口老龄化与家庭小型化

同时出现，一方面家庭中能够照顾老年人的年轻人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家庭的经济状况、照顾子女的负担又使他们无法使老年人得到十分细致的日常照顾，就更难满足老年人需要的精神慰藉了，这对于中国实行了几十年的传统养老模式提出了根本性的挑战，不实行改革，中国的新家庭模式将使得人口老龄化的问题显得日益严重。

最后，中国老年人口的身体状况一般都比较差，医疗保健的任务重，但老年人的收入远不如在职人员，加大的医疗支出已经成为他们的负担。由于过去的生活水平较低，老年人在年轻时又大多工作紧张，没有很好的锻炼，因此步入老龄之后，患病率高，尤其是慢性病患病率高。据北京市政府顾问团进行的调查，北京地区的老年人1994年患慢性病的高达68.5%，1996年60岁以下的病人平均住院费用为5 471.3元，而老年人的住院费用高达9 943.5元，后者是前者的1.7倍。不仅如此，1992年的调查显示，近1/4的老年人的身体有一定的肢体功能障碍，有32.3%的老年人感到医疗费负担重，当医药改革之后，他们需要自己支付的部分会增加，因而使得老年人退休之后的医疗负担更加难以承担。

面对21世纪，中国的养老事业竟然显得这么苍白，经费上捉襟见肘，人员上可以做贡献者的队伍在减少，但老龄化人口却在以很快的速度增加，而且由于改革的不断进展，提前退休的问题又在浮现，如果考虑到随着经济的发展，老年人的医疗要求、发挥余热、闲暇活动、文化教育、居住环境等必然出现的新问题，我们就需要好好地想一想，我们能够为辛劳一生的父辈做些什么？将来我们自己进入老年时，将如何应对出现的新情况？

10.2.3 不信春风唤不来

无路则变，变则通。进入21世纪之时，中国的养老事业在改革中显现出了曙光和转机。1984年中国的养老事业从单位负责再次变为社会统筹，尽量改变以家庭为社会保护基本单位以及放大了的家庭（单位）作为社会保护网的核心的传统做法，同时，国家也承认无法由财政将社会保障全部包下来，逐步让人们接受在养老问

题上不能完全依赖国家，而应该各个方面共同来承担社会的养老负担的新思路。从1991年开始，全国有十几个行业根据国务院《关于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决定》，以及《关于深化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的通知》，实行了养老制度的改革试点，到20世纪末基本所有在职职工均已经加入了这样一个养老的保险网络，估计覆盖面有1.3亿人以上。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进程的日益深化，中国的养老事业也在逐步走向符合国际化的正轨，并由国务院七个部委牵头，经过试点，拟定出中国养老体制改革的基本大思路，并且确定了总体改革的方向：从企业保险逐步走向社会保险的实施，建立起符合国际惯例的国家提供基本保障、企业进行补充保险与个人储蓄性保险三个层次相结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养老保险制度。应该讲，一旦这种养老保险制度建立起来，中国的老年人就算是有了福气，既可以有比较放心的晚年生活，又可以在夕阳红之际，再享受一下人生。从目前已经开始进行的试点看，21世纪的养老体系大约具有以下的架构。

养老保险体系的第一个层次是由政府举办的基本养老险，政府通过税收的办法积累所需要的基金，这部分基金完全纳入政府的财政预算，作为社会保障的预算开支，具体业务由政府有关部门或者是公共机构来运作，与过去的区别在于，这种基本的养老险将覆盖全社会，它实际是未来“社会保障网”中给予最低养老金保障的部分，将来根据实际情况，它的替代率（即退休人员领取的养老金与社会平均工资之比）大约为25%；第二层次的养老保险是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将采取个人账户储存积累的方式，资金将由企业和职工个人按一定比例共同承担，国家出面强制收缴，以便使这一费用得到保证，事实上，按照现有设计，职工养老保险的第二层次将是未来中国养老体制的核心部分，它所提供的保障，以替代率计算将达到50%～60%，可以预计职工将来对于这部分的保障看得最重；养老保障的第三层次将是个人储蓄性的养老保险，或养老保险性质的个人储蓄，它是政府在一定的优惠条件下，如全世界的惯例做法是在一定的额度内予以税收减免，使人们在有能力的时候自愿向商



业保险公司或银行投保、存款，这一层次的保险实际是给予人们一定的灵活空间，根据自己的经济能力，在今天为明天早做打算，即削减今天的消费以保证明天的生活层次，具有较大的弹性。

当然，有了上面所谈到的设计与运作，并不是说职工养老便会一帆风顺，事实上也还存在许多需要落实和改进的地方，这种改进要在21世纪才能逐渐完成。例如，上述养老制度对于新职工无疑是合理而且有益的，但对于那些已经工作很长时间，长期拿低工资的老职工则存在很大问题，这是所谓“中人”问题，目前只能“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尽量给这部分职工一个合理的安排；其次，理论上这种保险制度是针对全体城镇人员的，但在实际中，人们处理的养老问题是国有企业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远不是全体，在2000年，前者在全体职工人数中的比重大约为55%，而其他非国有制单位如个体、私营、三资企业中职工养老问题将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方面，尽管已经有了具体的条例，但落实的力度还需要加大，同时，作为核心的企业补充养老保险在中国进展得并不理想，20世纪末仅覆盖了500万人，积累了几十亿元的资金，与已经覆盖了1.3亿人口，积累了700多亿元的基本保险相比较，实在需要大力推行；再次，广大的农村居民的养老体制依然是“反哺”型的，“养儿防老”观念深入人心，尽管有了几千万农民参加了民政部组织实施的农村养老计划，但相对于8亿多农民，这个数字实在是太小了；另外，原有养老基金的挪用，以及这部分资金的保值、增值更引起了人们的重视和关心，养老基金在有些人的眼中是一块肥肉，不啃一口觉得很对不起自己，已经有一些官员因此而丢了乌纱帽，但“前腐后继”接续以身试法者仍然不断；最后，由于目前建立的是个人账户，由企业和个人向账户里按规定存入个人的养老金，但问题在于企业亏损无钱可交，同时由于种种原因，已有的账户大多是空账，这对于新养老体制的改革是十分不利的。

尽管存在上面的一些问题，但由于各种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问题在不断缓解，而且随着人们对于社会保障作用的重新认识，“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道理将为更多的

人所接受，事实上，中国人在面临一个巨大的变化时，传统的思路是“临渊羡鱼，不如退而结网”，当人们认识到中国的养老制度必然要发生根本的变化，就会未雨绸缪，早做准备的。事实上，今天处于60岁左右的老人，仍然具有很好的体力和精力，如果他们能够帮助70岁～80岁的人们，提供服务，并将这种服务的贡献计人“个人账户”，当他们70岁～80岁需要别人帮助的时候，便可以从账户里无偿得到别人的服务，互助互帮使得不同年龄段的老人均有所用和所养，应该相信，随着中国经济的不断发展，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国的老年人会有一个“夕阳无限好”的幸福晚年。

10.3　养老之外的保障话题

除了引人瞩目的养老话题之外，中国的社会保障还涉及医疗、失业、工伤以及生育等方面的情况，加上养老共有5项内容。人可以说自己不愿发财，不愿当官，但任何人都不敢说自己不会得病，得病之后便出现了看病、吃药、打针甚至住院动手术的种种需要，接着就是支付医疗费。

10.3.1　21世纪的医疗事业

大家都知道，21世纪来临的时候，人们突然发现，中国的医疗制度进入了一个怪圈：医院不断地抱怨，由于收到的医疗费太少，已经难以维持下去，而患者却觉得越来越看不起病，真心地怕得病，于是我们的医疗制度似乎出了什么问题。笔者20世纪70年代得病，一次感冒发烧，治病到痊愈也就是几角钱，80年代中期，小孩子发烧感冒，在笔者所在学校的医院看病，也就是7元～8元钱便可以治愈，但到了90年代中后期，一次普通的感冒发烧，轻则50元～60元，重则百元，确实到了过分支付的程度。一个家庭如果有人得了大病，即便有公费医疗，也仍然是十分沉重的负担。可是，笔者内人在医院工作，每天要看70个～80个患者，经常累

得不愿意多说话，但是谈到收入，笔者实在不敢恭维，倒是连班、夜班却倒换得十分频繁。在患者与医生之间既有矛盾的一面，又有需要相互理解的一面。

事实上，除了像2003年非典传染时，各个国家几乎均启动了无偿医治的机制，但在平时，看病难的问题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富裕的发达国家，也开始向大包大揽的医疗制度开刀了，甚至在素有福利制度的北欧、西欧也觉得必须改革传统的医疗体制了。在20世纪90年代，为了探索医疗制度改革的可能，中国在江苏的镇江、江西的九江进行了试点，基本确定了医疗改革的总体目标：首先，改革必须能够保障人们的基本医疗，既要使劳动者在患病之后可以得到基本的医疗保障，不能使他们因病痛而陷入贫困无力诊治的地步，又要使得这种医疗保障水平控制在政府和企业能够承受和支付的范围之内；其次，改变医疗吃“大锅饭”的状况，建立个人医疗保险账户，同时个人要自己支付部分医药费用，使得个人承担适当的经济责任，自己对于个人的健康更加负责任；最后，大力减少医疗资源的浪费，从医院管理体制的改革入手，同时建立起医疗保险赔付的评价机构，对于医疗资源的使用给予监督，使中国有限的医疗资源能够得到更为有效的使用。在这样的原则下，医疗改革的具体做法已经初见端倪，各地纷纷出台了在医疗保险框架下，公疗报销的药品目录表，制定了提高诊疗费，降低仪器设备检查费，限制药费涨价的措施，同时社会统筹大病，个人医疗账户由企业与个人按照规定的比率共同付费建立、健全，个人必须支付一定比例的医疗费用，等等，这些措施对于21世纪的中国医疗事业是必不可少的。

除了医疗费的问题之外，21世纪中国医疗事业更重要的是医疗服务以及全民的健康和疾病预防，这可能比医疗费用的问题解决起来更加困难，但它们却是21世纪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必需的，体现着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与成熟程度。

1. 优化医疗资源的配置，满足日益提高的城乡居民的医疗保健要求。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医疗事业得到了巨大、长足



的发展，人们的预期寿命在延长，基本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1997年全国每千人已经有床位2.41张，医生1.65人，卫生医疗机构得到了大发展。但是，进入21世纪，中国医疗资源的配置需要按照社会发展进行符合人民需要的改进。在中国医疗卫生体系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城市中的医疗体系，另一部分是农村的医疗卫生体系，在资源配置上，绝大部分的资源集中在大大小小的城镇中，广大农村中的医疗资源极度缺乏，靠政府发动的送医送药的临时措施，并不能满足农村对于医疗保健的巨大需求，城市中的医院，尤其是中小医院，患者不多，而广大农村中又缺医少药，有病得不到及时的医治，2003年当非典肆虐时，人们最担心的就是它传染到农村中去。随着农村中经济的发展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情况会伴随医疗制度的改革而得到缓解。8亿农村人口的大服务市场，早晚会成为医疗机构争夺的对象，它也是中国医疗未来发展的根本动力来源。21世纪这个问题的解决意味着中国经济质量的根本变革。

2. 城市中医疗社区化的发展趋势。中国在过去的20余年间，极大地发展了医疗事业，但是在这一过程中，却出现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情况。城市中比较合理的医疗体系应该是8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社区，20%的医疗资源集中在医院，中国目前的情况正好相反。这便形成了一方面城市医疗资源的相对集中、过剩；另一方面却又是许多医疗保健的需求得不到满足。在《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卫生改革与发展的决定》中，明确地提出了大力发展社区卫生服务，逐步建立功能合理、方便群众的卫生服务网络。面对基层大量卫生服务要求不能满足，而城市中中小医院的出路又很严峻的情况，建立社区卫生中心，重组卫生医疗资源是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办法。事实上，国外做得比较好的国家，从事初级卫生保健的全科医生大约占医生人数的一半，中国的比重与美国接近，只占20%，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经提出为了满足21世纪的医疗保健要求，至少50%的医科毕业生应该是全科医生，我们是否可以从这里得到一点启示，结合中国的特色把城市中的医疗保健事业办得更好，促



进经济的稳定发展。

3. 医疗保健的重点放到保健上，医院的功能除了治疗急性病之外，应该向多方面发展，以适应21世纪人类长寿、健康的需要。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长寿是必然的趋势，而许多流行病在下个世纪则因为人们的健康水平、卫生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的科学化而减少了发病的机会，人们在长寿的同时也进一步认识到，健康的长寿才是最宝贵的。从这种趋势出发，中国未来的医疗保健制度，必须将保健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来认识，而必须克服重医治、轻预防，重医疗、轻保健的传统看法。治病的目的是使人长寿，长寿如果不健康，是很可怕的，它事实上对于患者是痛苦的，对于社会是包袱，于公于私，人类都需要健康的长寿。这样就需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良好的锻炼习惯，也就需要有附和人们需要的大众医学、大众保健的教育和这方面知识的传播。因为有了上述的需要，传统的医疗机构在忠于职守、治病救人的同时，应该更多地承担起这些社会责任，一些医院在统筹安排下，也应该针对21世纪人类长寿健康的事实与特点，改变原有功能，以人为本，扩大服务范围，转化成具有预防功能、康复功能、护理功能、临终关怀功能的医疗机构，真正为人们的长寿与健康服务。

总之，面向21世纪的中国医疗体制，应该是一个有病能够及时看，并且看得起的制度，在向人们提供基本医疗需要的同时，必然要以城乡整体为服务范围，以健康为中心，以生命全过程为线索，以全民为对象，实行锻炼、预防、诊治、保健、康复和健康教育一体化的综合性服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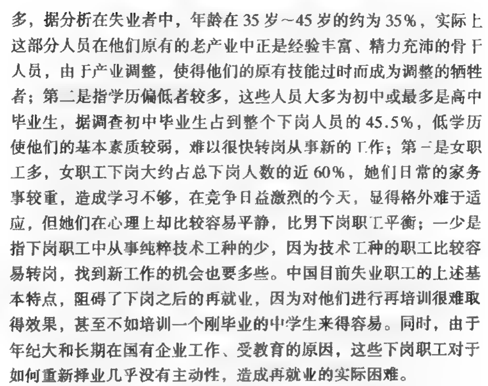
10.3.2　为结构转换保驾护航

在20世纪90年代，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出现了大批富余职工的下岗待业，机关的公务员也因为机构改革而被分流，失业问题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需要坦然承认，而且需要认真研究的课题了。从经济学上讲，失业是指劳动者由于各个方面的原因，与生产资料相互分离，不能利用生产资料从事生产，从而

无法获得报酬的现象。中国社会在20世纪70—80年代，由于大批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返城找不到工作，出现就业难和失业的问题。当时因为在经济理论上这种情况无法与社会主义相容，于是在中国便发明了一个词来形容这种现象，即待业。根据《中国经济统计年鉴》的定义，凡是具有城镇户口，年龄男在16岁～50岁，女在16岁～45岁，有劳动能力无业，并在城镇劳动就业机构进行登记的人员就是待业者。90年代后，人们终于从理论的“鸵鸟现象”中解放出来，承认了社会主义的不完善性和失业存在的客观事实，1993年开始在中国正式设立了失业统计。中国统计学意义上的失业，其定义为：16周岁以上至男50岁、女45周岁以下，有劳动能力，在调查时间范围内从未从事有收入的劳动，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正在寻找工作的人员。随着经济的发展，结构转换必然出现，否则社会无法进步，一部分无法适应新经济结构的人员在结构转换中失业是必然现象，这是结构调整的代价，问题是这些人应该有社会保障体系给予照顾。

1．中国有多少人处于失业状态。中国劳动力供给量大，就业机会少，这是个不争的事实。中国的劳动力供给主要有三个来源，一是城镇每年新增加的大量劳动力；二是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其他行业的转移；三是城镇中已经下岗和失业的人们，同时中国还有更大量的企业富余人员处于半失业状态。根据统计，1998年中国的失业率为3%，农村的富余劳动力大约为1.5亿，隐性失业率达到25%，而人们所关心的城镇失业，2002年已经在统计中达到了4%，如果算上企业的富余人员，大约为3 000万人左右，这些情况正在日益明朗化，加上已经进城务工的近亿农民工的将来下岗问题，中国的劳动就业制度在21世纪需要进行改革。由于产业的调整，下岗是不可避免的，人人都有这种可能性，下岗未必不公平，但是工作了很长时间却没有失业的社会保障，对于下岗人员是不公平的，也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2．失业的人员结构分析。中国目前失业者大军具有所谓“三多一少”的特点。所谓“三多一少”，是指下岗职工中年龄偏大的



多，据分析在失业者中，年龄在 35 岁～45 岁的约为 35%，实际上这部分人员在他们原有的老产业中正是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骨干人员，由于产业调整，使得他们的原有技能过时而成为调整的牺牲者；第二是指学历偏低者较多，这些人员大多为初中或最多是高中毕业生，据调查初中毕业生占到整个下岗人员的 45.5%，低学历使他们的基本素质较弱，难以很快转岗从事新的工作；第三是女职工多，女职工下岗大约占总下岗人数的近 60%，她们日常的家务事较重，造成学习不够，在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显得格外难于适应，但她们在心理上却比较容易平静，比男下岗职工平衡；四是指下岗职工中从事纯粹技术工种的少，因为技术工种的职工比较容易转岗，找到新工作的机会也要多些。中国目前失业职工的上述基本特点，阻碍了下岗之后的再就业，因为对他们进行再培训很难取得效果，甚至不如培训一个刚毕业的中学生来得容易。同时，由于年纪大和长期在国有企业工作、受教育的原因，这些下岗职工对于如何重新择业几乎没有主动性，造成再就业的实际困难。

3. 下岗人员的行业与区域探讨。如果我们分析一下下岗职工的行业与地区分布，就会感到结构调整带来的失业问题绝不会因为将来经济的腾飞而减缓，相反却会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而进一步明显，中国经济发展的一个特点就是高速度，但吸收的就业却不明显。从目前情况看，职工下岗主要集中在传统的不景气的行业中，如煤炭、纺织、机械制造、林业、军工以及一些为机械化所替代的体力行业，这些行业即便在经济进入高涨的阶段，也很难再有往日的辉煌，因而这些行业的下岗是一种趋势。如中国的煤炭行业，治理亏损的办法是封井，其结果是百万富余职工的分流。另外，从下岗的区域分布看，中国的西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较慢，总体不景气，当地能够吸收的就业量相当有限，因而失业问题相对更加严重，相反，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由于经济发展速度快，经济总体水平高，因而可以吸纳大量的人员就业，不仅当地失业率较低，而且还吸纳了大批内地经商务工人员，缓和了内地的困难。

从中国就业问题的严重性来讲，长期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发展生

产逐步消化失业人员，但在短期内却只有靠社会保障，即失业保险来予以解决，尤其是那些岁数较大，学历较低，家庭负担较重的下岗职工，因为对于他们，再培训显然不太现实，而且成本高收益小，有了社会保障，他们的基本生活能够有着落，社会也才能够稳定。

中国的失业保险自 1986 年实行以来，有了一定的发展，但由于失业保险的发展进度是伴随企业改革进程的，因而企业在改革中遇到的困难，使得失业保险的缴费成为老大难问题，并且失业保险的资金来源较为单一，统筹范围小，覆盖面窄，与中国目前的失业状况很难适应，更不用讲随着经济结构调整而产生更多的下岗人员了。在 21 世纪，中国的就业问题的解决一靠经济发展创造工作岗位，二靠职工提高自身素质，培养良好的适应能力，三靠社会保障体制能够暂时舒缓失业的压力，但最根本的还是发展生产力，创造多层次（包括海外就职）的就业岗位，同时完善市场机制，职工自主择业、实行双向选择，最终形成一个按照个人素质、以市场为主进行双向选择配置、鼓励人员流动、完善失业保险机制的就业体制，在 21 世纪做到人尽其才，发展经济的局面。

在本章结束之时，笔者愿意引用社会保障部副部长王东进的一段讲话，在讲话中他勾勒出了 21 世纪初中国社会保障的基本框架：

> 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必须要正确认识和准确把握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特点和实际情况：一是我国生产力水平低，经济还处于不发达状态；二是我国过去存在，现在仍然存在，将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还将继续存在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三是在经济改革与发展过程中，存在着不同地区、不同行业的诸多不平衡现象；四是人口多，老龄化进程快；五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传统保障制度的束缚和影响。

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在总结改革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确定了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要建



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要求的、适用于城镇各类企业职工和个体劳动者、资金来源多渠道、保障方式多层次、社会责任与个人责任相结合、权利与义务相对应、管理和服务社会化的社会保障体系，并且提出，我国社会保障体系包括社会保险、社会救济、社会福利、优抚安置和社会互助、个人储蓄积累保障。特别是在社会保险方面，我们要逐步建立社会基本保险、补充保险和商业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分工明确、职能互补的完整体系。

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各方面的承受能力，特别是企业经营状况的实际出发，要实现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必须坚持“低水平、广覆盖、多层次、双方负担、统账结合”的基本思路，具体地说：

1. 低水平。“低水平”就是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出发，根据财政和企业的实际承受能力（换句话说，基本保障的水平只能根据经济能力，不能完全根据需要，只能从自己的实际出发，不能互相攀比），同时也借鉴了国际上高福利国家的经验教训，明确提出基本保险只能提供最基本的保障。这是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思想路线在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的具体体现。确定一个什么样的保障标准，至关重要，它关系到整个改革的成败。鉴于我们是在原来福利型的统包统揽保障方式的基础上进行改革，因此应把一些“超基本”的部分剔除出去，把真正该保未保的保起来。标准定高了，效益好的企业不愿参加，困难企业参加不了，社会保障的措施就很难落实。由于社会保障需求具有刚性增长的特征，在实践中表现为项目和保障水平只能上、不能下，从而使保障规模不断扩大，保障支出亦不断膨胀，社会保障的总体水平越来越高。如果社会保障的规模和水平超过了社会经济的承受能力，就会变成国家的负担，增加财政赤字，国民经济的发展就会受到影响。也必然会严重影响国家的竞争实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各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不平衡，且非短期内可以改变，这是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中必须尊重的客观事实。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保障水平，这一点必须十分明确。本地区有什么样的经济发展水平，就只能提供什么



样的保障水平。俗话说“穷人不能办富人的事”,攀比只能自食苦果。

2. 广覆盖。“广覆盖”就是社会保险必须遵循普遍性原则。因此，社会保险要逐步扩大覆盖范围，这样才能发挥其互助共济、分散风险、稳定社会的功能。“广覆盖”与“低水平”是一个相辅相成的有机整体，“低水平”有利于“广覆盖”，只有“广覆盖”才能把缴费的水平降下来。广覆盖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互济，互济功能的发挥取决于社会统筹的层次，而社会统筹的层次又取决于现实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各方面的承受能力。作为社会保障重要项目的社会保险有一个“大数法则”,即参加保险的人数越多(覆盖面越大),互济功能就越大,抵御风险的能力就越强。所以,我国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是要覆盖城镇全体劳动者。社会保险是政府在承诺范围内承担最后责任的基本保险,必然是一种法定保险。作为法定保险应该是面向社会全体成员的,所有在统筹范围内的社会成员和单位都要无一例外地参加社会保险(当然,这需要一个逐步扩大的过程)。

3. 多层次。“多层次”就是要在开展社会保险即基本保险的同时，举办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个人储蓄性保险以及社会救助等，这样既可以体现公平，又可以体现效率，既可以把国家和用人单位过重的负担降下来，又可以满足不同企业、不同行业、不同人群多层次的社会保障需求。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和发展趋势。因此，社会保障的方式和途径必须多形式、多层次、多渠道，决不能“单打一”，一个基本保险包打天下。必须充分调动社会成员及社会各方面的力量，通过发展企业补充保险、商业保险，积极开展社会救助，鼓励进行个人储蓄性积累保障等多种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如果不发展商业保险等多种保障形式、建立多层次的社会保障体系，基本保障也难以巩固和发展。

4. 双方负担。“双方负担”就是改变过去由国家财政和用人单位包揽职工社会保障费用的做法，实行基本养老、基本医疗保险费用由用人单位和职工个人双方共同负担。这也是国际上的通行做法，这既可以减轻国家和用人单位的负担，又可以增强职工自我保障和节约费用的意识，形成稳定的保险基金筹资渠道。

5. 统账结合。“统账结合”就是指基本养老保险、基本医疗保险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将自我保障与社会共济有机地结合起来，将纵向积累与横向调剂有机地结合起来，将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有机地结合起来。

10.4　新时期中国社会保障的基本原则

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建立健全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制度，在指导思想上要坚持如下一些原则。

10.4.1　社会保障水平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原则

从国内外的经验教训来看，社会保障中的“高福利”政策和“平均主义”原则都不可取。一些西方福利国家的财政负担越来越重，由此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即使像我国计划经济条件下那种普遍福利政策现在也难以为继。因此，在进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时，其保障水平必须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生产力水平相适应，既要以人为本，又要使国家和单位的负担能维持在一个适当的水平，保证企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活力和竞争力。

10.4.2　权利与义务相统一的原则

在传统体制下，社会保障费用由个人负担的部分很少，国家和企业包揽过多，不堪重负，这也使劳动者缺乏自我保障意识和责任。建立新体制，要适当减轻国家和单位代个人承担的责任，强调个人参与，增强人们的自我保障意识和节约费用意识，在自我保障的基础上发挥社会保险的互济功能。

10.4.3　效率与公平相结合的原则

社会保障的不同项目体现公平与效率的程度不同。社会救济、

优抚安置和部分社会福利事业支出主要由国家财政负担，凡符合条件者可以无偿使用，体现公平原则；社会保险的主要项目，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由用人单位和职工共同负担，职工享受的保障水平，既要能保障职工的基本生活、基本医疗需求，体现社会公平，又要与个人缴费多少挂钩，以激励职工的劳动积极性，提高效率。

10.4.4 制度、政策统一的原则

社会保障作为一个国家基本的经济社会制度，在制度模式和基本政策上一定要统一。如果政出多门，各行其是，不但不利于社会保障事业的健康发展，而且会给政府造成极大的麻烦，影响社会的稳定。考虑到我们国家大、情况复杂，各地经济发展存在很大差异，在推进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特别是养老、医疗保险制度改革时，一定要坚持大政方针集中统一，具体办法因地制宜、体现差别的原则，切忌搞“一刀切”、一个模式。

10.4.5 政事分开的原则

政府行政管理和保险基金营运管理应分开，执行和监督机构应分设。社会保险管理机构主要是行使行政管理职能，管规划、管政策、管制度、管标准、管监督，不直接管理基金的收缴和营运。社会保障基金的营运由社会保险基金管理机构依法经办，受政府和社会监督。要将目前各部门各单位对社会保险的分散管理逐步转为统一的社会化管理，将目前企业承担的社会保障事务性工作转为社会化服务，这有利于解决机构重叠、政出多门、业务交叉、资金分散、成本上升、管理不善等问题。

10.4.6 城乡有别原则

现阶段我国城乡之间在生产力水平、就业结构、收入水平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差别很大，因而在保障形式、标准等方面，城乡之间应有所区别。在现阶段，社会保障的主要项目，如养老、医疗保险

制度，主要在城镇机关事业单位和各类企业及职工中推行。广大农村在近期内尚不具备普遍实行社会保险的条件，主要是依靠土地、家庭保障，同时靠集体经济、集体组织如合作医疗等保障方式。在一些农村经济发达、群众温饱有余、基层组织健全的地区，可采取农民自愿和政府组织引导相结合的办法，积极稳妥地发展农村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障制度。

新的世纪伊始，需要进行的改革很多，社会保障则是直接关系到人们生活水平的重要改革，先挖沟后放水，它也是许多改革的重要前提，不进行不行，搞不好也不行，相信在上述思想指导下，中国的社会保障会有全新的局面，能够适应21世纪对于这一事业的要求，也能够体现出不断发展的中国风貌。

第11章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政策取向

在世纪交替的2003年，回首2002年，中国经济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内生产总值突破10万亿人民币大关，进出口贸易有6 200多亿美元，引进外资超过美国列世界第一，城镇居民储蓄超过87 000亿元人民币，外汇储备创记录地达到2 864亿美元，稳居世界第二位。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又似乎特别让人不放心，西方的学者甚至提出了"中国经济崩溃"的命题，国内学者则在不断争论宏观经济形势大好下的结构失衡问题尤其是微观经济的困境，说法相左，莫衷 -是。笔者的观点是：中国微观经济层面出现了很好的转机，各种

结构调整在动态的状况下很难满足静态的"到位"，但中国宏观经济层面存在的问题在这几年的积累，却产生了对内、对外同时的巨大失衡，这将影响我们全面小康的实现和中国经济进一步健康发展。笔者愿意与关心中国经济的人们共同探讨此问题。

11.1　东亚金融危机后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取向的探讨

1998—2002 年，在国内出现相对过剩，各种矛盾逐渐浮出水面，外部经济环境不宽松的条件下，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基本出发点呈现出保证经济增长率的强烈取向。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中国调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手段和资源（甚至包括计划经济的有力措施），来刺激内需的扩大和经济的增长。结果是中国在经济发展、增加外贸顺差、扩大公共开支等方面取得了成功，但却造成了外汇储备的急速增长，以及金融体系中存贷差的大幅度增加，出现了宏观经济内外同时失衡的现象。与此同时，尽管中国政府的宏观政策在追求增长率、为国企解困等目标的过程中，体现出强烈的指令惯性，但中国微观经济基础却在不断走向市场主导，中国经济的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日趋明显，已经对未来中国经济全面小康的实现和经济的全面发展产生了负面的影响。

11.1.1　外经贸政策的基本取向

长期以来，中国一直存在外汇缺口。因此，改革开放二十几年来，中国对外经贸政策的核心思路是增加外汇储备。"对外开放"的政策，被理解为增加出口和引进外资，对进口增长形成了自觉和不自觉的限制，单纯追求贸易的顺差和外资的净流入。1998 年以后，中国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八"，而之后则是保"七"，即维持总体经济的较高增长率，从而使维持以至扩大贸易顺差成为一个可调控的政策手段，更加强化了对贸易顺差的追求。

不过，从外汇的供求来看，1994 年以前，中国长期处于紧缺状态。但 1994 年的汇率并轨，以及 1992 年邓小平南巡引起的外商投资中国潮，逐步改变了原来的短缺状态。因此，从 1994 年开始，中国的外汇储备从较低的水平逐步提升。实际上，这个储备水平到 1996 年很多人认为已经超过了国际公认的合理水平。因此，当时对外经贸政策讨论的方向是开放经常账户，并循序进行资本账户的开放。在实际操作过程中，国家外汇管理局不但于 1996 年底实现了经常账户的开放，汇率水平也逐步反映市场供求状况出现升值（在这个过程中，最能够反映市场供求状况的汇率黑市价格也随着官方汇率一起升值）。当时，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目标是在 10 年左右的时间内，逐步实现人民币在资本账户下的可兑换。关于中国的对外经贸状况见表 11—1。

表 11—1　　中国的对外经贸状况

单位：亿美元，官方汇率为兑美元比率

年份	出口	进口	顺差/逆差	官方汇率	外汇储备
1985	274	423	－149	2.94	26
1990	621	534	87	4.78	111
1993	917	1 040	－123	5.76	212
1994	1 210	1 156	54	8.62	516
1995	1 488	1 321	167	8.35	736
1996	1 511	1 388	123	8.31	1 050
1997	1 828	1 424	404	8.29	1 399
1998	1 837	1 402	435	8.28	1 450
1999	1 949	1 657	292	8.28	1 547
2000	2 492	2 251	241	8.28	1 656
2001	2 662	2 436	226	8.28	2 121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 1985—2001 年各年《中国统计年鉴》汇总。

然而，1997 年爆发的亚洲金融风暴，以及 1998 年金融风暴对东亚各国和各地区的巨大影响，打乱了上述进程。经济学界对外汇储备是否过多的辩论，转而服从于追求更多的外汇储备，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宏观政策。而国际投机者对港币的进攻，以及国际金融

界对人民币的贬值预期，改变了市场上对人民币汇率走势的心理。人民币黑市与官方汇率的差距再度拉大，中国外汇管理当局的政策被动地演变为全力捍卫人民币的汇率，保障本国和整个地区的金融安全，特别是为维持港币汇率稳定，中央政府不得不反复重申人民币的稳定（与此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和台湾放任汇率贬值）。与此同时，由于经济出现过剩，拉动经济的力量不足，“三驾马车”的作用突出体现，为了追求高经济增长率，出口作为经济增长的推力，贸易顺差便自然成了顺风船。1999—2001 年，中国的外汇储备再次增大，市场汇率回稳。本来，从 1999 年开始，可以重新考虑汇率与外汇储备的问题，但 1999 年春中国大幅度启动加入 WTO 的进程，又需要积累更多外汇储备以备不测。

2001 年“9·11 事件”后，随着世界各国对美元贬值预期的形成，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人民币黑市汇率在当年的 10 月份升破官价，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历史上的第一次，也是发展中国家和转轨经济中少见的现象。由于外汇管理部门强烈维护人民币汇率的稳定，海关工作兢兢业业，出口骗汇几乎成为不可能，黑市批量外汇需求大降，结果便是外汇市场供大于求，过量的外汇转变为国家外汇储备的增加，2001 年以后，中国的外汇储备呈现出直线上升的态势。

2002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第一年，但在这一年，预料中的进口冲击并没有出现，中国的出口和进口都在高位上运行，当年中国外贸进出口总值达到 6 207.9 亿美元，比上年增长 21.8%，其中出口首次突破 3 000 亿美元，达到 3 255.7 亿美元，增长 22.3%，进口达到 2 952.2 亿美元，增长 21.2%，全年实现贸易顺差 303.5 亿美元。2002 年中国的贸易顺差不减反增，实在出乎所有人意料。同时，国际上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呼声日高，在全球国际直接投资大幅度下降的背景下，中国吸引的外资突破了 500 亿美元，成为全球吸引外商直接投资最多的国家。因此，到 2002 年底，中国的外汇储备突破 2 800 亿美元。

从发展趋势上看，如果现行政策不作重大调整，中国的外汇储备还会继续增加，其原因包括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力还有提高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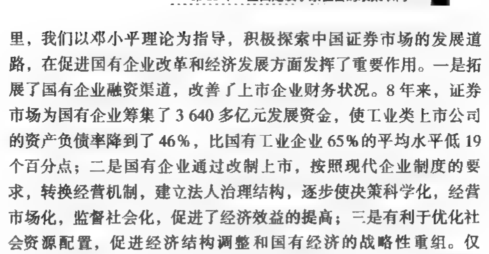
间，外资进入中国的步伐没有放缓。同时，全球形成了美元贬值预期，中国居民不愿持有美元的心理在继续强化，中国要注意类似“广场协议”事件发生而使得人民币被迫升值。另一方面，用顺差拉动经济增长的任务依然繁重，政府最高财经领导人的心态依然没有发生改变。

然而，外汇储备的积累，是不是越多越好，过多的外汇储备应该说会从宏观层面威胁中国经济的长期均衡发展。本章后面部分将会从理论上阐述这个问题。

11.1.2 金融市场的困境：为国企解困与银行体系的资金过剩

1．股市：为国企解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各种条件的变化，国有企业出现了空前的困难，为国企解困成为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一个重要的方面。20 世纪 90 年代中后期，国有企业的主要困难被简单总结为“钱从哪里来、人往何处去”，而非体制的困难，国有企业的困难被有意无意地定位为主要是缺少资金，解困的必要条件（但绝非充分条件）就是解决国有企业的资金问题，在财政拿不出钱，又担心银行的不良资产会因企业的财务困难而加重的时候，人们的眼光开始转向了股市，希望从股市融资、“圈钱”来解决企业的资金不足问题；政府相信如果能够减少企业的财务负担，增加企业的资本金，则企业就可解困，于是利用股市筹资解困成了必然：将国有资产稀释到民间，利用股市将资金再次流转回国有企业，便成为一种政策。国有企业既然是全民的，则其困难理所当然应该由全民承担。

上述思想，到 1999 年已主导了政府的股市政策。例如，1999 年 5.19 行情之后，当时的中国证监委主席在回答记者问及“管理层对证券市场作用的理解”时指出，国有经济是我国的经济主体，因此证券市场必须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这是有中国特色证券市场的重要内容。其后《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十分清楚地指出，中国的股市发展主要是为国有企业改革服务的。“在过去的 8 年多时间



里，我们以邓小平理论为指导，积极探索中国证券市场的发展道路，在促进国有企业改革和经济发展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拓展了国有企业融资渠道，改善了上市企业财务状况。8年来，证券市场为国有企业筹集了3 640多亿元发展资金，使工业类上市公司的资产负债率降到了46%，比国有工业企业65%的平均水平低19个百分点；二是国有企业通过改制上市，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转换经营机制，建立法人治理结构，逐步使决策科学化，经营市场化，监督社会化，促进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三是有利于优化社会资源配置，促进经济结构调整和国有经济的战略性重组。仅1998年，就有277家国有企业通过证券市场实施了收购、兼并和资产重组；四是通过支持高新技术企业上市，促进了高新技术企业产业化发展和技术进步。1998年，经国家有关部门认定的高新技术上市公司达135家，占全部上市公司的16.2%。实践证明，证券市场已经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我国宏观经济继续保持了持续健康发展，证券市场具有长期稳定发展的良好基础。1998年，我国金融机构新增各项贷款11 000多亿元，同期股市筹资只有840亿元，仅相当于贷款总额的7.6%。而在发达国家，直接融资比例一般在50%左右，我国发展证券市场的潜力还相当大。另一方面，近年我国总储蓄率高达40%左右，截至2002年5月底，城乡居民储蓄存款余额突破8万亿元大关，到6月底，累计余额已达81 712亿元，居民手持现金超过了1万亿元，在银行利率下调的情况下，为居民投资多元化创造了条件。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股市成为服务于国有企业解困的场所，形成了一种怪圈：从资本市场直接获得资金达到了资本比重的40%。企业上市集资，给银行带来了问题。一般来说，好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而在正常情况下，恰恰只有它们可以为银行贷款还本付息，由于这时有了几乎没有成本的巨额资金来源，企业获得了可以支配的无偿资金，因而任何支付利息的可能负担，均使得这些企业没有动力从银行贷款；但同时银行的存款在不断增加，银行向储户付息是

必然的，造成了银行运营的困难。另一方面，营运差的国有企业无法上市，如果银行向它们贷款，则意味着坏账的增加，拒绝贷款则意味着这些企业的困难的进一步加剧。同时，在将部分国有企业债转股过程中，政府也试图通过资产管理公司来解决银行坏账和企业的财务压力，但最终的出路还是寄希望于企业的财务压力减少以后再向股市推出，以筹资偿还资产管理公司。

不过，实际情况的发展与原来的设想大相径庭。对于好企业来说，它们在股市的发股、配股得到了庞大的资金，但在得到钱之后依然无法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企业业绩改善的幅度有限。为了进一步筹资，只好编造业绩，上市企业热衷于各种关联交易等不规范的行为；同时，为了炒作股价，股市上的其他力量也到处兴风作浪，严重破坏了中国资本市场的秩序。这种状况，又迫使证券管理当局，决心下大精力来整顿市场的秩序。

因此，2000 年以后，股市的基本发展思路演变为，一方面整顿市场秩序（甚至有人提出要推倒重来）；另一方面进一步为国有企业筹资，而且，政府希望通过国有股的减持问题，在为国有企业筹资的同时，为政府的社会保障资金筹集款项。应当说，后一种思路，与 1999 年以来为国企解困的做法是一脉相承的，即政府发展股市的目的，已经发展成为为自己解困——筹集社会保障基金。

不幸的是，这个做法得不到市场的认可。应当说，中国股市的发展有其特定的历史环境，在 1990 年底起步的时候，中国能够上市的只有国有企业。而且，当时发展股市属于尝试性质，在意识形态方面有一定的风险。但是，中国的股市很快成为居民投资的场所，从此管理层与股民之间的互动出现了所谓的“政策市”，即政府是通过上市企业的数量来操控股市的发展，在很多情况下，政府的做法是要抑制股市的过度投机行为，这种情况在 1996 年尤为突出。从这个意义上看，1999 年以后政府对股市作用的重新定位有一定的合理性。但是，到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发展的背景已经发生了重大改变，一是经济发展中最有活力的部分不再是国有企业，二是股民的投资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未必再受“政策市”的操

控。与中国经济体制全面走向市场经济一样，中国股市的运作轨迹，也在迅速走向由市场决定。

在典型的市场经济中，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股市扮演的功能，是将资源配置到最有效率的地方去。从西方国家200年的股市发展史来看，哪个国家符合这个规律，哪个国家的股市就较为健康，而且具有可持续性；反之，则不然。因此，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大背景一致，中国股市的上市企业主力应该实现从国有企业向民营企业、三资企业的转型。在中国股市中，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地位的上升并没有直接反映到股市中，民营经济在股市中所占的比重远小于国有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在目前中国股市1 200多家上市公司中，有90%是国企，而国企的经营状况相对中国整个经济状况，其代表性已经不足50%，因此股指所代表的只是部分国企的经营状况。如果说中国股市在20世纪90年代建立之初为国企改革服务还有其必然性的话，那么在中国经济经过这十几年的发展后，随着民营经济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份额不断提高，原有的对中国股市的定位显然已不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但很明显，政府的做法却是将股市的资源进一步向无效率的地方倾斜（这将从根本上破坏中国尚不成熟的资本市场）——为国企解困、以至于解决社会保障基金问题。而从东欧（包括前民主德国）的经验看，在市场力量逐步发展起来之后，国有企业的资产基本不可能被现代资本市场全部认可。中国的经验也是如此，在政府宣布进行国有股减持之后，中国的股市陷入了前所未有的低迷状态，此后政府出尽了一系列救市招数，都起不到预期的效果，这表明股票市场上投资者的行为正在逐步走向市场决定，如果不符合市场预期，再多的利好政策效果可能也是有限的。

或许我们可以说，近年来中国股市的发展方向值得重新探讨，不在根本方向上理清思路，而仅仅在市场规范和秩序上做文章，是远远不够的，还可能适得其反。而且，从全局来看，作为直接融资的手段，中国股市的发展与中国的银行业联系到一起，两者的发展思路都值得重新研究。

2. 商业银行的改革方向。中国的银行体系以工、农、中、建四大商业银行为主体，长期以来，国有银行服务的对象是国有企业。1992年以后，中国经济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非国有部分在经济中的比重迅速提高。有关研究表明，近5年来，民间投资在全社会投资当中所占比重已从原来的35.9%上升到2001年的44.6%。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2年前10个月，中国民间投资增长速度达到18%，是2001年同期增长速度的两倍，国内民间投资的比重已接近国家投资。但很显然，中国商业银行体系服务的对象，并没有随着整体经济结构的改变而转移到民营企业身上。银行体系发展方向的错位，加深了中国的商业银行体系的特殊困境——存差问题。

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长期处于资金短缺状态。但是，从1994年，随着宏观经济从短缺走向过剩，中国金融体系出现了存款大于贷款的存差现象，而且，存差还有越来越大的趋势。中国在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过早出现了资金过剩现象。产生存差问题的原因很多，但我们认为，重要原因之一是体制性问题，即商业银行失去了作为资金中介的功能，无法将社会储蓄转移为有效的投资，无法有效地将资金融通到最有效率的民营经济中去。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的金融业面临相当的挑战。

1998年以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思路，是增加资本金、剥离和减少不良资产等技术思路，在某种意义上看，四大商业银行改制的目标，还是典型的国有企业改革思路——上市集资，希望通过上市达到双重目的，既解决资本金不足的问题，又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这种只重视技术层面的改革思路，后果是银行间接融资功能的衰退。在这种思路下，各商业银行的各级分支机构，都致力于内部的技术工作，如减少成本、控制坏账、收缩网点等，在增发贷款方面显得谨小慎微，惜贷现象严重。因此，我们看到近年来中国的贷款增长率下降，从1997年和1998年的12.25%和11.55%，大幅度下降到1999年和2000年的8.33%和6.01%，而同期存款增长速度一直维持在12%～15%的水平，造成同期存差大幅度上升。2001年贷款增长率才恢复到13.03%，但存差依然在继续上升，这

表明中国金融体系的资金中介功能出现了严重问题（见表 11—2）。

表 11—2　　1990—2002 年中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　　单位：亿元

年份	各项存款	各项贷款	存贷差额	外汇占款
1990	14 012	17 689		599
1991	18 079	21 338		1 228
1992	23 468	26 323		1 102
1993	29 627	32 943		1 432
1994	40 472	40 810	－338	4 504
1995	53 862	50 538	3 324	6 775
1996	68 596	61 156	7 440	9 579
1997	82 398	74 914	7 484	
1998	95 698	86 524	9 174	
1999	108 779	93 734	15 045	14 792
2000	123 804	99 371	24 433	14 291
2001	143 617	112 315	31 302	17 856
2002	171 000	13 000	40 000	22 585*

* 为 2002 年 11 月底的数据。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2002)，中国人民银行网站。

前述的国有企业在股市上的行为，更加加重了银行体系的矛盾。对于上市企业来说，无偿的集资，更令这些企业没有必要从银行贷款。因此，国有银行失去了国有企业中可以为自己创造利润的优质客户。在服务对象不积极向民营经济和个体消费者（如房屋抵押贷款等）转移的情况下，中国商业银行体系的存差现象恐怕会愈演愈烈。但更严重的是，过去几年来股市和银行体系改革的客观后果是，金融市场中股票市场的直接融资功能和银行体系的间接融资功能在同步削弱，如不更改将来问题会更严重。

11.2　转轨中的政府作用

我们看到，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国有企业从股市直接融资，企业无必要从银行贷款，更加剧了存差的扩大。当存差太大时（2001 年已经达到 3 万亿，2002 年突破 4 万亿，比 1998 年的

9 000亿元整整增加了3万亿元。或者说，这个数量相当于2002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有40%处于闲置状态），意味着资金严重供大于求，利率只可能维持低水平，而过低的利率会造成货币政策的失效，经济调节手段效果甚微，甚至失去作用。实际上，如日本的情况一样，今天中国的货币政策已经剩下极小的空间了，因此才有“淡出”的说法。在这种情况下，宏观经济只能靠财政手段调节，积极的财政政策成为必然，所以许多人认定中国经济的困难的底线应以财政能够“罩住”为界。

1998年中，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的影响，以及国内需求的严重不足，中国政府在年中改变了原来的政策取向，从当年7月10日决定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由中央财政向商业银行增发1 000亿国债，专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1999年7月，进一步加大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力度，通过增发国债增加固定资产投资，当年发行国债1 100亿元。2000年和2001年各发行了1 500亿长期建设国债（引自财政部部长助理李勇2001年11月19日在香港的讲话），其中包括500亿特殊国债，主要用于西部开发项目。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后，中国的财政赤字在原来的基础上大幅度增加。1998年的财政赤字为922亿元，比1997年增加58.42%；1999年的财政赤字为1 744亿元，增长率高达89.15%；2000年为2 491亿元，进一步增长了42.83%；2001年则基本维持在2000年的高水平上（见表11—3）。

表11—3　　中国的财政赤字与国债发行　　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赤字	国内债务	国内债务余额	国内债务还本付息
1990	146	93	892	113
1995	582	511	3 302	784
1997	582	2 412	5 511	1 820
1998	922	3 229	7 839	2 246
1999	1 744	3 702	10 607	1 792
2000	2 491	4 154	13 000	1 552
2001	2 516	4 484	16 000	1 923

资料来源：本表根据1990年、1995年、1997年、1998年、1999年、2000年、2001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汇总。

与发达国家对比，中国目前的财政赤字不算大，中国的国债余额也不算太高。2001 年，中国的财政赤字只相当于 GDP 的 2.62%，国债余额只相当于 GDP 的 16.7%。因此，很多人认为中国政府有继续推行赤字财政，以及继续发债的空间。但另一方面，过去 5 年来，中国财政收入和财政支持的增长幅度远远高于同期 GDP 的增长速度，中国的公共开支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在大幅度上升。过去 5 年来，政府的财政收入延续了 1994 年实施分税制以来的趋势，年均增长率约为 18%，大约高于同期 GDP 增长率 10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的增长与财政开支的增长互为因果，财政开支的年均增长率约为 19%，比财政收入的增长还高 1 个百分点，比 GDP 增长率则高了大约 11 个百分点。财政收入占 GDP 的比重，从 1994 年的 11.2%，上升到 1998 年的 12.6%，到 2001 年急速跃升到 17.1%；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2001 年更高达 19.7%，而 1998 年和 1994 年分别只有 13.78%和 12.39%（见表 11—4）。

表 11—4　　中国政府的收支状况　　单位：亿元

年份	财政收入	税收收入	预算外收入	财政 + 预算外收入	财政支出	预算外支出	财政 + 预算外支出	国内生产总值
1990	2 937	2 821	2 709	5 636	3 084	2 707	5 791	18 548
1993	4 349	4 255	1 432	5 781	4 642	1 314	5 956	34 634
1994	5 218	5 127	1 863	7 081	5 793	1 710	7 503	46 759
1997	8 651	8 234	2 826	11 477	9 234	2 686	11 920	74 462
1998	9 896	9 263	3 082	12 978	10 798	2 918	13 716	78 345
1999	11 444	10 683	3 385	14 829	13 188	3 139	16 327	82 067
2000	13 395	12 582	3 826	17 721	15 887	3 529	19 416	89 442
2001	16 386	15 301	—	—	18 903	—	—	95 933

资料来源：根据 1990、1993、1994、1997、1998、1999、2000、2001 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

但是，中国政府的相关收支，并不仅限于财政收支，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预算外收支。如果将预算外资金考虑进来，我们发现政府收支在经济中的比重更大（考虑到各种合法和灰色的非预算资金和费用，则比重还要大）。更关键的问题是，这个比重过去几年中在

大幅度上升。如表11—4所示，实施分税制之前的1993年，财政收入和预算外资金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6.69%，实施分税制第一年的1994年为15.14%，1998年缓慢上升到16.57%，但2000年大幅度上升到19.25%。财政支出和预算外资金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升得更快，1993年为17.20%，1994年为16.05%，1998年为17.51%，2000年已经上升到21.71%，短短三年间，上升了4.2个百分点。如果考虑中国的银行体系的呆坏账、国有企业的亏损、医疗保险、养老账户的空账，中国的财政赤字需要有另外的计算方法。据国外的估计中国所有的公共债务加总的话，大约要占中国GDP的70%～90%。这种情况，与中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的趋势，以及对市场经济微观基础的塑造是极不一致的。显然，这种发展策略也不具备可持续性。

从另外的角度分析，从1999年至2000年，中国的GDP增加了7 375亿元，而同期财政支出加预算外支出增加了3 089亿元。换句话说，这一年中GDP增量的41.88%来自政府开支的增加；或者说，政府用掉了当年GDP增量的41.88%。从政府收入的角度看，问题同样严重，同期政府的财政收入加预算外资金收入增长了2 892亿元，相当于当年GDP增量的39.21%，也即政府拿走了当年GDP增量的39.21%。看到这个数据，人们会发现在中国的经济增长中政府计划的痕迹是很浓重的。

因此，未来中国财政政策的走向，问题不在于是否应增发国债，或是推行多大规模的财政赤字，而在于是否要继续强化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还是要扭转政策方向适当降低政府在经济中的作用，避免走上管制经济之路。近年来，日本经济正好陷入这个陷阱。而且，由于日本政府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没有主动解决上述问题，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经济陷入衰退再想解决这个问题时，财政赤字和国债的包袱已经积重难返，宏观经济内外失衡的矛盾空前激化。并且，政府过度介入经济活动，在客观上必然发生公共开支排挤民间经济的情况。

11.3 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向符合市场化的微观经济基础的方向调整

11.3.1 微观基础的市场化与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性

简单的两缺口分析模型显示出，过去 5 年中中国经济已经走上了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80—90 年代的老路，而且外部的失衡（外汇储备累积）和内部的失衡（资金过剩）是同步发生的。如果不对现行宏观经济政策做出相应调整，外部失衡和内部失衡的局面可能会更为严重。

上述局面的出现有深刻的背景。1995 年以来，随着微观经济基础的逐步市场化，中国经济已经从计划模式的“短缺经济”，进入了本应该是富有市场经济特征的“过剩经济”阶段。但中国的经济学界、从事政府政策研究的智囊机构、中国财经方面的引路人并没有及时而完全地体会这种转变，而是将这一现象总结为“结构性短缺”，这导致在相当长一个时期内，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在延续短缺经济时代提高效率、增加有效供给的思路，没有切实重视在“过剩经济”下必须考虑需求管理的政策取向。1998—2002 年政府宏观经济政策的目标是维持高增长率，在无法刺激民间消费和民间投资的条件下，惟有通过外部需求拉动——体现为追求贸易顺差和增加政府公共开支。结果经济增长的目标虽然达到了，但宏观经济的内外失衡也形成了并越来越强化。这一情况反映着中国经济微观经济基础的巨大变化与宏观经济政策与之不相适应，甚至背离的现实。

因此，未来宏观经济政策应该尽快扭转内外同步失衡的局面，即一方面如何调整外经贸政策以降低外汇储备；另一方面降低存差。这种调整的思路是要尽快扭转宏观经济政策与微观经济基础背离的趋势，让宏观经济政策取向反映市场化的微观基础，确立具有可持续性的宏观经济政策。

11.3.2 外经贸政策调整

今后，中国对外经贸的主导思想是否仍然应以继续追求外贸顺差和外汇储备为取向，抑或应该是实现宏观经济的内外平衡，人们的看法并不相同。但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摒弃重商主义思潮，减缓过量的外汇储备，尽快实施中国外经贸体制的市场化运作，充分反映中国在国际经济中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却是前进的大方向。人们在谈及问题的解决时，常常提到三种政策选择：第一，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调整；第二，资本账户的循序开放；第三，人民币汇率的灵活浮动。

在现有的政策框架下调整的措施包括放宽对外投资、放宽海外旅游、海外升学与移民、进口便利化等。实际上，从 2000 年底开始，放宽海外投资、旅游、升学等措施已经在陆续实施，但这并没有能够起到减缓外汇储备的作用。2002 年 9 月份已经实施进口便利化，但当时的初衷似乎是为了增加进口环节的关税和增值税收入，以弥补财政收入增长幅度下降的空间，属于被动型、应急性的做法，而不是本节提出的战略性考虑。

我们认为，资本账户循序开放与汇率灵活浮动的问题需要提出来讨论。国际舆论普遍认为，中国正在逐步成为一般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而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日益对中国形成压力。在这种状况下，中国的未来利益在于贯彻自由贸易原则，因为中国未来将从国际自由贸易中获得最多的好处（具有讽刺意义的是，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自由贸易的推动者美国如今出现保护主义思潮，中国却要以实际行动来消除美国的顾虑，推动美国继续实施自由贸易政策）。从历史的角度看，世界经济中的大国应该追求对内外的同时均衡，这对世界经济有着重要的意义。

11.3.3 金融政策必须反映市场的需求

本章第二节分析的金融市场失衡，既造成了庞大的剩余资金，又无法形成有效的内部消费和投资，进而造成政府的财政力量不堪重负。因此，如何顺应市场的需求，使金融政策与市场化的微观基

础相适应，通过直接融资和间接融资的市场化，将过量的存差转变为有效的内部投资，便成为需要认真探讨的问题了。

直接融资的有序市场化是股市发展的方向，未来的资本市场不应该作为国企解困的工具，更不应该作为政府社会保障基金的提款机，而应该真正成为配置金融资源的市场，让最有效率和活力的民营企业和三资企业能够成为上市和融资的重要角色。只有解决了这个方向性的问题，才能具备同步解决监管、规范操作等问题。不理清上述方向，单纯强调监管，恐怕是缘木求鱼。

间接融资的市场化主要是国有商业银行的服务对象问题。未来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重心，不应该仅仅是完善自我的公司治理结构、剥离坏账、追求利润、以至上市集资，而更应该侧重于如何为日益成为国民经济主力的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以及个体消费者提供融资服务，真正发挥银行的资金中介功能。

11.4　结论：两缺口模型——走向内外同步失衡的宏观经济

从某种意义上看，中国宏观经济的上述问题与日本在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以来的发展类似。日本经济走的也是持续累积外汇储备，而本国的资金过剩的道路。但是，日本经济在 20 世纪 90 年代陷入低谷之后，上述问题并没有缓解，而是越来越严重。我们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宏观经济模型——两缺口模型来考察近年来中国宏观经济的问题。

从宏观经济供给和需求的角度考察，一个国家的产出可以表述为以下两种形式：

需求：$Y=C+I+G+X$

供给：$Y=C+S+T+M$

如果财政收支平衡，则：

$$I+X=S+M$$

（若进出口平衡，则有：$S=I$ 这一基本公式）

经变换，则：

$$S-I=X-M \qquad S=I+(X-M)$$

若 $S<I$，则 $X<M$

若 $S>I$，则 $X>M$

若财政也出现失衡，则

$$S-I=(X-M)+(G-T)$$

一般来说，发展中国家经常处在两边都是缺口的情况，即等式的一边是储蓄缺口，而另一边则是外汇缺口。因此，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要同时突破两个缺口。但是，日本和中国经历的情况正好相反：等式的右边是不断增长的巨额的贸易顺差，这反映在外汇储备的不断增加上；而等式左边必然出现储蓄富余，即存差（体现为外汇占款）。当然，现实生活中，需要考虑公共开支和税收的因素，稍微复杂一些，但从总体上看，贸易顺差、外汇储备增长与存差之间是存在对应关系的。日本长期以来的情况，是等式的两边都在积累，宏观经济最终走向失衡；而中国宏观经济过去5年的表现，或多或少地在重复日本的老路。从表11—2 中国金融机构信贷资金平衡表上，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经济存差的形成，与由外汇储备引起的外汇占款有极大的关系。

在前面我们分析过，好企业才有资格上市，而恰恰它们可以为银行贷款还本付息，这时有了几乎没有成本的巨额资金来源，即企业可以从股市获得可以支配的无偿资金，利息的支付使得它们没有从银行贷款的动力，而银行的存款不断，向储户付息是必然的，造成运营的困难。而营运差的企业无法上市，银行给予贷款，意味着坏账的增加，拒绝贷款则意味着这些企业的困难的进一步加剧。与此同时，银行的存差意味着贷款的减少，资金的供大于求，利率走低，而利率低到一定程度，货币政策就会失灵，经济只能够靠财政

政策调节，体现为相当时期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关键看国家财政究竟有多大的力量。国家必要的基础设施投资，又必须由财政解决。一方面是银行资金闲置没有渠道转化为投资；另一方面则是财政吃紧，不得不发行国债，长此以往财政将无力支撑，形成恶性循环，这种经济运行的底线是中国财政的承受能力。另外，国有企业的困难被认为是财务困难，得到无偿资金即可解困，于是利用股市筹资解困成了必然，社会资源的无效配置，某种程度上讲是中国股市在发展中面临着的根本性风险。长此以往，股市前景堪虞，因为长期资源的无效配置将会从根本上毁了股市，或从根本上阻止中国股市的顺利发展。

然而，基于过剩的失衡毕竟与基于短缺的失衡有着根本的区别，它可以给人们调整经济留有充分的余地和空间，只要宏观经济政策的走向适当调整，原有的失衡可以转化为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的动力。



后　记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国家教委博士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的资助，得到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在本书付梓之时，我们对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编辑所做出的辛勤工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本书撰写分工如下：

彭　刚：代前言；第1章；第2章；第3章。

黄卫平：第6章；第8章；第9章；第10章；第11章。

郭郁彬：第4章；第5章；第7章。

作者

2004年1月1日于世纪城